

破屋春秋

陈独秀  
一家人

吴晓  
著

三聯書店發行

# 陈独秀一家人

吴晓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京)新登字 3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独秀一家人/吴晓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 3  
ISBN 7-80109-010-1

I. 陈…

I. 吴…

II. ①陈独秀—生平事迹②家史—陈独秀

IV. K827.6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邮政编码:100032)

华北矿专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3 印张 310 千字

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01—16000

定价:13.80 元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缺页破损,请寄回更换)

## 内 容 提 要

陈独秀曾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名震环宇的人物。然而，他曲折复杂的人生轨迹却鲜为人知。四次婚变，扑朔迷离：元配高晓岚，文武攀亲强结姻缘，婚礼过后，一生落寞；妻妹高君曼，才貌不凡，志同道合结为伉俪，却始乱终弃；与医生施芝英一见钟情，秘密恋爱同居，终为露水夫妻；晚年落魄，偶遇知音潘兰珍，结为老夫少妻，生生死死，颠沛流离陪伴终身。膝下四子二女，父子情结微妙，各各自创人生：长子延年、次子乔年是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家，为追求救国救民真理，英勇就义；三子松年和四子鹤年，一生漂泊，命途多舛，遭受种种磨难；长女陈筱秀、次女陈子美，命运悲壮而凄惨……本书所描述的就是陈独秀与一家人悲欢离合、催人泪下的故事，也折射出他丰富多采的人生。史料翔实，内容丰富，情节曲折，引人入胜。

---

## 序

每个人身上都挂着无数的问号，  
每个人都有着令人难解之谜，  
普通人是这样，名人更是如此。

人生在世，总是要不断地向他人身上倾注探寻的目光。了解和认识他人，或许是人的一种生活的本能需求。

通常，人们在通过了解和认识他人以便立身处世、联络交往、立业成家的同时，也藉此满足着求知、猎奇乃至消遣的心理。在较深的层次上，可以说，人们是要通过了解和认识他人进而认识自己、认识社会、认识历史的。

他人，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他人的成功与失败、幸运与灾祸、善恶与爱憎、生死与美丑、思想与志趣等等，包括他人的一切，都可以用来对比自己，对照自己。人们正是通过不断地和各种各样的人对比、对照来认识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的。当人们咀嚼、品味他人一切的同时，实际上，是在读自己的心。而自己的心越是难读，人们越是需要了解和认识他人，以借助他人来把握自己。

他人,也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他人的一切,折射着社会之光,是社会的一个缩影,通过了解他人的人生,人们可以认识过去乃至现在不同地域、不同国度的社会变革、政治风云、世态民俗、人际关系和各种事件、事物等。认识了这一切,便可以使自己增长见识和本领,以驾驭自己的命运之舟。人们也是要循着他人成功的足迹,吸取他人失败的教训,汲取他人的思想智慧,驱动并激励自己参与社会竞争,确立并努力实现自己的追求与目标。

他人,还是历史的一面镜子。人是历史的主人。用野蛮与文明、落后与进步、斑斑血迹和斗艳的百花编织历史的,是人。透视他人的人生与命运,感受他人的经历与情感,可以更为真切地了解各种社会矛盾的产生,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发展动力;可以更为真切地了解 and 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懂得怎样把握今天,怎样去创造未来。

认识和了解他人,人们更关注名人。

名人们或是用自己非凡的本领、独特的性格、辉煌的成就,或是用自己传奇的经历、显赫的地位、多彩的人生享誉于世,更能激发人们的兴趣。在名人的身上,人们能获取对于自己、对于社会、对于历史的更为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基于此,名人们的一切,蒙着神秘诱人的色彩,有着几乎是无穷的魅力。

## 二

认识和了解他人,认识和了解名人,人们又无不关注他们的家庭。

家庭,是一个人的起点和归宿。具体来说,是一个人的成长的摇篮,是一个人的自由生活的港湾,也是一个人的隐秘场所。在家庭生活、家庭关系上,最能反映一个人的本质特点,因而人们能够看到摘去面具的那个人的真实面目。所以,只有真实地了解一个人的家庭生活、家庭关系,才能更真实地了解 and 认识那个人。

家庭,又是社会肌体的细胞,是历史长河的水珠。在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的变迁中,生动地反映着社会变化、人际真情、文化继承和血脉繁衍,以及人的性格特征等。当人们从家庭这一特定角度去了解 and 认识他人时,也获取着对于社会和历史的更为深刻的认识。

由于每个人都生活在家庭之中,家庭生活、家庭关系更能沟通人们的思想感情,触发共识,引起共鸣。因此,介绍好一个人的家庭,对于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那个人确实是至关重要的。

### 三

如此说来,我们应该感谢本书作者吴晓了。他的这部著作,很有助于我们认识和了解一位不该被人们遗忘的人物——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

在人们不断地去认识和了解他人的心理历程中,陈独秀以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以其独特的性格和生活方式,以其独特的命运和结局,有着显赫的名人效应。也就是说,陈独秀一家人,会引起众多读者的浓厚兴趣。

我和作者,有这样的共识。

于是,在一年前,在一个不是令人愉快的日子,当

我接到吴晓的来信,看到信中提到他正在撰写《陈独秀一家人》时,眼睛竟豁然一亮,油然产生了几分欣慰。我认为此书是值得写的。

此后,我们通了许多次信和电话,就此书的采访、撰写、修改、出版不断地交换着看法,成了陌生的朋友。

直到书稿即将付梓之际,我读到了吴晓写的小传和他寄来的照片,才知道,他是位资深的新闻工作者,是位老同志了,而在电话中,他的声音是很年轻的。

一位老同志,积十余年的功夫,留心采访,苦心搜集,并实地考察,以第一手资料写作,这是很难得的。起码,比依靠第二手、第三手……的资料来编著的写作态度,要严谨、要认真、要负责得多。这就构成了本书内容新鲜的特点。通读此书,能看到关于陈独秀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即便是一些报刊已经披露过的关于陈独秀的轶闻趣事,本书仍富有新意。吴晓说,他是对已经披露过的材料重新作了考证,而不是照抄照搬。

尚未来得及仔细研读本书,匆匆写下点感想,介绍些情况,权作序。

高建中

1994年2月16日



---

# 目 录

<b>第一章</b>	<b>安庆古塔多传说</b>	
	陈家破屋起春秋.....	(1)
	镇龙伏虎的振风塔.....	(1)
	古塔是“陈家祖坟上的一管笔”.....	(3)
	“独秀山下的居民”.....	(4)
	人杰地灵的故乡.....	(6)
	两保剖开陈家屋.....	(7)
	家世源远流长.....	(8)
<b>第二章</b>	<b>小户人家发迹难</b>	
	自幼铸就叛逆心.....	(10)
	“白胡爹爹”.....	(10)
	能干而慈爱的母亲.....	(12)
	兄长良师手足情深.....	(15)
	没有印象的父亲.....	(18)
	官运亨通的养父.....	(19)
<b>第三章</b>	<b>将门长女高晓岚</b>	
	文武攀亲结发妻.....	(25)
	苦难的童年.....	(25)
	文武攀亲强结姻缘.....	(27)
	唯一的一次婚礼.....	(28)

	思想隔膜酿成婚姻悲剧 .....	(30)
	独守空房悲郁离人间 .....	(32)
	夫妻合冢九泉下 .....	(38)
<b>第四章</b>	<b>才貌不凡高君曼</b>	
	<b>婚姻自主终见弃</b> .....	(41)
	上海来的落难女 .....	(41)
	将门才女高君曼 .....	(42)
	偶遇君曼一见钟情 .....	(43)
	婚姻自主高于族人歧视 .....	(46)
	西子湖畔情意绵绵 .....	(48)
	志同道合历经风险 .....	(51)
	琴瑟之中不乏暗流 .....	(54)
	觅新人君曼遭遗弃 .....	(56)
	含愤病死茅草屋 .....	(59)
<b>第五章</b>	<b>真诚女工潘兰珍</b>	
	<b>落难末路得少妻</b> .....	(63)
	沪上探监女 .....	(63)
	多灾多难的包身工 .....	(66)
	因祸得福遇知音 .....	(68)
	温暖柔情的世界 .....	(71)
	弱女子吐露情怀 .....	(73)
	雪夜红烛喜结良缘 .....	(75)
	老夫被捕直面事实 .....	(78)
	狱中相见情深似海 .....	(80)
	老夫囚犯少妻陪伴 .....	(84)
<b>第六章</b>	<b>小儿出世父远离</b>	
	<b>松年探监情依依</b> .....	(89)
	一对年轻的探监夫妇 .....	(89)

	不知父亲是什么模样 .....	(91)
	父亲被捕全家惊惶 .....	(94)
	柏将军说独秀小儿初识父 .....	(100)
	父子狱中相见热泪流 .....	(107)
	接父出狱巧遇后母 .....	(122)
<b>第七章</b>	<b>风流云散无家归</b>	
	<b>颠沛流离飘江津</b> .....	(140)
	“民惠”轮上的一对逃难夫妻 .....	(140)
	拒当劳动部长 .....	(142)
	不去美国做“寓公” .....	(144)
	“上海虽好不能去” .....	(147)
	路过家门不得归 .....	(149)
	黄鹤楼下愁肠断 .....	(152)
	总算有了个避难家 .....	(157)
	离党走末路 .....	(161)
	茫然惆怅蜀道行 .....	(164)
	重庆难有一个家 .....	(169)
	意外应邀去江津 .....	(170)
	吃“闭门羹”老夫少妻受辱 .....	(173)
	幸亏有了个流亡的家 .....	(176)
<b>第八章</b>	<b>故土沦陷举家迁</b>	
	<b>阖家团聚梦难圆</b> .....	(183)
	铁蹄下的安庆家 .....	(183)
	流亡急难好人助 .....	(188)
	家人团圆危难中 .....	(191)
	一家和睦多艰辛 .....	(196)
	贫病交加邓氏再相邀 .....	(200)
	开明巨商邀游白沙 .....	(204)

	母亲病故披麻戴孝·····	(212)
	遭“抢白”退隐鹤山坪·····	(218)
<b>第九章</b>	<b>隐居鹤山度春秋</b>	
	<b>家徒四壁节不变</b> ·····	(222)
	隐居石墙破屋的神秘老人·····	(222)
	破屋常有要人访·····	(226)
	破屋穷愁友情暖·····	(232)
	破屋雨漏缸无米·····	(242)
	破屋人穷清白在·····	(246)
	名大惹贼家被窃·····	(250)
	缸中无米助人乐·····	(252)
<b>第十章</b>	<b>老夫少妻情不移</b>	
	<b>陪伴终生终无悔</b> ·····	(257)
	偏信单方反被误·····	(257)
	她像个尽职的护士·····	(260)
	遇故人“妙手回春”·····	(262)
	九死一生盼阳光·····	(266)
	“怕等不到那个时候”·····	(268)
	弥留之际为妻留遗言·····	(269)
	魂断鹤山妻悲哀·····	(271)
	眷恋人世眼不闲·····	(273)
	生前至交捐资办丧事·····	(274)
	择遗像松年心悲痛·····	(278)
	乡邻护送葬康庄·····	(279)
	潘兰珍晚景凄凉·····	(283)
	养女凤仙与古瓷碗·····	(284)
<b>第十一章</b>	<b>魂归故里合妻家</b>	
	<b>鼎山青松招旧魂</b> ·····	(290)

	许诺变遗言·····	(290)
	隐姓埋名运灵柩·····	(291)
	乡友迎柩悲·····	(294)
	孝子贤孙心如愿·····	(295)
	碑石铺路墓难觅·····	(297)
	土墓两修重立碑·····	(299)
	儿孙雨中祭扫墓·····	(303)
	子孙难忘江津情·····	(305)
<b>第十二章</b>	<b>童年游伴创人生</b>	
	<b>延年乔年路相同</b> ·····	(309)
	血染龙华的两兄弟·····	(309)
	两兄弟出世父在他乡·····	(310)
	父亲反袁两兄弟险落虎口·····	(312)
	清苦少年父子情薄·····	(314)
	赴法苦学求真理·····	(318)
<b>第十三章</b>	<b>英勇果敢陈延年</b>	
	<b>宁死不屈保卫党</b> ·····	(326)
	“黄包车夫”·····	(326)
	省港大罢工的卓越领导者·····	(327)
	鲁迅的“仁侄”·····	(330)
	父子关系微妙·····	(331)
	“花盆”犹在不幸被捕·····	(334)
	营救不成反落虎口·····	(336)
	铁骨铮铮不泄密·····	(338)
<b>第十四章</b>	<b>陈乔年智勇双全</b>	
	<b>笑洒热血献青春</b> ·····	(340)
	“人生自古谁无死”·····	(340)
	正确意见被否定之后·····	(342)

	儿子教训老子·····	(343)
	病中母子相见·····	(344)
	突然被捕智斗叛徒·····	(346)
	周之楚勇敢身替陈乔年·····	(348)
	节外生枝乔年英勇就义·····	(349)
	两兄弟牺牲父悲戚·····	(352)
	子夭折遗腹女在何方·····	(353)
<b>第十五章</b>	<b>陈松年历经沧桑</b>	
	<b>普普通通一家人</b> ·····	(355)
	褪色的像框·····	(356)
	他支撑着这个家·····	(359)
	她为陈家默默奉献一生·····	(367)
	毛泽东与陈独秀家庭·····	(369)
	困境中成长的孙辈·····	(373)
<b>第十六章</b>	<b>陈鹤年流离香港</b>	
	<b>妻子儿女遭厄运</b> ·····	(379)
	香港影院里的一位老人·····	(379)
	颠沛流离迫居香港·····	(381)
	女成右派妻“逼”离婚·····	(385)
	“文革”中妻儿灾难深重·····	(388)
	盼来噩梦醒·····	(391)
<b>第十七章</b>	<b>陈子美命运坎坷</b>	
	<b>偷渡海外无音讯</b> ·····	(393)
	幼年辛酸婚姻不幸·····	(393)
	从不向孩子提起外祖父·····	(396)
	陈子美今在何方?·····	(398)
	<b>后记</b> ·····	(400)

---

# 第一章

## 安庆古塔多传说 陈家破屋起春秋

---

### ◎镇龙伏虎的振风塔

长江,伟大的母亲河,古往今来,滔滔滚滚,奔流不息。它自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起步,跨越青海、西藏、四川、湖北、湖南……挟历史洪涛,卷千古哀怨,一个劲儿地往东流;流经哪儿,那儿就灵山秀水,人杰地灵,孕育出灿烂的华夏文明,流传着叙说不尽的人间春秋事……

若从黄鹤楼下的武汉乘大轮,顺万里奔腾的长江东去,行至中下游,长江与支流皖江口汇合处,十里之遥就隐约可见一座巍然屹立大江北岸的古塔。这时,大轮播音员在伴有优美、清甜、乡土气息浓郁的黄梅戏曲声中,亲切地播音道:

“亲爱的旅客!前方到达港口,是黄梅戏之乡、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安庆。临江挺立的高80多米、气势宏伟的振风塔,便是这座古城的象征和标志,有‘过了安庆不说塔’之誉……”

说起这座建于明代、雄居全国108座砖石结构宝

塔第二位的古塔，倒有不少神奇的传说。

相传，这座宝塔是为振安庆文风而筑的。

安庆，在中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虽是一块弹丸之地，然而，它却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早在七千多年前的母系氏族社会后期，已有先民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创造着古代文明史。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此地已是古皖国所在地，安徽简称皖，即由此而来。相传东晋诗人郭璞，“精卜筮之术”，来这里游览，备加赞美：“此地宜城”，故安庆又称“宜城”，美丽动听。安庆建城始于宋代，其城池 9 里 13 步。

安庆，顾名思义，即平安吉庆之意。然而，安庆雄踞长江北岸，上接湘鄂，下衔吴越，地势非常险要，有“长江万里此咽喉，吴楚分疆第一州”之称，是长江北岸的一个重镇要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安庆常常又是个动荡不安的地方。三国时的东吴大将吕蒙曾在这里筑吕蒙土城，以抗曹兵；偏安江南的宋王朝建筑安庆城，以防御金兵南侵和蒙古兵南下；元朝末年，红巾义军曾围困安庆城达 7 年之久才攻克，元朝的统治也从此而动摇……由于古代战火频仍，安庆动荡不安而不吉祥，人既不杰，地也不灵，古代一直没有出现过状元，人们疑惑不解，原因何在？一位路过这里的星象家，察看了安庆三面环山、一面临江的地形之后，摆开八卦图，掐指而算，煞有介事地说：

“安庆风水不好，遇上了邪。安庆东边有一条青龙，西面卧着一条白虎，龙虎相斗，格格不入。江水滔滔，安庆颠簸不安，文采均随滔滔江水付诸东流了，哪能出什么状元呢？”于是，这位星象家说：

“须在江边建一座塔镇之。”

明代安庆知府王宗徐到任后，听了这个传说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四处筹款建造了这座塔，命名为“振风塔”。不仅如此，还特意在塔底座下的“迎江寺”古刹门前左右，各拴一只巨大的铁锚，以镇固文采，堪称塔中一绝。



这座脚踏浩浩江流，头顶蓝天白云，塔表华丽、庄重挺拔的古塔建成后，人们又相传说，振风塔像一支毛笔竖立在青龙的身上，两只巨大的铁锚锁住了白虎，因而镇固了安庆的地灵，从此，安庆兴旺，文采不再付之东流了。又传说，安庆是只巨船，振风塔是船的桅杆，有了振风塔，安庆人就“一帆风顺”了……

每当朝日月夜，塔影横江，虚实交辉，景色瑰丽，亦是安庆胜景。因此，又传说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满月当空之时，映置江中的振风塔倒影两旁出现众多的塔影，这是长江两岸所有的宝塔带来了安祥吉庆，汇集前来向振风塔作一年一度的朝拜。故又有“塔王”之称，名扬海内外。优美的传说，又给巍峨的古塔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 ◎古塔是“陈家祖坟上的一管笔”

大浪淘沙千古，古塔下一代代风流人物尽风骚。

1879年10月9日，中国近现代史上风云一时、赫赫有名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共中央第一任至第五任总书记陈独秀，就诞生在这座古塔下的安庆城。他的诞生，他的风云，又给这座古塔带来了神奇的传说。

话说当年，即1896年，与四书格格不入的陈独秀，正值17岁，为“敷衍母亲”而参加了府考。卷子发下后，一看宗师出的试题是什么“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搭题，陈独秀不加思索地决定，“对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于是，他“把《昭明文选》上所有的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陈独秀回家后，把文章稿子交给大哥看，大哥看完文稿，皱着眉头足足有个把钟头一声不吭。谁知陈独秀那篇不通的文章，却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录陈独秀为第一名，成了青年秀才。爆竹声中，喜讯传来，人们造出

许多传说,说他家的祖坟是如何如何的好风水;又说安庆城外迎江寺的宝塔是陈家祖坟的一管笔,给他镇住了文采,他将来一定会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还说他出世前,他母亲做过什么梦,到江边振风塔烧香朝拜过……

## ◎“独秀山下的居民”

陈独秀的故乡安庆,四周皆名山,山川绮丽,风光宜人。

俯看长江,一泻千里,名山对峙,寂如画屏,晴阴昏晓,景色万端,既具江城要塞的磅礴气势,又富山乡水色的诗情画意,有许多游玩处:登万里长江第一塔——振风塔,极目远眺,东南是“奇峰一见惊魂魄”的扬名四海的佛教圣地九华山;西南有“一峰独立、圆如椎髻”的小孤山,浮现在滔滔江水之中,犹如“江山蓬莱”仙岛;东北有全国 36 洞天之一的浮山,三面环水,宛若浮船,峰岩洞壑,玲珑怪幻;西有“奇峰出奇云,秀水含秀气”著称于世的“古南岳”天柱山;北郊有峰峦迭起的大小龙山,铺彩叠翠,蜿蜒似龙,令人心旷神怡!在四周名山掩映下,离城 30 公里的西北角,有一孤峰拔地而起,奇特而令人瞩目,“西望如卓笔,北望如覆釜”,这就是安庆市所辖怀宁县众山之祖的独秀山。

独秀山本是安庆周围众多山中的一座极为普通的山峰,然而,由于陈独秀这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取笔名于独秀山,山因人而得名,由此也引出众多的传说。

有人说,陈独秀是独秀山人,生于独秀山,宗门对着独秀山,秀山秀水给了他家好风水,于是,他的“白胡爹爹”因山而给他起了这个名字,还引来许多考证者。其实,陈独秀原籍是安庆市北郊沈店村(原属怀宁县,古属江州郡),出生于安庆市北门后营(今海军 116 医院)。此处原是清代的营房区,后毁于太平天国战火,成了一片废墟,住着一些贫民和菜农,是安庆当时的贫民窟。那时,陈独秀

家是贫苦的小户人家，常常靠拣白菜帮为食，后来全家迁至安庆大南门培德巷东口。陈独秀出生后，按陈氏宗谱起谱名庆同，字仲甫，号实庵，官名乾生。陈独秀一生用过38个笔名、化名。“陈独秀”这个一时非常响亮、“如雷贯耳”的名字，是他1914年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酝酿创办《新青年》，举旗发动新文化运动时，才开始使用的。1914年7月，陈独秀第四次去日本，在江户辅佐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当时他的生活极为贫困，过着“穷得只有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的生活”。同年11月10日，第一次用“独秀”在《甲寅杂志》一卷四号上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批判传统的“国家观”，提出救国之道：

“自今日始，外不举债，内不摸金，上下相合，岁计倍益。”

在同期杂志上，还载有他的《双枰记叙》一文，署名“独秀山民”。从此，陈独秀常爱用这个名字发表文章，并名震一时。直至今日，人们只知陈独秀之名，而不知其谱名庆同。在当时，连陈独秀的家里人，也不知他用这个名字。1919年6月11日晚，陈独秀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抛散传单时，被反动当局警察逮捕，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此时，正在小学读书的三子陈松年，当老师告知他父亲陈独秀被捕时，陈松年说陈独秀不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叫陈仲甫。这位老师给他看报纸上登的陈独秀照片，而这照片与家中的父亲照片模样一样时，他才深信不疑，才知道陈独秀就是他的父亲。

当“独秀”这个名字出现于刊物以后，又引起人们的一番议论。他的同乡好友、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风趣地对他说：

“仲甫，你太不客气了，似乎目中无人，以为世界上只有你一个是‘秀’的，其他的人都是‘莠’也！”

陈独秀听了忙解释道：

“哪里，哪里！我们家乡安庆有座独秀山，秀气挺拔，我用这个名字，只不过说我是这座山下的居民而已。”

为此，陈独秀还有一枚“独秀山民”篆石，给朋友题字时，他常常盖上这方印章。1940年8月，他避难四川江津县鹤山坪石墙院破屋时，衣物被盗，对此他毫不在意，唯独这枚印章被窃使他十分痛心。奇怪的是，后来警察局追查，衣物大半追回，而“独秀山民”印章及文稿却失去踪迹。友人前来安慰，他幽默而风趣地说：

“这窃贼也真风雅啊！”

此外，陈独秀还用过“盛唐山民”的笔名。因安庆城内有座似土丘的盛唐山，据说当年汉武帝在元封五年冬南巡狩猎时，曾登过这座盛唐山。陈独秀借用家乡山水之名而作为笔名，表达了他这位长期漂流在外的游子对故乡的怀念之情。常言道：“故土难离”。晚年他寓居江津鹤山坪时，时时思念故乡，盼望着回归安庆。每当想起安庆小吃和那乡音浓郁的叫卖声，有时他情不自禁地喊上一嗓子：

“汤——团——罗——黑芝麻——白糖！”

“打——香油罗——小磨——麻油！”

喊完之后，往往轻声独笑，也常逗起相濡以沫的少妻潘兰珍开怀大笑。

## ◎人杰地灵的故乡

古往今来，江水滔滔，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文采镇固，安庆古城孕育出一代代风流人物。

有被推为“宋画第一”的著名书画家李公麟，明代大思想家方以智，清代著名书法篆刻家邓石如，现代著名小说家张恨水，现代科学家“两弹元勋”邓稼先等。清代桐城县文人方苞、刘大魁、姚鼐开一代文风，创立了著名的散文流派——桐城派，先后影响中国文坛达二百多年。安庆还是黄梅戏之乡，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生于此，长于此，名扬海内外。

安庆向来又是文人荟萃之地，历代文人墨客李白、白居易、苏

东坡、王安石、黄庭坚、陆游、文天祥、史可法等，在此留下了千古绝唱和丹青墨宝。同时，安庆也是一座历史名城。近代史上，著名的太平天国安庆保卫战，辛亥革命前徐锡麟起义和熊成基马炮营起义等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里。安庆自清乾隆二十五年到公元20世纪30年代，其间270余年，一直是安徽省府所在地。在这片土地上，它又曾孕育出呼唤“科学与民主”的一代人杰陈独秀。随着陈独秀的沉浮，安庆名声更传四方。

登古塔眺望，“不尽长江滚滚来”。只见它夹着泥沙，后浪推前浪，一浪高似一浪，汹涌澎湃地奔向东方……昔日安庆这艘巨船，正张满那时代的风帆，随着改革开放大浪潮乘风破浪地前进，驶向全国，奔向世界五大洲……

## ◎两保剖开陈家屋

脚踏古城，寻古探踪。驱车东北郊约10公里，便是如明珠镶嵌在绿树红楼之中的白泽湖。碧水环绕，鱼儿欢跳，绿色田野，蚕豆花香，麦苗婆娑；幢幢农舍，袅袅炊烟……抬头眺望，满目皆是绿，故旧名为“绿水乡”。

在湖一旁，绿水桥西，有一曲曲弯弯的小河环抱的村庄——沈店，在其附近又有一个坐落两保交界的老屋，这就是陈独秀的祖籍之地，亦是他的故乡——陈家老屋。由于旧时两保交界线把屋基分割为两半，故又称作“陈家剖屋”，后来误传为“陈家破屋”。“陈家破屋”春秋起，名副其实的“破”。这里是临江广济圩区的一个小小村庄，村民大都为陈氏人家。每逢大雨倾盆，江水猛涨季节，不是内涝，就是破圩成水灾。汹涌洪水吞没农作物，吞没村庄，陈独秀家就因水灾逃难，流落到安庆市后营这个贫民区，艰难地铺口度日。这里也是陈独秀的出生之地。

陈家破屋有一祠堂，上书“陈氏宗祠”，据说出自陈独秀手笔。

此祠堂，系陈独秀养母谢氏夫人慷慨捐资，一家独修，并于1947年重修八开版本《义门江州·陈氏宗谱》，陈氏门下各一套永久保存。但是，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四旧”横扫之火也无情地烧到了这个小小村庄。一声令下，吓得陈氏门下各家不得不交出《陈氏宗谱》，一把烈火烧个精光，正所谓“纸船明烛照天烧”。然而，唯独有一小户陈家——陈庆山，不怕“烈火烧”，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深更半夜，悄悄爬上农舍小阁楼，把《陈氏宗谱》藏在阁楼深处。

雨过天晴。“四人帮”倒台后，人欢雀跃，陈庆山老人又爬上阁楼，取出唯一幸存的《陈氏宗谱》，拂去尘埃，视之为宝。心想，这本《陈氏宗谱》或许对研究陈独秀历史有用，私人收藏易于散失或丢落，于是自愿献给安庆市图书馆收藏。为此，安庆市图书馆特发给陈庆山老人奖金和奖状，以资鼓励。

这套唯一幸存而且发黄的八开版本《陈氏宗谱》，详细记载了陈氏宗族的源流及其陈独秀一家的情况，为了解陈独秀家春秋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 ◎家世源远流长

追溯陈氏远祖，像华夏其他古老姓氏一样，源远流长。

陈氏受姓，昉自胡公。胡公者，相传是虞舜的后代，妫遂之子满，为开国君主，馆甥于周京，娶以元女为大姬，封于陈，以主虞祀，后因国为氏……

陈氏后代繁衍旺盛，传至南北朝，已播衍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传到第八十三世，义门居聚达3700余口。隋朝结束，南北朝分裂统一中国后，陈氏子孙由于播散流域之广而失考，唯有宜都一支，发隐于宜昌附近荆门之谷，宗支保持，至元孙陈兼举唐进士，官为翰林。到唐代，荆门一支中的陈兼举后代，又避迁福建泉州仙游乡，即今日之先游县。

胡公的第七十一世孙陈阔，字伯宣，为陈兼举后代，很有才名，四处皆有友人。自泉州到九州（即今日九江）访友，畅游庐山名胜，结茅饮泉水，津津乐道，流连忘返，不忍离开庐山之名胜而寓居其下，时值盛唐时期，为江州（怀宁县北宋时属江州郡）义门的始祖。义门陈氏，在宋太宗淳化年间，子孙更加繁衍，家业昌盛。到宋仁宗天圣年间，其田庄多至 300 余处。为子孙立久远之计，到陈氏第八十三世，义门同居聚族达 3000 余口。鉴于陈氏户口过于集中，北宋仁宗庆历时期，下令其分庄迁于各州郡。约在南宋孝宗淳熙时期，陈汝心则开始由江州迁居，安庆东门外金定桥林湾（原属怀宁县），为其迁居故址。陈汝心为迁安庆之始祖，定居淶水桥西，生四子，陈独秀是陈汝心的第二子陈崇志之后代。陈独秀属大纶公支下，曾祖是天直公。

---

## 第二章

### 小户人家发迹难 自幼铸就叛逆心

---

#### ◎“白胡爹爹”

你“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  
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这是陈独秀的祖父陈章旭，对背书背不出来，挨了  
毒打而一声不哭的幼年陈独秀，不止一次愤怒而切齿  
的詈骂。

陈独秀的祖父陈章旭(公元1819——1889)，字太  
占，亦字皖峰，因他长满一把白胡子，亲戚本家都称呼  
他“白胡爹爹”。陈章旭娶劳秉全之长女为妻，生四子：  
衍藩、衍藻、衍中(出继章寅为嗣)、衍庶。子衍中为陈独  
秀亲生父亲。陈衍中曾得过“以盐提举衔候补知县”，但  
从未放过实缺，终年在外教书或作幕僚，是家族中一个  
举足轻重的人物，思想守旧，满脑子的封建礼教，俨然  
孔夫子再世，唯我独尊，家庭成员没有一个不害怕他三  
分。陈独秀两岁那年，陈衍中不幸病故，年仅34岁。

“白胡爹爹”脾性怪癖，一天到晚板着脸，不见一丝  
微笑，严厉至极，闻名乡里。在孩子们心目中，他如同  
“老虎”，啼哭的孩子，妈妈一说“白胡爹爹来了”，孩子



顿时停声，不敢再哭。

这位老人，好洁、好静成癖。家中每一个旮旯，每一张桌椅，都要扫抹干净，他每天要用手擦抹，如果没有扫抹干净，哪怕一角或一张桌椅，那陈独秀的母亲和大姐，就要遭“白胡爹爹”的严厉斥骂，直骂得鸡飞狗跳，唾沫星子横飞。对陈独秀的母亲，他有时尚能留点面子，而对陈独秀的大姐不仅是破口大骂，甚至动手严打，打得她还不肯哭一声！

这位“白胡爹爹”还有一个严厉的规矩。当他看书，或挥毫，或闭目养神时，不许家人走动有脚步声，谁稍不注意有脚步声，谁就要倒霉，不是骂就是打，弄得家人不得不蹑手蹑脚地走路。即使陈独秀的外祖母到他家里来，如果不是从“白胡爹爹”眼前经过，也得像做贼一般走路，怕他不问青红皂白地骂起来，弄得十分难堪，甚至不好承认是她的脚步声。陈独秀的二姐生性好强，不知厉害，有时不注意走路有声，“白胡爹爹”不问青红皂白就是一顿毒打，甚至罚跪，还不让人出面求情。

然而，这位好洁、好静的“白胡爹爹”，偏爱抽鸦片，鸦片瘾一旦发作，萎靡不振，口淌涎水，走路摇摇晃晃，不仅在家开灯抽烟，还常到街上龌龊而又嘈杂的烟馆里去抽，才觉得过瘾。这时，他早置好洁、好静于九霄云外，伪君子的假面具不知跑到哪儿去了！这往往又使年幼的陈独秀大惑不解。直到半个世纪以后，陈独秀才悟出了其中的哲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集中起来抽鸦片有趣，同时还可互相欣赏抽鸦片之艺术，似乎这一艺术世界之外一切都忘怀了，悠哉游哉，乐在其中！

陈独秀小时候聪慧过人，正是这聪颖又害苦了他。教子严厉的“白胡爹爹”，对陈独秀大哥孟吉的读书不大注意，唯独看中了陈独秀，对他期望值很大，恨不得他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一夜之间功成名就，“白胡爹爹”才称心。陈独秀自幼不爱死记硬背呆板读书，不喜欢八股文章，即使读了，也只是表面应付“白胡爹爹”。因

而，他常常背不出书来，使“白胡爹爹”气极，抬手便打。可是打归打，陈独秀总是一声不哭，气得“白胡爹爹”怒目切齿，几近发狂，令人可怕！为此，陈独秀善良的母亲不知流了多少泪，总是好言劝勉他：

“小儿，你爹爹是为你好，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书读好了，中个举人替父亲争口气。你父亲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是他生前一桩憾事。”

陈独秀见母亲边说边流泪，便嚎啕大哭起来，一头扑在母亲的怀中，他母亲心疼地摸抚着他的头，一面替他擦眼泪，一面责备他：

“你这伢子真淘气，爹爹那样打你，你不哭，现在倒无端地哭起来。”

陈独秀母亲的眼泪，比他“白胡爹爹”的板子还有权威。正如他在《实庵自传》中所说：

“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

后来，“白胡爹爹”从毒打陈独秀而陈独秀仍旧不哭的沉默中，似乎悟出了一些道道来，于是他对人说：

“这伢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白胡爹爹”于光绪十五年六月去世，葬于安庆市郊十里的老祖山，与三子、陈独秀父亲衍中合墓，有碑。那时，陈独秀虽才10岁，但“白胡爹爹”的怪脾气和专制的家长作风，在陈独秀幼小的心灵中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记。

## ◎能干而慈爱的母亲

在陈独秀亲戚本家中，提起陈独秀亲生母亲查氏（1852——1899），都称她为“女丈夫”，是一位能干而慈爱的母亲。但她受封建礼教的影响较深，吃斋敬神，崇奉科举。她对陈独秀及其大哥孟吉

的教育,起码要求也要中个举人,为她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的丈夫争气,光宗耀祖。

那时农民生活很苦,受尽封建制度的压迫和剥削,所以,农民也望子成龙,如果能考取秀才,便是一步登天,为将来做绅士打下了基础。当时乡间流传着这样两句谚语:

“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

屡考不中的人,往往埋怨祖坟的风水不好,便掘出尸骨,请最好的风水先生改葬祖坟。在那出人头地的社会空气中,在人们尤其是妇女的头脑中,科举可是一件神圣的事业了。1896年,17岁的陈独秀在安庆学宫考秀才,没有发榜前,陈独秀的大哥孟吉就对母亲说:

“赶快准备红喜蛋散给亲友。”

“如果考不中,不叫人笑话吗?”母亲难为情地回答道。

“母亲,你放心好了,兄弟肯定会考中。”大哥孟吉胸有成竹地对母亲说。

发榜时,陈独秀果然考中了秀才第一名。捷报传来,母亲乐得眉开眼笑,掉下了如愿以偿的热泪。陈独秀考中秀才的消息,顿时轰动了小小的怀宁县城,他的叔父陈昔凡还摆了几桌酒席特别庆贺了一番。

最有趣的是,陈家本是淠水乡的小户人家,绅士们向来是瞧不起的。陈独秀考中秀才后,几家富户便另眼相待,竟看中了陈独秀这个没有父亲的穷孩子,纷纷托人向他的母亲询问可曾定亲,想把他们的女儿嫁给陈独秀,为此展开了一场婚姻竞争。陈独秀母亲对此大乐而特乐,陈独秀总算为陈家争了光,母亲脸上露出微笑,夸陈独秀是个有出息的孩子,但又劝勉他好好读书,来年参加江南乡试考举人。

在陈独秀的心目中,他的母亲不仅能干,而且疏财仗义,好打抱不平,是个老好人,菩萨心肠,然而,往往又优容奸恶,缺乏严肃

的态度。

光绪十二年前后,无情的洪水冲破了怀宁县广济圩,一片汪洋,淶水乡全给淹没了。乡民们衣食无着,携儿带女,背井离乡,四处逃荒。陈独秀一位在地方上颇有名望的祖辈本家,是陈氏家族里的族长,被称为“户尊”,陈独秀的母亲很尊敬他。一天,这位族长上门,哭丧着脸对陈独秀母亲诉说了乡民们如何的痛苦之后,却要借钱接济他的家属。陈独秀母亲虽对他十分尊敬,但钱分文未借。族长扫兴而走。陈独秀纳闷不解,母亲常常当衣借钱济人,又时常教训他们兄弟,不要看不起穷人,不许骂叫化子。于是,陈独秀问母亲道:

“我们家里虽然穷,总比淹水的人家好,为何今天你一个钱也不肯借给族长呢?”

母亲听了,紧锁双眉,一言不发。事隔几年之后,陈独秀才从乡人中渐渐知道这位族长为人狡诈。族中及乡邻有争执之事,请他判断曲直是非,他不分亲疏,一概以鸡米烟土或老本洋多少为标准。有时他的亲戚本家反而会败诉,族人对此极为不满。此外,每逢修圩放赈,他无论严寒酷暑,都热心尽义务为大众奔波,其结果,他所督修的圩工,比别人修造的工程都不坚固,实为偷工减料,中饱私囊。难怪陈独秀母亲皱眉不语,然而,他仍然优容和尊敬这位欺诈钱财的族长。

这位族长手下有一位户差,常常奉行族长之命,抓捕族中不法分子到祠堂处罚。上行下效,这位当差的依仗族长的权势,效仿族长,四处欺诈钱财,骗吃骗喝。不过,他耍的是阴差把戏罢了。他常常到陈独秀家里,胡说在阴间见到他家的祖先,没有钱用了,托他来要钱买纸银锭烧给他们。陈独秀的母亲不仅恭敬款待他,而且给钱托他代买纸银锭。这位阴差钱骗到手走后,陈独秀的母亲总是摇头,不相信当阴差的鬼话,甚至说他是“活鬼”。

一天,这位当阴差的来到陈独秀家里,张着嘴,打着呵欠,直挺

挺地倒在床上，嘴里叽哩咕噜地胡说什么，像是到了阴间。年幼而调皮的陈独秀气不过，约十几个小伙伴，从后门边跑边喊：

“外面失火了！不得了了！”

这位阴差听了“失火”二字，刹时又打着呵欠回到了阳间，闭着眼睛，煞有介事地问道：

“这边有火烛了罢？”

“是的！”陈独秀母亲站在床边微笑着答道。

“这可不错罢，我在那（阴间）也就知道了。”阴差若有其事地说。

这时，调皮的陈独秀捂着嘴，弯腰，缩颈，几乎大笑出来。他母亲怕泄露“天机”，拿着鸡毛帚将陈独秀及其小伙伴赶了出去，强忍着笑，还骂道：

“你这班鬼伢子！”

善良的母亲没有戳穿这位阴差的鬼把戏，反而恭恭敬敬地用酒肉款待他，照样送钱托他买纸钱银锭。阴差吃饱喝足，拿着钱一摇一晃，洋洋得意地走出陈独秀家门。

能干、慈爱而优容奸恶的母亲，对幼年陈独秀的影响，比家庭中任何一个成员的影响都大而深。正如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所写：

“有人称赞我嫉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嫉恶如仇则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然深知，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之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的性格之遗传，也有影响罢。”

## ◎兄长良师手足情深

“青灯课我读，文彩励先鞭。”这是陈独秀追忆兄长孟吉对他的

教诲。

长兄陈庆元(1872——1908),官名健生,字孟吉,当过廪生,在东北花钱捐过一个候补官,实际没有职权,没有正式当过官。为人老实、笃厚。

自从祖父“白胡爹爹”死后,陈独秀失去了一位严厉的启蒙老师,虽找过好几个私塾老师,他都不满意。到了十二三岁时,就由他大哥孟吉教授读书。他大哥知道他不喜欢读八股文章,除要他温习经书外,还教他读《昭明文选》。起初,陈独秀有点头痛,时间长了,也渐渐读出味道和兴趣来了,对八股文就更看不起了。读八股文,是受他母亲的严命,预备应考。他大哥知道他讨厌八股文,这就使大哥夹在母亲与陈独秀中间十分为难。一直到陈独秀 17 岁,在县考前一两个月,他大哥再也无法拖过去了,才硬着头皮对陈独秀说:

“兄弟,考期已近了,你也得看看八股文章罢,不要叫母亲伤心。”

大哥一席话,说得陈独秀没吭一声,只得默默认许。他大哥见他没吭声,便高高兴兴地拿出合于小考格式的道德文章为他讲解,陈独秀表面装着在听,而心里还是想着《昭明文选》。不久,大哥看出道德的文章不合他的口味,于是,又拿出金黄和袁枚的制艺给他看,虽然陈独秀有点兴趣,但总是格格不入,弄得大哥也无法可想,只好任其自然了。然而,大哥又受母亲的严命,让他督促小弟认真读八股文章。庆元两面为难,不得不向母亲做了一个虚伪的报告,说小弟如何如何用心学习八股文,母亲听了满脸喜悦。至于写字,陈独秀喜欢临碑帖,大哥总劝他习馆阁体。陈独秀心里觉得好笑,他只想考个举人,以了母亲的心愿,不想再上进,习那讨厌的馆阁体又有什么用呢?

他们兄弟俩感情很好,朝夕相伴。虽然对待科举等各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发生冲突,陈独秀没有一件事依大哥的话去做,但他们

始终相亲相爱，保持着兄弟情谊。大哥不愿在口头上反驳陈独秀，免得伤了兄弟手足情谊，这令母亲十分满意和高兴，族人和邻里也夸他们兄弟俩听话、和睦而又上进和懂事。

大哥孟吉对陈独秀“青灯课我读”，给予陈独秀早期革命思想的萌芽和学业的造诣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901年，陈独秀与大哥孟吉离开故乡安庆。孟吉去沈阳候补，陈独秀第一次东渡日本，开始了一生的政治生涯，入东京大学进修日语，并在高等师范学校读书。自此，兄弟俩一别再未见面。1908年10月3日，陈独秀大哥孟吉患肺结核病，死于东北沈阳，是年37岁。此时，陈独秀正在杭州浙江陆军小学任国文史地教习，当他闻悉大哥去世的噩耗时，悲痛不已，痛哭涕零。次年秋天，陈独秀自杭州北上，接扶大哥灵柩运回安庆故乡，悲怀郁结。途中，在沈阳寓所写了《述哀》长诗，抒发对兄长的痛悼情怀。

与君为兄弟，匆匆三十年。  
十年余少小，罔知忧苦煎。  
十年各南北，一面无良缘。  
其间十年内，孤苦各相怜。  
青灯课我读，文彩励先鞭。  
慈母虑孤弱，一夕魂九迁。  
弱冠弄文史，寸草心拳拳。

……

入门觅兄语，尚怀握手欢。  
孤棺委尘土，一瞥摧心肝。  
千呼无一应，掩面不忍观。  
仆夫语疾语，一一无遗残。  
依依僮仆辈，今作骨肉看。  
故旧默无语，相视各沈澜。  
中夜不成寐，披衣抚孤棺。

孤棺万古闲，非梦无疑团。  
侧身览天地，抚胸一永叹。

## ◎没有印象的父亲

“父亲的性格，我不大知道”。这是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所记载的。陈独秀出世不久，他的父亲便因在苏州教书，瘟疫流行，染病而亡，故陈独秀称自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陈独秀生父衍中(1848——1881)，字象五，生有异姿，束发受书岸然柴立。优廩贡生，江苏补用府经历，家世贫寒，儒业十二世矣，而均无功名。咸丰之季，太平军占领安庆城，象五父章旭同长兄衍藩投笔从戎，参加镇压农民军，衍中随母劳氏避乱乡间，家徒四壁，无以为生，以母出卖女红维持生计。生活流离之际，象五母亲勤俭持家，不忍他兄弟荒废学业，教子一端，尤足世风。授其良师教授象五弟兄读书，而师俸倍高于人。夜间解绾，挑灯课读，其母纺织于灯下，命子从旁诵读，声响彻户外，不分寒暑易节，并常常告诫儿子：

“吾家累世以书为业，毋至若辈而坠读书种子也。”

象五深感母亲心意，于是发奋自励，刻苦读书。太平军被镇压后，清政府收复了安庆，象五以县学生考中秀才，他母亲劳氏高兴得逢人便说：

“我儿本是穷苦人家的孩子，而考中秀才！”

劳氏生活贫寒又因积劳成疾，病重在身，象五亲自为母奉送汤药，依依膝下。这时，宁国孙太守因慕象五之名，欲请他为家庭教师，他以母病力辞，不愿离开母亲，而母亲却力劝他前去应教，并万般无奈地说：

“吾儿，家中无财物，不要挂念我，如果没有粮食养我，不是孝顺也。”



象五遵照母意，离开家门，依依不舍去宁国孙太守家任教。不久，母亲病故，他闻讯即回家奔丧，痛哭泪下。为承母亲遗愿，他教育四弟昔凡，无微不至。母亲去世不几年，四弟昔凡亦考取恩科举人，象五感到由衷的欣慰。象五为人天性秉厚，乐于助人，凡亲友困难上门，他都慷慨解囊，毫不吝啬。他在家乡当教师，名传乡里，来自四方的学生很多。凡学生贫困而不能缴学费者，他供之饭食而教育他们，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学有成就。因之，象五虽不常出门，但已成为怀宁县的知名人士，受到乡邻们的赞扬。象五讲求实学，慷慨有大志，屡因多次应考未能考中举人，感到极大遗憾，不得不以纳粟以府经历，分发江苏做了几年小官。光绪七年，在苏州安徽霍丘窦军门家当塾师，教他家几个儿子，因苏州瘟疫流行，不慎染病死于怀宁会馆。此时，陈独秀还不满两岁，当然他对父亲的性格是不大知道的。

1921年，陈独秀应广东省长陈炯明之邀请，到广州任教育委员会委员。在一次宴会上，陈炯明一本正经地问陈独秀：

“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

陈独秀听了，幽默而正而八经地回答道：

“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陈独秀父亲重实学而不雕饰，爱自然而不爱八股文。陈独秀虽未亲受父教，但他父亲的人品、文风以及流传下来的家教、家风对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 ◎官运亨通的养父

翻开《陈氏宗谱》，陈独秀家几代人都是靠教书谋生，有教书世家之称。陈独秀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历来是被绅士们所瞧不起的小户人家，全族中只有他的父亲象五才是一个秀才。他的父亲虽有

慷慨大志，但一生未中举，不得已纳粟捐了个小官。然而，他叔父衍庶，字昔凡(1851——1913)，自称石门渔隐、石门湖叟，倏然时来运转，使陈家祖坟风水突然好了起来。昔凡不凡，1875年中举后，官运亨通，一路顺风，步步高升。初任知县，因治河有功，由知州、知府，一跃而升到府级以上省级以下的道员，领加四品衔，以知府赏戴花翎。

封建社会，升官与发财是结伴而来的。陈昔凡在东北怀德、柳河、辽阳、新民等地任职时，正值日俄战争时期，中国商人乘机贩运马匹以获暴利，而马匹经陈昔凡管辖之地要抽牲口税，也无须上缴国税，谁收谁得，因而大部分牲口税落入陈昔凡的腰包，大发其财，很快腰缠万贯，成了安庆有名的大户。他在辽宁省彰武县置地200亩，在安徽省贵池置地800亩；在北京琉璃厂开有“崇古斋”古玩铺，在奉天还设有分店；同时在安庆市四牌楼附近有房产近10处，又在安庆城里南水关李鸿章公馆隔壁，盖有一座公馆，主建筑有前后进三个大院(现为安庆市土产公司的仓库)，宅前宅后都有花园，是当时安庆有名的陈家大洋房。这样，陈家从一个被人瞧不起的小户人家，一跃而成为令人刮目相看的大户人家，故当时人称“名门望族”。

这时，陈昔凡名利皆显赫，升官发财致富，家中已有数以万计的银两，足够他荣华富贵享受一生。同时，他又审时度势，觉得大清朝危若累卵，天下乱哄哄的，仕途难卜，于是大约1908年，挂冠归故里，安享晚年之福。

然而，陈独秀这位官运亨通的叔父，也有不称心如意的事。昔凡，先后娶三房妻：元配桐城拳庄方氏、续娶浙江谢氏、侧室邵氏。这三位妻子都未能如昔凡之心愿——不曾生子。昔凡为此怏怏不快，成了终身恨事。掌管家事的第二位妻子谢氏，既为未能生子感到内疚，又十分体谅丈夫的心情。这样的大户人家，没有后代，岂能继承家业？于是，谢氏多次劝说丈夫昔凡，过继一子为嗣。在封建

社会里，过子为嗣，必须在本族内过继，不许外姓人进入宗谱，还得要按严格的程序，上祠堂办理过继手续。其实，昔凡夫妇心中早已物色了过继人——陈独秀。他们认为，这是最如心愿不过的了，但一时难以开口，怕伤了三嫂查氏的心。三哥象五早逝后，三嫂查氏省吃俭用，辛辛苦苦抚育陈独秀兄弟俩，实也不易，她能同意吗？

时到1896年，家境贫寒的陈独秀，在安庆参加府试，初露锋芒，便一矢中鹄，考中秀才第一名。不消片刻，便传遍弹丸之地的怀宁县，不仅乐坏了他的母亲，也令他叔父昔凡夫妇高兴和喜欢，认为这孩子聪慧超人，小小年纪就中了秀才，将来前程一定远大，但需要好好地教导，同时又认为过继陈独秀为嗣时机业已成熟。于是，昔凡便托那位欺诈钱财的族长，上门与三嫂、陈独秀母亲查氏商议过继之事。

通情达理的查氏，认为陈独秀过继昔凡为嗣，是顺理成章的事，使陈家大户后继有人，荣宗耀祖。

陈独秀17岁那年的一天，在那位族长——“户尊”的主持下，上祠堂办理了过继手续，圆满了陈昔凡夫妇的一大心愿。陈独秀原是贫寒人家的儿子，过继手续一办，顿时便成了封建大家庭的阔少爷，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然而，陈独秀对此也无所用心。同时，陈昔凡与清军安庆营统领副将高登科文武相亲，将陈独秀与高登科长女高大众订婚，“门当户对”，称羨庆贺之声便从四面飞来。陈昔凡很喜欢陈独秀，东北上任时，便把陈独秀带在身边，亲自教导，对他抱有莫大期望——“子承父业”，成为封建大家庭的继承人，并对陈独秀说：

“不得功名，何以为官？要想出人头地，就得先苦几年，把书念好。”

陈独秀思想活跃，易于接受新事物，不安心于攻读诗文、八股。戊戌政变后，陈独秀萌发了革命的念头。早在1901年，在杭州求是书院求学时，便开始了最初的革命活动，跟同学进行反满演说，被

警察追捕逃亡南京，后又回安庆，在藏书楼开办图书室，宣传鼓吹革命，宣传反清，被清廷列为首要分子加以追捕。1902年秋，陈独秀被迫第二次逃亡日本……

这又一次招致灾祸，使在清朝官运亨通的养父陈昔凡，终日惶惶不安。心想，朝廷若知他的儿子是康党、乱党、革命党，岂能逃过王法？且不说丢了乌纱帽，恐怕连性命也难保。为此，他不得不去祠堂表面上办了“退继”手续，不承认其与陈独秀有父子关系等，以划清界限，实际在暗中给予接济。对此陈独秀从未提及“过继”的事，即使在《实庵自传》中，也只字未提官运亨通、发家致富的继父。

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们对钱财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陈昔凡挂冠归故里，本可以过着清闲安逸而富有的生活，然而，他当官时发了财，还梦寐以求发大财。1909年，他通过当年在东北任职时的换帖弟兄、浙江巡抚增子固的关系，创办浙江省华商大益公司，做起了洋生意，企图发洋财。可是，他既不懂外语，又无经商经验，这个官运亨通、一帆风顺的陈昔凡，受人愚弄，栽了个大跟头，落得个倾家荡产的结局。

那时，他与上海怡和洋行订立购东北大豆3万吨的合同，约定在黑龙江对青山俄国车站交货，英商预付豆金沪银71280两。同时，合同规定双方不得在交货处与他人交易。签约后，陈昔凡兴高采烈，料定这笔生意做成，又可发大财了！正当他高兴之时，英商却私自违约，在交货处抬高数倍价格，大量收购大豆，消息传来，令陈昔凡惊魂落魄，在浙江巡抚增子固的帮助下，遂提出诉讼。在事实面前，英商理屈词穷，经判决，全部损失均由英商赔偿，中止合同。这样，陈昔凡有惊无险，暂未蒙受损失。

然而，一波刚平，又生一波。不料在办理手续时，买办姚某与英商串通，钻陈昔凡不懂外语的空子，设下骗局。加之，辛亥革命胜利后，浙江巡抚倒台，本已无理的英商，却通过外交部索还定洋，或交付大豆。这时，在白纸洋文面前，陈昔凡有口难辩，不得不变卖家

产,以抵付英商索赔。这倾家荡产的打击,如同千钧霹雳击顶,陈昔凡岂能经受得了?于是,他眼见光宗耀祖的“名门望族”一落千丈,毁之旦夕,忧愤成疾,于1913年5月去世,葬于安庆市郊十里老祖山。从此,陈家家业衰败。

话再说回头。陈独秀自幼生就刚烈的性格,作为陈昔凡的嗣子,继承其家产是理所当然的。然而,陈独秀参加革命后,屡说自己是个从小“没有父亲的孩子”,走南闯北,宁愿过着穷困的“寒士”生活,也不愿依赖养父的财产,贪图享受。对于家业的兴衰,他全不关心,对于家事从来不加过问,对封建官僚家庭来了个彻底的背叛。比如,有一次他到北京,北京铺子的掌柜听说小东家来了,便请他到铺子去一趟,以赏个面子,而他不仅不赏面子,反而说“铺子不是我开的”,弄得掌柜的面红耳赤,十分难堪。1921年,他担任中央总书记后,社会上议论纷纷,说他虽是共产党的总书记,家里却拥有万贯资产,不敢革自家的命。据1932年11月24日《社会新闻》说,1925年英国劳工运动左翼领袖勃劳顿到上海,与陈独秀会晤时,问陈独秀国内外报纸常说你:

“家拥有巨资,确有此事吗?”

陈独秀听了幽默而笑,指着隔壁房间所藏党内文件,说:

“吾之财产,全在乎此!”

这位英国劳工运动左翼领袖听了,连连点头赞之。

陈独秀养父陈昔凡,还是一位才子。他的诗文、书画,也有一定的造诣,在当时艺术界还有一定的影响。当时流行士大夫画,他的画风靡一时。郑午昌著的《中国绘画史》一书中,亦收录有陈昔凡的画。对此,《怀宁县志》有言曰:

“工书画,以邓石如、刘石庵、王石谷、沈石田四先生为师。自颜其居曰:‘四石师斋’。又自号石门叟,弄(音举)藏贤真迹,古玩甚富。每陈列璀璨盈室,友朋来观,留连不肯去。或假归一二,绝无吝色。平生最关心折同邑姜筠,谓当时画家,无出其右者,余子不欲下

之。晚年朝夕汉隶，书益大进，得者珍如拱璧。尤喜奖掖后进，于潘勖篆刻，箫瑟画，称誉不去口。”

1913年，由于陈独秀参加反袁“二次革命”失败，被迫逃亡日本，家却被袁世凯爪牙倪嗣冲派兵抄了，将陈昔凡多年收藏的书画珍品，洗劫一空。

陈独秀对其养母谢氏，十分孝敬。1939年3月，养母谢氏与陈独秀避难四川江津病故时，陈独秀悲痛不已，披麻戴孝，并允诺养母谢氏亡灵：

“你老人家安度亡灵吧，待抗战胜利后，我同松年一定带您老人家回安庆！”

不料，未等抗战胜利，陈独秀却于1942年5月27日病逝于江津鹤山坪寓所，未了孝子心愿。最终由其子陈松年实现——谢氏灵柩，1947年随同陈独秀灵柩一并迁回安庆故乡。

谢氏在陈氏大家庭中是“贾母式”的人物，一切说了算，主观行事，独断专行。五世同堂，几代人、几房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她就是这个大家庭的最高当权者，但族人对谢氏仍尊敬十分。《陈氏家谱》赞谢氏云：

“居巾幗而识大义，能继公未了之愿，慷慨捐资，重建祠宇，族人怀德。”

此外，陈独秀还有两个姐姐：大姐嫁富商吴向荣；二姐嫁画家姜超。

---

## 第三章

### 将门长女高晓岚 文武攀亲结发妻

---

在古城安庆陈独秀三子陈松年先生家中客厅墙上，挂着一帧两眼炯炯有神，面目清秀端庄，梳着老式发髻，穿着老式服装的中年妇女照片，这就是陈独秀结发元妻高晓岚。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风云一时的人物，又是当年北大文科学长，然而，他的结发妻高氏夫人，却是目不识丁，典型的老式妇女，他们的结合，说来令人蹊跷。

#### ◎ 苦难的童年

陈独秀的结发妻子，名为高晓岚，本名高大众，生于1876年3月4日，长陈独秀三岁，为清朝末年安徽统领副将高登科前妻詹氏所生独女。说起这位将门之女，童年还有一段苦难史。

高登科，字敬亭，他出生于安徽霍丘城东十里高墙一个穷苦的农家。霍丘位于大别山区脚下，旧时在封建统治下，经济落后，交通闭塞，他的父亲同成千上万的“靠山吃山”的农民一样，受尽地主老财的压迫和剥削，

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的母亲勤劳而又仁慈,省吃俭用,很会过日子,但由于生活贫困,劳累过度,染重病而又无钱医治,不幸早逝。这使他过早地失去了母爱,那时他只有几岁,骨瘦如柴。他的父亲为把他拉扯大,虽无能力培养他读书,但笃信能使自己老了有所依靠,“养儿防老,积谷防灾”嘛。于是,在乡邻亲友的接济下,续娶了后妻。本以为后妻会如己所生之子一样,疼爱和抚养他长大成人,然而,度日如年的贫困生活,却使得他的继母性情暴躁如雷,对他施以无情的虐待,不是饿饭,就是毒打毒骂,小小年纪常常被打得遍体鳞伤。不仅如此,还强迫他放羊、放鹅,上山砍柴。一天,他赶着鹅去山边草地放牧,鹅儿见绿油油的青草,一个劲儿地吃,一个劲儿地欢腾扑打着,且不断嬉戏追逐……太阳西斜,渐落山间。他赶着鹅儿,一边哼着山区牧童小调,一边数着鹅儿,数着数着,发现少了两只鹅。顿时,他失魂落魄,直打哆嗦,四处寻找,可是天黑下来了,到哪儿去找呢?少了鹅,回去注定一顿饱打,吓得他不敢回家。于是,他蜷缩着身子,在麦田里露宿过夜。事也凑巧,这天夜里一队清兵行军路过这里,发现麦田里有人,以为是叛军的探子,上前一看却是一个孩子,先是把他盘问恐吓一顿,他哭诉着他的身世求饶,令清兵头领十分同情,于是把他收作勤务兵。这对幼年受苦的高登科来说,真是喜出望外,绝路逢生。他在清兵里很能吃苦,讨清兵喜欢。随着年龄的增长,后来又扛枪打仗,屡立军功。于是步步高升,后由安庆营统领升为安徽统领虚衔副将,清朝廷赏穿黄马褂,且又世爵,威风凛凛,并置田 4000 余亩,在清廷也相当有影响。他仕途得志之后,娶詹氏为妻,生独女高晓岚。不幸詹氏一场大病身亡,后又续弦阜阳六家女儿为妻。高登科由于军务在身,只得将晓岚交由后妻抚养。起初,后妻待前妻女晓岚面子上还说过得去,但自六氏生小女君曼(乳名小众)之后,母爱全倾注于小君曼身上了。于是,对晓岚加以虐待,不但不让她识字读书,而且把她当作丫头使唤,稍不顺眼非打即骂,天寒地冻还得叫她洗



衣、洗尿布，两只手冻得红肿溃烂，后母也视若无睹。即使高登科有时返回家中，高晓岚也不敢对父亲诉说，只得默默地忍受着。后来，高登科从乡邻亲友口中得知后妻六氏把晓岚当作丫头使用，受尽虐待，老将不禁想起自己童年的不幸遭遇，一阵心酸内疚不已。于是，派手下当差的将晓岚接到安庆，带到身边，亲自照料，这才使晓岚从后母虐待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这时，晓岚渐渐长成身材修长、面目清秀、一双小脚的大姑娘了，于是，老将心中暗暗地考虑着女儿的婚事……

### ◎文武攀亲强结姻缘

高晓岚虽是目不识丁，但毕竟是将门之女，有些富户人家来说亲，老将高登科均未择中理想的女婿。陈独秀家本是怀宁县乡下的一个小户人家，家世清贫，绅士们向来不屑一顾。然而，陈家和高家门第天壤之别，是那樣的悬殊而又极不相称，那么，他们又是如何结亲的呢？这得从陈独秀过继给叔父陈昔凡为嗣子说起。

陈昔凡先后娶三房妻室，都未曾生子，是他萦绕心怀的一大不顺心之事。陈独秀两岁时父亲去世后，家境十分贫寒。他的母亲对他和他的大哥寄以莫大的希望，省吃俭用，供他读书，企望将来长大考科举，起码也得中个举人，为他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的父亲争气。陈独秀幼年极为聪慧，在私塾读书时，十分调皮，老先生在上面领读四书五经，他在下面不是东张四望，就是动嘴不出声，而每回堂考，他总是名列前茅。同时，他常把同学们已经作好的文卷抢来撕掉，等老师要作文卷时，他一挥而就，而别的同学则只好干瞪着眼，挨老师的骂，陈独秀则哈哈大笑不止。陈独秀 17 岁时，一举考中秀才，一下轰动了怀宁县，他的叔父昔凡也为之高兴，并倍加赞赏。这时，曾考取恩科举人的陈昔凡，由山东巡抚张耀保举补缺知州知县。陈独秀中秀才，陈昔凡出任知县，这两件事使陈家在怀

宁县这个小地方开始有名望了。为使陈家家业后继有人，在族长的主持下，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陈独秀过继给陈昔凡为嗣子。由此摇身一变，陈独秀由小户人家的孩子成了知县府上的少爷，更令人刮目相看了。几家本来瞧不起陈家的富户，竟争先恐后地托人说媒欲与陈家定亲联姻，一场联姻竞争在几户富豪之家展开了。

这时，正在考虑为女儿择婿的高登科，听说陈家公子中了秀才，且养父又是知县，心想陈家公子倒是理想的乘龙快婿。于是，迫不及待托人上门说亲。陈昔凡一听，说亲的是赫赫有名的安徽统领副将高登科，心中也暗自高兴。他虽是知州知县，但由于朝中无人，未能得到朝廷重封，为了寻求靠山，曾四处求人无门。现在副将高登科托人上门求亲，相中嗣子独秀为婿，这不是想巴结还巴结不上的亲事吗？陈昔凡没有顾及高晓岚比陈独秀长三岁，也无须征求陈独秀的意见，便满口应承了这门亲事。这样，“文武相亲”，高登科在与陈家联姻竞争中获胜，于1896年为长女高晓岚与陈独秀订下了终身。这门亲事一经传出，称羨庆贺之声便不绝于耳。

陈独秀虽年仅17岁，但在同龄人中是佼佼者，思想比较活跃，对于这门实属封建包办的亲事，他是快快不快的。这倒不是因为未来的娘子要长自己三岁，更主要是因为他对这种由家庭越俎代庖包办的婚姻深恶痛绝，同时，未来的娘子又没有文化，“秀才与文盲”，岂能相配，又怎样生活？但处于那种封建时代，儿女婚事均由父母包办，这是几千年雷打不动的封建礼教，小小年纪的陈独秀对这门亲事即使一千个不情愿，也奈何不得。再一想，岳父大人有权有势，别人可羡慕不已，他只有顺水推舟了。

### ◎唯一的一次婚礼

1897年的一天，弹丸之地的安庆城，街上一大早就闹腾起来，人们奔走相告，说是安徽统领副将高登科今天就要把女儿嫁给陈

府的秀才少爷。

这时，陈独秀的养父陈昔凡由于得到亲家高登科向朝廷举荐，青云直上，一帆风顺地在东北任职时大发其财，家拥巨资，置地千余亩，且在北京、东北和安庆开设店铺，骤然间成了安庆“名门望族”。陈家为炫耀自己的门楣，为陈独秀的婚事大操大办，十分排场。同时，高登科也为女儿置办了极为可观的嫁妆，仅金手镯就有10两重，令人刮目相看。

早已择定的黄道吉日这天，陈昔凡家喜气洋洋，挂灯结彩，亲友盈门，搭台唱戏，好不热闹！在一队清兵卫队的陪送下，吹吹打打，鞭炮齐鸣，一顶大红喜轿穿城而过，悠悠荡荡地抬进了陈府宽一丈有余的大门。在盈盈喜气中，候相请了新人出轿。这时年方18岁的陈独秀，带着无可奈何的心情，见比他长三岁的新人高晓岚蒙着盖头，喜娘披着红扶她来到堂中。在候相的赞礼声中，陈独秀像一个让人摆布的玩偶，身不由己地与新娘拜了天地。又请出养父母陈昔凡夫妇登堂受拜，两位老夫妻笑逐颜开，喜从心来。行礼完毕，新郎新娘喜入洞房，亲友们嬉闹了一番。在一对红烛飞花下，新郎陈独秀轻轻慢慢地揭去新人的盖头，顿时新人的容貌一览于陈独秀眼帘，盛装艳服，身材颀长，眉清目秀，确实不愧将门闺秀。可是，当陈独秀视线落到新人穿着一双大红绣花鞋的小脚时，他不禁楞了一下，心想这如同一朵鲜花遭霜打，缠足摧残了妇道人家。这时，喜娘从陈独秀手中接过盖头，也就步出洞房。陈独秀没有欢乐，也没有悲哀，他只有和新人默默相视，但多少还有些兴奋。他却不能忘掉一切地独睡，因为和他睡在一起的是一个比他长三岁的大姑娘，不禁心头笼罩着茫然……

这是陈独秀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明媒正娶并举行的婚礼。

## ◎思想隔膜酿成婚姻悲剧

鸳鸯成对之后，起初小两口表面上还算过得过去。但他俩的思想差距远不止一个世纪，就像一堵墙隔在他们中间，感情十分不融洽，双方很少有言谈，更谈不上什么甜甜蜜蜜的悄悄话儿了。

高氏虽出于将门，但由于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旧思想的影响，加之后母的虐待，而未能读过书，斗大的字不识一个，思想趋于保守，恪守妇道，满脑子的“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是典型不过的旧式妇女。结婚以后，陈独秀曾多次劝高氏识些字，学点文学，看些有趣的小说，学些好听的儿歌，但她不屑一闻，甚至骂陈独秀放“洋屁”。一生未出过远门，只是在晚年时，为着看望生病的二儿子陈乔年，在三儿子陈松年的陪护下去过武汉一次，见了汽车都惧怕，对大城市花花世界，很是看不惯，见那些袒胸露背的洋女人和剪着入时短发、穿着短裙的中国女人们，她闭目而过，还骂这些女人不要脸，丑死了。同时，高氏由于幼年受后母虐待，性情暴躁，动不动就发火，不买陈独秀的帐。有一次，陈独秀拿来一本《三字经》欲教她读时，她一见即火冒三丈，抢过手来就撕得粉碎，口里还振振有词地骂道：

“你书越读越坏！我父亲不读书，照样当副将！”

陈独秀想留学日本，曾多次与她好说歹说，欲借她 10 两重的金手镯作为盘缠，待他留学成名，手中有了钱再还她，而她坚决不给，并气愤地说：

“这是我娘家陪嫁的，你这个黑心肠的东西！”

不仅如此，她还想方设法不让陈独秀出去留学。为此，他俩常有争吵，弄得家庭越来越不和睦，陈独秀也渐渐变得心灰意冷，心中更加茫然了。陈独秀与高氏截然相反，少年得志，颇负才名，思想十分活跃，不安于现状，易接受新事物，加之他曾去杭州求是书院

学习和留学日本，眼界大开，同时，又接受了辛亥革命的思想，在当时可说是一个思想激进者，对封建礼教疾恶如仇，敢于冲破旧的世俗偏见。1901年，他瞒过家人东渡日本留学东京，入高等师范学校的当天，就剪掉了盘在头上的辫子，并倒上煤油当众焚烧成灰，令同去的中国学生目瞪口呆，十分惊讶。他还表示说：

“誓与封建天朝彻底决裂，不留任何尾巴！”

辫子是大清朝的象征，剪辫子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是要杀头的。后来，他从日本回国时，不得不戴着一条假辫子，可是一进家门，他就把假辫子扯了下来，一头短发，一身西服革履，吓得全家人胆颤心惊。高氏见了满肚子窝火，横看竖看总不顺眼，骂他忘了祖宗，穿着洋装像洋鬼子一样。朝廷命官陈昔凡回来，见到一头短发的陈独秀，吓得面色铁青，怒火中烧，大声斥责道：

“看你这个样子，让外人见了你还能有命吗？你是大清秀才，竟敢剪掉辫子对抗朝廷，这是犯罪，要杀头的！真是大逆不道！家门不幸！”

说着，陈昔凡拿起假发，冲着陈独秀大声吼道：

“你还不赶快给我戴上，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不准出去！”

陈独秀听了叔父的责骂，只言不发，默默地望着养父，也不与之抗争，但也没有戴假发。这时，他大哥陈孟吉看到这僵持局面，心里也急了，于是劝说道：

“小弟，你还是戴上吧，叔父怕你惹祸吃官司，你也该替叔父的处境想一想，也不要让家里人为你担惊受怕！”

陈独秀听了大哥的劝说，才勉勉强强地把假发重又戴在头上。

相比之下，高氏却像是老古董，梳老式发髻，娘家陪嫁的衣服宁愿压箱底也不穿，常常穿着无艳丽色彩的大褂子，长裤的裤管用绳子扎紧，一双小脚迈着方寸小步，走路一摇一摆。陈独秀每每见到这副样子，就从心底厌烦而无一点好感，常常唉声叹气，摇头不已。也许是对婚姻悲剧的感触，更加促使了他对封建婚姻制度抨击

的决心。后来，在《安徽俗话报》上，他连续发表《恶俗》论说，尖锐批评“父母包办，强迫婚姻”的旧婚姻习俗，大声疾呼，主张男女自由择配。

辛亥革命胜利，推翻了满清，民国成立，陈独秀与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一样，欢欣鼓舞，走上街头鸣放鞭炮。这时，他正在杭州陆军小学任国文史地教员，安徽都督孙毓筠慕陈独秀之名，邀陈独秀任都督府秘书长。几经辗转，陈独秀回到了安庆，后又改任高等学堂教务主任。不久，柏文蔚继任都督，陈独秀再度出任都督府秘书长。其实，这时陈独秀已另有新欢——与元妻高氏的同父异母妹高君曼由同居而在杭州结婚。陈独秀不过表面上与高氏维系关系，其夫妻关系已十分恶化了。他由杭州返回安庆后，与高君曼独住在安庆宣家花园的一处别墅里。1913年陈独秀在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他被迫又自安庆避难芜湖。一到芜湖，即被当地驻军逮捕入狱，并贴出布告，要枪毙他。陈独秀却很从容地催促道：

“要枪毙，就快点吧！”

后经当地知名人士刘叔雅、范江偃、张子刚等周旋，极力营救，柏文蔚也亲临芜湖解救，方得幸免。陈独秀获释后，只身潜往上海，后又去了日本江户，继续投身于爱国反帝斗争，辅佐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从此，陈独秀再也没有归过家门，置高氏于一旁，而将门内高氏的高氏，却一直空守安庆家门……

## ◎独守空房悲郁离人间

1913年，陈独秀远离家门后，不幸和磨难一个又一个落在陈家，使得高氏终日惶惶不安，如同惊弓之鸟，在磨难中独守空房，极度的孤独和抑郁。

官运亨通大发其财的养父陈昔凡，因与英商经营大豆一案败诉而倾家荡产，气愤而极度忧郁，染病于1913年5月去世。家中的

一棵大树倒了，一个封建官僚大家庭开始衰落了。作为嗣子的陈独秀本应支撑这个家庭，但他历来不问家事，也不愿继承这个家业，同时因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又逃离了家庭。因此，这个衰退的大家庭，开始由婆母谢氏支撑着，但不久，谢氏因承受不了这个大家庭由兴而衰的沉痛打击，焦急而忧愁，以致双目失明。那时，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才15岁，次子陈乔年12岁，三子陈松年10岁，这样，这个江河日下的大家庭的重负便自然地落在元妻高晓岚的肩上。然而，命运之神却使她连连遭遇厄运，没有过过一个安宁的日子。

1913年7月，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逃离安庆，后又亡命日本。袁世凯的爪牙、安徽都督倪嗣冲盘踞安庆后，便下令“捕拿柏文蔚之前秘书（长）陈仲甫”，并派部下到陈独秀家查封，整个家被洗劫一空。没有抓到陈独秀，穷凶极恶的倪嗣冲派兵到处捉拿陈独秀的儿子，扬言要斩草除根，吓得高晓岚惊恐万状，束手无策，跪下哀哀求饶。幸好事先有人通报，陈独秀之子逃往乡下，才免遭毒手。其侄儿陈永年被捕入狱，脚钉8斤重的铁镣，受尽非人折磨，经极力营救打点几百大洋，才得保释。事后，高氏愤愤斥骂陈独秀：

“死不掉的东西，招来这样大的祸，却一拍屁股跑了，将来定没有好死！”

高晓岚当年做梦也没想到，父亲替自己择配的郎君竟会变成康党、乱党、革命党，大逆不道……

1915年8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于9月创办了著名的刊物《青年杂志》（第二卷改名为《新青年》），它的创刊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1917年1月，应蔡元培聘请，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把《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陈独秀家中。陈独秀高举“文学革命”大旗，积极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向封建势力及其腐朽的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有力地推动了五四运动的爆发，被称之为“思想界明星”、“五四运动总司令”。不料，大祸也随之降临。1919年6月11

日晚，正当陈独秀和高一涵、邓初等人，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五层楼上向游客抛散传单时，被北京警察厅跟踪的巡警和步军统领衙门便衣密探当场逮捕，并押至警察厅。当夜，反动当局又围抄了陈独秀住宅（亦为《新青年》编辑部），抄去书籍、信札等。

陈独秀被捕后，立即引起社会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北京《晨报》、《北京日报》、《公言报》、上海《申报》、《时报》、《民国日报》等全国各地报刊，纷纷在显著位置发表消息、评论，顿时群情激愤，“函电交驰，多方营救”，要求当局立即将其释放出狱。然而，独守安庆家门的结发妻高晓岚却蒙在鼓里，一无所知。一天，正在小学读书的稚气的三子陈松年，被一位崇敬陈独秀的老师叫去，关起门，悄悄地问陈松年：

“松年，你可知道你父亲陈独秀，在北京被捕？”

陈松年听了先是一惊，继而莫明其妙地答道：

“老师，我父亲叫陈仲甫，不叫陈独秀，你弄错了吧？”

“不错。”说着，这位老师从抽屉里拿出几份报纸给陈松年看。

陈松年虽然打从记事起没见过父亲，但看过父亲的照片。他一看报纸上的陈独秀，正是自己的父亲，顿时吓得脸色煞白，“陈独秀”是他父亲的笔名，比原名“陈仲甫”还有名气，他和他母亲都不知道。机灵的陈松年知父亲被捕非同小可，若是被地方当局知道了，家里又要遭殃。忙对老师说：

“老师，此事千万不能外传，传出去不得了。”

“我知道，你放心好了。”

陈松年放学回家，小声告诉母亲说：

“妈，爸爸在北京出事了，又被捕坐牢了。”

“什么？你从哪儿听来的？”高晓岚听了十分惊讶，忙问道。

“老师告诉我的，起先我也不信，看了报纸上的照片，才相信是真的。”

“松年，千万别对你祖母说。”母亲嘱咐。



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上次，陈独秀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殃及家庭之祸，历历在目，犹如昨日发生。受惊余悸未消的高晓岚，顿觉大祸可能又要降临家门，于是多日不让松年到学校去读书，而要他去乡下避避风，高氏又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时隔不久，这位老师又告知陈松年说：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北京当局已释放你父亲出狱，没事了。你父亲了不起，名震全国，令人敬佩。”

陈松年听到父亲释放出狱的消息后，撒开腿跑回家告诉母亲。高晓岚听了，心中的石头才算落地，稍稍放下了心。就其个人恩怨来说，杀了陈独秀才解高氏心头之恨，然而，他毕竟是自己的丈夫，担心他有个三长两短，也是情理所在。不过，她更多的是怕祸及家门，这个家已支离破碎，哪能再经得起如此巨大的灾难呢？然而，她每每想到此，心中怨愤难平，从此，她再也不愿听到有关陈独秀的事儿了。所以，1921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建中国共产党及先后两次被捕，她虽有耳闻，但她装着全然不知，仍然过着她那孤独而难熬的生活。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祸又殃及陈独秀安庆家门，受到蒋介石部下的侵犯。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右派趁机要陈独秀家的房子，并强行在住宅里办公，扬言要抓他的儿子陈松年，斩草除根。吓得高晓岚紧闭房门，日夜护守着儿子松年，不敢迈出家门一步。双目失明的婆母谢氏，心急如焚，不得不叫人打电报给柏文蔚，后经柏文蔚从中斡旋，国民党省党部右派分子才从陈家撤走。高晓岚对陈独秀恨之入骨，一气之下，便把陈独秀的藏书和著作，一把火烧得个精光，免得再惹事生非。

那以后，高晓岚仍然整天提心吊胆，心神不宁。她既担心陈独秀的安全，更令她担心的是她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的安全。他们兄弟俩虽然年轻，她也知道他们都是共产党的领导人，

蒋介石是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如果有个三长两短，那又如何是好？于是，她经常在家里烧香、祭祖、求神拜佛，祈求神灵保佑陈独秀父子平安。

然而，噩耗还是传来——陈延年和陈乔年，于1927年7月4日和1928年6月6日，先后惨遭国民党杀害，壮烈牺牲。当时高晓岚并不知道，后来，还是陈松年从报纸上看到他两个哥哥被国民党先后杀害的消息。陈松年原不想告诉母亲，因她身体不好，正在患病，不能让母亲精神上再受打击。然而，延年和乔年毕竟是他同胞哥哥，手足情深，回家后，一个人关在房子里痛哭不已。母亲听到松年如此痛哭，一阵心疼，忙叫开门问他：

“松年，你怎么啦？哪儿不舒服？”松年摇头不语。

“谁欺负你了？”

松年仍然摇头不语。

“是不是你父亲又出什么事了？”

“妈，不是。”说着，松年一把抱住妈妈的腿，哭得更加厉害而悲痛。

“是不是你哥哥出了事？”

“嗯……”陈松年悲痛哽咽了。

高氏一听这噩耗，顿时天旋地转，悲痛欲绝，泣不成声。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安庆，同样是一片白色恐怖，既不能嚎啕大哭，又不能设灵堂祭祀两个儿子的亡灵。中年丧子的高晓岚痛不欲生，更使她忧心如焚的是国民党可能再次祸及家门。

一悲未过，又生一悲。她的长女陈筱秀得知大哥陈延年牺牲，去上海奔丧。由于国民党不让收尸，性情刚烈的陈筱秀极度悲痛，忧愤之下暴死在上海医院。此时，陈独秀又隐蔽地下，还是好友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慷慨解囊料理了丧事。本已极度悲伤的高氏，又听到女儿暴死于上海的噩耗，几度昏厥，几度欲投江而死……

这接二连三的灾难，折磨得将门之女身染肺结核和妇科病，面

容憔悴，日渐消瘦，一病不起。其实，陈独秀与同父异母妹妹高君曼同居、结婚之忧郁，早已在她身上埋下了病根，只不过为了顾全陈家的体面，她并不外露，只是把这家丑深埋在心间，这就如同套在她心灵的绞索，越套越紧，病愈染愈重，虽经多位医生医治，仍不奏效。1930年冬，高晓岚守尽空房，饱尝了人间的磨难和悲郁，走完了她那多难的人生旅途，终年55岁。

此时，陈独秀已抛弃第二个妻子，与不到20岁的潘兰珍结为秦晋之好，再次寻欢作乐，他哪里知道他的结发妻子高氏已含愤离开了人间。

1932年，陈独秀被捕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一天，长到30岁只是幼年见过父亲的陈松年，来到南京监狱探望陈独秀。陈独秀见了这个不认识的儿子，先是一愣，后又高兴地抓住松年的双臂，激动地说：

“真没想到，你都长大成人了！”

然后，陈独秀详细询问安庆家里的情况：

“怎么样，家里人都好吗？你母亲好吗？”

松年向父亲望了望，稍停了会，轻声答道：

“家里老小都很好，奶奶身体也很好。就是母亲身体多病，于前年就去世了。”

“啊！你……你母亲，真……的去世了？”陈独秀心头一怔，脸上略显痛苦之状，沉默不语，不停地大口大口抽着手中的烟卷。过了好一会，悲戚而内疚地说：

“松年，你母亲是个老好人，为陈家辛苦一生，未享过一天福，我对不起她。我感谢她，为我生了三个儿子。延年、乔年虽然牺牲，但他们死得英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你母亲也算是英雄的母亲啊。”

说着，陈独秀在囚室内来回踱步，又点燃了一支烟卷。往日夫妻一曲三波的生活，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松年由于与父亲感情生疏，一直低着头，沉默一阵的他对父亲说：“父亲，母亲弥留之际，还念着你……”

“噢……”陈独秀听了松年这句话，不禁一阵内疚。接着，他对松年吩咐道：

“松年，你回去后，替我买几刀纸钱，在你母亲坟前烧烧，聊表我对她的缅怀之意。每逢清明，不要忘了去扫墓。”

“父亲，小儿一定照办，请你老放心！”

### ◎夫妻合冢九泉下

高氏向来恪守妇道，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信条，不敢越封建雷池一步。即使陈独秀无情地抛弃她而远离家门，在陈家连遭不幸的年月里，她都竭尽全身心地尽着一个妻子的责任和义务，心地善良，生活十分俭朴，很会过日子。她对公婆孝敬，尊失明的婆母为母，梳头、浆洗，无微不至地体贴和照顾，从无怨言，在陈家族中很有贤惠之名。她对唯一留在身边的小儿松年，寄以希望，倾注了全身心的母爱，她省吃俭用，培养松年读书，教诲松年要正直做人，不要像他父亲那样四处闯荡而不顾家庭。因此，她平时对松年管教甚严，不让他无事外出，更不让他参加那些在她看来是过激的活动，连学校里的童子军也不让他参加。松年中学毕业后，也不让他考大学外出读书。她四处托人，在安庆一个小学校里给松年谋了个教书职业。这样，她才算安下了心，松年可以不离开她了，内心感到有几分欣慰。

高晓岚生前，每逢清明时节，都要带小儿松年去安庆北郊祖坟踏青扫墓，祭祀祖先。还常对松年说：

“这个地方好，附近有树林、桃园，幽静、安逸，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其实，高氏心中早已隐藏着一个“秘密”和宿愿，一直未对松年

讲过。直到她生前最后一次扫墓时，她才向小儿松年吐出了真情。

那是1930年的清明节。这天，多日“雨纷纷”的安庆，雨霁初晴，春光明媚，大地放绿，吐花杨柳，随风吹拂，婀娜多姿。人们三五成群地走向城外，踏青扫墓，祭祀祖先，这乃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一大清早，高晓岚就催促小儿松年上路，因祖坟地离城区有10余华里，往年家业兴旺时，她都乘马车去扫墓，现在家业衰落，生活清贫，而无能力乘坐马车了，只得步行。高氏又是小脚，这来回的路程，也够她走的。这时，松年正站在门口张望，并安慰母亲不要心急。原来，松年于前几天就与乡下亲戚联系好，请了一辆独轮小车，说明是母亲清明要去扫墓。不一会儿，一辆独轮车嘎吱嘎吱地沿着石板条路，推到了他家门口，母亲见了十分开心。

独轮车载着高氏，又嘎吱嘎吱地向城北郊外祖坟地推去……

一个多时辰，独轮车到了祖坟之地。高晓岚下得车来，在长满嫩绿草儿的祖坟前，摆好祭祖的酒饭，让小儿松年鸣放鞭炮，她跪下烧纸，连连叩头，嘴里还念念有词。松年挥锹挖土，给祖坟披上新土，换上新坟顶……往年，她祭祀祖先扫墓后，就赶着往回走。而今年，她却迈着方寸小步，在祖坟四周走了又走，心情十分郁闷，好像有什么话要对小儿松年说，可欲言又止，沉默不语。走着，走着，突然在路旁那块无名碑处站住，手摸了又摸，停了好一会儿，她才呼唤松年：

“松年，你到这儿来，我有话要对你说。”

“母亲，我来了！”松年放下手中的铁锹答应道。

“松年，你要记住，这路旁是一个假坟，我怕他人占领，而立了这块无名碑，万一我……”

松年听了，望着病魔缠身而虚弱的母亲，眼角不禁流出悲伤的泪水，但又强忍着，说：

“母亲，你不是好好的，怎么想到……”

高晓岚凭着母爱的本能，一个劲儿地摸抚着小儿松年的手，泪

水盈盈悲戚地说道：

“松年，我儿，人早晚都要死的。看样子我是活不了多久……”  
说着，母子俩拥抱着悲泣起来……

1930年冬，当高氏含着悲郁艰难地走完人生旅途，咽气离开人世间后，小儿松年按照母亲生前的遗愿，含着悲痛，将亲生母亲葬于无名碑处，并在坟旁留下一块空地。松年当时想，母亲生前长期与父亲分离，而又饱尝人间沧桑，只要有可能，待父亲百年之后，一定要遵照母亲的遗嘱将父亲与生母合冢，让他们在九泉之下，相依为命，安度亡灵。

1945年5月，漂泊一生的陈独秀凄凉地病逝于四川江津，厝于鼎山脚下的一个园地里，正是“鼎山青松映孤魂”。八年抗战胜利后，陈松年为实现自己的夙愿，于1947年6月，想方设法，几经周折，将父亲陈独秀的灵柩迁回故土安庆，而与生母合冢于安庆北郊叶家冲祖坟之地，并刻有“先考陈公仲甫之墓”一碑。

合冢之后，陈松年面对先父、生母合冢之墓，含着泪水呼唤着：

“母亲大人，先父回来了！小儿松年，愿你们老人家，在九泉之下相依为命，安度亡灵！”

---

## 第四章

### 才貌不凡高君曼 婚姻自主终见弃

---

#### ◎上海来的落难女

1930年冬，六朝古都南京。

一天，一列从上海开往南京的火车，在汽笛长鸣声中，缓缓在下关车站停下。顿时，肩挑手提的旅客，争先恐后地簇拥着走出车站。人流中，一位身材瘦长、梳着齐耳短发、举止文静，但满面愁容的中年妇女，提着简便行装，携着一双刚成年的儿女，不时地关照着，又不时地停下歇歇，艰难而吃力地走出车站。然后，又穿过人流，好不容易挤上驶往城南的马车，在马蹄得得和寒风呼啸声中，到了城南秀山公园旁。下车后，几经打听探寻，终于在东厂街6号找到事先联系好的几间破草屋住下。邻里都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位新来的满面愁容的陌生女子。

她就是陈独秀的第二位妻子高君曼，因陈独秀另有新欢而遭遗弃，落难独居南京城。那一女一男未成年的孩子，正是陈独秀与她1912年所生的女儿子美、1913年所生的儿子哲民（鹤年）。

那么，陈独秀是怎样与高君曼结合，高君曼又是怎

样被遗弃，落难而来南京独居的呢？这说来，挺有戏剧性。

## ◎将门才女高君曼

高君曼，约生于1886年，为陈独秀岳父高登科后妻六氏所生，比同父异母姐、陈独秀结发妻高晓岚小10岁，比陈独秀小六七岁。其父高登科身为清廷武将，地位显赫，权势皆有，置有田地4000余亩。然而，高登科万事皆称心如意，唯独缺子，是人生一大憾事。第一夫人早丧，后续弦詹氏，独生一女晓岚。詹氏亡后，续弦阜阳六家女儿为妻，高登科只盼得一贵子，以了一生夙愿。不料，后妻又生一女，这气煞了老将。起先，高登科闻悉后，怏怏不快，叹气不已。但一见小女长得与长女晓岚大不一样，小脸儿红如玫瑰，两眼水灵灵，目秀眉清，红润小嘴“叭嗒叭嗒”地不停动着，惹人喜爱。刹时，高登科一扫心里的不快，感到由衷的高兴，小女长大，一定是才貌双全的将门闺秀。他一心想得子，可惜“天公不作美”，却得一美女，故起名为君曼（小名为“小众”）。“君曼”这个名字，叫来温文尔雅，优美动听。

高登科虽是武将，但由于幼年家境贫寒，又遭后母虐待，未进过学校门。他又未让长女晓岚读书，使得她目不识丁，甚感内疚，这实与门第不符。于是，他暗暗思忖着，一定要好好培养小女读书。小君曼随着年龄的增长，出落得越来越漂亮，聪明伶俐，活泼烂漫，喜爱唱歌，一张甜蜜的小嘴，见人就亲切称谓他人，家人、邻居以及府里当差的，无人不喜爱她。高登科办完公事回到府中，总爱逗逗小女，十分开心，有时甚至学猫、学狗叫，逗得小君曼和妻子六氏乐得哈哈大笑。高登科十分疼爱小君曼，不让她缠足，任其自然生长，但他对她要求甚严，寄予莫大的希望。小君曼七八岁时，他就请高师上门教小君曼读书识字。小君曼读书认真，记忆灵敏，《百家姓》、《三字经》之类的启蒙读物，往往老师教一两遍，她就能背诵出来。



到十来岁时，读书很有长进，四书五经之类，她能滚瓜烂熟从头背到尾，但她不喜欢死记硬背，爱“打破沙锅问到底”，对于不懂的地方，她不弄懂决不会罢休，有时问得老师一时也难以答出。有一次她问老师：

“老师，男人的头上为什么要盘着一条辫子？多不好看。”

老师被问得脸色煞白，连连摆手道：

“君曼，你不可问这话，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这时，她已能写短篇的命题作文，字也写得清秀工整，很讨老师喜欢。老师往往因教学有方，小君曼不断长进，而受到高登科的嘉奖。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君曼求知欲望日渐强烈，已不满足于那些四书五经之类的东西了。她的思想已渐活跃、开朗，与她姐姐高晓岚截然相反，她常常背着父亲和老师看些小说、故事之类的东西，开始受到一些新事物的影响……大约十七八岁，她已长成一个十分俊秀的大姑娘，练得一手好字，写了一些像样的文章，人见人夸。父亲高登科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为深造小女君曼，好为高门将府争口气，他不顾妻子六氏的反对，把她送到北京女子师范就读，成了将门才女。

这时，陈独秀早已与君曼同父异母的姐姐高晓岚经双方家长包办完婚，长子延年、次子乔年也相继出世。陈独秀又曾去杭州求是书院学习天文、语法和造船，因有反清言论，被追捕，逃回安庆，与柏文蔚等组织青年励志社，倡导建立私人藏书楼，发表救国演说，在省城安庆引起广泛的影响。这便是陈独秀最初的革命活动。

## ◎ 偶遇君曼一见钟情

一天，陈独秀正在房中埋头看书，挥毫写文章，家里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妻子高晓岚正高兴地忙着接待，亲切地说道：

“妹妹，几年不见，你的样子全变了，像个洋小姐。若在路上遇

见，还叫姐姐不认识你哩。”

“姐姐，你可真会开玩笑。”

“你可把姐姐想坏了。”

“姐姐，你好吗？我也想你。姐夫呢？他在家吗？”

“他在里面。”高晓岚漫不经心用手指了指房间说。

这时，陈独秀从妻子与来客的对话中，才听出来客是自己的妻妹高君曼。由于陈独秀和妻子高晓岚感情不融洽，关系日渐恶化，对高家的人，他向来不愿多理会，常常避而不见，虽是妻妹放假来看望，他也不屑一顾。然而，妻妹君曼与妻子洒脱的谈笑，却不时地传入他的耳中：

“姐姐，现在时代不同了，你怎么还是个老古董，也该做些入时的衣服穿穿。”

“我是个妇道人家，哪能与你相比。你在北京见了大世面，你受了洋人的影响。”

“洋人侵略中国固然不好，但洋人的文明也有值得学习的东西。”

“姐姐的老思想，怕死了也不会变。”

“姐姐，你不要自卑，妇女也是人，也应自尊自重，求得个性解放，为什么老是守着男人和锅台转？”

“恪守妇道，自古如此。”

“姐姐，你该向姐夫学些文化，性情放温柔些。他是个有学问的人，他的文章写得真好。”

“妹妹，好了，不说这些。说起他来，真叫人伤心……”

“姐姐，姐夫对你怎么啦，我去找他算帐！”

……

听着这番对话，不禁使陈独秀心头为之一怔，对妻妹刮目相看了。于是，他放下手中的书和笔，抬头透过房门，仔细地打量着这位小姨子的风采。高高的身材，姣好的脸蛋，明眸皓齿，一头茸茸短

发，一身新潮入时的打扮，是一个大方、文雅、俊秀的新女性。陈独秀见此女性，不由自主地走出房来。机灵的高君曼见姐夫走出房门，便笑着迎上前去，说道：

“姐夫，您好！您在报上发表的颇有见地的大作，小女子多有拜读，不过还有不少疑惑之处，不知姐夫愿否折书赐教！”说话间，神气活泼，还带些天真的顽皮。

陈独秀听了，说道：

“君曼，你放假回来了？”

“是的。”

“请到书房里谈吧！”陈独秀手一让说。

高君曼对姐姐晓岚一挤眼，笑着说：

“姐姐，失陪了。”说着，就半推半拥地把陈独秀先拥入了书房。

高君曼，是年十八九岁，如此开化的举动，使陈独秀心头一颤。她思想活跃新颖，与陈独秀思想颇相似，具有时代女性的特征，尤其是就读于北京女子师范，见多识广，眼界大开，洒脱而文雅，特别喜爱文学，从内心敬佩姐夫陈独秀的学识。

两人如同一见如故，谈得相当投机。尤其是陈独秀感到，这是他难得遇见的女性知音，眼前这位女性，不正是他所鼓吹、所提倡的新女性形象吗？于是，两人便打开话匣子，从古谈到今，从社会讲到家庭，从男人讲到女人，从中国谈到国外，畅所欲言，时而滔滔不绝，时而开怀大笑。他们谈得很多很多……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一直谈到万家灯火时分，可谁也不觉得时间太长。高君曼在姐姐高晓岚的多次催促下，才不得不起身，依依不舍地告辞。离开时，她还向陈独秀借了几本书，并对陈独秀嘻笑地说：

“姐夫，你放心睡觉好了，过几天我会还你的。”

陈独秀目送着走入夜幕中小姨子的背影，不禁想道：

“高家这个封建老窝子，居然也出了这个尤物，令人不可思议。”

从此，高君曼借着各种由头，时常和陈独秀见面，攀谈，交流思想，开展热烈讨论；或者去藏书楼阅读进步报刊和听陈独秀演讲。一天，君曼去藏书楼听陈独秀作拒俄演说，恰逢大雨，她见狭窄的藏书楼挤满了人，“多立门外”，虽被雨淋而不顾，鸦雀无声地听陈独秀“词情慷慨”的演说。这“群众激愤，气象万千”的场面，令君曼激动不已，内心更加敬佩姐夫的学识和反帝爱国的勇气。崇拜之情，几乎达到五体投地的地步。

起初，姐夫和小姨子亲亲切切探讨学问，无人非议，陈独秀之妻高晓岚也未生什么疑窦，更没有醋意了，她甚至以为，陈独秀与高家的关系正在改善，“亲戚越走越亲”嘛。

然而，人非草木，乃血肉铸成。岂料，天长日久，陈独秀与高君曼两人情趣相投，过从甚密，甚至幽会于公园，傍晚漫步在江边古塔脚下……感情日渐渗透、相融，两颗心相撞，终于发出爱的火花——超越了姐夫与小姨子的界限，步入了爱情“王国”，相亲相爱，难以割舍。此时，风言风语四起，闹腾得沸沸扬扬，几近满城风雨。

高氏将府，陈氏官府，在朝廷、在安庆地方，均是有影响的大户人家，岂能容得这伤风败俗、大煞风景的事……

## ◎婚姻自主高于族人歧视

事到1910年，姐夫陈独秀和妻妹高君曼的自由恋爱，已发展到感情的饱和点——同居、结婚。陈家、高家一齐反对，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叛祖离经之事。武将高登科、文官陈昔凡两亲家怒容满面，大发雷霆，联手要驱逐他们出家门。

养父陈昔凡认为这种败坏门风的事，比陈独秀干革命多次殃及家庭还难以容忍，是地道的败家子，以致扬言要“退继”，以维护封建卫道士的假面具。

岳父高登科则认为，两姐妹同嫁一人，为礼教所不容，大失老

将的体面，痛悔当初错择了女婿，气得一病多日。

其实，这时最为悲伤忧愁而气愤的，莫过于陈独秀明媒正娶的妻子高晓岚了，她没有发怒，也没有大吵大闹，只是整天悲郁哽咽，闭守房门。但她悲郁中也有所感悟，生米做成熟饭，事已至此，吵闹已无济于事；同时，君曼毕竟是自己同父异母胞妹，何必家丑外扬，损害两大家族的体面呢？这位善良质朴的女性，只有悲伤、叹息和忍耐，她别无选择，只有默默地过着没有爱情的悲郁生活……

高君曼自和陈独秀相爱，倾倒于陈独秀的情怀，尽管父亲高登科多次为她择婿，甚至于打、罚、跪，不准进家门，但她坚决不允，默默地爱着陈独秀。这时，她已有二十四五岁，她是知识女性，自有主见，决不像姐姐高晓岚那样做封建婚姻的牺牲品，决心冲破家族的歧视和封建礼教，与陈独秀相爱到底。陈独秀这年已31岁了，他自幼就倔强好胜，小时不喜欢读《左传》，宁愿被祖父毒打，他总不吭一声。凡是看准而必做的事，就勇往直前，义无反顾。1901和1902年，他先后两次东渡日本留学，见过世面，已经开始了革命生涯。对于家族的反对和歧视，是他预料之中的事，只要求得婚姻自由——与高君曼结婚，这一切对于他来说，是不能成为绳索的。有时面对家庭的强烈反对，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养父陈昔凡反抗道：

“婚姻包办，使得我与大众（高晓岚）苦不堪言。现在，我与君曼自由相爱，你们不容。难道你能纳妾，我就不能……”

养父陈昔凡听了这犯上的话，一时傻了眼，气得直哆嗦，挥着手，怒不可遏地骂道：

“好！你这个孽种，你走，从此你不要再进这个家门！”

“走！走就走，我早就想离开这个家了！”说着，陈独秀迈步走出家门……

陈独秀被逐出家门后，与高君曼私下商议：

“君曼，看样子你我家庭都容不得我们了。我们到杭州去，我那

里还有几个朋友。你看如何？”

高君曼听了，连连点头道：

“好！我同意去杭州！”

他们俩于1910年“远走高飞”，双双赴杭州。陈独秀在杭州初等军事学校任国文史地教习，自食其力，与高君曼生活在一起，成为正式的夫妻，开始新的生活。陈高两家虽耿耿于怀，可也奈何不得。

但是，陈独秀的家族仍不能宽恕他们，在《陈氏家谱》中，仍把高君曼称为侧室（即妾），对她所生的子女称为庶出，打入另册，不能与元妻高晓岚所生的子女相提并论。

然而，性格倔强的陈独秀，对于家族的歧视不屑一顾，求得美满婚姻，已是高于家族的歧视了。

## ◎西子湖畔情意绵绵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闻名于世而美丽诱人的杭州，“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在这美丽的西子湖畔，陈独秀和高君曼“徜徉于湖山之间，相得甚欢”，情意绵绵，感情炽烈，恩恩爱爱，生活得自由、幸福，完全摆脱了族人的歧视和束缚，抛弃家庭优厚的生活条件而自食其力，过着隐居式的生活。陈独秀在致苏曼殊时，说：

“仲（陈独秀）现任陆军小学历史地理教员之务，虽用度不丰，然‘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诗贺我乎？”

高君曼脸庞清秀，一身江南女子的入时打扮，亭亭玉立，温文尔雅，善良又厚道，竭力支持陈独秀所从事的事业，为他分担忧愁。她常伴随陈独秀出门访友，或参加一些活动，在此，他们结识了沈尹默、刘季平等江南文人，常游西子湖，以诗酒自娱，互相观摩、谈天说地，过着诗酒豪情的生活。他曾与沈尹默赋诗云：

垂柳飞花村路看，酒旗风暖少年狂；  
桥头日系青骏马，惆怅当年萧九娘。

友人常夸陈独秀娶了个才貌双全、志同道合的妻子。好友汪孟邹曾夸高君曼为“女中之杰”。在杭州这段自由自在的新生活，可以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安然自得而美好的岁月。

1911年10月，正当陈独秀与新得佳人高君曼过着温馨、甜蜜生活的时候，一声炮响，传来武昌起义的消息。陈独秀为之欢欣鼓舞，积极进行革命宣传，由君曼磨墨，他起草革命檄文多篇，交由革命党光复会干部周亚卫等人用大字报写好，夜里贴于杭州鼓楼的门旁，使“省垣官吏闻之悚然”。第二天，檄文不翼而飞，换上了抚台衙门严厉镇压的告示。11月5日，杭州光复，陈独秀与安徽同盟会的管鹏等人，督促新军响应，为形势所迫，新军惧而求降。陈独秀的胆识，令友人赞叹。

辛亥革命胜利，清帝宣统宣布退位，建立中华民国。陈独秀与高君曼彻底地获得婚姻自由，他俩高兴得相互拥抱，邀约沈尹默、刘季平等人聚会，举杯祝贺胜利。高君曼心潮起伏，唱起在杭州学会的越剧小调《梁山伯与祝英台》，愿在美丽的西子湖畔生活一辈子。1912年初，任安徽都督的孙毓筠，慕陈独秀之名，邀陈独秀任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接邀请函后，既高兴又为难，怕夫人高君曼不同意。一天，他与夫人高君曼商量说：

“君曼，现孙都督邀鄙人回安庆任都督府秘书长，你说回去不回去？我知道你不愿离开杭州这个天堂。”

“独秀，此事我已听说了，我为你高兴。能荣任此职，实属孙都督对你的器重，不过……”话到嘴边，高君曼又缩了回去。

“君曼，不过什么，你说出来。有什么难处，我们共同商量解决的办法。”

“我们是被迫离开安庆的，你也说过，再也不进家门，现在倒又

要……”

“君曼，现在时代变化，大清朝推翻了，家里人的思想也会变的。”

“话是这么说，回去生活在一起，总是不好。”

“那你说，该怎么办？”

“我的想法是，最好不住在家里。”

“好，我完全同意，你同我想到一块去了。”

陈独秀和高君曼依依不舍地告别美丽而留人的西子湖畔，由杭州到上海，绕过被张勋固守的南京，几经辗转回到故乡安庆。

这天，辛亥革命后的一个严冬的早晨，冬日红霞映衬下的临江古城安庆，显得格外的美丽。巍巍屹立在霞光中的古塔，出现在陈独秀、高君曼的眼前时，他俩不禁高兴地说道：

“看见宝塔了，我们又回来了！”

“呜——”汽笛一声长鸣，长江大轮徐徐靠近破烂不堪的安庆码头。当陈独秀与夫人高君曼拎着简便行装，兴高采烈地走向码头时，早已迎候在那里的都督府人员向他们挥手致意，燃放鞭炮，热烈欢迎陈独秀应招回安庆任都督府秘书长。人们上前与他们热烈握手，不断说着：

“欢迎，陈先生及夫人！”

“孙都督早已在等候你来任职。”

“谢谢！谢谢孙都督，谢谢各位先生。”陈独秀满面笑容，神采奕奕，无比的谦恭和诚挚。与一年多前被迫离开家乡去杭州时的心情，截然不同。

接着，他们夫妇俩乘上一辆披红挂彩的大马车，在几辆马车的伴护下，得得地穿过狭窄的街道，好不威风。人们夹道相看，有的指着马车说：

“那不是陈家的大少爷吗？”

“是的，听说他是都督府秘书长。”



“那是他的姨太太吧？”

“他的姨太太，就是他的小姨子。”

“噢……”

不一会儿，马车在安庆城中心北边的宣家花园一处别墅门前停下。这是都督府应陈独秀要求，事先给他安排的寓所。这里环境幽静，住的大都是有钱有势，或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家。陈独秀的寓所是一四合院，里面家具设施应有尽有，均是都督府人员按孙都督旨意而置办的。这里离位于南门的陈独秀家较远，他们夫妇俩独居这里，生活起居比较方便，少与家人接触，可以避免与家人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因此，高君曼对此寓所十分满意、高兴。他们在这里，又共同开始了新的生活。

陈独秀上任办的第一件大事，奉都督孙毓筠之命，亲赴上海，与上海旅沪各界及华洋义赈会开展工赈活动，为当年6月间安徽遭受特大洪灾捐募义款。人们慕陈独秀之名，纷纷解囊相助，取得显著成效，对稳定安徽局势，解决灾民的生计以及修堤防洪，起了极大的作用，这显示出了他初登中国政治舞台的才华，甚得都督孙毓筠的赞赏。是年，他与高君曼结合的产物——女儿子美出世了。次年，又生儿子哲民（鹤年），这又给他们的小家庭带来了欢乐。然而好景不长。1913年，陈独秀参加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又被迫偕高君曼逃离安庆，后在芜湖被捕，险丢脑袋。遇救后潜逃上海。然而，大祸却殃及家门，遭到袁世凯爪牙倪嗣冲的查抄，并扬言抓他的儿子，要斩草除根。陈独秀在上海听说家中的不幸遭遇，愤怒异常，表示“恨不得肉食其人”。从此，陈独秀远走他乡，四海为家，再也没有回过安庆故土。

## ◎志同道合历经风险

高君曼对陈独秀一片痴情，志同道合，历经艰险，柔情似水，从

1910年同居、结婚，到1930年被遗弃的20年间，她与陈独秀患难与共，颠沛流离，伴随他历经五四运动，创建中国共产党和反革命的四·一二大屠杀，风雨同舟，经历许多风险，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在动荡不安中没有过一天安宁日子，彻底打破了她想过教授夫人的那个温馨生活之梦，甚至还陪陈独秀坐过班房。

那是1921年10月4日，中国共产党创建不久发生的事情。

这天下午，陈独秀正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住处楼上睡午觉。高君曼兴致勃勃正与来客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打牌，刚打了两圈，突然有人敲门。包惠僧闻之，忙放下牌去开门，闯进两三个“白相人”，大声嚷着：

“我们要见陈独秀先生！”

“陈先生不在家。”包惠僧答道。

“我们要买《新青年》。”

“这里不卖，大自鸣钟下有卖的。”包惠僧又答道。

这几个人边说边向房内走，指着堆在地上的《新青年》说：

“这儿不是有吗？”

陈独秀闻声起床，穿着拖鞋走下楼来，见来者不善，想从后门出去，但到后门一看，有人把守着，又回到前庭。顿时，高君曼和包惠僧等人紧张起来，尤其是高君曼心里忐忑不安，吓得脸色发白，但谁都没有说出陈独秀来。不一会儿，来了两部汽车，几个巡捕不问青红皂白，就把陈独秀与高君曼等在场5人全部抓走，被押解巡捕房，并一一审问其姓名、职业与陈独秀的关系等。陈独秀自称王坦甫，未暴露身份，巡捕房无奈，让每人打了指纹。不久，褚辅成（字患生，北京众议院副院长、上海法学院院长）、邵力子也先后被捕。陈独秀见了褚和邵正要打手势叫他们不要声张，褚辅成没有意会，一见陈独秀，就拉着他的手大声说道：

“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接到这儿来了！”

这一下，陈独秀的身份暴露无遗了，褚辅成悔之莫及，不禁叹

息道：

“哎……”

褚辅成和邵力子，在弄清身份后就释放了。

高君曼与丈夫陈独秀等被投进牢房，她被关在单独的小号子里。10月秋夜，明月高挂，月光透过狭窄的透气窗射进牢房。睡在硬板床上的高君曼，不禁暗自吟诵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诗句，思绪万千，往日之事，如同电影一幕幕从眼前闪过。她想起了安庆，想起了父母，想起那天真烂漫的童年，想起那北京女子师范的学生生活，想起与陈独秀的结合，想起了那美丽的西子湖畔的幸福生活……她怎么也没想到，昔日的将门闺秀，今日却成了阶下囚。然而，当她想到丈夫陈独秀所从事的是正义而伟大的事业，亘古未有，既然冲破封建礼教与他结合在一起，就应与丈夫患难与共，同舟共济，在所不辞，陪丈夫坐牢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当她想到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时，不禁一阵心疼，悲从中来。若是夫妻同时判刑坐牢，这两个孩子又该怎么办呢……

第二天，会审公堂审问共产党首领及其党徒。公堂森严，令人毛骨悚然，未见过这阵势的高君曼甚是紧张、胆怯，然而三进牢房的陈独秀却是沉着冷静，应付裕如，化险为夷。当法庭认为高君曼和包惠僧等人为陈独秀的党徒时，陈独秀镇静自若地说道：

“他们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妇女，是我的太太。客人陪我太太打牌，有事均由我负责，与客人无关！”

法庭审问后，将高君曼无罪释放，而高君曼仍然十分焦急，担心着陈独秀与其他人的安全，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出牢房……

陈独秀是个有影响的人物，被捕后上海市闹得满城风雨，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上海、北京等地各大新闻传媒均作了报道。第三天，褚辅成和张继等，就将陈独秀保释出来，其他人也相继放出，但要随传随到。20天后又会审，说陈独秀宣传赤化，最后定案是《新青年》有过激言论。经第三国际代表马林的种种活动，结果罚款

5000元了事。

事后，陈独秀对妻子高君曼甚感遗憾地说：

“君曼，你受惊了，我对不起你。”

“话不能这样说，谁叫你是我的丈夫呢？这次被捕虽有害怕，但我更体会到你是一个真王的大丈夫。不过今后要更加小心谨慎。”

自此以后，高君曼在生活上更加体贴丈夫了。

这时期，正是陈独秀胸怀大志、叱咤风云之时，四处奔走革命，党的总书记重担在身，对于家庭很少顾及，家庭事务，教育子女，全由高君曼一人担当。她是新时代的女性，在革命的浪潮冲击下，她常为自己不能走出家门投身于革命而叹息。一天，她听说陈独秀与李达等人商定在上海创办一所平民女校，“以期培养妇运人材，开展妇运工作”，同时，也可以让一些干部家属参加，一边学习文化，一边掌握劳动技能。高君曼十分高兴地对陈独秀说：

“独秀，也让我去平民女校学习，好参加革命工作。”

“夫人，你把我家照顾好，把孩子教育好，就是对革命的支持。”

“话是这么说，但毕竟不是革命工作。”

“好，夫人，你有志气，等孩子们长大能自立，我一定向党组织介绍你。”

话说到此，知情达理的高君曼还能说些什么呢？

## ◎琴瑟之中不乏暗流

高君曼细细想来，丈夫陈独秀的话不无道理。他是党的总书记，又有多少事要做，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顾及家庭。于是，她心甘情愿地默默作出牺牲，做一个贤妻良母，像所有的母亲一样，用母爱去爱、去培养两个孩子，对陈独秀的生活照顾无微不至，有时还帮助陈独秀查些资料，或抄写些什么。不仅如此，她心地善良，还把

母爱分给陈独秀与她同父异母姐姐高晓岚所生的两个孩子——陈延年和陈乔年。她视陈延年兄弟俩为己出，深深地爱着他们。延年、乔年兄弟俩自幼育于祖父陈昔凡，因陈独秀早年出走家门，半生亡命，对家庭无有照顾，故延年、乔年兄弟俩都刻苦自励，才十五六岁，旧学已有很好的根基。为使他们兄弟俩自创人生，陈独秀把延年、乔年兄弟俩接到上海学习外文，并寄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即上海四马路亚东图书馆）店堂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吃的是烧饼，饮的是自来水，冬无棉衣，夏无蚊帐，晚间到巡捕房内学习法文，勤工俭学，十分艰苦。延年、乔年兄弟俩面容憔悴，人们都为之怜惜，多责怪陈独秀对他们兄弟俩不关心，不爱护。然而，高君曼对陈延年兄弟俩的困境，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她曾多次劝说陈独秀，要陈延年兄弟俩回家吃住，而陈独秀总是不以为然，并大声斥道：

“姑息养奸，不可！不可！”

为陈延年兄弟俩之事，她同陈独秀争吵过多次，但陈独秀性格与人不同，十分固执，一味地强调陈延年兄弟俩应自立、自创。为此，高君曼时时哭诉于同住上海渔阳里的陈独秀同乡好友、我国旅法著名女画家潘玉良丈夫潘赞化：

“独秀性情与人不同，望你以老友资格代我恳求独秀，让延年兄弟俩回家吃住。”

“延年兄弟俩是吾姐之子，我是他们的姨母，他们也很诚实，我从名义上的感情看待他们，尤胜我所生，他们也视我如母。”

“今不令其在家住食，知之者不言，而不知之者，谁能谅我？”每每诉说，高君曼总是泣不成声，一片真挚的母爱之心。

潘赞化为高君曼母爱之情所深深感动，也常以言语劝告陈独秀：

“独秀，你是延年兄弟俩亲生父亲，为何不立即叫他兄弟俩回家住食，君曼于心不忍。”

“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们自创前途可也。”陈独秀固执地说。

琴瑟生活中也不乏暗流。

陈独秀连多年老朋友也不给一点面子，这更使高君曼心痛不安，忍无可忍，伤心透顶。于是，由口舌之争，继而发展到出手相打。高君曼怒斥陈独秀：

“无耻之徒！”

陈独秀振振有词地宣布她是：

“资本主义！”

清官难断家务事，亲朋好友不敢置一词。直到1920年，陈延年兄弟俩赴法勤工俭学之前，仍是自立自创，未进家门住食。因此，父子情薄，如同陌路。他兄弟俩赴法后，高君曼仍时时惦念在心，常常催促陈独秀打听他们兄弟俩的情况，而陈独秀对此置之不理。1927年7月和1928年6月，闻陈延年兄弟俩惨遭国民党杀害，高君曼悲痛不已，在家烧纸哭泣，为陈延年兄弟俩在家中设牌位，剪纸招魂，以寄托哀思。而陈独秀虽然悲痛不语，但仍然讥骂高君曼：

“思想腐朽，封建迷信！”

陈独秀这固执的讥骂，岂能令这位善良、贤惠而通情达理的女性承受得了呢？这样，他们的感情又蒙上了一层十分可怕的阴影……

## ◎ 觅新人君曼遭遗弃

其实，陈独秀与高君曼感情发生裂缝，进而恶化，早已种下了孽根。

陈独秀与自由恋爱的高君曼初期感情融洽，相处甚好，也有过一段美好的生活。然而，一个倾倒于陈独秀情怀的高君曼，怎能忍受陈独秀有寡人之疾？在北京时，陈独秀就常跑八大胡同的妓女

院，与妓女厮混，寻欢作乐，因此街头小报说他不以嫖妓为耻，反以为荣。对此，高君曼早已有所闻，只是闷在心里。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回上海与李大钊等人创建中国共产党并当选总书记，名声大噪，然而，高君曼常常指责陈独秀有外遇，寻新欢，在“经济上接济心爱的人”。因陈独秀没有职业，也没有固定的收入，其经济来源主要靠《独秀文存》的版税和稿费，这期间家庭收入明显减少，常常弄得生活拮据，这就不得不使高君曼感到怀疑。与此同时，组织上也有所察觉，但他总是守口如瓶，一个字也抠不出来，而他的住址常有变动，连他的秘书都不知道。更有甚者，1926年1月初，陈独秀突然失踪了——没有来中央机关看文件，连秘书也恐慌起来。秘书报告瞿秋白、张国焘等负责同志，他们也深感惊愕，不得不派人多方探听，四处查寻，但也未觅得踪迹。于是，大家绝望了，以为总书记已被反动派秘密杀害了。张国焘几乎落泪地说：

“老头子（即陈独秀）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了个下场。”

同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第一项议程竟是讨论陈独秀“失踪”的问题，不料在会议期间，陈独秀突然发来电报说：

“已能扶病视事”。

这样，大家才松了口气。

大约一个多月后，陈独秀裹着一件厚厚的大衣，脖子上缠着一条围巾，突然来到中央机关，使同志们既惊又喜，不禁七嘴八舌地向他：

“总书记，你到何处去了？”

“……”

他笑着解释说：

“生了伤寒病住进医院，以为会很快好的，同时，也怕给大家添麻烦，所以，没有告诉机关，请大家原谅！”

然而，大家对陈独秀的突然“失踪”仍感是个谜，后经多方探寻，才得知他和一位年轻貌美，亭亭玉立的未婚女医生寻欢作乐。因陈独秀有胃病常常去医院请这位女医生看病，天长日久，两人感情就渐渐粘合在一起，同时，这位年轻的女医生也被陈独秀总书记之名所迷惑。这样，陈独秀就轻而易举地与其同居，作乐。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也被撤了职，这位年轻女医生就不得不嫁于他人了。

这位女医生姓甚名谁，这一直是个谜。直到60年后，这位女医生的养女出现，才使真相大白。她叫施芝英，她对陈独秀由病人而恋人而情人，由崇拜而生恋爱，由爱恋而同居，直至1927年3月才分手。施芝英是陈独秀四个妻子中，唯一活到解放以后的人，于1973年病故。她与陈独秀生活得如何？何故分手？施芝英至死缄口未言，看来这些谜团再也无法解开了。

高君曼悉知此事，面对爱情不专一的陈独秀，岂能容忍，怎能不伤心落泪，心灰意冷！虽经汪孟邹多次劝解，仍然无法愈合，关系急剧恶化。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革命失败，由于陈独秀犯下右倾错误，受到了党内的批判和处分，一下子变得情绪消沉起来，由此一蹶不振，这标志着他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涯，一落千丈。同时，蒋介石又悬赏3万大洋捉拿陈独秀，于是，他不得不改名易姓为王坦甫，从沪上渔阳里秘密地隐居岳州路永兴里11号。谁料，陈独秀隐居永兴里不久，却又与同居一里的邻居、上海英美烟草公司不到20岁的女工潘兰珍搭上，直至相爱、同居。这使得高君曼气恨更加难平，愁肠寸断，与陈独秀大吵一顿，声泪俱下，感情彻底破裂。高君曼怒不可遏地责骂陈独秀：

“你丧尽天良，狼心狗肺！既害了我姐姐，又坑了我，毁了我高家。我忍无可忍，只得与你分手，独居南京，让你去寻欢作乐。”

无可奈何而理屈词穷的陈独秀，只得求助于亚东图书馆发行



公司出版商，每月资助 30 元。这样，身患咯血病的高君曼愤愤不平地携带一对儿女，凄凉地独居南京当年陈独秀倒袁“二次革命”失败后而盖的几间破旧草屋，直至香消玉殒，也没有去见过陈独秀一面。

### ①含愤病死茅草屋

昔日的将门才女高君曼与陈独秀相亲相爱，冲破封建礼教和族人的歧视而结为夫妻，万没想到，如今却落下遭遗弃的凄凉结局，这怎能不使她伤心惨痛，悲愤忧郁呢？在举目无亲而无经济来源的六朝古都，开门便要钱，一个弱女子怎样生活下去呢？同时，她又是蒋介石悬赏捉拿的陈独秀之妻，在国民党心脏之地的白色恐怖下，她如同惊弓之鸟，惶恐万状，事事处处不得不谨小慎微，不敢轻易露面，整日闭门谢客，甚至与邻居也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一次夜间查户口，破旧草屋的门被敲得“咚咚”地响。这突如其来的敲门声，吓得她心惊肉跳，两个孩子吓得“呜呜”地哭泣不止。她以为特务上门来抓她，一时惊恐得束手无策，只听外面厉声吼道：

“快开门！不开，就踢门啦！”

“臭娘们，窝藏共产党！”

她只得战战兢兢地去开门。门一开，只见几个警察手持长枪，一脸凶相，打着手电筒，里里外外翻查一番后，问道：

“你家几口人？”

“三口。”

“那两个孩子是你的什么人？”

“是我的女儿和儿子。”

“哪你男人呢？”

“死了！”

“怎么死的？”

“病死的。”

“你干什么事？”

“失业。”

“臭娘们，你听着，不得窝藏共产党，窝藏者要坐牢！”

“是，是，老总！”

“家里来了人，要报户口！”

“是，是，老总！”

其实，这夜间查户口在那时的白色统治区内，如同家常便饭，然而却使得高君曼心境多日不能安宁，整日提心吊胆，尤其夜间更觉难熬，担心警察再来，更怕特务上门……每每想到这些，她总是怒火中烧，斥骂陈独秀的不仁，是前世作孽。她悔恨自己当初轻信陈独秀的甜言蜜语，他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从共产党总书记的位置上一落千丈，也是他罪有应得的下场，没有被特务抓住，也算是他命大。可怜的高君曼，在这破旧草屋里，家具破碎，母子三人只睡一张不像样的木板床，过着苦不堪言的生活。刮风下雨，无藏身之处，外面下大雨，屋里水汪汪。夏季，号称长江流域“三大火盆”之一的南京酷热难耐，又无蚊帐，任凭蚊虫叮咬；三九寒天，冰天雪地，却盖着像猪油似的破棉絮，两个孩子冻得直打哆嗦，她就用母爱的体温去温暖他们。每月只靠上海亚东图书馆朋友接济的30元，来维持起码的生活，还得培养子女读书，饥寒交迫，实在难熬，孩子不断地哭唤着：

“爸爸，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

孩子的呼唤，常常使她心如刀绞，悲戚的泪水长流不止。她不愿再听到孩子这挠人心碎呼唤，不让孩子再提起抛弃他们的父亲，她曾不止一次地求儿女说：

“子美、哲民，妈妈的心都碎了，我求你们今后再也不要呼唤

他,好不好?”

两个懂事的孩子听了,“哇”地一声扑倒在母亲的怀中……

在这度日如年的苦难日子里,她曾几度想投秦淮河一死。然而,她却舍不得丢下亲骨肉——一双天真无邪而读书上进的子女,她要活着,她要把他们培养成人,做个不像他们父亲那样无情无义的人,于是她支撑着苦苦挣扎在穷愁潦倒之中……

1930年冬,正当陈独秀与新夫人潘兰珍同居,抛弃高君曼不久,他的结发妻高晓岚在安庆含愤而死。噩耗传到南京,本已心碎的高君曼更觉悲痛,同时又内疚不已,深感对不起死去的同父异母姐姐,悔不该当初从她的手中夺走陈独秀,给她带来终生的苦难。而今,她自己又落得与姐姐一样的凄凉结局……为忏悔内心对姐姐的过失,她不得不带着儿女回安庆奔丧。一回到安庆家门,就抱着离开人世的姐姐痛哭了一场,她把埋藏在内心的苦水倾泻而出,悲怆地哭诉着:

“姐姐,你死得好苦!妹妹对不起你……”

喉咙哭干了,眼泪流尽了,哭得昏死过去,苏醒过来再哭。曾经是俊俏的将门才女,如今却显得多么的苍老、衰弱。

然而,即使她这样,陈家的人和亲友,对她与陈独秀的婚事仍然不能宽恕,多有非议和责难。当高晓岚病逝时,是否报丧于高君曼,陈家的人和亲友都持反对态度,唯有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以为,无论如何,君曼毕竟是生母同父异母胞妹,至少她是我的姨妈,哪有不报丧之理?当高君曼带着孩子从南京回到安庆家中时,陈独秀姐姐的孩子按大人之意,不叫她舅母,则偏叫她小姨。高君曼听了气愤不已,反问道:

“叫我小姨当然也可以,那么他们对舅舅陈独秀又该怎么称呼呢?难道也叫他大姨夫吗?”

这使得本已极度悲痛的高君曼,精神上再次受到难以承受的刺激,神经近乎崩溃,不仅原患多年的咯血病大发,又患上子宫癌,

贫病交加，卧床不起，凄凉不堪。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位善良的女性久病无钱医治，于 1931 年含着悲愤凄凉地死于南京，终年约 46 岁

她死后，幸亏潘赞化获悉高君曼噩耗，即从上海奔来南京为她营葬，并得到陈公博的资助。否则，她连收尸的人都没有。

此时，陈独秀在上海与少夫人潘兰珍正过着甜蜜、自得的隐居生活，然而，他哪里知道，他曾经狂热爱过、与他历经风风雨雨的将门才女高君曼，在他欢娱中已含愤离开了人世。

离人含泪而去，留下了一对孤苦伶仃的子女。他们被父亲遗弃，今又失去了相依为命的母亲，在六朝古都，举目无亲，子美、鹤年姐弟俩，不得不过着饥肠辘辘的流浪生活，颠沛流离于人世间……

---

## 第五章

### 真诚女工潘兰珍 落难末路得少妻

---

#### ◎沪上探监女

1932年10月15日夜，患胃溃疡病的陈独秀，正躺在上海岳州路永兴里11号居室的病榻上，呻吟不已。因托派内部出卖，突然一批国民党特务荷枪实弹冲上楼去，踢开门，大声吼道：

“不许动！陈先生被捕了！”

这时，54岁的陈独秀，虽然病魔缠身，但脸庞清瘦，蓄着微髭，头发微白，镇静自若，不慌不忙地穿上淡蓝色的哗叽长袍，戴上黄色呢帽，像欲出门探亲访友似的在房内踱了几步后，带着浓郁的安庆乡音，对正在翻箱倒柜的特务说道：

“走吧，先生们，我这里没有什么金银财宝可翻的，快些回去向蒋先生领赏去吧！”

特务把他押上了囚车。到了租界巡捕房，陈独秀看见先行被捕的彭述之等人时，幽默地开玩笑说道：

“嗨，原以为就我一个人被捕，没想到你们都先来了。这下我可有伴了，可以松快松快了。”

他的一席笑话，令彭述之等人啼笑皆非。

陈独秀是国民党悬赏“久缉未获之共产党领袖”，为此，报上连篇累牍大肆吹嘘捕获了共产党首领陈独秀等人，特务们也因此分得奖金3万。由于分赃不均，特务们打得头破血流，头目黄麻子在上海过了几个月的糜烂生活，被中共红色恐怖队送上了西天，罪有应得。

名为公共租界的法庭，早与国民党暗中勾结，对陈、彭等人轻描淡写地审问几句，便把全案人犯引渡给上海市警察局，关押在侦缉队。那时的上海，提起这个侦缉队，令人毛骨悚然，它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进步人士的龙华警备司令部一样，是臭名昭著杀人不眨眼的鬼门关，只要落入魔掌，十有八九难以生还。侦缉队长慕陈独秀的大名，拿出纸墨请陈独秀写几个字留念。陈独秀不加思索，执笔一挥，写了“还我山河”和“先天下忧”两个横幅。那个侦缉队长估计，陈独秀的生命不会太长了，将来这几个字便是墨宝，价值连城。而陈独秀却借此抒发了自己的胸怀，表现了浩然之气。

同年10月19日，国民党中央电令上海市政府将陈独秀等人谨慎押送南京。是日夜晚，上海车站戒备森严，陈独秀等被押上京沪车上，关在一专列车厢内，严加把守。汽笛一声长鸣，火车向南京方向急驰而去。在车厢内，彭述之等人心情沉重，忐忑不安，此去南京凶多吉少，怕性命难保，怎么也不能入睡。然而，陈独秀伴随着火车有节奏的“轰隆轰隆”声，“酣睡达旦，若平居无若然”，酣睡到火车到达南京下关还未醒来。当押解特务把他叫醒时，他还慢慢地伸伸手，松松筋骨，打着哈欠。滔天大祸生死关头逼在眼前，他处危不惊，从容不迫，泰然处之，这“仰不愧于人，俯不忤于人”的境界，一时传为佳话。

押解南京后，陈独秀被关在老虎桥监狱的一个单独的小院子里，开始了他那漫长的5年监狱生活。这座高墙、铁门、电网壁垒森严的监狱，始建于清朝末年，以关押政治犯为主，规模并不大，占地

约两英亩左右。被标榜为“江南模范监狱”。其实，由于它坐落在“谈虎色变”的老虎桥北侧，这似乎又给这座监狱涂上了一层毛骨悚然的色彩，故俗称为“老虎桥监狱”，区别于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陈独秀是这座监狱始建以来，关押的影响最大的政治犯，狱方还以此为荣。进了这些监狱，就如同入了虎口，进入了人间的另一个世界——鬼门关。难怪陈独秀被关进后，失去了人间的自由，不无感慨地说：

“现在我成了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蒋介石的阶下囚、虎口食。”

一天，一位身材不高，梳着蓬松短发，脸庞浑圆，眼闪秋波，年轻貌美的女子，胆怯怯地来到南京老虎桥高墙、铁门森严的监狱门前，操着上海——南通口音，轻声曼语地对看守说：

“老总，我要探望陈独秀先生，请你通报一下！”

看守见这位温情脉脉、满面含羞的女子，以为是陈独秀的女儿，于是便自然地问道：

“你是陈先生的女儿吗？”

这一问，顿时使这位少女脸色羞红，腼腆起来，只是摇头，不语，而且低下头尴尬地看自己在地面上划杠杠的脚尖。

“监狱规定，凡来探监者首先要通报姓名，以及和犯人的关系。”看守解释说。

“我姓潘，名叫潘兰珍，是从上海特地来看陈先生的，至于我和他的关系嘛……你向陈先生一通报，他就知道了。”这位女子，既羞羞答答，又十分尴尬，几乎从牙缝里挤出这些话。

看守见她这副神色和羞涩的样子，她究竟与陈独秀是何种关系，心中也略有几分明白，于是，看守跑进小院向陈独秀通报去了……

这位女子不是别人，正是陈独秀 1930 年落难时，与其同居的第四位妻子——潘兰珍。

## ◎多灾多难的包身工

潘兰珍，又名潘若兰，或潘运仙，生于1913年左右，江苏南通人。出身于贫苦农民之家，是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

4岁那年夏天，紧靠长江下游北岸的南通，一场来势凶猛异常的台风和暴雨，把庄稼、房屋、牲畜……一切东西都裹在台风、狂雨之中。风过去了，雨停了，却落下了一片汪洋……灾难降临，人们携儿带女，背井离乡，纷纷外出逃荒活命。潘兰珍的父亲、母亲含着泪水，抱着她，随着逃荒大军来到了举目无亲的上海滩。

上海滩被洋人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在这“华人与狗”不得入公园的上海滩，哪有穷人活命立足之地？兰珍的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除了拿锄头之外，什么手艺也没有，先是背着兰珍流落街头，忍饥挨饿，过着乞讨的生活，兰珍往往饿得哭喊不停。为了一家人活命，她父亲不得不在外滩码头上给上下轮船的旅客挑东西，凭着苦力挣几个力气钱，然而，大部分还得缴给流氓工头作“地头赏”。这样所剩也就无几了。有时还得忍受流氓工头们的打骂，但他别无选择，只得默默地忍受着。后在别人的介绍下，她父亲进了上海英美公司仓库当装卸工，拼命卖着苦力，但仍然不能维持生活。于是，兰珍的母亲不得不带着她拣破烂，拾煤渣。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饥寒交迫中，兰珍一天比一天长大，一天比一天懂事，吃苦耐劳，手脚勤快，待她七八岁时，就跟着穷伙伴们去拣破烂，洗衣烧饭，样样能干，很讨父母喜欢。兰珍豆蔻年华时，她母亲又生了一个弟弟和妹妹，家里本来难以维持的生活就更为艰难了，实在难熬。懂事的兰珍为减轻家庭的负担，暗暗地托人想找工做，然而谈何容易？上海滩满目皆是饥肠辘辘的穷人，哪有她这个女孩子做的事。在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下的中国人民，处于灾难深重之中，哪有穷人的出路？这时，洋人厂里有脚路（即门路）



的南通帮“带工”老板，来到了贫民区，“用他们多年熟练了的，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去游说那些无力‘饲养’可又不忍让他们儿女饿死的同乡”，将自己的亲骨肉交给“带工”的，“招进”洋人的工厂。就这样，潘兰珍同千千万万包身工一样进了英美烟草公司当童工。

童工工价低廉，每天做工十几个小时，苦不堪言，吃的是猪狗食，拳打、棍棒在所难逃。小小年纪的潘兰珍饱尝了人间苦楚。尽管如此，毕竟有了个暂时可以活命的饭碗，总比流落街头好些，小大人似的潘兰珍很知足。十三四岁的兰珍，由于劳累过度，使得她长得很矮小，手脚像芦柴棒一样的瘦，面容憔悴，可是她还得忍受着在那洋人工厂里支撑着，每月总算能挣几个钱交给父母，多少能减轻点压在父母脊梁上的担子。后来，她的父母为求生到浦东去了，她却独居在上海岳州路永兴里 11 号。

这时，她已成了一个十七八岁漂亮的大姑娘了，发育使她丰满起来，圆圆的脸上泛着几丝红晕，一双眸子闪着秋波，梳着入时的短发，亭亭玉立，尽管没有什么衣着，但倒也有些摩登起来。然而，这漂亮又给她带来不幸和灾难。一些工头和不三不四的家伙，见了她如同色狼欲吞噬她，经常纠缠着她，尤其是做夜班，更使得她无处躲藏，只得在屈辱中忍受着。一个流氓工头，表面上对她挺关心，佯装大骂那些欺凌她的工头和流氓，其实是一个口蜜腹剑的家伙，经常夜间闯入她的住处，威胁她、强迫她嫁给他。潘兰珍不同意，上班时则找她的茬子，甚至打骂体罚。被迫无奈，潘兰珍与这个流氓同居，但又受尽虐待。同居后，生了一个孩子，但未能养活。这个流氓为了抛弃她，则变本加厉地对她施以虐待，动辄非打即骂，她常常被打得鼻青脸肿，甚至遍体鳞伤，精神上受到莫大的刺激。在忍无可忍中，她也变得刚强起来，与那个流氓一刀两断，从虎口中逃生，孤苦伶仃地独居在岳州路永兴里 11 号的一幢房子里。

## ◎ 因祸得福遇知音

位于上海提篮桥附近的岳州路永兴里，其实是一条狭窄、房屋破烂不堪的弄堂，大多住着生活贫困的下等人家，与花花绿绿的南京路洋人进出的国际饭店相比，这里是另一个世界——贫民窟。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叱咤风云一时的陈独秀，受到党内批判和撤销总书记职务后，一下子变得心情沉重起来，从此一蹶不振。为避开国民党悬赏3万缉拿他而布下的天罗地网，于1930年冬隐姓埋名，在永兴里潘兰珍居住的那一幢房子的前楼隐居下来。

这时的陈独秀，情绪低落，满面愁容，郁郁寡欢，昔日总书记那盛气凌人的威风早已扫地，特别是两个儿子相继惨遭国民党杀害，使他更加愁肠寸断，精神痛苦难熬。他住下没几天，胃病突然发作，身觉不适，饮食不思，一无人照料，二又不敢去医院就医，只得穿着破旧长袍，头戴礼帽，围着一条大围巾，如惊弓之鸟，匆匆忙忙地到附近街上药店，买点胃药后，又急急忙忙地返回，但又怕有人盯梢，走走停停，东张西望，心神无定，总觉得特务跟他形踪不离。慌忙间，被里弄小路上一条枯树枝绊了一下，“哎呀”一声，摔倒在地，昏了过去……

无巧不成书。这时，一位剪着短发，穿着繁雅而剪裁得体的冬装的年轻女工，下班正好路过，发现一位胡子拉碴、脸色苍白的老者昏倒在地。这位善良的女工，急忙弯腰蹲下扶这位老者，一眼看出是刚搬来的隔壁邻居，他嘴里还不停地喷吐着白沫。这位女工不禁想起前几天与他争吵时，他还挺神气的，今天怎么昏倒在地呢？

那天，她下夜班回来，累得倒床便睡。睡得正香时，突然隔壁楼上响起一阵又一阵咣咣唧唧的声音，把她吵醒，她气愤地大声道：

“啥人这个样子缺德，阿拉做夜班，依发神经啦！”

楼上人不仅不理睬，反而敲得更响。她气愤至极，穿起衣裳，飞

快跑到隔壁楼上，抡起拳头，使劲地敲门，喊道：

“开门！开门！把人吵煞了！”

敲了好一会，随着一声门开，伸出一个蓬头垢面的脑袋，厉声问道：

“敲什么，你发疯了？”

潘兰珍一见是隔壁的新邻居，胡子拉碴，一双血红的眼睛，是个十足的瘪三样子。

“先生，阿拉做夜班，依弄出的声音太响，把阿拉吵醒了，请依声音小点，好吗？”潘兰珍哀求道。

“你听着，这房子是我花钱租的，我在房子里干什么事，你管不着。你怕声音，可以搬到别处去住嘛！”

说着，这位先生就“哐啷”关上门，气得潘兰珍脸色铁青……

想到这里，她真想走开，不管他死活，然而她又想到救人要紧，吵嘴是件小事，邻居相处哪有那么好，于是，她亲切地呼唤道：

“先生，你摔得怎样？快起来，阿拉扶依回家！”

任凭她怎么呼唤，陈独秀仍无一声应答。她急了，救人如救火，忙背起陈独秀往自己家里吃力地走去。到了家中，将他平稳地放在床上，她又火速花钱请来大夫，急忙地问大夫：

“医生，这位先生病严重吗？”

“姑娘，这位先生是你什么人？”大夫问道。

“是阿拉的隔壁邻居。”

“姑娘，你心地善良，救了一条人命。如果再晚一会儿，这位先生的性命就……”

“医生，他现在怎么样？”

“姑娘，你不要急，我先给打一针强心剂。”

“谢谢医生。”

说话间，大夫一针强心剂注入了陈独秀的肌体。

片刻间，陈独秀苏醒过来，眼前出现的竟是前几天与之吵嘴的

那位俊秀的姑娘，正在用汤匙慢慢地给他喂药。陈独秀感动不已，不禁从眼角挤出了老泪，他十分内疚，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姑娘，太谢谢你了！那天我真……”

“先生，不用谢。那天阿拉的态度也不好。好了不说这些，大家都是隔壁邻居。”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阿拉叫潘兰珍，在英美烟草公司做工。”潘兰珍温柔地说。停了会，又问陈独秀：

“先生，请问依尊姓？”

“我姓王，你就叫我王先生好了。”

“噢，王先生，阿拉屋里很穷，幼年从苏北跟着父母逃荒来上海的。阿拉没有进过学堂，很想读书，也喜欢文学。”

“那好，我会教书，会写文章，我愿意帮助你。”

“先生，阿拉没钞票，哪里请得起依这位先生。”

“兰珍，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教你读书，就算我报答你救命之恩。”

“先生，不能这样说，这点小事，无论啥人见了，都会救的，啥人能见死不救？”

“好！我们就定下师生关系，你每天下班回来，我就教你读书、识字。”

“阿拉帮依买菜、洗衣、烧饭，家务事阿拉包了。”

从此，他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吃喝在一起，老少朝夕相伴，感情日渐亲热。陈独秀在潘兰珍的精心护理下，渐渐恢复了健康，生活过得也有些条理了，能按时吃上可口的热菜、热饭，精神也平静多了。陈独秀也像父亲那样疼爱 and 关心潘兰珍，手把手教她写字，教她念书读文章，教她画画，教她唱歌。潘兰珍在他的精心指导下，长进很快，很得陈独秀的喜欢。有时，陈独秀还同潘兰珍开玩笑说：

“兰珍，假如你将来当了文学家，你一定要把你救我一条老命

的事写进去,要读者读得流出感动的热泪来。”

“先生,侬真会开玩笑,阿拉哪能成为文学家:即使菩萨保佑阿拉成了文学家,阿拉首先要写侬这位有大学问、待人又好、乐意教人的好先生,也要读者读了再读,四处来拜侬做先生。”说着,师生俩不禁对笑起来。

人非草木,是充满性爱和情感的高级动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的流逝,感情这个“怪物”无孔不入地渗透,起初那纯朴的师生关系,也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 ◎温暖柔情的世界

1930年腊月的一个夜晚,上海滩北风呼叫,鹅毛大雪纷纷扬扬,人们早已进入了梦乡。下小夜班的潘兰珍,踏着积雪,冒着凛冽的寒风,直奔永兴里……

一踏上里弄雪路,远远望见陈独秀房间里灯还亮着,她想,深更半夜了,冰天雪地,老师一定还在写文章,他身体不好,还是叫他尽快熄灯睡觉。于是,她未进家门,脚就不由自主地朝陈独秀房里走去,边“咚咚”敲门,边心疼地喊道:

“先生,外面下着大雪,快夜一点了,侬还不困觉!”

“兰珍,快进来,我等着你哩!”陈独秀边答边将门打开。这时,出现在潘兰珍眼前的先生,令她大吃一惊:

陈独秀身穿一套毛料西服,系着领带,染上秋霜的头发梳理整齐,油光闪亮,腮帮胡子刮得精光,鼻梁上架着一副黄褐色的眼镜,显得潇洒,很有学者的派头,与先前见到的先生判若两人。

潘兰珍上下仔细地打量着陈独秀,不禁高兴地问道:

“先生,侬今天啥事体这样高兴,有啥喜事,打扮得这样漂亮,挺有气派!其实,先生侬并不老,你那胡子拉碴的样子,是侬故意装的吧?”

陈独秀听了，把手一让，笑着说：

“兰珍你到里边看。”

潘兰珍走进房里一看，又惊呆了：

一张方桌上，摆满了红烧鱼、狮子头、油炸排骨、炒鸡蛋……潘兰珍爱吃的香味四溢的菜肴。她不解地问道：

“先生，依做这许多好吃的菜，做啥么子？有客人来？”

“兰珍，今天是你的生日，你忘了？你父母不在，我特地为你做了你喜欢吃的几样菜，还有生日蛋糕，祝你生日快乐！”陈独秀像长辈似的对她说。

这时，含情脉脉的潘兰珍，她那禁锢的情感闸门一下被叩开了，在人生中，她第一次被异性特殊关怀，女人特有的柔情似潮水袭来，不禁叫道：

“先生……”一下扑到陈独秀的怀中，泪如雨下……

室外，北风夹着雪花在呼呼地吹着，而室内却是一个温暖柔情的世界。师生对饮情绵绵，激情似火情脉脉……潘兰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生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甜蜜，她一次又一次地瞅着陈独秀清癯的面孔，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微笑和那西服革履的儒雅派头。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她越瞅，越从心底升腾起对陈独秀爱的火花，此时，她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于是情急智生，含着少女独有的羞涩，大胆地带着试探的口气说：

“先生，依人真好，又有派头，依身体不好，我看要有个身边的人照顾才好，阿拉替依物色一个怎么样，包依满意。”

陈独秀听了潘兰珍从那肺腑里迸出的一席话，觉得好笑，说道：

“兰珍，你年纪轻轻的，心眼却不少，你真会开玩笑。如今先生老了，谁愿意嫁给我这手无分文的穷鬼呢？再说，现在有你这样好学生的关心，比什么人都好，我的身体好多了。”

停了会，陈独秀立起，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边轻声对兰珍劝

说道：

“兰珍，谢谢你的好意。现已深更半夜了，赶快回去睡觉，叫别人看见了，会说闲话……”

潘兰珍在陈独秀多次劝说下，才依依不舍地回到冷冰冰的家里……

## ◎弱女子吐露情怀

感情这个“怪物”，真会捉弄人。

潘兰珍回到家中，内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一个人睡在冷如冰霜的被窝里，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她甚至想到，先生夜里睡觉，要是有一个贴心女人给他焐脚，那该多好。她又想到自己，如果有个焐脚而不是流氓的男人，也不至于睡冷被窝了……想着想着，倏然萌生一个念头，她不禁自言自语地说道：

“对，主意就这么定了，明天去找许姐……”

第二天，适逢潘兰珍调班休息。一大早，她手里拿着棒针和毛线，兴冲冲地向邻居许姐家走去。

提起许姐，里弄的人都夸她人好，乐善好施，邻里有什么事都乐意去找她。潘兰珍的父母到浦东求生时，还再三嘱咐许姐，请她多多关照兰珍，怕她年轻不懂事，惹出乱子。同时又叮嘱兰珍，有什么事就去找许姐，她不会耍弄人。

潘兰珍来到许姐门前，只见她正在铲扫门前雪。她放下手中的棒针和毛线，上前就抢过许姐手中的铁铲，并说：

“许姐，依歇会儿，阿拉帮依铲雪。”

“这怎么行呢？”许姐执意不肯。

“好，阿拉帮依铲雪，依帮阿拉毛线衣起个头，这下好了吧？”

“兰珍，这毛衣是男式的，还是女式的？”

“男式的，年纪大一点儿的。”

“给你爸结的？”

“不是，是给王先生结的。”

“兰珍，你救了王先生的命，现在又给他结毛衣，你心真好。”

“许姐，你觉得这位王先生人怎么样？”

“说不准。看样子这位先生蛮有学问的，很少出门，常常见他在写什么。说不定，也是一位穷先生，否则，怎么会住到永兴里这个穷人住的地方？”

“许姐，人穷有什么要紧，只要人好就行。”

“兰珍，看样子你要拜他做‘过房爷’（即干爸爸）了。”

“不，不是这个意思。”

“啥意思？”许姐不解地问。

“许姐，阿拉……”潘兰珍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

“阿拉……究竟是啥意思，你快说嘛！”许姐这一反问，使潘兰珍一下子羞红了脸，低头不语了。

许姐看她这副羞赧的样子，刹时心中明白了潘兰珍欲言又止的意思了。她理解潘兰珍——一个大姑娘岂好开口吐出心底的“秘密”呢？许姐向潘兰珍上下打量了一番后，边开玩笑边开门见山地说：

“兰珍，你是不是看上了那位王先生？”

许姐这句话，直捣潘兰珍的情怀，说得她既心花怒放，又羞得无言可答。许姐毕竟是过来人，她懂得少女的心。于是，又说道：

“兰珍，你爱他就爱嘛，怕什么羞。”

“许姐，依说这事能成吗？”潘兰珍见许姐十分理解她，心里踏实了，于是鼓足勇气，说出了藏在心底的话儿。

“我问你，王先生已 50 多岁了，你 20 岁还没到，你真的爱他吗？你爱他什么？”

“阿拉真心爱他，爱他的学问，更爱他人好。”

“好，要爱就爱到底！”



“许姐，你看这件事怎么弄好呢？”

“我有办法。你过来，我教你。”

潘兰珍满脸羞红而又露出丝丝甜笑，走到许姐身旁，许姐贴耳对她如此这般地点拨一通，潘兰珍频频颌首……

## ◎雪夜红烛喜结良缘

这天，雪霁天晴，里弄的屋顶积压一片白雪，在阳光的照射下，映衬出一个白色迷人的世界。人们纷纷走出家门，享受这温暖的阳光。

清晨，潘兰珍提篮踏雪去小菜场，买回了许多菜，直奔陈独秀房门。陈独秀见了忙问道：

“兰珍，今天是什么喜事，买这许多菜。”

“还礼！”潘兰珍随口答道。

“还谁的礼？”陈独秀反问。

“先生为阿拉做生日，学生哪有不还礼之理？”潘兰珍笑着答道。

“噢——是这么回事。”

这一老一少，洗的洗，切的切，忙得不亦乐乎。晚上，师生俩高高兴兴地吃着丰盛的晚餐，有说有笑，举杯互敬，情思缕缕……

晚饭后，陈独秀对潘兰珍说：

“兰珍，我同一个朋友约好，有点事要出去，要很晚才能回来。你把碗洗好后，就回去休息吧。”

“先生，冰天雪地路很滑，要慢点走，早点回来。”潘兰珍关切地说。

“好，阿拉慢慢地走！”陈独秀学着上海腔，风趣地说道。说着，陈独秀迈步走出家门，背影消失在雪夜之中。

半夜时分，陈独秀拖着疲惫的步伐回来了。一跨进门，就像冻

僵了似的，呆立着，映入他眼帘的景：

他的床头上贴着鲜红的“喜”字，床上放了两床丝绸新被和一对崭新的绣着鸳鸯的枕头；一张破旧的写字台上，还点着一对红蜡烛……潘兰珍梳着油亮亮的短发，还散发着香味；穿着一件红色丝绸棉袄，脚穿一双绣花红鞋，一身新娘子装束。见陈独秀回来，她神色激动，羞涩低头，双手合十放在膝盖上，端坐床沿的中央……

陈独秀见状，一时失去了主意，不知所措。停了好一会，似乎从惊愕中醒来，抑制住感情地说：

“兰珍，我比你大 30 来岁，这件事你考虑过吗？”

“先生，阿拉慎重考虑过，并和许姐商量过。小说中说，真正的爱情是没有年龄界限的。依不是很崇拜国父孙中山先生嘛，国母宋庆龄女士，不是比国父年龄小 20 多岁吗？只要真心相爱，志同道合，白头偕老，年龄大小并不妨碍结婚。”

“兰珍，国父、国母是伟人，我是个穷瘪三，岂能与他们相提并论？”

“先生，伟人、小人都是人，恋爱、婚姻是没有年龄界限的。”

“你还是个孩子，我穷得叮当响，不能让你受苦！”

“阿拉不怕苦，也不后悔！阿拉只爱依的才华与真诚。一生一世，不彳不离。同时，阿拉有工作，能养活依。依会写文章，也能挣钱，我们患难与共。”说完，潘兰珍脱口吟诵起陈独秀教她的《上邪》诗，表达真情实感：

我欲与君相知，  
生命无绝衰。  
山无陵，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

“难道，我们就真的这样……”陈独秀正在进退维谷时，许姐提着一挂鞭炮，笑盈盈地走了进来，贺道：

“祝贺王先生和潘兰珍女士新婚志喜！百年和合，相亲相爱！”说着，许姐点燃了鞭炮，喜庆的鞭炮在雪夜中“噼哩啪啦”响个不停。

陈独秀和潘兰珍结成一对老夫少妻，一时成了永兴里这条里弄家喻户晓的新闻，尤其是那些妇道人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这个王先生，也太缺德了！”

“哎哟，他可以做阿珍的阿爸了！”

“阿珍上了这个穷老头的当了！”

“这成啥体统，一老一少走得出去吗？”

“许姐也太糊涂了，怎么能做这个媒呢？伤阴德哟！”

“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尽管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但这对老夫少妻结合在一块，感情倒十分融洽，炽烈的爱填平了年龄的“代沟”，让那些无知无识、爱管闲事的妇道人家说去吧！陈独秀暗暗想到，这与他当年与第二个妻子高君曼自由相爱，所受到的家庭和族人的反对和歧视，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这算得了什么呢？求得个老来乐，也是晚年的一大慰藉。然而，潘兰珍与陈独秀稍有点不同的想法，她受过流氓的欺骗和虐待，现在获得了真正的爱情，她梦寐以求地希冀生一个孩子，老了好有所依靠。陈独秀则无所谓，他家中儿孙皆有，对此没有渴求，能生则生，不能生也无妨。他的这种想法，也只能埋藏在心中，他与潘兰珍结合时，潘兰珍并不知道他的真正身份和家世，她还被蒙在鼓里。陈独秀怕暴露身份，惹出麻烦，也只得昧着良心“瞒着”她了。在那国民党悬赏捉拿他的日子里，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陈独秀毕竟年过半百，身体又

多病，生育力不像年轻时那样旺盛了。结婚近两年，也未能如潘兰珍的愿，盼子未得，只得花 50 块大洋，收养了穷人家的一个 4 岁小女孩，起名叫潘凤仙。小凤仙天真可爱，这对老夫少妻倒也十分喜欢，给他们的新生活增添了不少欢乐。

## ◎老夫被捕直面事实

1932 年 10 月 16，初冬早晨，上海滩雾气腾腾。

街头弄堂人如潮涌，报童的叫卖声聒人听闻，令人震惊。“特大新闻，《共产党首领陈独秀等，昨天在上海被捕》……”

这时，人群中挤出一位身着工作服，个子不高、脸圆胖胖的年轻女工，身不由己地挤上前去，好不容易抢购到一张《中央日报》。这位女工，就是陈独秀的新夫人潘兰珍。街头买报纸给隐藏“地下”的陈独秀看，已是她的习惯了。

她刚下夜班正朝家里赶，一看报纸上登的被捕人的消息和照片，不由得吓了个半呆，惊呼道：

“天啦！这不就是阿拉的老头子吗？”此时，她才恍然大悟——她家老头子原来是赫赫有名的共产党首领陈独秀。

潘兰珍是位忠厚朴实的农家女子，与陈独秀这个藏有巨大秘密的人物朝夕相伴了两年时间，对陈独秀深信不疑，压根儿不知道国民党四处通缉捉拿的共产党首领竟是她所爱的陈独秀。这时，她不禁想起陈独秀被捕前的一件事来：

一天，她在街上看到一张通缉捉拿共产党要人的布告，上面写有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这几个在上海滩很有名气的人物。她回家对陈独秀说：

“先生，你晓得吗，街上到处贴着捉拿共产党首领陈独秀的布告呢。”

“是吗？”陈独秀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说。

“是的。布告上还说，谁捉拿到陈独秀赏给 3 万大洋。”

“那是虚张声势，他们抓不到陈独秀。”

“你认识陈独秀吗？”

“不认识，不认识。要是认识，捉到他不是可得赏金 3 万吗？可要发大财啦！”

“那也不能这样做，政府抓到他可要杀头的啦！”

“好了，兰珍，我们老百姓不谈国事。”

想到此，潘兰珍真相大白，怪不得，那天老头子神色紧张，不让她再追问下去。

潘兰珍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凝视着报纸上老头子陈独秀的照片，不禁泪水盈盈，心里着实翻腾起来：

“老头子被捕，父母已先后去世，阿拉该怎么办？”由不得潘兰珍多想，她急忙奔回永兴里那狭窄的弄堂，冲进家门。可是，人走房空，衣物、书籍遍地都是，一片狼藉。她忧心如焚，不由自主地“呜呜”痛哭起来，一时失去了主见……

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潘兰珍不由得吓了一跳，以为特务追踪而来抓她，胆颤心惊地打开房门，是邻居许姐来了。她一见许姐，格外悲伤，泪流不止，哭诉着：

“许姐，老头子被捕，阿拉该怎么办？阿拉也不想活了！”

许姐是位热心而体贴人的人，她曾为潘兰珍与陈独秀的婚事撮合过，她毕竟年长些，深知潘兰珍对她老头子情深意切，便故意问道：

“兰珍，你现在还真的爱你家的老头子吗？不爱，你完全可以乘机而走，免得受牵连。”

“是的，阿拉永远爱阿拉老头子。”

“既然是这样，他现在被捕了，你就得更加爱他。这样的女人，才算是女人哩！”

许姐一席话说到潘兰珍心窝里去了，增添了她生活的勇气，她

决定直面事实，决不退缩回避，与老头子共度患难，至死不变。于是，潘兰珍跑巡捕房，跑警察局，四处打听陈独秀的下落。十多天之后，她才得悉陈独秀作为政治要犯，关押在南京老虎桥模范监狱，为此，她还被警察敲去一笔钱。打听到陈独秀的下落后，潘兰珍毫不犹豫地果断辞去上海的工作，收拾行装，并将收养的那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送回到南通老家，托人抚养，只身乘火车奔赴南京。一下火车，她就急匆匆赶到“模范监狱”，迫不及待地要探见陈独秀……

### ◎狱中相见情深似海

陈独秀在狱中极受优待，关押他的单人囚房，原是看守的住所，约20来个平方。房里摆有两个大书架、一张床、一张写字台和几把椅子，书架上摆满了书籍，经史子集，每样都有一点，供他研究之用。陈独秀对文字学最有兴趣，成天埋头钻研《说文》。同时，他可以随时会见外人，来探望他的人也不少，大都是社会知名人士，如早年诤友章士钊、画家刘海粟、旧交胡适、北大学生罗世伦、段锡朋……然而，他独居牢房斗室，体弱多病，伴随他的只有孤独、寂寞、惆怅……

这天，陈独秀正在囚室里磨墨、摊纸，挥毫书写什么，突然听到看守通报：

“陈先生，外面有位女士要见你。”

“噢，请问多大年纪？”

“看样子，十八九岁。”

陈独秀一听通报的年龄，不禁心头一颤，眉一皱，脸色突变，又迫不及待地问道：

“这位女士姓甚名谁？”

“她说，她姓潘，名……名叫什么兰珍。”看守边说，边想着。

陈独秀愣住了，眼睛紧闭，双手习惯地交叉在背后，伫立窗前，思忖着：

“她来了，果真来了……”

他被捕后，时刻惦念着潘兰珍，处处为潘兰珍着想，她对他一片真情，他为出于无奈对潘兰珍隐瞒自己真实身份而感到内疚，深感对她不起。为此，他曾几次写信给好友高语罕，委托高语罕做好善后工作，并要高语罕“婉言劝她不必来看我”，从此断绝关系，自谋出路，以免受到不必要的牵连。同时，他感到因他被捕给潘兰珍财物造成莫大损失，心里十分难过。他在致高语罕的一封信中说，在其书桌抽屉内藏有一小袋，“系女友潘君之物，她多年的积蓄，尽在其中，若失去，我真对她不起。”他拜托高语罕到他家里去寻觅潘的其他财物。他以为潘兰珍听了高语罕的劝说，而自谋出路去了……

不料，她不避嫌，不怕险，果真来了。而他现在成了阶下囚，而且50多岁了，但她还年轻，怎能误她一生呢？见还是不见？不见吧，显得太无情，太伤她的心，良心也说不过去，见吧，又……

“陈先生，你究竟见不见？这位女士特地从上海来看你的啊！”看守又追问道。

陈独秀在狱中，去看他的人很多，狱中一般不严加阻拦，至于见与不见，不决定于狱方，而决定于陈独秀自己。看守把客人的名片或姓名通报给陈独秀，他说见就见，他说不见就不见。

这时，陈独秀眉头一扬，把手一挥，说：

“请这位女士进来！”

看守大摇大摆地返回监狱门口，带有挑逗性的口气对潘兰珍说：

“潘女士，你那位陈先生请你进去！”

只要能进去见到心中想念的老头子，潘兰珍也顾不得看守的挑逗了，顺手从地上拎起藤箱，经看守检查后，跨进监狱大门。只见

她日思夜想的老头子陈独秀，身着长袍，头戴毡帽，留着山羊胡子，脸色苍白、清瘦，背微驼，正候等在囚室门前。潘兰珍连忙放下手中的藤箱，三步并作两步，急奔过去，一下扑到陈独秀的身上，不禁“哇哇”地哭起来……

这时的陈独秀，也老泪纵横，泣不成声，紧紧地搂住少妻潘兰珍……

此时无声胜有声，他俩埋藏在心底的爱和思念，像潮水般涌出闸门，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全卷进了这对老夫少妻的爱的潮水之中……

然而，陈独秀毕竟年过半百，且又走南闯北，从党的总书记变为反对派，历经风险和沧桑，论年纪他已是潘兰珍长一辈的人了，只是共同的命运和机遇使他们结合在一起，论感情他们是笃深的。所以，他在狱中见到日夜惦念的少妻潘兰珍，情感虽然躁动，但还是能动地抑制住了。他用长袖擦了擦眼角，连忙叫潘兰珍在床上坐下，深情地说：

“兰珍，你辛苦啦！叫你受惊了！谢谢你对我的一片深情。过去我对你未说真话，这次被捕又使得你失去许多衣物，我很对不起，你一定怨恨我？”

“不！先生，依对阿拉未说真话，那也是没啥法子的呀。起先阿拉感到受惊害怕，但又一想，阿拉没找错依，先生是个大人物，阿拉对依一点怨言也没。说真的，阿拉心中更崇敬依，比过去更爱依……”潘兰珍用南通——上海口音，一句一句地吐露对陈独秀被捕后的真情。

陈独秀听了潘兰珍这番真挚而朴实的话，心也渐渐平静下来了，从内心感到潘兰珍年纪虽轻，但她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女性，在这生死关头她不退缩回避，冒着风险来看他，又说出这番体谅他的话，使得他一颗心灰意冷的心又燃起了火焰，得到十分难得的安慰。于是，他用浓重的安庆口音对潘兰珍说道：



“你这伢子心真好，我真不知如何感谢你，见了你，我的心也安了许多。不过……”已到嘴边的话，陈独秀怕伤了潘兰珍的心，又咽了下去。

“不过，不过……啥么子？依讲啊。”潘兰珍边用手绢擦泪水，边追问道。

陈独秀不语。从床边立了起来，又习惯性地双手交叉背后，踱步沉思着……潘兰珍也跟着站起来，迈步上前拉着陈独秀的长袍袖，撒娇似地说：

“阿拉特地从上海来看依，依怎么对阿拉这样冷冰冰的？”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啥意思？依快快说啊，快把人急煞了！”

“我的意思，你见了我就行了，赶快回上海上班去。工作不能丢，那是你用汗水和眼泪换来的饭碗，弄个工作不容易。”

潘兰珍听了，拉陈独秀又一起坐在床上，真情实意地说：

“先生，阿拉已辞去上海的工作，囡囡凤仙，阿拉已送南通托人抚养了。阿拉决定在监狱附近租一间房子，陪伴依，照顾依，生与依一道生，死与依一道死，阿拉决不回上海。”

陈独秀听了潘兰珍这句句吐自内心的话语，心中激起阵阵暖流，不禁眼角又流出了老泪，但沉默不语。潘兰珍望着陈独秀，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房间里沉默寂静，甚至连针掉在地上也能听到声音，只有那放在写字台上、朋友赠送的一只精细别致的小钟儿，在“嘀嗒嘀嗒”地走动……过了好一会儿，陈独秀在沉默中站了起来，手一挥说：

“兰珍，这不行！你还年轻，我已老了，还不知生死如何，即使不死，也不知何时才能出狱。蒋介石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人，他随时都可能杀我。”

“先生，我们既然是夫妻，阿拉就要和依同生死，一直伺候你！”

陈独秀凝视着这位心甘情愿受苦而又情深意厚的少妻，他还

能说些什么呢？

### ◎老夫囚犯少妻陪伴

潘兰珍的真情和决心，使得在狱中孤独、寂寞的陈独秀，不得不同意少妻留在南京。起先，潘兰珍住在陈独秀好友、国民党教育部次长段锡朋家，但她总觉得自己是穷人家出身，住在大官家里，不仅给人家添麻烦，同时又不自由，不方便，于是在监狱附近租了一间破旧的房子，凭她那勤劳的双手，打打短工，或帮人浆洗，省吃俭用，拿出自己多年的微薄积蓄，风里来雨里去，每天都到监狱去陪伴和照料陈独秀的生活，做点陈独秀喜欢吃的小菜送去。为他洗衣洗被，剃头理发，整理书籍资料，说说笑笑，唱唱小调，使陈独秀精神为之一振，深受感动，病弱的身体也渐好转。与此同时，潘兰珍在狱中见到众多亲友宾客，甚至连国民党的一些大官和社会名流都来探望陈独秀，有的还馈赠贵重的衣物以及钱财，如皮袍子就有好几件。这使从未见过世面的潘兰珍眼界大开，从内心感到老头子是有地位、受人尊重的大人物，当年她的眼睛没有看错，虽然他眼前坐牢，但爱他爱得值得。每每想到此，她也感到极大的安慰。“换我心，为你心”，这对老夫少妻在牢房内相亲相爱，耳鬓厮磨，欢爱不相离，甚至还有肌肤相侵。曾经就发生过这样一件十分尴尬的事儿——

一天，典狱长突然提了陈独秀同狱的案犯、托派常委之一濮德志询问。濮德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以为大祸临头，心情十分紧张。在看守押解下，来到了典狱长办公室，见典狱长脸色严肃且带怒容，并挥手叫看守退出去，把门关紧。濮德志见状，感到事情不妙，只有与之周旋了。典狱长点燃一支烟，猛劲吸了一口，嘴里吐着一团团白色的烟雾，突然十分严肃地说：

“濮先生，我今天把你提来，有件事要请你转告陈独秀先生。”

典狱长又吸了口烟，板着脸继续说：

“陈先生在我们这里，我们没有把他当犯人看待，上面叫我们优待，我们也尽量给他以优待。但这里是监狱，不是旅馆，优待也得有个界限：陈先生近来忘记了他在监狱，把我们这里当作旅馆，使我很为难。”

濮德志听了典狱长这番话，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典狱长提审的事与己无关，而是涉及陈独秀的事，但又不知典狱长说陈独秀什么事，于是便急切问道：

“典狱长，陈先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请你直说。”

“你可知道有个姓潘的女士，经常来看望陈先生，她是什么人？”

“大概是他的学生。”

“不像，学生岂能天天来看老师。”

“是不是他的女儿？”

“更不是，他的小女儿我见过。”

“那么，她是谁呢？我猜想不出。”

“你恐怕知道，碍于陈先生的面子，你不肯说罢了。”

“典狱长，有什么事请你直截了当地说吧。”

“好，我说。根据看守的报告说，陈先生和那位姓潘的女士，在他的监房里发生肉体关系，这怎么行呢？这事说出去，岂不要我同他一样坐牢吗？请你婉转告诉他，要为我们的处境想一想。面子要双方来顾，如果有这样的行为，那就莫怪我无情了。”

濮德志听了，装腔作势地说：

“怕不会吧？请典狱长再调查一下。”

“调查过了，他们俩不止一次发生肉体关系，千真万确。不瞒你说，当年我也是崇拜陈先生的一个人，以为他的道德文章可以做青年模范，现在看来，他文章虽好，但道德有限。请你告诉他，往后请他自爱一点，为我们着想一下，免得双方弄得难堪。”

第二天，濮德志不得不把典狱长的话如实地转告给陈独秀。陈独秀听了神色自若，毫无赧颜。于是，濮德志愤然地说：

“你这个人，在政治、思想一切方面都非常偏激，在行为方面也很乖张。一个政党首脑，这样对待生活，对吗？有号召力吗？外面小报说你，不以嫖妓为耻，反以为荣，确有此事吗？”

陈独秀最初听了濮德志的话，默无一言，似有愧色，但一听濮德志谈及舆论，陈独秀火了，说：

“大报造大谣，小报造小谣，你怎么信它？这是私人生活，不用别人管。”

“你是一个政党领袖，对妇女问题，没有正确而严肃的态度行吗？”濮德志接着陈独秀的话说道。

陈独秀听了，自知理屈，沉默良久。然后说道：

“在建党之前，我在这方面是放荡不羁的，可是建党以后，我就自身检点没有胡来了。”

濮德志话锋一转问道：

“这位天天来看你的潘女士，是从哪来的呢？”

陈独秀听了问话，便大为光火，说：

“难道我不能有个伴侣吗？”

事后，陈独秀在狱中与潘兰珍的接触确实检点了许多，典狱长也不再提这件事了。

1937年7月7日，随着芦沟桥一声枪响，抗日战争爆发了，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8月中旬，又发生了淞沪抗战，不甘屈辱的中国人群情激奋。周恩来和董必武等中共中央代表飞抵南京，敦促蒋介石释放政治犯，全面实现联合抗日之条件。正值此时的一天，穷凶极恶的日本飞机夜袭南京，疯狂地投下大批炸弹，南京城顿时一片火海。房屋炸毁，成千上万的市民粉身碎骨于狂轰滥炸之中，血流成河，一片凄惨。位于总统府附近的老虎桥监狱，也连中8枚炸弹，监房震塌。陈独秀闻爆炸声速卧躲在桌下，幸免一死。

此时，他不仅不惊恐，见人还笑谈自若，置生死于度外。日机轰炸的当夜，监狱严加防范，四周高墙架着机关枪，看守不断呼叫着：“不许乱跑乱动！乱跑乱动者即开枪！”监狱门口也加强了警卫，探监者要严格履行手续。探望陈独秀这类政治要犯，必须经典狱长批准，方可入内探视。

第二天，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中文系主任、原北大陈独秀的学生陈钟凡教授，闻悉监狱被炸，前来探望陈独秀，安慰他说：

“先生，你受惊了。”

“老天有眼，赐留吾一命，安然无恙也。”陈独秀若无其事地笑着说。

陈钟凡见此形势险恶，陈独秀若在狱中，随时有生命危险，于是与胡适、张柏苓等人商议联名保释他。国民政府则要求，除有人保释之外，还需本人“具悔过书”。陈独秀听后大怒，说：

“我宁愿炸死在监狱中，实无过可悔。”

陈独秀不但拒绝人保，还声明说：

“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

住在监狱外面的潘兰珍，夜里听飞机轰炸声，她想监狱一定被炸了，十分担心陈独秀的安全。第二天一大清早就匆匆跑来监狱，探望陈独秀。她情急心切，只见陈独秀监房倒塌在浓烟烈火中，刹时，吓得大声哭起来，不断呼唤：

“先生！先生！依在啥地方？”

正在与濮德志等人笑谈夜间日机轰炸逃生情景的陈独秀，听到少妻潘兰珍的呼唤声，便应道：

“兰珍，我在这里！”

兰珍闻声望去，见老先生站在里边一栋监房门口，她急速跑过去，边扑着陈独秀身上的泥土边问道：

“先生，你没事吧？昨天夜里把阿拉吓死了。”

“我不是好好的嘛！日本飞机炸弹没敢动我一根毫毛。”陈独秀

风趣地笑着说。

“没有事就好。这个地方不能再蹲下去了。”

“兰珍你不用急，形势所逼，看样子老蒋就要放我出去了。”

“要是真这样，那就好了！”

果不出陈独秀所料，由于时局紧张，又迫于国共两党合作已是大势所趋，国民政府不得不于8月23日提前释放陈独秀。是日中午，潘兰珍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搀扶着老夫陈独秀，走出了关押他5年的监狱大门……

老夫入狱，少妻陪伴，陈独秀再次以自己5年的铁窗生涯的实际行动，实践了当年在《随感录》中提出的格言：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在这5年中，潘兰珍默默地奉献着年轻而美丽的青春，以炽热的爱和精心的照料，使患有多种疾病的陈独秀在狱中安然无恙，度过那不太寂寞的5年与世隔绝的高墙生活，精神得以极大的安慰。与此同时，他们这对老夫少妻的忠贞爱情，也经受了一次风险考验，更觉情深似海，难舍难分。“千年长交颈，欢爱不相忘。”陈独秀出狱后，潘兰珍又紧紧相随，风雨同舟，漂泊四川江津避难，揭开了他们爱情生活新的一页……

---

## 第六章

### 小儿出世父远离 松年探监情依依

---

#### ◎一对年轻的探监夫妇

1932年，寒冬腊月，年关临近，笼罩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的石头城南京，覆盖着厚厚的一层冰雪。虎踞龙盘的紫金山，白雪皑皑；家家户户，除了屋檐下垂挂着一串串冰凌外，没有一点儿辞旧迎新的气息。街头行人稀少，连昔日沿街乞讨、衣不遮体的乞丐，也被这滴水成冰的严寒驱赶得无影无踪。不过，人们在肮脏的旮旯处，时而见有冻尸骨；那些达官贵人，在温暖如春的豪华住宅里，尽情地吃喝玩乐，飘出阵阵的酒肉香气，正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在这凄凉阴森的街景中，人们常常听到或者看到吼叫着的囚车，像发了狂似的开进珠江路旁、“谈虎色变”的老虎桥监狱，一批又一批的革命者和进步人士，被投进这座冷酷胜过冰雪的监狱……每当人们听到这囚车的吼叫，不禁心惊肉跳紧闭门户，唉声叹道：

“不知何时才能过个太平年？”

一天，北风嗖嗖，寒气袭人。一对20来岁的年轻夫

妇，提着大包小包的上特产，踏着前人踩出的冰雪路，边走边问，一步步向老虎桥监狱走去。男的，中等身材，面目白皙，举止文雅，和颜悦色，身着长袍，围着一条宽长围巾，戴着马虎帽；女的，身材颀长，脸庞浑圆，浓眉大眼，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冬装，显得亭亭玉立，看上去像是大户人家且有教养的女子。这对年轻夫妇，边走边四处环望，边窃窃私语，对一切感到陌生……他们在老虎桥路北侧的一座高墙、电网、戒备森严的铁门前停步，抬头一望，竟是一块令人毛骨悚然的牌子——江苏第一监狱。不看则已，一看使这对未出过远门的年轻夫妇，双腿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一时不知所措。然而，这“鬼门关”的地方，岂能让“闲人”停留，未等他们镇静下来，手持步枪的门卫便恶狠狠地上前吼道：

“你们站在这儿干什么？还不给老子快滚开！”

门卫的吼叫声，吓得这位书生气十足的男青年面色苍白，更加颤抖起来，手中的提物扑通一声掉落在冰雪地上。不过，那位年轻貌美的女子，从胆颤中镇静过来，轻声对丈夫说：

“不要怕，镇静些。”

她从容镇定，举止端庄而轻声曼语地对门卫说：

“老总，他是我的先生。我们是从外地来探望亲人的。”说着，手疾眼快向门卫塞去一包土特产和一包香烟，又强笑着说：

“老总，这是我们家乡的土特产，请老总品尝品尝，并请给我们一个方便。”

门卫接过这位满脸生笑的女子塞来的东西，脸色顿时“由阴转晴”，猫着笑脸，油嘴滑舌地问道：

“你们探望什么亲人？”

“是父亲。”

“他叫什么名字？关在哪个号子里？”

“他叫陈独秀，据说关在单号子里。”

“噢，是不是那个共产党首领陈先生？”



“是，正是！老总！”

“他是个大政治犯啊，蒋委员长亲自过问。你们敢来看他？”

“老总，他是我们的父亲。一人做事，一人当嘛，我们怎么不敢来看他老人家？”

“你们从哪儿来的？”

“从家乡安庆来。”

“噢，从安庆来，那儿我去过，江边有一个宝塔，对不对？”

“不错，江边有一个宝塔，叫振风塔。”

“来看陈先生的人很多，你们怎么现在才来看他？”

“老总，我先生在学校教书，放寒假才有时间。”

“噢，那好，你们先办个手续，我去向陈先生通报一下。”

这对年轻夫妇，就是陈独秀在狱中常常惦念的三儿子陈松年及其未曾见过面的儿媳窦珩光。他们利用放寒假的时间，特从家乡安庆来南京监狱，探望松年出世时就远离家门的父亲陈独秀。

等候在高墙、铁门、阴森的监狱门前，而又即将见到父亲的陈松年，不禁心潮激荡，思绪万千，往事一幕又一幕地闪现在他眼前……

## ◎不知父亲是什么模样

20出头的陈松年，说来蹊跷，不知父亲陈独秀是个什么模样。新进门的儿媳窦珩光，更不知公公陈独秀是高是矮，是瘦是胖了。话题得从1910年陈松年出生时说起。

1910年陈松年从生母高晓岚腹中出世时，生父陈独秀与姨妈高君曼冲破族人的歧视，同居、结婚远离家门，居住在杭州美丽的西子湖畔，相处甚欢，过着甜蜜的生活。1912年初，陈独秀应安徽都督孙毓筠之邀，偕同新夫人高君曼回安庆任都督府秘书长。此时，陈松年只有两三岁，当时忙于公务的父亲陈独秀，是否回过家

中,是否看过三子陈松年,不得而知。即使看过,对两三岁的陈松年来说,也是毫无印记的。1913年,倒袁“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又带着他的姨妈高君曼和刚刚出世不久的弟弟鹤年、妹妹子美,逃离安庆,客走他乡。自此,父亲陈独秀再也没有回过家门。因此,从他记事起,就没有见过父亲一面。后来,他的大哥延年、二哥乔年,也离开家门赴上海投奔了父亲。这样,安庆老家就剩下他和生母高晓岚、养祖母谢氏几位亲人了。1913年,他的养祖父陈昔凡去世,陈家由兴旺的“望门大族”而衰落、破产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家的那么大的房子和那数不清的好东西卖给了人家,被别人搬走了,原来过着小少爷生活的陈松年,一下过起了清贫的生活。他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整天只见养祖母谢氏和母亲高晓岚伤心落泪。对生父陈独秀,他只听别人讲,自己的父亲在安庆都督府当过大官,是个有学问的人。他又听邻居和亲友们说,他长得很像他父亲陈独秀,连说话、走路都一模一样,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他更不知父亲为何不回家,在外面又做了些什么事,袁世凯爪牙为何要捉他……一连串的问号,常常在他脑海里翻腾。他的母亲高晓岚对他从不提起陈独秀,养祖母也不讲他父亲的事,他从来未听说过父亲写过信回来。她们对他管教很严,平时不让他与别人家的孩子在一块玩耍,即使上小学读书,也要按时回来,连学校里的童子军也不让他参加。使他最难过的是逢年过节,他见别家孩子的父亲,给他们买许多好玩的东西,牵着他们上街看舞龙灯,他从内心羡慕极了!有时,他哭丧着脸问母亲高晓岚:

“母亲,父亲过年怎么也不回来?”

高晓岚听了,不仅不告诉他,往往对他狠狠地瞪着眼睛,吓得他不敢再问。

直到1919年,他9岁读小学时,一位崇敬陈独秀的老师私下告诉他,他父亲陈独秀因发起五四运动被捕入狱,他虽然感到害怕,但根本不知道五四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暗自庆幸,总算第

一次听到了生父在外面的一点消息，知道父亲在外面干着什么大事哩。他凝视着老师给他看的报纸上登载的父亲的照片，他才第一次看到了生父的模样：

一头黑发，高高的额头，胖胖的脸，大大的眼睛，微微地笑着；穿着洋装，打着领带，很神气，很有派头。也是从这时候起，他才知道父亲又叫陈独秀。

看了父亲的照片，他脑子里才有了父亲模样的轮廓，他多么想立刻飞到父亲的身边，好好地看看父亲，也让父亲看看他从未看到过的小儿——松年。可是，他现在又坐牢了，不知能不能出来，想到这些，他心里又难过起来……不久，那位老师又告诉他，他的父亲放出来了，又到上海去了，他也弄不清父亲怎么被放出来，又到上海去干什么？后来，他的大哥延年、二哥乔年，也到上海去了，只听母亲说，他们到上海去读书。当时，他拉着哥哥的手，吵着要他们带他一同到上海父亲身边去读书。大哥延年紧紧拉着他的手，亲切地安慰道：

“小弟，你年纪还小，待你长大了，父亲不带你去，我同乔年一定带你到上海去读书。”

乔年也安慰道：

“小弟，你在家里要听祖母和母亲的话，好好读书。读书成绩好，我们一定带你去上海，你放心好了！”

他和母亲高晓岚、祖母谢氏含着热泪，到码头送走了两个哥哥，当轮船徐徐离开安庆码头时，他还挥动着小手，大声呼喊道：

“大哥、二哥再见！我等着你们回来！”万万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他们手足情深的三兄弟最后的诀别。

1927年大革命失败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进步人士倒在血泊之中。当陈松年从报纸上看到他的两个哥哥先后被国民党杀害的噩耗时，在悲痛万分之中，他才知道两个哥哥参加了共产党，还是共产党的领导人，死得英勇顽强。这时，他家又遭侵犯，国

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右派分子强行封他家的房子，又强占他家的房子办公，并扬言要抓他斩草除根，吓得全家老小提心吊胆，惊恐万状。这时，他才知道生父曾经是共产党的总书记，是国民党悬赏捉拿的政治首犯，这也是祸及家门的原因所在。也就从这个时候起，他才开始了解和认识自己的父亲……

### ◎父亲被捕全家惊惶

1932年，二十二三岁的陈松年，风华正茂，在安庆黄家狮小学任教一两年了。他已于前两年与窦珩光自由相爱完婚，支撑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他教小学自然课，教学认真，讲课生动有趣，像讲故事似的，学生们爱听。一家几口人靠他那微薄的薪水维持生活，虽然清寒，但还能过得去。他家虽屡经大难，那已是过去的事了，他勉力维持并希望从此能过上安稳日子。

不料，一场大难又降临而来。一天，陈松年上完课，到学校传达室看看有没有信件，顺手拿起刚到的一份《中央日报》，打开一看，头版头条赫然的大字标题立刻跳入眼帘：《共产党首领陈独秀等被捕》。刹时，心头一颤，脸色煞白，心“嘣嘣”地激烈跳动，连报纸上登的那张父亲头戴礼帽、满脸胡碴、穿着长袍的像片，也不敢再看了，连忙合上报纸，迈着急匆匆的步子走出传达室，也顾不得还没有放学，就径直回家了。

一路上，他心情沉重，心里直翻腾。他思忖着，父亲被捕的事要不要告知养祖母，她老人家年纪大了，为着陈家连遭横祸焦虑而双目失明了，若是她知道这消息又怎能经受得了这打击呢？他从养祖母平日的言谈中，深知她常常惦念父亲，把父亲当作亲生的儿子。有时犯愁起来，还指责已过世的养祖父陈昔凡当年太过分了，太过于无情，硬逼着父亲出走家门，而去参加共产党，要不然，生父在外头也不会屡遭生命危险，吃那么多苦；两个大孙子也不会被杀害。

或许家业有父亲继承，也不会落得破产……他觉得还是暂时瞒着好，瞒一天算一天。陈松年又想到，陈家已是“破碎品”了，再也经受不起任何打击了。父亲是共产党大人物，名声又大，他被捕凶多吉少，生死难料，蒋介石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他十分害怕全家再受株连，国民党当局来个“满门抄斩”，那又怎么得了。他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越不想告诉养祖母。连他的爱妻也不打算告诉，任其自然，到时再说。

此时的陈松年，已从陈家历次磨难中逐渐成熟起来，遇事也能三思而后行了。为此，他还向本家及一些亲友打过招呼，让他们保守秘密。他只知父亲被捕，但不知关押在何处，他又暗中探寻家父关押之地。

俗话说：“纸包不住火。”时隔不久的一天，他突然收到在南京做事的本家伯父陈庆云的来信：

松年侄：

近从张治中先生处，闻悉你父亲被捕后，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此事非同小可，望告知你祖母及家中人，以便思想上有所准备。亦望你祖母不要过于焦急，事已如此，也只有心放宽些了。若情况有变再言告于你。

陈松年看了信后，对本家伯父陈庆云所说的确信无疑。因陈庆云大儿子即陈松年堂兄陈子健，在南京陆军学校当教官，他与张治中先生在保定军官学校是同学，当时，张治中先生又任国民党第四陆军总指挥，所以陈子健消息灵通，很快从张治中先生那儿得知陈独秀被捕后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陈松年得知生父的关押之地，稍稍放了点心。他想，此事不能再瞒家里人了。

他回到家中，心颤颤地将本家伯父的信递给爱妻珩光，说：

“珩光，这是本家伯父从南京寄来的，你……你……看一下。”

窦珩光接过信展开看起来，看样子并不显得过分惊讶，这是出乎陈松年意外的。他以为刚过门不久的爱妻，见了这封信，一定十分惊讶，因她还没有经受过陈家所遭受的大祸。珩光看完信，说：

“公公被捕的事，我已听同学说了。我以为你不知道，还瞒着你哩，怕你受惊害怕。”

她从抽屉里的一个包里，取出那份登有陈独秀被捕消息的《中央日报》，用颤抖的手递给陈松年。

陈松年接过报纸，望着爱妻，不知说什么好，心跳得难以平静。他低声说：

“珩光，这报纸我早看了，我怕你经受不了这个打击，也瞒着你。”

“松年，这样大的事能瞒得了吗？报纸到处都有，连邻居亲友都知道了。说真的，当同学给我送来这份报纸时，我看了简直吓呆了，还哭了起来，真为公公担心。同学好心相劝、安慰，还要我暂时不告诉你，怕你……”

松年听了，不禁眼角流出了泪水，心中也涌起一股暖流，从心灵深处感谢爱妻的理解和体贴。

说起陈松年和爱妻窦珩光的结合，也有一段趣事。

松年的祖父，即陈独秀的亲生父亲陈象五，当年在苏州任教于窦珩光祖父家，教窦家几个儿子读书，深得窦军门家的赏识。窦家是安徽霍丘很有名望的大家族。松年祖父陈象五执教认真，孜孜不倦，使得窦家几个儿子读书很有长进，先后中秀才、状元和科举，当了官。祖父象五后在苏州染上瘟疫，死于怀宁会馆，窦家还给予资助料理丧事。陈象五的学生窦军门的第五个儿子，即窦珩光的父亲任职于安庆后，全家从苏州迁来安庆定居，与陈家交往甚密。事也真巧，陈松年与窦珩光在安庆二中是同窗，他们自由相爱，又得到陈窦两家的支持，一拍即合，而结为姻缘。这在安庆一时被传为佳话。

这对自由恋爱的小夫妻，在家门大祸降临的时候，能相互体谅、安慰，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这样，本已惊恐不安而忧心忡忡的陈松年，从爱妻的体贴安慰中，也萌生了几分勇气。于是，他与爱妻珩光商量着如何将父亲被捕的事告诉祖母谢氏，千万不能过于突然，免得祖母精神上承受不了。陈松年思索良久，想不出好的办法，只是摇头叹气，感到难办。爱妻珩光见状，胸有成竹地说：

“松年，你精神负担够重的了，还要忙于教课。这样吧，这事由我来告诉祖母。”

“那怎么个告诉法呢？”松年不解地问。

“你放心，我自有办法。”珩光安慰地说。

1930年陈松年生母高晓岚病故，窦珩光与陈松年结婚后，照料双眼失明的祖母的担子，就落在她的身上。长年累月，为祖母梳洗，照料体贴入微，十分孝敬，还常常给祖母消愁解闷，祖母从心里喜欢这个孙媳妇，见人就夸。

一天，冬阳高照，天气暖洋洋。窦珩光端出一把木椅，让祖母在庭院里晒太阳，并给她梳头。边梳边对祖母说：

“祖母，你近来精神不错嘛。”

“还不是你这个孙媳妇服侍得好。”

“这是小辈应该做的。”

“珩光，你福气也不好，一进陈家门就受苦受累。陈家原是大家族，现在也破落不堪了。”

“祖母，现在生活不是挺好的吗？”

“多亏松年教书，每个月吃喝不愁，你又会当家过日子。日子比过去虽苦，但还可以过。”

“祖母，我想问你老人家一件事，好吗？”

“伢子，什么事？你只管说。”

“祖母，我还没见过公公，公公待人好不好？”

“你公公是个好人，有学问，待人热情，就是脾气太犟，与你婆

婆搞不好。”

“婆婆也是个好人，她去世了，我常想她。”

“你婆婆像你一样，对长辈很孝敬，她死得过早。”

“祖母，公公现在在什么地方？”

“据说，他在上海，日子也不好过。他也不给家里写信，一点情况也不知道。他就是和你祖父赌着一肚子气。当时，我劝你祖父，算了，让他们去，你祖父也是个硬脾气，不让！”

“祖母，最近我倒听人家说了公公的一些事。”

“什么事，你快说给祖母听听。我对你从不说他，但我心里常常惦记着他。”

“我是听来的，也不知真假。”

“伢子，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说错了，我也不生气。”

“祖母，我听说公公在上海又出事啦。”

“啊，又出事啦！什么事？”谢氏一听，感到十分惊讶。

“祖母，你不要急，我说了，你不要害怕。”

“伢子，我已经经受过那么多灾难，我经受得了！”

“祖母，据说公公又被政府逮捕了！”

“啊，我的天啦，作的什么孽……”谢氏听了惊恐不已，不禁老泪纵横。

“祖母，你想开些，公公被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现在还没听说有什么事，他会出来的。”

谢氏沉默不语。过了好一会，用手指了指，要回房里去。接着，孙媳妇边扶谢氏进房，边说：

“祖母，你老人家不要难过，待松年放寒假，我同他一块去南京看看公公。”

谢氏进房，慢慢躺在床上，泣不成声。孙媳妇给她盖好被子，用手绢给她抹了抹眼泪，安慰道：

“祖母，早知你老人家这样难过，我就不对您老人家说了。”



“伢子，你告诉我是对的，这样的事不应该瞒我，我躺会就好了。松年放学回来，要他进来，我有话对他讲……”

“祖母，你先睡会儿，待松年回来就叫他来看你老人家。”

松年放学回来，一进家门就问妻子珩光：

“珩光，父亲的事你对祖母说了没有？”

“说了。”

“她老人家怎么样？”

“还算好。祖母听了公公的事，难免担惊受怕，她要你回来就到她房里去，说有话要对你说。”

陈松年轻声慢步地走进养祖母谢氏的房里。躺在床上盼等松年的谢氏，听见松年进门的脚步声，没精打采地说：

“伢子，你父亲的事，你媳妇都对我讲了。我看事情不妙，说不定，政府又要上门找麻烦，我老了，怕他们也不会怎么样的。你年轻，你还是到乡下去避避风好，被他们抓去，就不得了，那陈家就要遭灭种之灾了。”

“祖母，你不必担心，看样子父亲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我也想到乡下去躲一躲，可是现在还没有放假，请假扣薪水是小事，要是敲掉饭碗，那就麻烦了。”

“唉，作孽，作孽呀！不过你还是提防一点好，陈家已受不了任何打击了。你父亲现在怎么样？”

“祖母，我刚才收到大伯父陈庆云从南京寄的信。”

“信上怎么说的？”

“信上说，大伯父和大伯母去监狱看过父亲，说他在监狱里受优待，单独住在一个房间里，去看他的人很多。又说父亲很想念家，想念你老人家，要你老人家宽心。要我去南京看他。”

“没事就好，放寒假你同你媳妇去看看也好……”

## ◎ 柏将军说独秀小儿初识父

腊月隆冬，天寒地冻，安庆又下了一场大雪，格外寒冷。

离放寒假的日子越来越近，学生们忙着准备期终大考，陈松年显得分外忙。去南京探望父亲的日子，也日益逼近。他嘱咐爱妻珩光做好准备，买点家乡土特产，总不能空着手去看父亲。

一天，忙碌劳累的陈松年从学校回来，顾不上休息，习惯性地先进房内看望嗣祖母谢氏。未等他开口，祖母带着几分高兴地说道：

“松年，你回来了？你坐下，我有话对你说。”

“噢！”松年在祖母床边坐下。

“松年，今天下午，你柏烈武伯父来看过我。”

“真的，祖母，柏伯父回来啦！”松年惊奇、高兴地说。

“他刚从南京回来，同我谈了许多有关你伯伯（安庆俗称，即父亲）在南京监狱中的事。”

“祖母，伯伯在狱中可好？”祖母话未说完，松年就急着问道：

“据柏将军说，你伯伯在南京监狱还好，目前尚无什么大的危险，只待日后开庭审判了。”

“伯伯没有危险就好。”

“伢子，你年纪还轻，不管什么人，坐牢总不是滋味，家中总是不幸的。你伯伯盼你去看他。”

“祖母，一放假我同珩光就去看他老人家。”

“你明天买点东西，代我去看看柏将军，顺便问问他，如何去监狱探望，有些什么手续，南京你人生地不熟。”

“好，祖母，我明天向学校请半天假，去看柏伯父。”

柏烈武（1876—1949），名文蔚，安徽寿县人。陈松年自幼打心眼敬重他。他了解柏烈武，甚至超过了解他的父亲。他从祖母房中

走出来，就竭力捕捉柏烈武在他脑中的一些印象，他听人说过，柏文蔚曾与父亲以岳飞抵抗辽金，至死不变的精忠报国精神，成立了反清的岳王会；任过安徽都督，父亲在他手下还任过都督府秘书长；后又与父亲参加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一道逃亡日本。他还听养祖母说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家中遭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的侵犯，还是柏伯父从中周旋而幸免一难的。他还听说，柏伯父在北伐军中还当过大官，现在南京任国民党政府委员……尽管这只是些模糊的印象，但他知道柏烈武名声好大。柏烈武与陈独秀逃离安庆时，陈松年只有两三岁，打从记事起，他还没见过柏烈武。现在祖母要他去看望柏烈武，他内心感到一阵高兴。他想，一方面可向他了解父亲在狱中的情况，再方面如果可能的话，请他先带个口信给父亲，一放寒假自己就去看他老人家。

这天上午，陈松年手提糕点，来到了柏烈武黑漆大门的府邸。柏烈武正在一盆熊熊炭火旁，看着报纸，家人通报说：

“大人，有一位姓陈的少爷要拜见您。”

一听“姓陈的少爷”，柏烈武心中料定，怕是仲甫的三儿子松年来了，他连忙放下手中的报纸，说道：

“请他进来！”

柏烈武抬头向大门望去，只见陈松年穿着长袍，围着一条大围巾，手提糕点，文质彬彬，活像陈仲甫。不要介绍，也不等松年开口，他就笑迎着说：

“瞧瞧，近20年不见，你都长成了一条汉子了。你长得极像你父亲，活脱脱一个陈仲甫！”

“伯父，请你老人家先受侄儿一拜。”说着，陈松年捞起长袍正欲下跪，柏烈武忙上前挡住，说道：

“免了，免了，现在不兴这套了。”

柏烈武手一让，亲切地说道：

“松年，你就随便坐。”

“谢谢您老人家。”松年有礼貌地答道。

“松年，你父亲被捕的事知道吗？”

“我还是最近才听说。”

“你父亲没有写信给家里吗？”

“没有。家父从打早年出去，就没给家中来过一封信。他在外面的情况，家里人一点也不知道。”

“哎，这个仲甫，为革命连家都不要了。”柏烈武不禁叹气说，“不论怎样，也该给家里来个信。他还是这个犟脾气。”

“伯父，家父是怎样被捕的？在南京监狱里，有没有危险？祖母知道家父被捕后，天天提心吊胆，惦念着他。”

柏烈武不禁站了起来，手焐着一杯热茶，在客厅里边踱步，边向陈松年说起陈独秀被捕前后的一些事来。陈松年像学生听老师讲课似的，神情专注地恭听。

仲甫一生革命，一生难，先后5次被捕，每次被捕都因他名声大，轰动社会，国内外知名人士都为营救他四处奔走。算他命大，前4次都化险为夷，死里逃生。这次被捕，在国内外又引起轰动。国内著名学者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8人和国际学者杜威、爱因斯坦、罗素等，纷纷致电蒋介石，对陈独秀进行营救。许多报刊发表文章或短评，呼吁营救陈独秀。说“陈独秀是一个党领袖”，“有骨头有意识的老革命家”，是“中国革命史光焰万丈的大慧星”，主张“处置陈案，应考虑陈独秀一生行迹，及近20年来中国革命史”等等。北京学生界还发动了很有声势的援陈运动，好几个大学都进行了援陈讲演集会。国母宋庆龄女士也由沪抵南京，后又飞往武汉，为营救陈独秀，欲访蒋介石夫妇。然而，蒋介石对这些营救置之不理，下令将陈独秀等人押解南京军政部，称陈独秀等人系危害国民罪，应交法院审判以重司法尊严。10月25日，何应钦在军政部会客室传询陈独秀，并要陈独秀为其题词，他即兴挥笔写道：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何应钦见了题词，啼笑皆非，当即撕得粉碎。

传询完毕，军政部的许多青年军人慕陈独秀之名，纷纷持笔墨和数寸长的小纸条，四面围着陈独秀，向他“索书纪念”。陈独秀欣然挥毫，草成数书：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直到墨尽，陈独秀才得以解围。他是借题字之机，抒发自己大义凛然的情怀，一时传为佳话。

仲甫历经艰险，是一条硬汉子，生死关头，泰然自若，临危不惧。别人被抓，生死大祸，惶惶不安，而他在押往南京的火车上却呼呼大睡，睡得那么香那么熟，完全置生死于度外，令人赞叹！到南京后，他就提出要见蒋介石、陈立夫、陈公博等人。天气冷了，他又函请当局添购衣被，国民党中央党部不得不批准，拨洋 100 元。

仲甫关在监狱里，当局对他也算是优待的了，一人单住一间，而其他囚徒则住普通牢房。他是政治要犯，看守甚严，起初不准亲属探监，不准通信，不准读书看报。仲甫对此愤然斥责狱方：

“你们执行恶法，我拼老命也要抗议。”

典狱长辩解道：“恶法胜于无法”。

“恶法就要打倒！”陈独秀态度坚决地说。

于是，陈独秀进行绝食斗争，强烈要求取消“三不准”，狱方迫于压力请示当局，终于悄悄地取消了“三不准”。

仲甫一生的信条就是“斗争”二字。当年我与他创立岳王会，反袁世凯，他都是勇往直前，斗争不懈，决不退缩。世上许多事也都是这样，“斗则进，不斗则退，甚至灭亡”。

独秀，独秀，其性格真独特，有趣。他被捕，这是一条大新闻。当天许多记者获悉，一窝蜂似的钻进牢房，对他进行采访。有记者问他：

“陈先生，你打没打算请个律师替你辩护？”

陈独秀直言不讳地答道：

“我独秀一个穷光蛋，两袖清风，哪有钱请律师。即使请了律师，当今许多律师的良心，都被蒋介石收买了，他们能违背蒋介石旨意，替我辩护吗？怕他不敢，而只会落井下石。”

“如果有律师慕陈先生之名，愿意为你尽义务，你可否请他？”记者又问道。

“愿为我陈某义务当律师，当然可以考虑。不过，没有钱的生意谁干哪！”陈独秀冷笑一声，接着又讥讽记者说：

“记者先生们，如果报社不给你们钱，你们会削尖脑袋跑到大牢里来采访我陈某吗？”

说到这里，柏烈武向陈松年感叹道：

“松年，你父亲从年轻到英雄末路，都是这个脾气，时时事事都想逞英雄豪杰。”柏烈武呷了口茶，又说道：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你父亲成了老蒋的阶下囚，还想逞英雄豪杰。你想想，在这生死关头，哪能这样呢？说理，也得讲讲艺术吗？行船走路，还得看看天气嘛！”

柏烈武侃侃而谈陈独秀，陈松年句句听来新鲜、入神，顿时父亲那赫赫有名而倔强的形象出现在眼前，他似乎第一次才真正认识、了解了父亲，他心里更生起对父亲的安危担忧焦虑，于是问道：

“柏伯父，家父在狱中怎么样？”

“我回安庆之前，去看过他。听说他的案子已由军法司移交江宁地方法院审理，老蒋已审清你父亲与中共和红军没有关系。这样看来，目前不会有生命危险，判刑坐牢，看样子在所难免。”

“只要没有生命危险，坐牢也还有出来之日。”

“表面看，你父亲在狱中精神状态还好，在钻研《说文》，一张桌子上摆满书籍和稿纸。我劝他写写自传。他说，他早就立志于研究《说文》，过去四处亡命没有时间，现在老蒋提供了这个条件，何不用它？自传日后再写。”柏烈武看了看陈松年，又说道：

“从他一生看来，他早该坐下来做做学问。朋友说他，当政治家不适宜。现在能省悟了，也好。”

柏烈武好像又想起了什么，不禁自笑道：

“噢，松年，我还想起一件有趣的事，说给你听听，包叫你好笑。”柏烈武呷了口茶，饶有兴味地讲起这样一段笑话：

江苏南通有一位姓程的老先生，也是研究文字学的，因慕陈独秀之名，特来监狱看他。两人一见如故，互道钦佩，交换著作、文稿，互称对方有造诣，有卓见，然后推心置腹，相互探讨，侃侃而谈。起初，双方都心平气和，各抒己见，突然两人为了一个“父”字的解释，热烈争论起来，闹得面红耳赤，互斥浅薄，两人都高声大叫，甚至拍桌对骂，几乎动武。陈独秀说，“父”字明明是画着一个人，以手执杖，指挥人家行事。而那位程先生说，“父”字明明是捧着一盆火，教人炊饭。陈独秀说你不通，程老先生说你不通；陈独秀说你浅薄，程老先生也说你浅薄……谁也不服谁。幸亏有同案犯濮德志，好不容易把他俩劝开，并说：

“学术讨论应心平气和，不应发火。”濮德志随口谄出几句打油诗讽刺他们：

一日执杖一日火，二翁不该动肝火；  
你不通来我不通，究竟谁人是浅薄。  
若非有我小濮在，遭殃不只是板桌；  
异日争论平心气，幸勿动怒敲脑壳。

程老先生听了这打油诗笑了，陈独秀则幽默地骂道：

“你这小鬼是浅薄，我要敲你的脑壳。”

濮德志笑着说：

“我岂只浅薄，对于你们这一行，我简直无知。”

不一会，陈独秀和程老先生又握手言和。程老先生临别时，陈独秀还写了封信给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推荐程老先生教文史。

“松年，你瞧瞧，你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怪人，怪脾气，怕一生难改了。”

陈松年像听说书似的入迷，还时时发出笑声，他从来没听说过有关父亲这样有趣的故事，不禁内心感到：

“父亲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既严厉认真，又和蔼可亲。”

此时，他对去南京探望父亲的欲望更加强烈。

柏烈武又对陈松年说：

“据你父亲说，他久患胃溃疡病，血压也高，当局不允许他保外就医，法医看不好，他已写信给过去在上海常为他看病的黄钟医生，请他赴宁为他看病。典狱长为了上下两全，准许濮德志、罗世凡二人轮流看护他。松年，坐牢可不是个滋味，他已50多岁了，他想着你们，让我带信，要你去看看他，好为他分担一些忧愁。坐在牢房里的人，往往是最思念家人的。古人道：‘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嘛。”

“柏伯父，马上就要放寒假了，我已决定同我内人去南京看家父。柏伯父，看家父有什么手续，让不让看？”

“你同你夫人去看他，你父亲一定很高兴。去看他很简单，不要任何手续，只要看守向他通报一下登个记，就行了！”

“这点安庆特产，请柏伯父笑纳，实在也没有什么好东西孝敬你老人家的。”

“不，不。”柏烈武推让道，“这点心还是留着送给你父亲吃，你的心意我领了。”

“柏伯父，你老人家就收下吧。”陈松年恳切地说，“带给家父的，我会再买的。”

“那好，我就不客气收下了。代问候你祖母，她老人家双目失明，你们要好好地孝敬她。”

“是，柏伯父！我走了。”陈松年恭敬地向柏烈武深深地鞠一躬，转身走出柏府。



## ◎父子狱中相见热泪流

这天，冰天雪地，寒风刺骨，是数九寒天最冷的一天。由于狱方优待，陈独秀单室囚房里，破例地生着一盆炭火，却是暖洋洋的。陈独秀吃过早饭后，沏上一杯茶，便伏案摊纸、磨墨，开始一天的文字学研究。当他正全神贯注地解析《初说阶段》中的“上”、“下”两字，挥毫写着时，看守敲门进来，通报说：

“陈先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哪来什么好消息？”陈独秀头也不抬答道。

“你家少爷和儿媳，从安庆老家来看你啦！”

陈独秀一听，放笔推纸，“嚯”地站立起来，喜出望外地叫道：

“啊，真的？”

“真的，陈先生。你家少爷长得挺像你，儿媳妇也很漂亮。”

“快，快快，叫他们进来！”陈独秀欣喜若狂地说道。

“好！”看守说着，转身就走。

“慢点！”陈独秀好像又想起什么，忙叫回看守。

“陈先生，有什么事？”

陈独秀见看守转身回来，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他尴尬地对看守托咐道：

“那……那位潘女士来的话，请你对她说一声，我今天要会客，有事要谈，请她明……明天再来。”

陈独秀猛然想到潘兰珍每天上午10时要来看他，若是被儿子、儿媳妇看见了，那该多尴尬。

陈独秀在狱中，与看守的关系处得很好，上至典狱长，下至每一个看守，都因慕他的名而敬重他，不把他当犯人看待，而他常常为看守题字，有求必应，有的看守还把他的题字拿去卖钱，后来他知道了一气之下就不给看守写了。有时，他还以烟卷招待看守，吃

不完的东西也送看守分享。因此，他有什么事，一般说来，看守对他也是有求必应。看守对潘兰珍来探监也很客气，只要不是晚间，她来去自由，一般不加干涉。所以，这位看守应声道：

“好的，请陈先生放心。”

看守走出囚室，踏着冰雪来到监狱大门口，客气地对陈松年夫妇说：

“陈先生请你们进去！他在里面候着你们。”

陈独秀的囚室，离监狱大门不远。陈松年夫妇走进院内，只见父亲穿着崭新的长皮袍，外套一件马夹，围着一条围巾，头发斑白，面目清瘦，正喜形于色从房间走出，迈步在院子里，笑迎他们夫妇俩。陈松年夫妇看见日夜想念的父亲出现在眼前，疾步跑上前去。

“爸爸！”儿媳窦珩光话一脱口，不禁热泪夺眶而出，哇哇地哭了起来，扑了过去；陈松年也泪流满面，呜呜地哭着。

陈独秀见到近20年未见的儿子松年和未见过面的儿媳，十分高兴，满脸喜色，一把拉住他们的手，瞧了又瞧，上上下下打量着松年说：

“瞧，松年，快20年不见，你已长成一条汉子！”话音未落，陈独秀喉咙哽咽了，再也抑制不住一颗凄楚而激动的心，不禁眼角也溢出一串老泪，眼泪流过脸颊，落在他那山羊胡须上。

父子狱中相见，悲喜交加，心绪激荡，一时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久久地默默相视。此时，似乎只有沉默，才能表达出他们父子在这与世隔绝的高墙内久别相逢而又难以言表的心情。是的，昔日的陈独秀叱咤风云，而今却成了中共的反对派，老蒋的阶下囚，老子蹲大牢，儿子来探监，心里哪是个滋味呢？“人有悲欢离合”，偌大的一个世界，哪儿不能相见？然而，今天竟在这人间“魔窟”的监狱久别相见，老子、儿子那心情、那心中的滋味，语言能表达出来吗？沉默，只有沉默，此时无声胜有声。

在良久的沉默中，陈独秀终于精神一振，用长袍袖拭了拭眼

角，对泪流满面的儿子和儿媳含笑而幽默地说：

“别哭，别哭，父子相见是大喜嘛！如果不是蒋介石关照，我们父子还没有见面的机会哩。”

经他这么悠然自得的一说，陈松年夫妇也破涕为笑，父子三人亲切地交谈起来。

“爸爸，你身体好吗？”儿媳珩光亲切地问道。

“除老胃病外，还算好。”

“爸爸，我们真为您担心。”

“我不是好好的嘛，你们不必担心。他老蒋对别人可以想怎么样就怎样，但他对我不能想怎么样就怎样。大不了坐几年牢，到时候我出不出去，还由不得老蒋，不办手续，不签字，就出不去。”

“话是这么说，你名声大，还是提防点好。”松年提醒说。

“伢子，你说得也对。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嘛！”陈独秀风趣地笑着说。

他这一笑，也逗得松年夫妇笑了起来。

“松年，你们是怎么知道我被捕关在南京的。”

“我们先是从报上看到的，后来又接到庆云大伯父的来信，还有柏烈武先生回安庆，也告诉了我们。爸爸，这样大的事，你也该写封信告诉家里。”

“我何曾不想写信，特别是刚刚被捕时，心里寂寞难熬，像笼子的鸟儿一样，多想你们来看看我。但又想到，一人做事一人当，写了信怕牵连家庭，你祖母担忧。国民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何必要家里人跟着我受苦呢？”他又笑着说：

“我的名气大，不写信告诉家里，国民党也会登报告诉家里人的。我没有写信给你们，你们不是来看我了吗？你看看，蒋先生也真够朋友的了！”说着，他又仰面哈哈大笑。

“我们本想早来看你老人家的，只是学校里没有放假，课又没人代，所以，一放寒假，我们就看你老人家来了。”

“噢，松年，你已当教书先生了？”

“是的，我中学毕业后就当小学教师了。”

“松年，教书好，教书是陈家的祖业。你曾祖父、祖父靠教书为生，我也教过书。子承父业嘛，你又当了教书先生。教书先生，以教书为生，不会惹事。”陈独秀话锋一转问：

“你祖母好吗？家里都平安吗？我这次被捕后，国民党有没有上门找麻烦？”

“家里都还平安，祖母大人精神挺好，就是老挂念着你老人家。到现在，当局还没上门找麻烦。”

“国民党翻脸不认人，还是小心点好。”

“我们还是挺小心的，尤其是祖母。”

说话间，松年夫妇搀扶着陈独秀走进了房间。

陈松年夫妇环顾房间，这哪里是牢房，倒像是一间书房。摆设虽然简单但清洁安逸；床上垫着厚厚的垫子，铺着整洁的半新半旧被单，放有两床被子和一只大枕头；写字台旁放有一把藤椅和几张木椅，台上放着笔墨、纸张和一叠叠的书稿；两个大书架，摆满了有关文史方面的书籍、资料及报刊。窗台上摆着许多食品、罐头及大大小小的药瓶。屋角茶几上，还放着一盆含苞欲放的腊梅。当陈松年看到墙壁上挂着几幅书法刚劲有力的条幅时，问父亲道：

“这是你老人家写的？”

“是的。有的是我自勉的。那幅‘海底乱尘终日有，山头化石岂无时’，就是自勉的。”说着，陈独秀指着一幅条幅，上面写着：

行无愧作心常坦  
身处艰难气若虹

“这是我赠给刘海粟大师的，因刘大师来看我时，送了我一幅画，当时我十分高兴，便欣然写了这幅对联，回敬给刘海粟大师。”

他笑了笑，又说：

“刘大师见了这幅对联，还风趣幽默地对我说，‘你老兄虽然身在狱中，还是那不屈的脾气，诗画如仁兄也！’松年，你说这像不像你老子？”

“爸爸，你书法内劲外秀，飘逸潇洒，一气呵成，很有气派！”儿媳珩光接上，赞赏地说。

“过奖了，过奖了，我这哪是书法，只是心血来潮。”陈独秀兴高采烈，开怀大笑说道。

“爸爸，你也给小儿写个条幅，留作纪念和勉励，好吗？”

“不行，现在不行。大器晚成，再过几年写，晚年才写得好，才有保存价值。”

“你早年留在家里的书稿，1927年时，都被母亲烧掉了，家中没有你写的一个字。”

“那是一钱不值的東西，烧就烧了。”

“爸爸，你就给写一个吧，我来磨墨。”儿媳珩光带着撒娇的口气要求道。

“伢子，你们不懂诗兴发作才能写好诗，心境不好哪能写好字，以后再写。”

见父亲如此固执，陈松年也不再坚持，这倒成了陈松年终生的遗憾。

这时，父子间那生疏的距离，一下缩短而贴近，陈松年夫妇也一扫拘谨，洒脱活泼多了。陈独秀见了从未见过面的儿媳珩光，喜从眉梢来，心里乐陶陶，但又感内疚地说道：

“珩光，公公对不起你。你与松年结婚，公公亡命在外，没送你一点东西。”

“爸爸，那也是没法子的。儿媳不计较这些，见到了你，比送什么东西都好。谢谢爸爸的心意。”

“好儿媳，你能体谅我这个不顾家的老头，我心里也得了几分

安慰。不过，爸爸想问你一句话，不知该不该问？”

“爸爸，什么话，你说，还同小辈客气什么？”

“好，我问你，你和松年是自由相爱，还是家长包办？”

“爸爸，我和松年是自由恋爱，又是同学，我们窦家与陈家又是世交，双方家长都支持我们的婚姻。”

“男女婚姻，我历来主张，自由相爱好，婚姻包办，坑害了许多青年。珩光，你说，你是窦家之女，是哪个窦家，是不是窦军门家？”

“爸爸，我岳父就是窦军门的第五个儿子，他还是祖父当年的学生哩。”松年接上说。

“噢，是这么回事，这门亲事好。窦家、陈家祖上就有缘，正是千里姻缘一线牵，有情人终成眷属。”

父子三人对笑起来。陈独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过，与家人相会，天伦之乐，使他由衷兴奋。

这时，儿媳拿出一大包、一小包的安庆土特产，放在桌上，一一说道：

“爸爸，这是怀宁大糕，请你先尝尝。”

陈独秀从儿媳手中接过大糕，一片片吃起来，边品尝，边说道：

“甜，这糕真甜。你们可知道，怀宁大糕是当年进贡朝廷的贡糕，皇帝都爱吃。制作考究，既细薄，又甜丝丝的，吃后还满口香。在外地吃到它，就想起了家乡，如同喝家乡清甜的水。记得当年我到南京赶考时，你们祖母就要我带好几条怀宁糕作干粮，她老人家还嘱咐说，吃了家乡糕心里甜，考试起来心不慌，一定能考上。”

陈独秀吃着，品尝着，又对陈松年和珩光说：

“你们也吃，今天父子相见，是大喜，吃糕庆欢，心里更是甜滋滋的。”

“好，我们也吃。”松年夫妇嘴甜地说。

儿媳又拿出几瓶安庆胡玉美蚕豆辣酱，递给陈独秀说：

“公公，这是蚕豆辣酱，你胃口不好，吃了它，可开胃哩。”

“安庆胡玉美蚕豆辣酱，可闻名东南亚一带，据说还得过巴拿马国际金奖，有好几十年历史了。这味道既辣又香，十分开胃。记得，当年我应陈炯明之邀，到广州任教育长时，还托人从安庆特地带来。蚕豆辣酱作为礼品送人，凡尝过蚕豆辣酱的，都说别有风味。”陈独秀突然想起什么，说道：

“我还曾给胡玉美先生的后裔胡子穆写过一个条幅。胡子穆曾与我一起东渡日本求学。这条幅是：

‘嫩秋被池如茵绿，落日衔天似火红；  
闲依柴门贪晚眺，不觉辛苦乱离中。’”

“这是安庆麦隆香的墨子酥，也请你老人家尝尝。”

“这也是挺有名的，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吃它。上海街头卖的汤圆，名为黑芝麻芯，其实大多是安庆墨芝酥做的芯，香甜可口，吃了还想吃。”

陈独秀高高兴兴地品尝安庆家乡的特产，思念故土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便从藤椅上站起来，习惯性地双手交叉背后，踱步沉思，不无感叹地说道：

“古人云：‘故土难离’。一晃，我离开家乡快20年了。在这风风雨雨的20年中，我一刻也没忘记过安庆，安庆是一座名城，历史上出过许多名人。安庆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也是我一生政治生涯起步之地。那石板条路，那藏书楼，那都督府，那振风古塔，都留有我的足迹。游子不忘故土，我曾用‘盛唐山民’作为笔名；我这‘独秀’之名，也取之于怀宁那座独秀山。当年我还曾想用‘振风’作笔名，以抒我雄心大志，也记不清，后来怎么没用过。”陈独秀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思乡之情溢于言表。但说着说着，他竟伤感起来，说道：

“振风塔，振风塔，你能振文风？当年我17岁中秀才，人们都传说，振风塔是陈家祖坟上的一管笔，振兴了文风。现在想来好笑，这

座塔已不是陈家祖坟上的一管笔了，而像座火焰山，烧得陈家祖业荡然无存，儿又亡，我又落到这个地步，哎……”

松年夫妇见父亲无尽伤感，忙安慰道：

“爸爸，你出狱后，我们一定接你回安庆，陪你老人家登振风塔，心想开些。”

儿媳忙提起竹壳水瓶，给公公沏上一杯热茶递了过去，扶着公公又坐在藤椅上。陈独秀呷了几口茶，抽出一支他爱抽的雪茄烟，陈松年忙划着火柴，给他点燃。陈独秀慢悠悠地吸了几口，吐出的团团烟雾，在囚室上空袅袅萦回，以解心中之伤感。这时，他又侧着身子，面向坐在身旁的松年说道：

“松年，我刚才忘了问，你母亲她还好吗？”

关于母亲病逝的事，陈松年和窦珩光本想瞒着父亲，没想到他却问了起来，松年不得不悲痛地说道：

“父亲，母亲大人，她……她已于前年去……去世了。”

“呀，她……你……母亲过世了？”陈独秀一怔，脸上顿生悲戚之色，又一阵心酸。他深深地吸了口烟，又慢慢吐出，闭目沉默。一支烟抽完了，他才悲伤而又内疚地说：

“我对她不起，她跟着我没过一个安宁日子，没享一天福。她是一个善良而老实的人。这些年，我亡命在外，家里全亏了她。她为我生了三个儿子，有两个成了英雄，她也算是位英雄的母亲啊。”他站起，又坐下，问道：

“松年，你母亲生的什么病？”

“母亲生的是肺结核病。你老人家走后，家中连连遭不幸，她既担惊受怕，又担忧你老人家的安全。祖父去世后，祖母又双目失明，家中的担子全落在她身上，里里外外也够她老人家劳累的。她的病全是愁出来的，累出来的。”

“噢，对她不起。”陈独秀愁眉紧锁，长长地叹了口气又问道：

“松年，你母亲安葬在哪里？”



“安葬在安庆北门外叶家冲。那里环境幽静、安逸，是母亲生前自选的墓地。小儿遵她老人家临终嘱咐，在她的墓旁还……”

“还……什么？你说啊。”

“父亲，小儿说出来，你老人家可不要生气。”

“你说，现在我对她还有什么气可生。”

“她在弥留之际，再三叮嘱小儿，她死后在她墓旁要留一空穴，让你……百年……之后，与她……老人家合冢。在九泉之下，相依为命。”

“噢，是这么回事。她这种心愿我完全理解，可是，我四海为家，飘落异乡，现又被老蒋囚禁在高墙之内，不知日后，抛尸何方？万一被老蒋杀了，还不知准不准收尸。你两个哥哥被他杀了，不就是不准收尸吗？我与老蒋有不共戴天之仇！这个仇早晚要报的，打倒蒋介石之时，即是报仇之日。”

“父亲，小儿刺痛了你的心。”

“不，不，我这是说的实在话。”

“父亲，你若是百年之后，不论你千古何方，我一定要你魂归故土，与母亲合冢。”

“那是日后的事了。松年、珩光，每年清明节时，你们都要去踏青扫墓，为你们母亲坟上多添些新土，插些野花。你们记住，回去替我买几刀纸，到你母亲坟前烧烧，表表我对她的缅怀之情。”

“父亲，请您老人家放心，我们回去就办。”松年夫妇答道。

“这就好。其实人死了，到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哪知人间烟火。烧纸只不过是活着的人，对死者寄托的一种哀思罢了。你们要替我好好孝敬你们祖母，让他老人家晚年过得好些，我若是出狱，我一定回去看她老人家。”

“爸爸，我和松年一定百倍地孝敬祖母，你老人家放心。”儿媳珩光接着说。

“父亲，这里的生活你过得惯吗？”松年问道。

“我在这里比在外面的生活还安宁又好。在外面过着动荡不安的‘隐居’生活，时刻担心老蒋派特务来抓，现在不必担心了，心也定了。狱方秉承当局旨意，生活上给我一定的照顾和优待，每餐都有几菜一汤，荤素皆有，我在外面还吃不着哩。我胃不好，同时又吃不了，我要看守把菜和汤混在一起，要吃热的。你们看，他们还给我生了炭火，火在这里是严禁的，既取暖，又热饭菜。我常吃面食，比较容易消化，不大喜欢吃米饭。”他指着写字台的雪茄烟，说道：

“我爱抽雪茄烟，而烟也是这里的禁品，但我抽烟，狱方也奈何不得。你们看，这些雪茄烟都是朋友送的，在门口作为禁品收下，然后由典狱长亲自一一送还于我。我抽不完，有时，还给看守抽。”

“爸爸，你这些朋友真好。你危难时，他们还关心、接济你。”儿媳蔚光高兴地说。

“古人云：‘同病相怜，同忧相救’嘛。朋友们还经常送钱给我，我不收，他们就交典狱长并由收发登记保管。我需要什么，我就要典狱长代买。”他双手拉拉身上穿的马夹说道：

“你们看，这崭新的马夹，就是典狱长给代买的，他很会买东西，但他从来不要我的东西。”他又指着窗台上大包小包、大瓶小瓶的各种食品说道：

“这些食品都是朋友送的，有的还是洋货，哪能吃得完，往往霉烂了。下次来看我时，你们不要带许多东西，带点怀宁大糕、蚕豆辣酱就行了。你们来得好，这些食品你们都带走，免得坏了。”

“不，爸爸，你还是留着吃。”

“你们带走，全带走，带给你们祖母吃。朋友来看我，又要带来。我久患十二指肠及胃溃疡病，血压也高，曾要求保外就医，国民党当局坚决不同意，但经常有法医给我检查和治病，医生开的药，我要的贵重药，狱方一般都能给我。还派两个同案的朋友轮流守候我，我洗脸、洗脚水都是他们打来的，连便桶也是他们倒。”陈独秀笑了笑，又说道：

“你们看，我在外面哪能过上这日子，有时连看病的钱都没有。老蒋真够‘朋友’，‘光顾’又‘光顾’。除了不能出院门外，我在里面尚是自由，别人会客不得入房内，只能在接待室，而我会客则在房内，有吃有喝。老蒋为我提供了这个难得的好机会，何不坐下来做学问。我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就说过：‘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我已几进几出监狱，现在又入监狱，我何不以实际行动来实践自己当年提出的格言呢？”

“爸爸，这写字台上一堆又一堆书稿，是你写的吗？”陈松年指着书稿问道。

“是我来这里写的。”

“写的什么内容？”

“我在研究文字学，开始写《小学识字教本》。我早就想写了，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同时也有助于度过监狱生活。”

“爸爸，什么叫‘小学’，是不是小学生课本？”儿媳珩光不懂地问。

“不，珩光，你不懂。何谓《小学识字教本》，其实是一部类似《说文解字》的书，但比它详细得多，要把每一个汉字，分别解析它的来源和含义。其所以称作《小学识字教本》，‘小学’即是文字学，‘识字’即是从文字起源说起，‘教本’即规范的意思。有些人不懂得什么叫‘小学’，要我把‘小学’二字改掉，这不就成《识字教本》了吗？驴唇不对马嘴。”

“噢，是这个意思。爸爸的学问真深。”珩光连连点头说道。

“父亲，你老人家还是好好养养身体，不要写这些东西了。你过去写了那么多的东西，又有什么用处。”

“你这伢子，就不懂了。我不把它写出来，难道还要带进棺材里不成。哈……”接着，又说道：

“我还要写《实庵自传》、《古代的中国》、《现代的中国》、《道家概论》、《孔子与儒家》、《耶稣与基督教》、《我的回忆录》等等，一直写到生命最后一息，写出人类文明史。”他指着两个大书架说道：

“要写作，就要读书，你们看这许多书，我都要读，有政治、历史、传记、文字学、游记等等；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这些书，都是蒋先生免费给我提供的，我缺什么，我要什么书，狱方都能尽量满足我。你们看，我在外面哪有这样的条件？”

“父亲，你老人家雄心不已，小儿远不如你，我也要像你老人家一样，好好读书，多读书。”

“对。青年时期多读书，长见识，打基础，对你教学也有好处。不过，你不要学我，一心想当英雄豪杰，想名垂青史，结果哩，成了一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阶下囚。也不要像你延年、乔年两个哥哥，陷进政治派别之争不能自拔，断送了性命，断送了前途。好好教你的书，当你的先生，少问国事。中国的事情很复杂，你们小伢子搞不清楚的，即使搞清楚了，也没有什么意思。像你祖父那样，一生教书为业。珩光，在这方面，你要多管着些松年。”

“父亲，你老人家说得有道理。母亲在世时，也不让我问国事，要我多读书，读好书，管得很严。这点请你老人家放心。”

“你们第一次来南京，可到中山陵、灵谷寺、明孝陵去玩玩。如有时间的话，可顺便去看看你们的姨妈，她也够苦的，我也对她不起……”说着，陈独秀似乎又痛苦内疚起来。

“爸爸，你还不知道，姨……姨妈，她……”儿媳珩光悲痛地断断续续地说。

“你姨妈，怎么了？”陈独秀吃惊地问。

“父亲，姨妈，她也于去年过世了。”松年说道。

“什么，她……她也走了，真太惨了……”顿时，陈独秀显得痛心疾首。

“母亲前年过世时，姨妈还来安庆奔丧的，由于过度悲痛，她回

南京咯血病复发，又得上妇科病，贫病交加，无钱医治而过世了。据说，她死得好凄凉，还是潘赞化先生花钱营葬的。她葬在何处，我们也不知道。”

“我，我太对不起你姨妈和你母亲两姐妹，她们不该早早过世，进得陈家门，就受苦受累，哎，我内心有愧呀……”陈独秀低着头，陷入极度悲伤和沉默中。

这时，看守跑进门来喊道：

“陈先生，会客的时间已过，开午饭了。请你家少爷、儿媳明天再来吧。”

按狱方规定，每次会客不得超过两小时，于是，陈独秀说道：

“噢，知道了。不过，我想请你向典狱长报告一下，我儿子、儿媳第一次来看我，我想请弟兄们给我个方便，在外面饭店里，叫几个菜，让我们父子吃个团圆饭。吃过午饭就走，好不好？”说话间，机灵的儿媳珩光上前递给看守一支雪茄烟。看守接过烟，客气地说道：

“你陈先生的事，鄙人照办，我这就向典狱长报告去。”

“爸爸，我们还是出去吃吧，怕典狱长不会同意的。”松年担心说着说。

“你这孩子，就不如你媳妇机灵。那支雪茄烟，就那么好吃的。俗话说：‘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嘛。”陈独秀微笑而幽默地说。

停了会，陈独秀面对儿媳说：

“珩光，快收拾桌子，等着吃饭。”

珩光手脚麻利地拾掇开了。陈独秀看着满心高兴，说：

“松年，你还站着，还不帮你媳妇一道收拾。”

“他啊，在家里历来是碗来伸手，饭来张口，连一双筷子都不拿、不洗的。”

“好，你在父亲面前告我的状。”

“告状，就告状！”

陈独秀听了，笑得合不拢嘴，感叹道：

“还是在家里好，一家人有说有笑，自由自在，天伦之乐也！”

“爸爸，你出狱后，哪里都不要去，回安庆家里，我好好地孝敬你老人家。”儿媳珩光嘴甜地说。

“好，好，我一定回去，‘叶落归根’，乃是人生归宿也。”

桌子收拾好，看守就带着一个饭店小伙计拎着饭菜进来了。看守说道：

“陈先生，典狱长听说你家少爷、儿媳来看你，十分高兴，算是给开了恩，饭菜都送来了，你看可满意。”

“谢谢你，老总！”松年感谢道。

“不用谢，陈先生是好人。”

饭店小伙子从提篮里一下端出七八个菜，油煎鲫鱼、油炸排骨、炒三鲜、南京板鸭……还有一碗蹄膀汤，摆了满满一桌子。看守见摆好饭菜后，又高兴地说道：

“陈先生，典狱长为庆贺你们父子团圆，还要我带来一封祝贺便信，不过典狱长说，吃了饭，你家少爷、儿媳就要出去，明天再来也可以吗。”

“好，请你转告典狱长。”陈独秀打开典狱长的贺信，看了看，便递给儿媳珩光，说道：

“珩光，你给念念。”

“还是请教书先生，松年念。”珩光把信递给松年，微笑道。

“父亲之命，你竟敢违抗。”松年开着玩笑说。

“好，念就念，念得不好，请爸爸赐教。”

“一家人还客气什么，珩光你念好了。”陈独秀笑盈盈地说。

窦珩光手捧典狱长的贺信，用浓重的安庆口音满怀激情地念道：

陈先生：

欣闻你贵公子和儿媳，从安庆老家来探望你，鄙人即兴

谄上几句，以示祝贺：

悲欢离合几多愁，父子相逢顿时消。  
人生自古伤离别，家人会聚愿长久。

陈独秀边听边摇头，手指在写字台上“笃笃”地敲着，和着音节。珩光念完后，他乘兴而说：

“不错，不错。典狱长这几句即兴，虽不完全像诗，但经珩光这么一念，却都很有点诗味和意境，诗情画意，句句道出我们陈家悲欢离合之悲愁，同时，他道出了我们父子的良好的心愿。这个典狱长，虽为国民党服务，倒还有几分人情味和同情心，也是难得也！”

“看样子，这个典狱长对你老人家还不错嘛。”

“爸爸吃饭吧，不谈这些。”

“好，你们都坐下，让我们父子吃个团圆饭。唉，我不会喝酒，要不然斟上几杯酒，借助酒兴，庆欢一番，更觉得有意义。”陈独秀兴致勃勃地说。

“爸爸，没有酒，我们以茶代酒，其意义一样，好不好？”珩光提议道。

“好！好！”父子二人高兴地应和道。

话音未落，父子三人共举茶杯，兴致盎然。这时，陈松年兴冲冲地说：

“父亲，我同珩光先敬你老人家一杯。祝你老人家精神愉快，万事平安，早日获得自由！”

父子三人相互碰杯，每人一口用家乡带来的茶叶泡上的香茶，陈独秀乐滋滋地用手抹了抹山羊胡须。

“让我们为祖母健康长寿而干杯！”儿媳珩光举杯说道。

“好！干杯！”

“松年、珩光，父子团圆实不容易，是大喜，让我们为这大喜干

杯！”陈独秀乐陶陶地说。

“好，爸爸我们共同干一杯！”

这团聚，这气氛，如同节日欢聚一般，父子三人完全陶醉于其乐融融之中。此时，他们竟忘了，这里是森严壁垒的监狱牢房。

从此，陈松年偕同爱妻窦珩光，每逢寒暑假，都要去一趟南京监狱，看望陈独秀。陈独秀在监狱5年间，陈松年先后去了8趟。他们有时住在监狱附近的小旅店里，有时住在本家大伯父陈庆云家，上午或者下午去监狱探监，有时上下午都去，但每次都不得超过两小时。有时超过了，看守照例打声招呼，只要不在那里过夜，也不大干涉。他们父子相见，大都谈家常，谈儿女情长，或者谈学问，一般不谈国事，不谈政治。监房内也没有看守监听，进出监狱，也不用检查，照例登个记就行了。

一趟趟的探监，一次次与父亲相处的日子里，陈松年对父亲的认识和了解，一次比一次深，父子感情也越来越深厚。他对父亲的形象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生动，越来越美好……他从父亲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一次比一次感觉到父亲是个有学问，有血有肉，感情丰富，和蔼可亲而幽默诙谐的老人，并不像有人所描述的那样，是个脾气古怪，嫉恶如仇，冷若冰霜，喜怒形于色，不容人的人。甚至他和他的爱妻珩光从内心感到，父亲根本没有脾气，是个善良的老人。只是太固执，连一个字也不肯写给他。“相见时难别亦难。”每当陈松年夫妇去看望陈独秀时，他总是欣喜若狂，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离别时，他总是依依不舍，拉着他们的手迟迟舍不得放下，依依相送院门口，甚至有时竟相送至监狱大门，呆呆地站着，目送着他们，直至他们的背影消失。

### ◎接父出狱巧遇后母

1937年夏天，安庆气候异常奇特，倾盆大雨像发了狂似的，一



个劲儿地倾泻不止。洪水滚滚，农田内涝，一时间眼见即将收割的金灿灿的稻田，被无情的大水吞没，变成一片汪洋。雨过天晴，又燥热异常，烈日炙烤，大地生烟，煞是难熬。老人们说，自古到今，若是老天爷发脾气，必有大难降临。

7月初，陈松年好不容易盼得暑假到来，正欲与爱妻窦珩光动身去南京探望父亲，突然传来芦沟桥事变发生的消息。7日夜，驻扎在北平西南宛平附近的日本侵略军，借口一个士兵失踪，要进宛平城搜查，并要求中国撤出当地驻军。这些无理要求遭到中国军队拒绝，日本即炮轰宛平城和芦沟桥，开始向我华北地区大举进犯，当地中国驻军出于爱国义愤，不顾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命令，奋起反击，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从此，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全面展开，烽火四起，四万万同胞，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奔向抗战第一线，誓与日本侵略者奋战到底。此时，作为安徽省府所在地的安庆，由于地处长江要冲，居于南京、武汉之间，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同时上海、南京的形势日趋严峻，为日军侵犯的主要目标地，这样安庆势必为日我双方的必争之地。一时间，安庆形势骤然紧张起来，加之迫于形势，安徽省府又忙于搬迁至六安，更使人心惶惶，惊恐不安。一些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也纷纷忙于准备背井离乡逃难。形势既吃紧，失明的祖母身体又欠佳，陈松年夫妇一时就离开不了安庆，在这兵慌马乱之时，岂好离家出走呢？不久，又传来淞沪战争爆发、日军进犯上海的消息，日军正蠢蠢欲动进犯南京，形势更加严峻而又迫在眉睫。陈松年一家为陈独秀的安危担忧，心急如焚，尤其是祖母整日叨念，夜不能眠，再三催促陈松年夫妇去南京看望陈独秀。她忧心忡忡对陈松年说：

“这时局越来越紧了，万一日本人打到南京，你父亲不死在老蒋的刀下，也要死在日本人的炸弹下，我真担心他的安全。你们安排一下，赶快去看看，看看当局怎么个处置法。看能不能把他保释出来，让他回安庆。即使日本人打到安庆，死，我们一家人就死一

块。唉，这伢子的命也太苦啦……”说着，祖母从手腕上抹下一对手镯，说：

“这对手镯是我当年嫁到陈家时，娘家陪嫁我的，你们拿去当了，筹集几个钱，好到南京把你们父亲保释出来。”

“祖母，这万万不行，你老人家留下，钱我们再去想法子借。”陈松年夫妇异口同声地道。

其实，在这国难当头的非常时期，陈松年夫妇何尝不想早点去南京探望父亲陈独秀，只是一时脱不了身。在祖母再三催促下，他们不得不商定，让陈松年一人去南京，窦珩光留下看家。陈松年又特地到乡下，托本家堂兄陈遐文帮助照顾家庭。

8月中旬，虽然立了秋，天仍然无雨，秋老虎来势凶猛，太阳火辣，热得人们无可奈何。一天，陈松年汗流浹背，乘轮船顺江而下，来到了石头城南京。因天色已晚，便寄住在本家伯父陈庆云家，准备第二天去监狱探望父亲陈独秀。

毕竟是秋天之夜，比白天凉爽些，时而伴有徐徐凉风，饱受夏日炎热之苦的人们，颇感凉爽惬意，家家户户早早就寝。陈松年由于旅途疲劳，在伯父家也很快入睡了。此刻，谁能料到疯狂的日本飞机，从上海起飞正向沉睡的石头城人逼进。当一阵“嗡嗡”的飞机吼叫声将陈松年、将石头城人惊醒时，还未来得及躲避，便响起日本飞机投下的炸弹“轰轰”的爆炸声。顿时，石头城一片火海，火光如柱直冲夜空，浓烟拔地滚滚冲入云霄；人们一片的惨叫声，房屋倒塌声阵阵；六朝古都，全置于日军飞机的夜袭之下，被炸得遍体鳞伤，血流成河……此时，惊魂未定的陈松年，凭着炸弹爆炸的方位和声音的判断，离总统府不远的老虎桥监狱可能也中了日机的炸弹，不由得担心着父亲陈独秀的安全，不知他老人家安危如何？他心惊肉跳，恨不得立刻跑去监狱，探个虚实，无奈之余只有暗暗祈祷父亲陈独秀平安无事……

第二天一早，陈松年就急匆匆地奔去监狱探望父亲陈独秀。沿

途满目凄凉，惨不忍睹：炸弹所炸之处，一片废墟，有的还冒着浓烟；数不清的男女老少，甚至全家人，被炸得血肉模糊，倒在血泊之中；有的还压在倒塌的墙壁之下，在挣扎着，一片凄惨。善良的陈松年见此惨状，不禁流出悲愤的泪水，满腔仇恨，怒火中烧，日本人太灭绝人性，这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陈松年穿街走巷，来到老虎桥监狱大门口，只见高墙内还在冒着烟火；再仔细一看，监狱门口比往日戒备森严，一队看守荷枪实弹，严守狱门，不让外人靠近；高墙之上，还架着机关枪……陈松年远远地透过狱门，向家父陈独秀住的那座单门独院极目望去，不看则已，一看便吓呆了：那屋顶倒塌大半，父亲肯定压在底下，凶多吉少了。他几乎痛哭起来，情急之中，见有一个熟悉的看守持枪守在监狱门口，他壮着胆子上前道：

“老总，我家父陈独秀，他昨天夜里，怎……怎么样？”

“噢，你是陈先生的少爷。”

“是的，老总。我昨天晚上才来南京，没想到夜里，日本飞机空袭南京。”

“噢，陈先生算他命大。他房间屋顶被震塌了，幸亏他反应快，躲在桌子底下，未压到他，安全无事。”

陈松年听看守说他父亲没事，心中石头落地，也就放了心。但他转面一想，父亲年纪大了，毕竟受了一场虚惊，精神一定不安，需要安慰。但又不知今天能不能进去探望，于是，他又向看守问道：

“老总，我能不能进去看看家父？”

“上头有命令，从今天起，探监严了，不经典狱长同意，任何人不准探监。”

“噢，那我这就走了，谢谢老总。”

陈松年正欲转身，看守却同情地叫住他：

“陈少爷，你等等，我进去问问典狱长，看能不能让你进来。”

约10来分钟，看守回来对陈松年说：

“典狱长说，对陈先生还是要优待一点，同意你进来看他。刚

才,那位潘女士进来,也是典狱长同意的。”

陈松年听说“潘女士”在里面,如同触电似的,心头一怔,全身肌肉抽搐,忙缩回欲进狱门的脚。父亲与潘兰珍的事,他已多次听本家伯父陈庆云夫妇说过,也听看守说过,潘兰珍是个好心肠的人,从上海辞掉工作,来南京监狱陪伴和照顾父亲,使父亲精神得到极大的安慰,病也日渐好转。他几次探监,父亲从未提及过她,他和妻子又难于启齿,这是父亲私人生活的事,不愿刺痛他老人家的。论年龄,他和妻子都比潘兰珍大,作为父亲怎好对儿子、儿媳说这件事;作为儿子、儿媳又怎好去问这件事,他们只好避而不谈。他们也想见见这位潘女士,尽管年龄上有差异,但毕竟是自己的后母。她为了父亲,把她最美好的年华默默奉献给了陈家,从内心深处,真要感谢她对父亲的一片深情和无微不至的照顾。此刻见还是不见?过去一次未见过她,也许是父亲让她有意回避的。我这次突如其来,父亲不知,她也不知,正好又碰上日机夜间轰炸,她和我,同样为担心他的生命安危,不约而同来到监狱。在这生死关头,不期在监狱巧遇,想他一定会体谅,甚至会感到几分欣慰。陈松年主意拿定,便迈步走进了严守的监狱大门,办了探望的登记手续,经看守检查后,向父亲住的那单独院子快步跑去……

陈松年走进小院内,只见几个勤杂人员在看守的监督下,正在清理、抢修父亲住的被炸弹震塌的房间;一位短发、矮胖略带几分摩登的女子,正在震塌的房间内向外搬书,搬被等,时而用手拂去灰尘,忙个不停。陈松年想,这位女子可能就是多次想见而未见到的那位潘女士了。再向院内树荫处一瞧,只见父亲陈独秀穿着一件白色对襟褂,正坐在藤椅上,跷着二郎腿,抽着雪茄烟,悠然自得看报纸。见此情景,陈松年不禁想起柏烈武向他讲述的父亲被捕后,在押解南京的火车上酣然大睡的事,又联想到日机轰炸时幸免一死的父亲,依然从容不迫,泰然处之。百闻不如一见,顿时父亲陈独秀的形象,在陈松年的心中更加高大起来,倍觉可亲、可爱、可敬。

陈松年不觉来到父亲身边，亲切地喊道：

“父亲！你好，你老人家受惊了。”

“呀，松年，你什么时候来的？”陈独秀惊喜得“哗”地放下报纸，站立起来。

“我是昨天下午来的，住在大伯父陈庆云家，没想到，昨天夜里日机突然袭击南京，我十分担心你老人家的安全，所以，今天上午就赶来看你老人家。”

“不用担心，我不是好好的吗？不过，日机轰炸时，确实危险，幸亏我来得快，躲在桌子底下。房子倒塌压在桌子上，我在桌下却安然无恙，日机也奈何我不得。”陈独秀哈哈地笑起来。

“日本人也太猖狂了，政府军为何不抵抗？”

“松年，这是国家大事，你们小孩子弄不清。西安事变，那个少帅学良真够有种，竟能把老蒋关起来，又敢于随他回南京。他这样做，本想促使蒋介石抗日。然而蒋介石阳奉阴违，表面上被迫接受中共提出的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条件，实际上依然在实行不抵抗主义，致使日本侵略者越来越猖狂，肆无忌惮。看样子，形势还要吃紧，日本人要侵略南京来了。”

“父亲，形势这样紧，日本飞机还要来轰炸南京，你在这里太危险了，狱方有什么防范措施？”

“迫于形势，国共实现合作，他们会很快释放政治犯的。陈钟凡、胡适、张柏苓等先生联合保释我，而老蒋却要我写悔过书，我当即谢绝，声明‘宁愿炸死在狱中，实无悔改，不要人保’。”

“父亲，你太固执了。什么时候了？能出去就出去，生命安全要紧，讲那么多条件当局会同意吗？祖母还要我带钱来，请人保释你出去，回安庆家里去。”

“松年，你不可这样说。我陈独秀，就是这倔犟脾气，附加任何条件，皆非吾所愿，否则，那不是我这个‘陈独秀’。松年，你不要性急，据我分析，放我出去势在必行，以表示蒋介石对抗日的诚意。我

若炸死在狱中，对老蒋十分不利，他那抗日的假面具就戴不住了。”

“父亲，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老人家，还是见机行事为好，不可固执到底。”

“松年，古人说得对。我刚才说的那些话，就是识时务的话，如若不看看眼前的形势，附加任何条件出去，那何为‘识时务者’，又何为‘俊杰’？”抽了口雪茄烟，陈独秀摆摆手，又说道：

“父子见面不谈这些，还是谈谈家事。你祖母还好吗？安庆形势怎样？”

“祖母近来身体欠佳，因安庆天气不好，先是大雨成灾，现又奇热无雨，干旱，祖母大人适应不了，关节酸痛，其他均安康。祖母日夜惦念着你老人家的安全。”陈松年看看陈独秀的表情又说：

“安庆形势也吃紧，省政府忙于搬迁至六安，人们提心吊胆，甚怕日军攻打安庆。有的人家，在收拾行装，准备外出逃难。”

“目前，全国形势都一样。长江中下游，日本人是一定要侵占的，南京也危在旦夕。南京一旦被日本人侵犯，芜湖、安庆就保不住了。这样，日本人就可以直接进犯武汉。你回去，思想上也要有所准备，以防万一，要照顾好祖母。”

“父亲，你对形势的分析是对的。我回安庆就按照你老人家的话去办。”

正在收拾东西的潘兰珍，看见有人同陈独秀交谈，她以为是陈独秀的朋友来看他。潘兰珍对陈独秀的来客，非常热情，不是沏茶，就是递烟，然后知趣地退居一旁。于是，她一手拿个茶杯，一手提着竹壳热水瓶，向他们父子走来。正在热烈交谈的父子俩，还没注意到潘兰珍已悄悄走到他们身边。还是潘兰珍的话音，打断了他们谈话：

“先生，这位少爷是你的学生？”

陈独秀看见出现在眼前的潘兰珍，脸面立刻呈现出一副尴尬神色。陈松年见了，心中虽然有数，但无法开口，只好侧身回避。潘

兰珍浑然不觉，提起竹壳水瓶，泡了一杯茶，正欲递给陈松年。就在此时，陈独秀眉梢一皱，想到现已“两军对垒”，不可回避了。于是勉强地笑了笑，向潘兰珍介绍说：

“这就是，我常对你说起的小儿松年。”

陈松年立刻扭转身子，面对着潘兰珍。接着，陈独秀用颤抖的声音，向陈松年介绍道：

“松年，这是你……”饱经风霜，闯荡天下的陈独秀，此时竟无勇气把该说的“后母”二字说出来。

陈松年见陈独秀进退维谷，便落落大方而有礼貌地向潘兰珍深深一鞠躬，亲切称呼道：

“母亲！请接受小儿一拜。”

潘兰珍一听，刹那间心一跳，面如火燎，顿时面红耳赤，不知所措，急得连连摆手。她从来还没听人叫过她“母亲”，急忙用上海——南通口音颤颤抖抖地说道：

“少……爷，少……爷，依……不必这样！”

“母亲，我和家里人，都十分感谢你对父亲无微不至的照顾，令我们敬佩。”这是陈松年从肺腑里吐出的真言，他从内心尊敬潘兰珍为母。

陈松年这肺腑之言，既使潘兰珍涌起一身暖流，又使她感到意外。她早就以为，陈家人见了她，一定要数落她一番，甚至把她从老先生身边赶走，然而，今天老先生的儿子松年竟称她为母，一扫她心中的疑虑。于是，她从内心感叹道，还是老先生家的后人有教养。她顿觉一身轻，精神也为之一振，说道：

“松年，依不必客气。依阿爸对阿拉也蛮好的呀。”

尴尬的陈独秀见状，难堪之色顿消，微笑着说：

“松年，这些年也亏得她的照顾，她是个真诚、热心肠的人。你们要尊敬她。”

“父亲，我们家里人，没有把母亲当外人看。我和珩光几次来南

京,都想当面向母亲表示衷心感谢。正巧今天见到了母亲,我很高兴。”

“松年,你很懂事。你媳妇和你祖母通情达理,令我欣慰,还是家里人好。”陈独秀感叹地说。

“松年,待老先生出去,阿拉和老先生一定去安庆家里,看看阿婆。”潘兰珍面带微笑说道。

“母亲,到时小儿和儿媳一定来接你们老人家回安庆,一家人团团圆圆过日子。”

“那好,那好!阿拉和老先生一定去安庆。”潘兰珍满口答应。

陈独秀默默地凝视着松年和兰珍,对他们亲如一家的交谈,脸上泛起阵阵笑容,似乎真的回到了阔别 20 多年的家乡——安庆,在家里过着天伦之乐的日子……

时隔两三天,即 8 月 22 日,陈松年预先打算再去监狱探望陈独秀一次,即动身返回安庆,因心中还惦念着家,家中人又惦念着陈独秀和他。上午,他穿街走巷,路过珠江路时,只听报童扯着嗓子喊叫:

“好消息,特大新闻:《国府明令,陈独秀减刑》,即将释放!”

陈松年一听,真是喜从天降,欣喜如狂,不由得从争先恐后买报人群的间隙中,挤了进去,好不容易抢购得一份《中央日报》,当即看了起来:

兹依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三十九条,宣告将陈独秀原执行之有期徒刑八年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此令。

作为儿子的陈松年,看到父亲减刑即将出狱的消息,此刻那心情就甭提有多高兴了。他和他一家人,终于盼到了这一天,父亲获得了自由,岂不是陈家的大喜?这应让家里人早点知道。于是,他四处询问,找到了邮局,发了个加急电报,把父亲即将出狱的喜讯告诉家里,让家里人高兴、放心。发完电报,他又急冲冲赶往监狱,



欲向父亲陈独秀报告这一喜讯。当他在监狱门口办好探监手续，走进父亲刚刚抢修的房间时，里面挤满了人，典狱长正在大声宣读陈独秀减刑的国府令：

查陈独秀前因危害国民案件，经最高法院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终审判决，处有期徒刑八年，在江苏省第一监狱执行。该犯入狱以来，已逾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将来……

典狱长宣读完后，室内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新闻记者抢拍镜头，上前采访陈独秀：

“请问陈先生，政府明令减刑，你对此有何感想？”

陈独秀减刑出狱，是条震动社会的特大新闻，新闻记者当然想从陈独秀口中抠出点什么。然而，陈独秀却缄口不言，令新闻记者吃了闭门羹。新闻记者摇头，感叹道：

“难怪人们说，陈独秀脾气乖僻。”

其实，这时陈独秀正气着哩。他听了《国府明令》中“深自悔悟”之类不实之词，十分恼火，愤愤不平。他想，本来就无罪，哪来的“深自悔悟”，这岂不是失其对象，对他污蔑造谣吗？岂不正中造谣者的下怀。在场的同案犯濮德志、罗世凡等人，当即要陈独秀发表一个声明，说道：

“‘爱国情殷’，可以默认，‘深自悔悟’四个字必须发表声明更正。”

陈独秀虽愤然万分，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令在场的朋友大惑不解。此时，他何不想乘此发个声明辟谣，批驳《国府明令》中不实之词呢？然而，他毕竟是沙场上的一位老斗士，深思熟虑，想得更深一层。出狱前就发表声明批驳《国府明令》，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不明智之举吗？弄得不好，“聪明反被聪明误”，反而耽误了出狱大计。出了监狱大门，获得自由，写一封声明信给曾经发表他自撰《辩诉状》要点的《申报》，要比现在发表声明，回答新闻记者的问

话明智得多，乃是策略也。于是，他只得回避新闻记者的采访，不发表只言片语，令当局对他奈何不得。

朋友们争先恐后与获释即将出狱的陈独秀热烈握手，祝贺道：“祝贺陈先生出狱，开始新的生活！”

“谢谢！谢谢！”陈独秀抑制住内心的激动，连连答谢道。

当即，傅斯年、陈钟凡等朋友，邀请陈独秀出狱后，与其夫人寓居他们处。陈独秀对此感动不已，“一生一死乃知交情”也。

客人走后，避于一角的潘兰珍，要不是陈松年在场，她定会上前热烈拥抱老先生陈独秀。陈独秀出狱获自由，是她早已盼望的一天。典狱长宣读文告时，她在一侧激动得热泪簌簌流下，满面喜悦。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她怎能不激动，不欣喜若狂呢？然而，她还是抑制住那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喜笑颜开地走到老先生的身边，拎起竹壳水瓶，给陈独秀倒了一杯水。作为儿子的陈松年，父亲幸获减刑释放，也是他和全家人的大喜，又怎能不兴高采烈？他见潘兰珍给陈独秀倒开水，便上前从桌上递给父亲一支雪茄烟，擦着火柴点燃。此时，陈独秀安坐在藤椅上，闭目抽烟，悠然自得养起精神来。过了好一会，陈松年开口说道：

“父亲，明天你老人家就要获得自由，这是大喜，小儿欣喜万分。不知你老人家日后有何打算？你与母亲是不是跟我回安庆老家去？”他又面对潘兰珍，有礼貌地说：

“母亲，你的想法呢？到安庆去，我们一定孝敬你和父亲。”

潘兰珍听了，腼腆地向陈独秀指了指说：

“我听老先生的。”

陈独秀这时正在静静地考虑，出狱后何去何从？回安庆，还是暂住南京，他一时拿不定主意。听儿子陈松年提出这个问题，而潘兰珍大事小事历来都听他的，由他作主。他连吸了几口烟，终于说道：

“兰珍、松年，减刑出狱，虽然是蒋介石迫于形势而作出此举，

对于我这个失去自由而又重新获自由的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件喜事，即使在外面讨饭，毕竟是一个自由的人。”然而，他又犹豫起来，说：

“出狱后，何去何从，我比你们考虑得多。按说，我与兰珍回安庆老家，与家人团聚，享受那天伦之乐，是为最好。同时，也好孝敬你祖母大人。但安庆地处长江边，是个要塞之地，南京一旦失守，日本人是一定要侵犯占领的。目前形势也很吃紧，即使回安庆，也是住不了多久的。其他地方，一时尚无合适去处。”他站起来，一边踱步，一边说道：

“出狱后，我想暂时寄住南京傅斯年先生处。一是拜访，感谢老朋友对我在狱中的照顾；二是有些事还要处理；三是身体多病，在南京想请名医检查治疗一些日子，以休养生息。至于日后，再看形势而定。兰珍、松年，你们看如何？”

“老先生，我听你的。”潘兰珍随口应允道。

“父亲，你就这样定吧。先在南京住下也好，待形势好转了，我再来接父亲和母亲回安庆。”陈松年想，父亲既已作出决定，何必去违背他老人家的意愿呢？同时，他不回安庆，恐怕还有他难以言及的苦衷。

“好，那暂时就这么定吧。兰珍，辛苦你就收拣东西吧。松年，天时也不早了，你还是到伯父陈庆云家住吧。告诉他们夫妇一声，我明天中午出去，过几天我去看他们。”陈独秀拿定了主意。

“好，父亲，我这就走。母亲，我走了。”陈松年告辞，向陈独秀、潘兰珍行了鞠躬礼，转身出了陈独秀的囚房。

次日，即8月23日，身陷狱中五载的陈独秀终于获得了自由。

这天，秋高气爽，朝晖满地，秋风习习，是入秋以来最凉爽的一天。陈独秀一清早起来，习惯地在独院内散步，这是他5年监禁生活中，健身、解忧愁的一种方式。今天他这最后一次散步的心情，与昔日迥然不同。往日忧心忡忡，愁郁满怀，步履沉重；而今天，虽

然不是狂喜，但也是怡然自慰，步履轻快。老蒋总算让他无条件地出狱了，这正是他所愿，他时而慢步悠悠，时而驻足，凝视那高墙、电网，时而思绪万千……

上午9时，探监时间一到，潘兰珍手里拎着提包，满怀喜悦地来到陈独秀的房间。陈独秀一见潘兰珍，笑盈盈地迎上前说：

“兰珍，你来了。”

“老先生，阿拉来了。依夜里睡得好吗？”

“睡得好，昨天夜里，一觉睡到天亮，脑子似乎什么东西也没有了。”

“依自由了，过去那些东西没啥想头了。”

潘兰珍从提包里拿出理发工具，笑吟吟地对陈独秀说：

“今天是依大喜，阿拉替依理理发，修修鬓角，好年轻些出去。”

“好的。你说得对，出去要有点精神，胡子拉碴的怎好去见朋友。”

陈独秀边说，边坐到藤椅上，让潘兰珍给他理发。潘兰珍从上海来到南京后，就上街买了理发工具，几乎每周都要给陈独秀修修鬓角，剪剪山羊胡须，让陈独秀那教授风度常在。理完发后，潘兰珍又拿出镜子让陈独秀照照，陈独秀对着镜子照了起来。出现在镜子中的陈独秀：那稀疏斑白的头发，向后梳理整齐；清瘦的面容刮得光光，泛起丝丝红光；那山羊胡须，修理得确有几分风度，随着面部肌肉的跳动，山羊胡须也在起舞，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照着照着，陈独秀不禁对着镜子笑了起来，说道：

“兰珍，你的手艺还真不错，把我这个胡子拉碴的老头，调理得也年轻起来。”

“老先生，依本来就不老，很有风度嘛，那是依故意装的那个样子嘛。”

“哈哈……”老夫少妻，笑个不停。接着，潘兰珍又问陈独秀：

“老先生，依今天穿啥子衣裳？穿西装，还是穿长袍？”

“不穿那洋装，东洋人已打到国门之内，哪还能穿洋装。我还是穿那件依新做的长袍，天有点凉，外面加一件黑马褂，这是中国人的传统服装。”

“好的，我这就拿。”

潘兰珍从一只藤箱子里，取出长袍和黑马褂，帮陈独秀很快穿上。她又拿着镜子递给陈独秀，说道：

“老先生，依再照照看，行不行？”

陈独秀拿起镜子，照了又照，笑眯眯地摸着那山羊胡须，十分得意，说道：

“兰珍，这个样子蛮好的。你把那顶礼帽拿来，我试试看。”

“老先生，那礼帽旧了，是依吃官司时戴的，不吉利。”

“哎呀，什么吉利不吉利，我历来不信那东西。我戴礼帽进来，再戴它出去，很有纪念意义。我与蒋介石有不共戴天之仇，不能忘记，永远不能忘记。”

潘兰珍被陈独秀这句话说得有点胆怯起来，只好默许，从藤箱里取出那顶“很有纪念意义”的礼帽，递给陈独秀戴上。她扫视一眼，陈独秀穿着长袍、马褂，头戴礼帽，风度翩翩，真像个教授、学者样子，内心又升腾起对他的崇敬之情。她对陈独秀笑着说：

“老先生，阿拉还给依买了件好么子？”

“什么东西？”陈独秀问道：

“依看！”她从手提包里取出一朵丝织品大红花，像孩子似的把玩着。

“你买红花给谁戴？”陈独秀看见红花，明知潘兰珍买花之意，却故意问道。

“给依戴，依今天大喜。”

“好，给我戴上。兰珍你想得真周到。”

潘兰珍将大红花别在陈独秀胸前，陈独秀那清癯的脸庞，在这大喜红花映衬下，显得满面红光，兴致勃勃，一扫那“阶下囚”的愁

容。

中午时分，穿着对襟褂，梳着分头的陈松年，兴冲冲地和前来接迎的本家伯父陈庆云夫妇、堂兄陈子健、傅斯年夫妇、陈钟凡夫妇以及国民党为表示对陈独秀的殷勤、特派前来接他的中统局局长丁默村、同案犯濮德志和罗世凡等，陆续来到陈独秀房间，与陈独秀热情握手，祝贺他出狱获得自由。陈独秀兴高采烈，其乐悠悠，与客人侃侃而谈。潘兰珍、陈松年忙着沏茶、递烟、散发糖果，热情招待客人。此时，室内热情洋溢，笑声朗朗，似乎这里已不是高墙内的囚室，而是自由世界那会客厅堂。

这时，典狱长走了进来，大家站起相迎。典狱长挥手示意让大家坐下。他走到陈独秀面前，通知他说：

“陈先生，奉上级之命，你现在可以出狱了，鄙人表示祝贺！”说着，典狱长与陈独秀握手。顿时，室内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陈独秀连忙向各位鞠躬致谢。

掌声刚落，典狱长将手中的出狱证书递给陈独秀，说：

“陈先生，这是你的出狱证书。凭此证，你现在就可以自由地走出监狱大门。”

陈独秀从典狱长手中接过，看也不看，便递给潘兰珍，他未发一言。虽是无条件出狱，但他对那“深自悔悟”还耿耿于怀，有什么好说的呢？

此时，典狱长又递给陈独秀一个帐册和一些钱物，说：

“陈先生，这是你托鄙人代为登记、保管和你支出的、朋友送你的钱物明细帐目，请你过目、清点。”

陈独秀接过并递给潘兰珍，连连道谢。

“不必客气！”典狱长笑着对陈独秀说，“陈先生，由于公务在身，鄙人不能像手下弟兄们那样，自由地请你陈先生题字纪念。今天，你荣幸出狱，能否给鄙人赏个光，题几个字留作纪念？”

陈独秀不加思索，挽起长袍袖，便从典狱长手中接过纸和笔

墨，欣然挥毫题道：

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典狱长及在场的朋友，见此抒发情怀，对未来新生活充满希望和信心的题词，交口称赞。典狱长赞赏道：

“名不虚传，陈先生书法气势磅礴，飘逸潇洒，刚劲有力，很有气派。难得的好书法。谢谢陈先生。”

此时，傅斯年、陈钟凡等高兴地对陈独秀说：

“仲甫先生，现在我们走吧。”

“好，走，出去！”很显然，陈独秀抑制着内心的激动。

“请稍候一下！”国民党中统局处长丁默村突然说道。

这突如其来的言语，使陈独秀及在场的朋友不禁惊愕，面色陡变，难道又出了什么岔子？老练的陈独秀定了定神，不屑一顾地问道：

“丁先生，什么事？”

“陈先生，鄙人奉上级之命，你出狱后，特接你以及夫人到中央党部招待所去住，那里已为你安排好了下榻处，外面有车子在等候。”丁默村带着奉命行事的口吻说。

“丁先生，那里不是鄙人所能够住的地方。鄙人已接受傅斯年先生夫妇之邀，暂到他府上栖息安身。”

丁默村被陈独秀这一拒绝，弄得十分尴尬，转身就走。

“好，我们走！”傅斯年夫妇喊道。

这时，同案犯濮德志、罗世凡等上前又拉着陈独秀的手，既依依不舍，又哭丧着哀求道：

“总书记，你……你出去，千万要……设法营……救我们。”濮德志流出了眼泪。

陈独秀见状，心也酸起来了。他们同他曾经共过患难，又同是

托派常委，在狱中，又得到他们的照顾，陈独秀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他与他们同时被捕入狱，现在他却一人出狱，心里怎能不心酸与同情呢？于是，他爽快地应允道：

“你这小鬼（指濮德志，与他有亲戚关系），被捕入狱你没流一滴眼泪，我出去，你倒哭起来了，没出息。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嘛，你们放心，我陈某出去不会忘了你们，一定设法营救你们早日出狱。”

濮、罗等人听了又苦笑起来。

此时，梳着一头齐耳短发，脸儿晕红，淡抹口红，眼闪秋波，身着紫色旗袍的潘兰珍，温情脉脉，笑容可掬地挽着老夫陈独秀的左臂；脸色白皙，清秀文静，彬彬有礼的松年挽扶着父亲陈独秀的右手，在众多迎接朋友陪同下，陈独秀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出了这关押他5年的囚室。当陈独秀走出留有他那数不清脚印的独院时，他止住了脚步，回头望了望这独门院，心中似乎泛起无限感慨的波澜……

陈独秀在众人簇拥下从容镇定走到监狱大门口，不少看守，立正站在狱门两边，默默欢送。陈独秀见此情景，不禁脱下礼帽，向看守挥帽致谢。

陈独秀迈着他那走南闯北的双脚，走出高墙、铁门之外，早已迎候在那里的新闻记者，一窝蜂地拥上前来抢着拍照，围着他采访：

“请问陈先生，你今天获得自由，有何感想？”

“陈先生，你获得自由，开始新的生活，有些什么打算？”

“陈先生，你对当前时局有什么看法？”

“陈先生，你对国共两党合作，团结抗日前景，有何评价？”

“……”

陈独秀面对新闻记者从容不迫，气宇轩昂，只是挥着礼帽，一言不发。潘兰珍和陈松年见状，一个劲儿地护着陈独秀。朋友们上



前劝挡新闻记者，陈独秀好不容易挤出新闻记者包围圈，迅速弯腰弓背，钻进迎候的一辆黑色小轿车。失望的新闻记者摇头感叹：

“好一个唯我独尊的老头！”

“难怪蒋先生对他，也奈何不得。”

“哎，这回去怎好向报馆交差？”

“……”

随着汽车一阵喇叭响，黑色小轿车在几辆车陪送下，车轮滚滚，飞也似地驶离这关押陈独秀 1800 多个日日夜夜的高墙、电网、森严壁垒的监狱铁门，载着他，奔向那前途莫测的新生活……

---

## 第七章

### 风流云散无家归 颠沛流离飘江津

---

#### ◎“民惠”轮上的一对逃难夫妻

位于山城重庆上游,约 180 华里的江津,原本是一个不太出名的偏僻小山城。然而 1938 年,由于日本军队进逼武汉,形势险恶,武汉告危,国民政府从武汉迁都重庆后,这个小山城,顿时也热闹起来,避难者蜂拥而至,社会名流也从四面八方逃难荟萃于此。

中国人决不会忘记,1937 年芦沟桥事变后,八·一三淞沪战争一声枪响,日本军速战速决,大举进攻,上海失守;接着跟踪追击,合围南京,兵临城下,国民政府仓皇迁都武汉;继而南京沦陷,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几十万同胞惨死在日本军人的屠刀之下,尸体遍城,血流成河,染红了滔滔长江水。1938 年,疯狂的日军溯江而上,侵犯芜湖、安庆、九江……扼长江之要塞,直逼武汉。日本军所犯之处,烧光、杀光、抢光,一片瓦砾灰烬,陈尸街头,血水横流,触目惊心。“同饮一江水”的长江沿岸人民,陷入了苦难深渊,扶老携幼,背井离乡,纷纷入川逃难。一时间,陪都重庆,机关、学校林

立,大批流离失所的难民,蜂拥而至,把个山城挤得人满为患,物价暴涨,供应奇缺,要想觅得一席栖身之地比上天还难。随之,日机空袭轰炸频繁,尤其是1939年5月初,连续两天大轰炸,炸得山城一片焦土,破烂的屋宇,倾圮的电线杆,荒冢一样的瓦砾场……抗战大后方,也成了屠门,成了新坟,一片凄惨,一片恐怖……于是,机关、学校和难民,不得不纷纷向重庆周围疏散,以躲避日机的空袭轰炸,这样,与重庆毗邻的江津便成了疏散地“小重庆”。

1938年8月3日,自重庆开往江津的“民惠”轮,挤满了到江津逃难的人们。这天,赤日炎炎,天气燥热,热得人们汗流浹背而不可忍耐,纷纷走出舱外,透透闷气,沐浴江面那丝丝清风。这时,一位面容憔悴,颧骨高耸,疲惫不堪,身着白色对襟褂,年近60的老人,在一位个子不高,四方脸膛,胸脯丰满,身着一件褪色旗袍的年轻女性搀扶下,步履蹒跚地走上甲板,默默地凭舷凝视着那滚滚流逝的江水,时而点燃一支烟慢悠悠地吸着,时而抚摸那随丝丝清风吹拂的山羊胡须,脸上掠起几丝惆怅、茫然的表情,显得思绪纷繁。他不时与依偎身旁的年轻女性窃窃私语,脉脉相视。他们满以为,从此可以结束颠沛流离之苦,离开那熙熙攘攘的城市,避开那人世间的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到江津这个僻静的山城,可以避开日机的轰炸,也可以休养生息,恢复昔日那挥豪写作安逸、平静的生活……想到这些,这位老人脸上不禁浮现一丝饱含希望的微笑,抬头向轮船前方眺望,盼望那江津城早点跳入眼帘,早一刻踏上那陌生的异乡之地,开始他那“隐居”的寓公生活……

这位老者正是被蒋介石提前从南京监狱释放的陈独秀,身旁那年轻女性,正是狱中相伴,紧随陈独秀的少妻潘兰珍。那么,出狱而获得自由的陈独秀,为何与少妻不远千里,从长江下游大城市溯江而上,几经飘泊流落而来到江津这个偏僻的山城呢?这就要从他出狱后说起了。

## ◎拒当劳动部长

1937年8月25日，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数学教授、陈独秀同乡好友余光焯先生（陈独秀关押在南京监狱初期，余先生偕同夫人常到监狱探望陈独秀，并特意做些可口小菜给陈独秀调剂生活，帮助他洗涤衣被），突然收到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二人联名的请柬，邀请去赴家宴。余先生对他们兄弟俩的约请感到不解和为难，平时与陈家兄弟素无来往，怎么突然来邀赴家宴呢？余先生思前想后，不知“葫芦里装的什么药”。陈家兄弟都身居高位——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主要成员之一，与蒋介石同出于陈其美门下。靠着这种关系，陈果夫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组织部长，陈立夫担任了蒋介石的英文秘书。二陈又是中统特务组织的创始人，一直党权在握，且根深蒂固，当时流行“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提起陈家兄弟，谁不退让三分。作为靠教书为生的余先生岂好拒绝陈家弟兄的邀请呢？于是，余先生偕同夫人，忐忑不安如约前往。

这天晚上，余光焯夫妇走进陈家公寓富丽堂皇的厅堂一看，正中向外是总理遗像和遗嘱，旁边配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墙壁上画着彩色图案的小方块，围着镀金的、华丽的框子，角上刻着精红的花朵；天花板饰有淡淡图案花纹，装在天花板上的灯球射出明亮柔和的光线；墙壁上还装饰有华丽的壁灯闪光耀目；打蜡地板，发出微红的光亮，十分典雅气派。再仔细瞧，厅堂中间几张红木四方桌，白桌布上金、银、玻璃器皿闪闪发光，桌上摆满各色菜肴，宾客围坐，谈笑风生。他们夫妇俩迈步走近再一瞧，剃了新头，身着一身洁净衣服的陈独秀及他的夫人潘兰珍，竟赫然在座，令他们一惊。陈立夫见余先生夫妇来到，便笑盈盈地迎上前来，说道：

“今天是家兄和鄙人给陈独秀先生洗尘，请余先生夫妇作陪。”

你同陈独秀先生同是安徽人，又是世交，今天，请你陪陈独秀先生多喝几杯。”

噢，是这么回事，余先生夫妇顿解心中疑惑，向陈立夫笑了笑，便入座。

陈独秀见好友余光焯及其夫人入座，忙上前握手，并顺手举起酒杯，十分高兴地说道：

“余先生及尊夫人，谢谢你们夫妇对鄙人在狱中的热情关照。鄙人平生滴酒不进，请允许我敬你们一杯！”

余光焯边摆手，边说：

“且慢！独秀先生，鄙人应先敬你一杯才是，你从狱中出来既是新人，又是喜事，值得庆贺，岂能让你先敬我一杯呢？”

“好了。在座的诸位先生和各位女士，同独秀先生都是难得的好友，还是让我们共同敬独秀先生一杯，为他洗尘。”陈果夫举起杯，以东道主的口气说道。

“好！”诸位宾客异口同声。顿时，宾客举起酒杯，一同与陈独秀碰杯。陈独秀其乐融融，一饮而尽。他放下酒杯，连忙双手抱拳，向诸位一拜，并说：

“谢谢果夫兄弟和诸位对鄙人的盛情款待！鄙人无罪坐牢5年，吃了5年的白饭，这就要多谢蒋先生了。”说得诸位笑了起来。

笑声中，陈果夫从座位上站起来，笑声朗朗地说：

“诸位，我要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在座的不约而同地问道。

“鄙人受蒋先生委托，他十分赞赏独秀先生渊博的学识和爱国精神，想聘请独秀先生任劳动部长，为中华民国效劳。独秀先生，你意如何？”

“果夫先生，请你转告鄙人对蒋介石先生的谢意。不过，他要鄙人当劳动部长是假，为他装点门面，当他的走卒是真。这真是异想天开。”陈独秀说完，不禁幽默地笑了起来。

“独秀先生，鄙人也受蒋先生的委托，要请独秀先生组织一个新共产党，并供给10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5个名额。独秀先生，你意如何？”在座的循声一看，说话的正是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朱家骅。

陈独秀听了，当即拒绝说：

“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关了我5年牢，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要我组什么新共产党，则更是异想天开，我陈某决不干这种事。”停了一下，陈独秀摸摸山羊胡须，换了换语气说：

“请朱先生转告蒋先生，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我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陈独秀一语道破了蒋介石的“天机”，弄得陈果夫兄弟和朱家骅十分尴尬，家宴不欢而散……

余光焯等暗自称赞陈独秀的骨气，不奴颜婢膝。

## ◎不去美国做“寓公”

陈独秀出狱后，他每时每刻都在思索着何去何从？无家可归，寄人篱下，靠人施舍，总不是长久之计。俗话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幸亏他朋友多，名气大，帮他找出路的也多，但由于他的古怪脾气，条条路又被他堵塞，朋友也无计可施。

在他拒当国民政府劳动部长后的一天，曾经得到陈独秀赏识、时任美国大使的胡适，获悉陈独秀提前释放出狱，便隔洋托人传话给陈独秀：

“美国一家图书公司，慕独秀先生之名，邀请独秀先生去美国写自传。一切安排妥当，盼往。”

陈独秀听了传话，顿时把他记忆的长镜头，追溯到创办《新青年》杂志那个时期。

1915年，他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播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战鼓时，胡适正在美国留学。那时，他与胡适并不相识，只是从同乡好友汪孟邹口中得知，他有个小同乡，名叫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跟杜威学哲学。于是，他叫汪孟邹写信给他的小同乡并向他约稿。1915年10月6日，汪孟邹写信并寄《青年杂志》一册给胡适，他在信中写道：

“这个《青年杂志》，是皖人陈独秀先生主编，深受国人欢迎。陈独秀先生向你约稿，尤其望你能在文学革命、白话文体等方面赐稿。”

同年12月13日，他再次叫汪孟邹写信给胡适，重申他约稿之恳切。1916年2月3日，大洋彼岸的胡适写信给陈独秀说：

“今日欲为祖国创造新文学，宜从输入西欧名著入手，使中国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

当时，他对胡适的意见十分赞赏，并写信给胡适，请他在“功课之暇”，为《新青年》翻译像《决斗》那样的短篇名著，“以改良文学之先导”。这样，他和胡适虽然远隔重洋，一个在东半球，一个在西半球，但都在思考中国文学改良的问题，一经“两地书”往来，便不谋而合，成了好朋友。后来胡适常投稿《新青年》，得到陈独秀的赏识。1917年胡适回国后，到北大任教授。这时，陈独秀也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大文科学长。两人第一次见面时，小他12岁的胡适一身西装革履，风华正茂，一表人材，彬彬有礼地向他深深一鞠躬，给他留下良好的印象。他后来邀胡适参加了《新青年》七人编委，每人一期，轮流编辑。再后来，尽管两人在观点上分道扬镳，一个走到复古派梁任公、林琴南一边，帮蒋介石做事；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两人背道而驰，走着不尽相同的道路。但他们的私人感情仍然笃深，陈独秀被捕入狱时，胡适和他的美国老师杜威，都向蒋介石致信呼吁释放他，还来狱中看过他，后又要与他人联名保释陈独秀出狱，被陈拒绝。今天，这位远隔重洋的旧友，仍在

关心着他。从私人感情上说，陈独秀应该感谢他，答应他的邀请，但陈独秀不愿接受去美国写自传的邀请，于是，他婉然谢绝，对传话人表示说：

“鄙人生活很简单，没有什么传奇的东西，不用去美国写自传。我是一个中国人，若是写自传，在中国也能写，同时，鄙人也厌烦见生人。”

传话人力劝陈独秀说：

“胡适大使，对独秀先生一片热心，希望你再好好考虑一下，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请你转告胡适先生，我是决意不去。过去一些大军阀官僚垮台后，都跑到国外当寓公，这是一件十分可耻的事。我陈某是不会干这种事的。”陈独秀直言不讳地说。

其实，陈独秀内心还有一种明智的想法，像他这样的人物，要获得国民政府的允许去美国，那是十分困难而不可能的，何必去干这不“明智”之举？

在场的陈独秀的弟子北大学生陈钟凡，听了陈独秀这番话，感叹万分，不禁赠诗一首：

荒荒人海里，聒目几天民？  
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  
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  
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

陈独秀见了，当即挥毫和诗：

莫气薄大地，憔悴苦斯民，  
豺狼骋郊邑，兼之片尘频。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



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

陈独秀出狱后，偕同其夫人潘兰珍住在南京中央路傅厚岗傅斯年家中。此时，日军大举进犯上海，南京告危，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日机频繁轰炸南京。不久，傅家住宅附近被炸，主人傅斯年不告而别，避难他乡。陈独秀无奈，只得寄居南京阴阳营金陵大学中文系教授、陈独秀弟子北大学生陈钟凡家。各方人士探望慰问者甚多，并赠送礼品钱物。然而，朋友的好心相助，却使得一贯清高廉洁的陈独秀心感不安。他以为朋友送钱送物，虽是好心，却如同针刺他心，把他视为施舍的对象和末路的落难者。因此，他除酌收北大学生和旧友的赠送外，其他概不受礼，即使有的收下，他往往又接济别人。他多次劝说前来看他的朋友：

“古人说：‘人生贵相知，何用金与钱？’朋友来看我陈某，已是不胜感激，切切不可送钱送物，‘无功不受禄’，受之有愧也，友情已高于一切。”

### ◎“上海虽好不能去”

1937年9月，南京战局日趋恶化，国民政府告危，迁都武汉，日机狂轰滥炸，石头城惊恐，人心惶惶，扶老携幼，纷纷逃难他乡。此时，寄人篱下的陈独秀心急如焚，一听到日本飞机的吼叫声，他血压剧升，心跳猛烈，张着嘴大口喘气，不断呻吟难受。夫人潘兰珍见此，除了安慰和流泪，束手无策。同时，陈钟凡一家也在收拾行装，急于避难他乡。就在此时，一天，突然有一位上海来客拜访陈独秀，并转给他一封上海托派的信：

“总书记，你德高望重，上海的朋友殷切地希望你回上海，重振党的组织（即托派），已筹集了资金，在法租界为你租好寓所，隐居下来，比在南京安全。总书记，我已给你和夫人买好了火车票，火车

到上海有车接你。总书记，你意如何？”

陈夫人潘兰珍给来客沏茶，听说去上海，心中倒有几分高兴，上海离老家南通不远，又可把养女小凤仙接到上海，免得她心中惦念，她多想劝说老先生去上海。可是她一切都得听从老先生的，岂好开口劝说。这些年来，她已熟知老先生的古怪脾气，一旦触怒他，发脾气来，可真叫人受不了，好在她已经习惯这些了。出狱后的一天，凉风骤起，气温下降，她好心拿来衣服，对正在看报纸的陈独秀说：

“老先生，天凉了，依把衣服穿上。”

陈独秀不仅不领她的情，反而大声斥骂道：

“你没看见，我正在看报纸，我哪是三岁伢子，冷了我不晓得穿。”

骂着，从潘兰珍手中抢过衣服，一甩老远，还瞪着一双目光逼人的眼睛，吓得潘兰珍低头站立，不敢吭一声。陈钟凡夫人在后院听见陈独秀的斥骂声，以为他们老夫少妻吵架了，立即跑来欲劝架。见此状，女主人又回转后院，因女主人对陈独秀的脾气也有所闻。若是他在发火时，任何人劝说都是无济于事的。待他气消时，他会很快“转阴为晴”。

潘兰珍在一旁听着客人与老先生说话，满以为陈独秀会同意去上海。从平日言谈中，她知道他对上海有着特殊的感情，对上海的生活依然留恋，现在朋友请他回上海，岂不是为他所愿吗？可是，潘兰珍万万没想到，老先生不仅拒绝去上海，而且还声色俱厉对客人说：

“你们放明白些，我陈某不是三岁小伢子，现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联合抗日，乃是头等大事。你们还要‘拉虎皮作大旗’，搞这种宗派是没有出路的，我决不去上海，日后你们不要再来找我！”说完，他大声喊道：

“兰珍，送客！”

这位上海来客，被陈独秀这厉声拒绝，弄得狼狈不堪，扫兴而走。

来客走后，陈独秀愁眉紧锁，心力交瘁，在房间里踱步不停，苦苦思索，南京局势日趋恶化，纠缠者太多，特务暗中盯梢，随时可能生出是非，此地不宜久留。家乡安庆也不能回，只有溯江而上，去武汉避难，离上海、离南京越远越好。于是，他又带着商量的口气对夫人潘兰珍说：

“兰珍，我知道你想去上海。上海虽好，但不能去，那里不仅有日本人，还有人来纠缠。南京太危险，我们到武汉去避一避再说，好不好？”

“老先生，阿拉听依的。去武汉也好，那里离南京远，安全些。”

9月9日，陈独秀偕同夫人潘兰珍，在朋友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购得船票，乘轮船离开南京前往武汉避难。

### ◎路过家门不得归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轮船逆汹涌江水而上，如同爬行，那蒸汽机吃力的喘息声震耳欲聋。陈独秀在客舱里，感到心烦意乱，坐卧不宁。夫人潘兰珍紧紧依偎着他，安慰着他，给他温馨，倒水给他按时吃药，不让他乱走一步。可是，潘兰珍哪里知道，此时的陈独秀，心胸郁闷，思绪繁杂，矛盾重重。上水轮船，次日就要经过他阔别多年的故乡安庆。那里是生他养他的地方，又是他开始革命生涯的摇篮；那里还有他双目失明的养母和三子松年及其一家。他多么想轮船路过安庆时，能踏上故土，回去看看那阔别多年的家，看看那双目失明的养母，看看小儿松年及其一家，哪怕是一分钟，哪怕是看上一眼，也可了却他那思念故土之情。然而，现在路过家门而不能归。国难当头，民族危亡，安庆也在告急，安徽省府也已搬迁至六安，家乡父老也在纷纷外出逃难，小儿松年来信也告知，准备逃难

他乡。不过，更令他烦恼的是，身边还有陪伴他度过那5年寂寞监狱生活，感情笃深的少妻潘兰珍，且年龄悬殊之大，三子松年还比她长几岁。这老夫少妻又怎好跨进家门？亲朋挚友又将怎样看他？这些苦衷，又怎好对少妻潘兰珍讲呢？想到此，他又害怕轮船经过安庆，恨不得插上翅膀，一下飞到武汉，好解脱这难以言状之苦。此时，他真是百感交集，愁肠百结。想当年，风华正茂，雄心勃勃，从反袁“二次革命”开始，为寻求和宣传真理，他远离家门，大江南北，四处奔波，五渡东瀛，历经艰险；五次被捕入狱，险丢脑袋，铁窗生活尝尽，谁不知他的赫赫大名。昔日的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创建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而今天，却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半生所做的事迹，似乎大半失败了”，连个归宿之地也没有，英雄末路，一片茫然。更令他寒碜的是，为了革命，四处亡命，对于家庭无所顾及，也未曾享受过家庭天伦之乐。他的结发妻高氏和他曾一度相亲相爱的第二位妻子高君曼，皆因他冷落，相继离开人世间。他的长子延年、次子乔年，又惨遭蒋介石杀害，连尸骨都不让收殓。他的长女筱秀，为延年奔丧，而暴死于上海医院。为此，他曾悲痛万分，多日不语。一个封建大家庭，也因养父去世以及他祸及家门而破产冷落，人去财空，又如当年的“陈家剖屋”……想到这些，他忧郁悲伤，痛彻肺腑，感慨不已，一时间备觉凄凉、茫然。这时，他只得躺在铺上，紧闭双眼，辗转反侧，似乎连看一看那故土，瞧一瞧那神奇占塔，跨一跨那阔别多年家门的勇气都没了。正是心绪繁乱，“理还乱，剪不断”。

然而，他毕竟是闯荡沙场的“老斗士”，还是从苦痛中解脱出来，从繁乱中镇静过来。人说“故土难离”。今日路过家乡，虽不能归得家门，哪怕瞧一瞧神奇的宝塔也好。于是，他理了理思绪，关照少妻潘兰珍：

“兰珍，轮船明天就要路过、停靠安庆，我已20多年没回安庆了。事先没想到，打个电报给松年，在码头与他见一见，顺便问问家中的情况。现在迟了。”

“老先生，当时阿拉想同侬讲的，又不好讲。”

“你当时提醒一下就好了，还有什么不好讲的。”停了会，陈独秀又吩咐道：

“兰珍，你明天留心一点，看见江边有一个宝塔，那就是安庆。你叫我一声，出去看看宝塔。那个宝塔，很有趣，有许多门，进去找不到门，转来转去，才能找到。我年轻时，常去登宝塔，现在老了，怕登不上去了……”

“好的，明朝阿拉一看见宝塔就叫侬老先生，侬现在安心地睡觉吧。”

次日下午，一声汽笛长鸣，安庆到了。潘兰珍透过船舱玻璃看到了那神奇的宝塔，忙叫正在午睡的陈独秀：

“老先生，阿拉看见宝塔了，安庆到了！侬快快起来。”

陈独秀听说安庆到了，一骨碌从床铺上爬起，潘兰珍忙帮他穿上长袍，戴好礼帽，扶他走出舱门，登上甲板，凭栏而望，那巍然挺立的宝塔顿时映入眼帘。他默默地眺望，没有开口，只一个劲儿地看那宝塔。古塔依旧，江水滔滔，而他的心际，与他当年离故土时，却迥然两样，往事一幕幕，从他眼前闪过……

那是1913年，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他被通缉，幸亏有友人事先告知，他装扮成商人，连夜乘坐民船，携高君曼及幼小的儿女，潜离安庆，逃往芜湖。那民船在汹涌澎湃的江水中，颠簸着顺流而下，一阵浪来，船高数尺而又落下，妻子儿女吓得哇哇哭叫。他心惊肉跳，心想没被袁世凯抓住，若是小船沉没，那一家四口岂不葬身于这江水之中？他忙向船老大塞去几块大洋，希望船老大把稳舵，小心驾驶，而船老大婉然谢绝，出乎他意料之外地说道：

“陈先生，我若是爱钱，你一上船，就向官府报告，何止得你这几个大洋？陈先生，你放心，在我船上，包你平安到达芜湖。”

陈独秀听了惊恐失色，心想船老大已认出了他，太危险；而又惊魂一定，世上还是好人多，幸亏遇上这个不爱钱的船老大。谁知，

到达芜湖后,又被叛军捉去,出了布告,要杀他的头。算他命大,幸得友人保释,才死里逃生。

陈独秀苦苦思索中,船已靠上安庆码头。码头依然破旧,搭着条摇摇晃晃的木跳板,岸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群,一片慌乱。然而,这毕竟是他的故乡,他多么想登上码头,踏一踏那片故土,看一看那狭窄的石板条街,尝一尝家乡的小吃,可是往事不堪回首……

陈独秀长长吁叹了一声,触物伤怀,惨目心酸,他不忍心再看再想,催促少妻潘兰珍扶他进入舱内,依然躺在铺上……

### ① 黄鹤楼下愁肠断

上水轮船,越往上行,江水越是惊涛骇浪,狂澜乱涌,轮船只能缓缓而行,有时还得躲避日机的空袭轰炸扫射。身在船上的陈独秀夫妇及逃难的人们,冒着生命危险只盼轮船快行,早点到达武汉。经过3天多的航行,轮船总算平安地抵达了武汉。

地处南北交通咽喉的武汉,也是陈独秀的故地,武汉在他脑际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在夫人潘兰珍的搀扶下,步履蹒跚地登上武汉码头,回民街那座临街的三层楼洋房,就闪现在他眼前,乳白色的墙壁,红色的屋顶,半圆的大门,西洋的风格,别具特色。这是中共在武汉的临时中央局机关所在地。他清楚地记得,1926年底,北伐战争胜利,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他曾在武汉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决定在武汉成立临时中央局。1927年4月初,他离开上海再次来到武汉,主持中央工作,他作为总书记而住进了这座洋房三楼中间的一套很讲究的房间,他的左邻为彭述之夫妇,右舍为蔡和森夫妇。那时,他也够有气派的,有专门的办公室,任弼时的弟弟任作民,为他的办公室主任,任弼时妹妹任秀兰,为他的事务管理,还有他的秘书黄玠然,从生活到工作都有人给他安排妥当。出门有汽车,秘书作陪同,又兼作警卫。那时,他48岁,年富力

强，身体壮实，精力充沛，经常身着一身毛料西服，系着蓝底白碎花领带。圆圆的脸光滑而红润，腮帮子刮得泛着青光。鼻子上架着一副黄褐色的眼镜，手里总夹着雪茄烟，不时地轻轻吸一口，又轻轻吐出来，派头十足。黄褐色的眼珠，目光灼人，双眉紧蹙，面容严肃，少有笑容。他犹如“白胡爹爹”，特别好洁，他室内的文件、材料和办公桌上的用具，整理得有条不紊，不准人乱动，一动他就知道，就追问谁来过，谁动过。他还记得，有一次，他从外面开会回来，发现案头的一支毛笔被动过，不问清红皂白，怒容满面地责问秘书：

“小黄，我的笔谁动过？我不是再三说，我的东西不准动吗！你给我问问，谁动的。”

秘书黄玠然见他发火，吓得胆颤心惊，但又不得不答道：

“总书记，请息怒，这支笔我用了一下。当时机关送文件来，我顺手用这支笔签了个名，我又原封不动地放回原处。总书记，你记性真好，下次不动你的东西。”

他还记得，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挺严厉，说话，尤其训斥确有些家长式的味道，开口闭口，不是“小”字，就是“你这个伢子”。中央机关数他年纪大，大多为青年人，就连周恩来，也是他儿子陈延年、陈乔年的同辈人，这就难免他唯我独尊了，得罪了不少人。其实，他这个人还是挺重感情的，秘书黄玠然生病，他掏钱给他去医院看病。谁家中一时有了困难，他也会掏钱资助。与他日子处久了，关系还是亲密的。身边的工作人员深有感触地说：

“总书记俨然像个孔夫子，其实是菩萨心肠，对青年人严格也是爱嘛。”

他还记得，他在武汉时，还得罪了不少同乡和朋友。他们投奔他找事做，他忙于党的工作，又不愿接见这些人，他就给好友潘赞化一笔钱，苦着脸说：

“这些人真要命，你越忙他们越是给你添麻烦。赞化你替我挡一挡，买船票劝他们回去，叫他们以后不要再来。”

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他在武汉又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没有忘记，在五大召开的日日夜夜里，他心情沉重，十分苦恼，夜不能寐，在房间里转来转去，常常到深夜凌晨，心情不安，愁眉苦脸，实是难熬。会议期间，尽管他受到与会代表的批评，他还是被选为总书记。然而，时隔不久，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于7月15日，悍然叛变举行“分共”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分裂，像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样，大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汪精卫咬牙切齿地叫嚣：“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顷刻之间，武汉充满了白色恐怖，大街小巷弥漫着血雨腥风，到处贴满布告，四处刀光血影，罪恶枪声此起彼伏，仅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就有100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杀害。陈独秀作为头号要犯被通缉，悬赏1500元捉拿他，瞿秋白、张太雷、毛泽东、周恩来等也在通缉之列，脑袋标价为1000元。在这白色恐怖下，陈独秀不得不化装成苦力模样，同秘书黄玠然隐藏在武昌一个偏僻的工人住宅区内，后又转移至地下党开办的一个纸行里。此时两人默默相对，一个人在深沉思索，另一个想问又不便开口。陈独秀心情沉重，愁肠百结，如同生了一场大病。身在武汉“火炉”内，却闷在房子里，不能到外面纳凉，如同在蒸笼里，热得实在难熬，他几次准备偷偷溜到江边去，跳到江里洗个痛快，往往刚欲出门，就被秘书拽住，劝道：

“总书记，外面实在太乱太危险，万万不能出去！你还是老老实实地遵守纪律，在屋里熬着。”

“什么纪律不纪律，你这小黄伢子，少跟我来这一套！”陈独秀火了，说道：

“你这伢子，存心要把我这老头热死在里面；到外面是死，在里面也是死，我宁愿死在外面来个痛快，也不愿在里面活活闷死。”

“总书记，你必须听从我的，不能出去，求求你了，不然我给你下跪……”



他见黄秘书要下跪，忙上前挡住，说：

“万万不可这样！你这伢子，我是吓唬吓唬你的，闷得虽是难受，但总比死要好。好，好，我听你的，也不能叫你为难！”

武汉“火炉”名副其实，烈焰烤人，身热如焚，大汗涔涔，确实热得他难受。然而，党的“八·七”会议没让他参加，还撤了他的总书记职务，这比火炉更热，更令他难受、难熬了，他从此便一蹶不振。

“八·七”会议后的一天，当瞿秋白、李维汉来到他隐居的那条深巷里，告诉他“八·七”会议情况时，只见门口一张竹床上，赤膊躺着一个面孔朝里的人，肩上搭着一条粗布大围布，手里拿把芭蕉扇，不停地摇着，活像一个拉大车的车夫。秘书黄玠然见瞿秋白、李维汉到来，忙对陈独秀说：

“总书记，秋白、维汉来看你了。”

“你们来了。”他脸向外一转说。

这时，瞿秋白、李维汉才认出躺在竹床上的这个“苦力”，是他们昔日的总书记，心里不禁一阵心酸。在告知陈独秀有关“八·七”会议情况后，并劝他接受共产国际的要求，到莫斯科去。他还记得，当时他语气坚决，坚持不去，并出乎瞿秋白、李维汉意料之外地说：

“我的错误共产国际有责任。”

事后，秘书黄玠然问他：

“总书记，你为何不到苏联去学习？”

他带着教训的口气回答说：

“你懂什么？莫斯科让我去学什么？学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懂得还是外国人懂得？你以为中国问题还要请教外国人，难道外国问题也要请教中国人，中国人能懂吗？”

无可奈何花落去，面对风流云散的悲凉处境，他心灰意懒，忧心忡忡，愁肠寸断。何必还住在武汉呢？若是有人来访或碰上熟人，人家还称呼总书记，岂不是很别扭，弄得大家心里都不自在。早日

离开武汉，大家也就都清静了，更不会自找烦恼了。于是，9月中旬，他在秘书黄玠然、中央出版局局长汪原放等人伴送下，装扮成病人，头戴风帽，胡子拉碴，乘英国“松和”号回上海。一上船，陈独秀心头一颤，他见船上贴着一张布告：

国民政府如果在船上捉人，本船概不负责。

他们包了一个官舱，陈独秀睡在上铺，铁板着脸，紧闭着嘴，很少开口，连吃饭都在舱里。船到码头时，他们紧闭门窗，装着睡觉。陈独秀清楚记得，船至九江时，正值中秋佳节，一轮明月高挂，半夜时分，甲板上行人稀少，他才悄悄登上甲板，无精打采地凭栏赏了会江月，嘴里喃喃自语：

“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

光阴似箭，岁月流逝，一晃10多年时光过去了，陈独秀更没想到，今天他又踏上武汉这块故地，又来到黄鹤楼下，驻足回头眺望那蛇山黄矶头上的黄鹤楼，思绪万千，百感交集。那时，他是作为党的总书记而来到这里，又因权柄旁落，成了通缉犯而秘密离开这里。如今，他又作为一个难民而来这里避难，彼时与此时，虽然不一样，昔日总书记那风采早已荡然无存，但同样是一个落难者，心地一样的凄凉，茫然惆怅。想到这里，他不禁暗自吟诵唐代诗人崔颢题《黄鹤楼》那传诵千古的诗句：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这诗正暗合陈独秀此时的心境。他吟完诗后，又顿生一阵悲戚。当年，他来武汉时，瞿秋白、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邓中夏和他儿子陈乔年等，都到码头用专车迎接他，晚上又设宴为他接风洗尘。可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有的已被反动派杀害，他的两个儿子也成了蒋介石的刀下鬼……此地，正是“空余黄鹤楼”，“白云千载空悠悠”了。想到此，陈独秀不禁悲从中来，老泪纵横，感慨万分。

这次，他重来故地，再也没人来接他，更没有车了，他步履维艰，一步一步地走出码头，挤出逃难的人群，好不容易在附近找了个旅社暂居下来。住下后，他便联想到当年秘密隐蔽远离市区的武昌，倒是隐居之地，于是他便托人在武昌租居寓所。9月14日，陈独秀在给汪孟邹的信中说：

“弟已抵汉，暂寓旅社，日内即移居武昌。”

不日，他就移居武昌城内双柏庙街一座旧式平房宅院里。16日，他又写信给汪孟邹说：

“弟子日前由南京来汉口，兹已租定寓所，来信望寄武昌城里双柏庙后街二十六号陈仲甫收可也。”

## ◎ 总算有了个避难家

武昌双柏庙街这座旧式平房宅院，原是一个桂系军人的住所，古色古香，颇有几分庭院风味。经过多年雨淋日晒，院门已陈旧，砖石院墙却还结实，院子里青砖铺地，有房间，有客厅，有厨房，室内家具，一应俱全。庭院当中砌着个大花坛，上面陈放着十几盆盛开的菊花，花坛旁植有高一丈余的红海棠树。庭院四周绿树成荫，随着习习秋风吹拂，树上黄叶沙沙作响，整个庭院显得幽静、清雅。几经飘泊辗转的陈独秀及其夫人潘兰珍，住在这个庭院里感到舒适满意，总算有了个自己的家，不再寄人篱下，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也可以安下心来研究文字学了。他对少妻潘兰珍说：

“兰珍，在大敌当前，民族危难之时，避难武汉，能住上这样的房子，确实不易，总算有了个安身之地。”

“老先生，阿拉蛮喜欢这个地方的，能常住下去就好了。”

这对老夫少妻住在里面，倒有他们的天伦之乐。潘兰珍手脚勤快，很会过日子，每天清早起来，就清扫庭院，给陈独秀烧好洗脸水，放好脸盆、毛巾，牙刷抹上牙粉，因陈独秀多年习惯于夜间挥毫弄墨，早上起得迟。然后，她提篮出门上街买菜，给老先生打碗豆浆，买上几根油条或馍馍，这是陈独秀最爱吃的早餐，有助于他消化。待她买好菜回来，正好陈独秀漱洗完毕，喝上豆浆，吃着油条，嘴里感到美滋滋的。潘兰珍如同千万个上海市民一样，习惯吃泡饭，弄点小菜搭搭就可以了。有时陈独秀见了心觉难过，就塞点油条或馍馍给夫人，夫人执意不要时，他就学着上海话说：

“阿珍，阿拉今朝胃里向不舒适，吃不下去，侬吃好了。”往往说得这对老夫少妻脉脉而笑。

吃罢早饭，陈独秀习惯躺在椅子上，看潘兰珍买菜时给他买的报纸。她嘱咐兰珍：

“菜可以少买，饭也可以不吃，但报纸不能不买。”

于是，买报纸便成了潘兰珍每天早晨必须做的事。为了给老先生买报纸，她不得不省吃俭用，因陈独秀无正常的经济来源，除了少量的稿费，主要靠旧友和北大同学会的接济。不省吃俭用，哪来钱买报纸？

午饭之后，陈独秀必睡午觉，而且不让夫人与他同睡在一起，他好静静地美美睡上一觉。然而，晚间他却要和夫人亲昵一番，往往躺在床上，要夫人给他捶背，捶腿，说些笑话，或讲些故事，或者要她背诵教她学的诗词或文章。夫人潘兰珍对他百依百顺，殷切地照顾，从无逆耳之言。而陈独秀也像长辈似的爱抚着她，尽管他的脾气古怪，但很少对她施以“大丈夫”之威，遇一些有关两个人命运的事，他总是听取夫人的意见。然而，他对教她读书识字，却十分认

真、严厉，毫不留情面。一天晚上，他叫夫人默写和背诵唐代诗人崔颢题《黄鹤楼》一诗时，潘兰珍一笔一画地把全诗默写出来，陈独秀逐字逐句地检查，发现“此地空余黄鹤楼”一句中的“此”字，被写成了“北”字，顿时严肃起来，板着脸说：

“读书写字要精力集中，不可分神，写好以后要检查一下，有没有写错。你这默写检查了没有？”

“阿拉检查过了，没啥子错。”

“你再检查看看，有没有错？”

于是潘兰珍边读边检查，还是没看出错，这下陈独秀可火了，手指“笃笃”地敲着那个“北”字，声色俱厉地说：

“这里明明是个‘此’字，你倒写成个‘北’字，这成了什么意思？你背的和写的，怎么言行不一！罚你从头到尾，再抄三遍！”

夫人仔细一看，真写错了，没吭一声，乖乖地伏案，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三遍。陈独秀看后，板着的脸上又露出了笑容，学着上海腔说：

“阿珍，侬写得蛮好嘛，可以拿去卖钞票。”

见陈独秀笑了，潘兰珍心中的石头才落了地，定了定神说：

“老先生，刚才是阿拉写错了，老先生骂得对，下次要注意。‘严师出高徒’，日后阿拉再写错，侬打阿拉的手掌心好了。”

“兰珍，我哪舍得打你，不过学习还是要严格些好。我那死去的‘白胡爹爹’，比我厉害得多，我小时候背书，不知被他打过多少回。”陈独秀幽默而诙谐地说。

陈独秀是悄悄来武汉避难的，知者甚少，本想过“隐居”生活，不再出头露面。但由于“爱国情殷”，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不愿袖手旁观，甘当亡国奴，于是总是寻找机会顽强地表现自己。到武汉稍作休息后，他不是写文章，就是四处讲演，一时间，在武汉各界中引起不小的反响，加之他本来就是有名的风云人物。这样，“树大招风”，吸引了许多新闻记者和社会名流，纷纷前来求见和采访。然

而，他又生古怪脾气，以身体不适，不愿见陌生人为名，闭门谢客，拒绝会见。尤其是新闻记者，总想从他那儿抠点新闻，但均是扫兴而走。他再三叮嘱夫人潘兰珍，严守大门，不问清来者姓名和身份，未经他同意，不得让任何人进来。对此，潘兰珍不敢怠慢，尽心尽职，对来者均是细加“盘问”。她说的南通——上海话，怕别人听不懂，她裁了好些小纸条，来者无名片，她就从门缝塞出一张小纸条，让来者写上姓名和身份，然后再去通报，陈独秀说让进，她就放行；说不让进，任何人别想进门。

陈独秀闭门谢客，“不愿见陌生人”，只不过是个借口而已。这时，他虽然获得自由，其实国民党特务仍盯梢跟踪，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在赴武汉的轮船上，就有不三不四的人闯进他的船舱。他刚在武昌住下，就发现有人在宅院外转来转去，有时还故意敲敲门。有一次，他外出演讲归来途中，有两个戴着礼帽和墨镜的陌生人，一直跟踪到宅院前，喊了声：“陈先生！”就扬长而去。

他对此耿耿于怀，但不得不倍加小心，免生是非。平日，他除出外演讲外，总是在庭院内与夫人寻天伦之乐，或散步，或谈笑，或修剪和浇灌花草。他对花鸟虫鱼颇有兴趣，朋友送他几尾龙眼金鱼，陈独秀视作珍宝，每天饭后，他和夫人观赏一番，侃起金鱼来眉飞色舞，趣味盎然。夜间，他大都伏案写文章，一旦写起文章来，就不让夫人打扰他，夫人连走路都得踮起脚跟，小心翼翼生怕弄出声响来。家务做完后，夫人就坐在他身旁打毛衣或做针线活相伴，不时给他磨墨或沏上茶水，她从不催他停笔休息，他知道老先生一篇文章写不好，你怎么催，他也不会上床睡觉。到时只要把夜点心弄好，往写字台上一放，就只管独自先去睡觉好了。夫人睡觉时，若是掀掉了被子，他就会放下笔，给她盖好，甚至摇头笑笑，或自言自语地说：

“真像个伢子！”

## ◎离党走末路

一天，一辆人力黄包车，悠然地停在陈独秀寓所门前。从车上走下一位身着长袍，精神焕发，神采奕奕，雄姿勃发的老人，看了看门牌号码，走向门前，便“咚咚”敲门。

女主人潘兰珍闻声赶来，警惕地透过门缝，边望边问：

“啥人敲门？”

“是我。”

“侬找啥人？”

“我来拜访独秀先生。”

“侬姓啥？”

“我姓董，请你向独秀先生通报一下。”

“请侬等一下，阿拉问问老先生，见不见？”

潘兰珍转身穿过庭院，走进客厅，轻声曼语对正在伏案挥毫的陈独秀说：“老先生，外头有一位姓董的先生，说是要拜访侬。”

“来人姓什么？”陈独秀听了，既惊讶又半信半疑地问。

“这位先生，他说姓董。”

“年纪有多大？”

“看样子也是一位老先生。”

陈独秀放下笔，推开稿纸，从椅旁立了起来，眉头紧锁，不禁自问：

“这位董先生，难道是必武先生，那真是太好了。”

他用手理了理那斑白稀疏的头发，扣好衣扣，便急切地对夫人潘兰珍说：

“兰珍，快快请这位董先生进来。”说着，陈独秀也紧随潘兰珍之后，迈步走出客厅迎接客人。

潘兰珍打开两扇陈旧的大门，恭敬而彬彬有礼地立在一旁，

说：

“董老先生，请进！”

这位董老先生迈着稳健有力的步伐，走进院内。陈独秀一见，果真是当年同他在上海开天辟地，一道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董必武同志。于是，快步向前，忙伸出手，喜出望外地说道：

“是你啊，必武先生！你好，久违了！”

两人久别重逢，革命友情笃深，两只有力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独秀先生，你受苦啦！祝贺你获得自由！”

“鄙人无罪，坐了5年冤枉牢。自由物本就属于鄙人，‘物还原主’。”陈独秀笑了笑，幽默而诙谐地说。

“独秀先生，你出狱时，适逢鄙人在延安，未能去接你，请你见谅！”

“哪里，哪里，你我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何必这样客气。”

“鄙人听剑英、博古说，你在南京时曾去找过他们。”

“鄙人曾两次拜见他们，只不过表示一下，鄙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态度。”

“这很好，你不愧是位‘老斗士’。今天鄙人受中共中央之托，专程来拜访独秀先生。”

“谢谢。”

“独秀先生，你今后对新生活有何打算？”

“鄙人一生事业，大半失败，还能有何新的打算。鉴于目前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我乃积极宣传抗日，并想继续从事文字学研究，治老病罢了。”陈独秀不假思索地说。

“独秀先生，你爱国情殷，主张抗日的精神，国人皆知，令鄙人敬佩。”

“必武先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乃是中华民族一员，不爱国，岂能有资格做一个中国人。”



“独秀先生，你说得对。四万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都应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这乃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目前，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鉴于此，以鄙人所见，你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也不要忘记当年，我们共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胸怀大志。”董老呷了口茶，又说道：

“林伯渠同志说，你在文化运动史上有不可磨灭之功绩，在党的历史上，亦有比他人不同的地位，倘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社会都是极需要的。”

“那已成了过去的历史，何必再提。”

“历史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温故而知新’也。你我都是开诚相见的老朋友，有话也就直说了。依鄙人所见，你写个书面检讨，回党工作吧，党中央是欢迎你的。独秀先生，你意如何？”

“必武先生，回党工作固我所愿。”

“那很好。”

“不过……”陈独秀犹豫起来。

“不过什么？独秀先生，有话直说。”

“不过，惟书面检讨，碍难遵命。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陈独秀直言不讳。

“独秀先生，你还是那个老脾气。你拒绝当国民政府的劳动部长和组织‘新的共产党’，难道你还拒绝回党工作吗？”董老反问道。

“必武先生，当年我们共同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如同刚来到人世间的婴儿，现在已成长为成熟的党，回党工作是鄙人的良好愿望。我出狱后，就盼望能与你必武先生面谈此愿，但万没想到，要我陈某写书面检讨，再回党工作，那我也只好不能如你所愿了……”

“独秀先生，你一贯襟怀坦白，令鄙人赞赏。党中央并无强行之意；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也希望你能以革命家气魄，站在大时代的前面，以抗日大局为重，放弃某些个人成见，不要错过回党工作的机会。一个革命者，离开了党的组织，就如同在茫茫的大海中航行，

失去了方向。希望你再好好地想想，主意拿定了，随时可与鄙人联系。请独秀先生多保重，告辞了！”

董老与陈独秀握手告别，走出庭院。陈独秀凝视着远去的董老背影，默默地站着……

董老访问陈独秀不久，包惠僧来拜望陈独秀，在谈到党中央要他写“悔过书”一事时，陈独秀还耿耿于怀，说：

“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无过还在未定之天，不写，有什么好写的。”

就这样，陈独秀谢绝了回党工作的最后机会，从此，走向了茫然惆怅，穷愁潦倒的末路……

## ◎茫然惆怅蜀道行

何去何从？归宿何在？陈独秀拒绝回党工作之后，一片茫然，心如火燎，苦苦思索，思绪紊乱，茶饭不香，甚至彻夜难眠，辗转反侧，一片茫然惆怅。

夫人潘兰珍见状，焦急不安，曾多次悄声细语问他：

“老先生，你已是一个自由的人，还有啥么子不开心，现在住的地方不是蛮好的吗？”

“哎……”陈独秀总是叹气不语。

有时夫人问得他心烦意乱时，他甚至斥责道：

“你个妇道人家，晓得什么，社会之复杂，各方均不容我，别管闲事！”

不甘寂寞的陈独秀，出狱后仍壮心不已，原想再干一番事业，然而，事与愿违，命运之神好像专门同他作对似的，一条又一条出路，都被他那倔犟的脾气给堵塞了。他从南京到武汉后，北大学生、国民政府教育次长段锡朋、陈钟凡向武汉大学校长王抚五（即王星拱）推荐他去教书，而王抚五又是他的好友，当即应允欢迎他去武

大任教，他拒绝了，并说：

“抚五与我至好，武大不便聘我教书，我所学亦无以教人。”

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建议他去美国。他也拒绝了，他说：

“鄙人决不去美国。一是身体不好，二是像我这样的人物，国民党正式批准让其出国赴美，成功机会绝对没有的。”

托派王文元等人还劝他去香港，以便摆脱国民党对他的严密监视，他也不愿意。他说：

“我们拥护与参加抗战，就无论如何得留在抗战地区，利用人家不得不给我们的合法身份来公开批评；一去香港便自动放弃了这个身份。”

一条又一条出路被他堵塞之后，他不禁万分感叹，问苍茫大地，出路何在？一筹莫展……

时局发展到1938年下半年，日军日益逼近武汉，形势十分恶化，日机轮番轰炸武汉三镇，一片惨象。我国著名女记者子罔，在报道武昌被炸之惨象时，是这样描写的：

昨天，武汉的晴空碧蓝如海，阳光下，三镇人民在流汗，在劳碌，在进行一切的工作。

“呜呜呜——”

警报！时钟指着十二点一刻，天空明亮得如同点着万千盏汽灯，愤怒地准备监视人间强盗的屠杀……

不到二十分钟的巨响，强盗们笑了吧，他们在武昌投下了三十四颗炸弹，他们毁灭了四百以上人的生命，他们炸塌了无数民房、医院和美国教会学校……

……

胭脂山的民房被炸毁一大片，已经挖出的死尸搬到山对面的人行道上，残缺的肢体垃圾似的陈列着，在三四点钟以前，他们是活泼乱跳的小商苦力和辛勤的妇孺。现在，他们身边是担架，是救

护队，是薄皮棺材，是啜泣的亲属骨肉，是淌泪的和死者并不相识的女人们。

……

公共体育场，东厂口……也都遭了敌人的毒手，他们不吝惜从日本老百姓身上剥削制成的炸弹，来毁灭中国人民的性命……

陈独秀正好住在武昌被炸区附近，险遭轰炸，吓得他和夫人潘兰珍，像在南京监狱一样，老夫少妻紧抱着躲在客厅方桌之下。空袭之后，他目睹日机屠杀中国人民之惨象，怒火中烧。日本飞机炸弹炸掉了他们这对老夫少妻庭院的平静生活。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迫于形势，从武汉又迁都重庆，随之大批难民又蜂拥重庆。此时，陈独秀的故乡安庆，亦已沦陷，他的养母谢氏及其三子陈松年一家，已先行入川避难。武汉告危，战火烧眉头，他不得不改变何之瑜陪徐特立到武汉调解所谓“日特汉奸”事件时，邀他去长沙岳麓山下专心著文字学的主意。他在致贺松生（即何之瑜）的信中说：

“湖南非乐土，城市将难免为战区，乡间亦不无土匪侵害，故决计入川也。”

陈独秀四海为家，纵浪人间，多年的政治生涯从工作以至衣食住行，大都是由党的组织给予安排和照顾，走南闯北，所到之处，均无须他为衣食住行操劳，有吃有住有车坐，还有秘书为他服务。然而，他离开了党的组织，就如同断了脊梁骨。1927年他潜回上海后，秘书黄玠然离开他到郑超麟部下工作去了，中央再没给他派秘书。身边少了秘书这根拐杖，他的生活一下子乱了套，没人张罗吃饭，他就饥一顿饱一顿；没人催他换衣，他就不换，衣服穿得既脏又臭，也不知道脱下洗洗。不到一个月，他就把自己糟践得胡子拉碴，蓬头垢面，当年西服革履的绅士风度荡然无存。现在，一切事无巨细都得自己过问料理，甚至许多事都得靠朋友帮助解决，离开了朋友，寸步难行。他的夫人潘兰珍缺乏主见，一切都听从他的，对于她来说，精心照料陈独秀乃是她的天职，她对陈独秀可说是无限忠

诚，作出爱的默默奉献，无一点怨言，乃是心甘情愿。陈独秀，几经人间沧桑之后，对“决计入川”思前想后，慎之又慎，并再三征询友人的意见。

一天，他应邀参加一次宴会，适逢当年支持国共合作的民主人士章伯钧、重庆《新蜀报》主编周钦岳等在场。故友相见，难免寒暄一番。席间章伯钧问陈独秀：

“仲甫先生，你积极宣传抗日，各界人士欢迎。当前武汉形势恶化，不知仲甫先生有何打算？”

“伯钧先生，积极宣传抗日，乃是鄙人尽点微薄之力，也是一个中国人应做的事。鉴于武汉之形势，鄙人决计入川去重庆，在抗战大后方再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伯钧和钦岳先生，你们看怎么样？更望能得旧友的支持和帮助，重庆那儿人生地不熟。”

“钦岳先生，仲甫入川，你看怎么样？”章伯钧问周钦岳。

“仲甫先生入川，鄙人表示欢迎。”

“仲甫先生入川，请钦岳先生多方关照。”

“鄙人一定关照。住和其他生活方面的问题，鄙人可以负责。明日鄙人回川，即作安排，届时望仲甫先生电告行期，以便迎接。”

“谢谢！承蒙关照。”

“不过，有一点我想提请仲甫先生注意。”

“什么？请直说。”

“陪都重庆，各方要员都聚集在那里。希望仲甫先生入川，要多加小心，不要从事政治性的活动或发表政治性的文章，安心休养、治病，做你的学问就是了，免生是非。”周钦岳说。

“我不反对各方就是了。”

这样，陈独秀在朋友的帮助下，几经周折，才于7月初，携夫人潘兰珍，告别生活将近一年的武汉，搭乘“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包的专轮入川了。受北大同学会委托照顾陈独秀的罗汉，也随船而行。船逆流行至闻名于世的长江三峡天险时，陈独

秀在夫人潘兰珍的搀扶下，登上甲板，兴致勃勃地凭舷一览三峡那宏伟、绮丽的风光，这也是他多年的愿望。天造地设的山峡，两岸高山，悬崖绝壁，江流汹涌，船行其中，好像“峰与天相接，舟从地窖行”，非常惊险。两旁山谷幽深，山峰倩巧奇特，净坛峰、起云峰、神女峰……一个接一个向他奔来，令他目不暇接。当船行至白帝城下、“夔门天下雄”时，他指着那山上的白帝城庙对夫人潘兰珍讲起白帝城的故事来。

“相传三国时，蜀汉皇帝刘备为兄弟关羽起兵报仇时，东吴大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刘备大败而归，兵退白帝城，忧郁而死。临死前，把国事和儿子刘禅托与诸葛亮。城内庙就是刘备托孤的地方。”

“噢，阿拉想起来了，侬叫阿拉读的那首白帝城诗，是不是就这个地方？”

“是，正是。阿珍，依还记得这首诗吗？这是唐朝大诗人李白写的。”

“记得，阿拉记得。”

“你背给我听听。”

“好的！”接着，潘兰珍激情满怀地吟诵道：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当潘兰珍吟完这首诗，陈独秀正欲开口称赞，不禁心里一阵难受，胃里酸水泛起，“哇”地一声，大口吐出，顿觉头晕目眩，面色苍白，几乎昏厥。潘兰珍一把扶住了他，掏出手帕给他擦了擦，就搀扶他入舱，躺在铺上。因船过三峡狭窄江面时，江水湍急，船颠簸剧烈，加之江风吹拂，他晕船了。随船医生闻讯赶来，及时抢救，哺以药物，化险为夷，但他身体极度的虚弱。船过瞿塘峡夔门咽喉入川

口，江面宽阔，船行较平稳，陈独秀渐渐清醒过来，觉得舒服多了，夫人潘兰珍依偎在他的身旁。

这艘轮船由于是四大银行包船，沿途码头不停靠，虽是逆水行舟，但比其他客轮航速快得多，当日即抵达重庆，在朝天门码头停泊。早已迎候在码头的《新蜀报》、《新民报》的朋友周钦岳、张恨水、张慧剑以及好友、黄埔军校政治教员高语罕等，登船迎接陈独秀及其夫人潘兰珍，并请他们夫妇乘坐滑杆（即轿子）拾级而上高低落差几十米的码头台阶。登上朝天门的新华路，乘上迎候在那里的汽车，绕道道山路，在上石板街15号川源公司楼前停下。这里是禁烟委员会主任李仲公的办事处，他们夫妇寓居在楼上。次日晚，朋友们设宴为他们夫妇洗尘，陈独秀对朋友的热情款待甚为感激。

## ◎重庆难有一个家

重庆，位于嘉陵江与长江的汇合处，是长江上游最大的城市，是我国西南地区水陆交通枢纽，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名城。早在公元前11世纪西周时代，这里就是“巴国”的首都，故曾称为江州、渝州、恭州。唐朝诗人李白在《峨嵋山月歌》中吟唱的“夜发青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指的即是这里。重庆简称渝即发端于此。南宋赵淳受封恭王，镇守于此，后来他当了皇帝，将恭州升为重庆府，取其双重喜庆之意。这就是重庆一名的由来。

重庆，有三绝。一绝，山多。开门见山，抬头见山，走路见山，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山城。然而，它很美。周围青山环抱，城下绿水围绕，南有滚滚东去的长江，北有江水滔滔的嘉陵江，两江汇流，重庆便成了一个弯月形的半岛，好似两条长龙托起一座变幻多姿的海市蜃楼。重庆房屋、楼房，大都错落有致，依山而建，这就成了一绝。待到新月高悬，登上枇杷山俯瞰，万家灯火，恰似繁星闪烁，顿生飘然登天之感。雾多，为重庆二绝。故称为“雾都”。寒暑易季，江雾

笼罩缭绕，浓雾弥漫，水天一色，山城又时隐时现在一片神秘缥缈的雾海苍茫之中。大雾过后，红日高照，天气燥热、烦闷。长江流域“三大火盆”之首，为重庆三绝。炎热夏季，温度高达摄氏40度以上，持续时间长，热得人奈何不得。

重庆这三绝，对于患有高血压等多种疾病的陈独秀来说，却是三大不适应，尤其是那七月的酷暑闷热，更令他难忍，对病不利。加之夫人热得中暑多日，他心中更觉不安。日本飞机连连空袭，四处轰炸，白天黑夜不得安宁，大后方也成了不安全的地方。再加上陪都重庆，国民党特务多如牛毛，虽然陈独秀已脱离共产党，表示以抗日为重，不反对蒋介石，但国民党对他仍不放心，处处监视他的行动，使他感到非常的沮丧。

一天，他在夫人潘兰珍的搀扶下，去医院看病，沿途碰到几个盯梢的便衣特务，气得他连病也不看了，半途返回，躺在床上气愤不已。尽管夫人潘兰珍安慰劝说仍然气愤难平，痛彻肺腑地感到重庆的环境还不如武汉，重庆决非是他久留之地，在重庆难有一个安身之家，真想插翅飞离山城。可是，眼下举目无亲，又寻找不到适合的地方居住，到哪儿去呢？这乱哄哄的时代，哪有太平之处？哪有他立足之地呢？每每想到这些，他总是叹息不已。苍天为何要这样不容他……他甚至认为，还是蹲在监狱好，不愁吃喝住，也无须到处飘泊不定。

### ◎意外应邀去江津

正当陈独秀在山城不知何去何从，焦急不安，一筹莫展之时，一天，他突然意外地接到日本留学同乡好友、皖白山人邓石如后人邓仲纯先生寄自江津县的来信。

他拆开信一看，字里行间充满了友谊、同情。信中写道：  
仲甫兄：



欣悉你已提前出狱，并于日前来渝，鄙人及家弟季宣为你祝贺！

当前，国难当头，日本猖獗，安庆家乡亦已沦陷，有家归不得。四川蜀地是大后方，江津毗邻陪都重庆，交通方便，物产丰富，生活便宜，在此避难的安徽同乡很多。你我都是同窗好友，当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同时你我已有多年未见。如果你及嫂夫人潘兰珍女士愿来江津避难，我及家弟热情欢迎，其住所和生活费用，均由我们兄弟二人承担，共度难关，待抗战胜利，我们同返故乡。我们盼等你及嫂夫人的到来。

愚弟

仲纯上

读完信，陈独秀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暖流，得到极大的安慰。没想到，在走投无路，身处危难之时，还有这样好的挚友，伸出热情的双手。于是，他拂去脸上的愁云，露出一丝丝微笑，吟道：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他在来重庆之前，也陆续听说，到重庆避难的安徽文教人员和学生很多，国民政府教育部为安徽的流亡师生，在重庆毗邻的江津县德感坝设立了国立第二安徽中学（后改为国立江津第九中学）。邓仲纯的三弟、他的同乡早年同学邓季宣任该校校长，他的同乡好友潘赞化任该校总务处主任，邓仲纯在江津开设了“延年医院”，行医治病，颇有点名气。在武汉行前，他也曾想直接到江津避难，家乡故人在一起很亲热，即使一时有些困难也好办些。但他关心政局，江津毕竟是个偏僻的地方，消息太闭塞，而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是抗日政治中心所在，朋友多，报刊多，消息来得快，又便于从事抗日宣传，所以，当时决定来重庆避难。可是，住下不到一个月，却事与愿违，“政治的和物质的条件不容许”，比武汉还不如。

现在故友邓仲纯兄弟俩热情地邀请他去江津，却是危难中之幸事了，也“只好退居人事比较闲适生活比较便宜的江津去做寓公”了。对此，他曾题李白《山中问答》诗赠友自嘲：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陈独秀对倩影难离的潘兰珍，平日少言寡语，大多板着面孔，什么事都是他说了算，而潘兰珍却一味夫唱妇随，她懂得老先生做事稳重，三思而后行，她只是个妇道人家，哪懂得世面上那些事。同时，她这些年来跟随陈独秀辗转飘流，多少也见过些世面，也接触了不少社会名流，她越来越感到老先生是个神秘而名气很大的人物，他到哪儿，哪儿都有朋友帮助他，衣食住行都不用担心。这样，她内心深处越来越崇敬老先生，对老先生的情爱，也越来越笃深。陈独秀看去俨然像个老夫子，其实内心像父辈一样爱抚着她，在这选择新的生活去向和归宿时，他又十分尊重她，不得不带着征询的口气对夫人潘兰珍说：

“兰珍，邓仲纯先生邀请我们去江津，那儿安徽同乡人很多，你说江津去不去？”

“老先生，阿拉父母早已去世，家里向没人了。阿拉自嫁罢依，就与依相依为命，同生死。既然依问阿拉，阿拉当然要说说阿拉的想法了。”潘兰珍深情地说。

“兰珍，快说，你的想法怎样？”陈独秀迫不及待地问。

“据阿拉看法，既然依的好友邓先生一番好心相邀，目前国难之时，无处可去，重庆这个地方依又不习惯，去江津避难，也是蛮好嘛。”

“兰珍，你说得对，同我的想法一样。就这样定了，你看行吗？”

“老先生，依已拿定了主意，何必还问阿拉？”

“这，事关我俩今后生计的大事，岂能我一人说了算？”

“哈哈”，老夫少妻不约而同对笑起来。这时，潘兰珍又像孩子似的依偎在陈独秀怀中。

1938年8月3日，这对患难与共的老夫少妻，终于告别那日子实在难熬的山城重庆，再度溯江而上，乘上自重庆到江津的“民惠”轮船……

### ◎吃“闭门羹”老夫少妻受辱

陈独秀偕同夫人潘兰珍，满怀希望地踏上了江津大地。

江津紧依长江边，建于汉献帝建安六年，有80余万人口。一条形如“几”字的江水，把它一隔两开，北为德咸坝，南为县城几江镇。山峰峭拔，形如金鼎的“鼎山”，高耸江畔，成了它的标志。江津山水映衬，景色壮丽，江水滔滔，水势奔涌，水天辽阔，飞舟直下，气势磅礴。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淳熙三年在成都任知府，因病回家乡江苏休养，他在泸州上船顺江而下，路过江津城时，写了一首赞美江津的风景诗：

西风扶棹似乘槎，水阔滩沉浪不花；  
梦里竹间喧急雪，觉来船底滚鸣沙。

江津满目青山迭翠，蜀地风光，别有一番风味。地形比山城重庆平坦，水陆交通方便，每天有轮船上下，几个小时便可到达。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遍山沉甸甸的红桔、广柑，盛产稻米，市场繁荣，物价比重庆便宜，文化也较发达。一时间疏散在这座僻静小山城的机关、学校、难民以及知名人士特别多，尤其是不远千里的下江难民，颠沛流离来到这里，似乎躲进了“防空洞”。

江津距陪都重庆约180华里，虽然1935年就有川黔公路过境

于此，但陆路大都忙于抗日支前，加之燃料紧张，公路汽车少有客运，从重庆到江津避难的人们，主要交通工具是轮船，也有步行或乘帆船的，这大都是些平民逃难者。因而一时间，1929年才通小火轮的江津通泰门外几江码头，便忙碌起来。这个码头设备极其简陋，唯一值钱的就是那个可供停泊轮船之用的趸船了，趸船上搭着长长一条木板跳，两边拉着供上下客扶手的绳索。码头对面，是一江之隔的德咸坝镇，背面是依山面江而建的楼房，青石墙上刻着县太爷萧烈写的“通泰码头”四个正楷大字，墙边一隅是灰色木制岗亭式的售票处，码头岸上是一空旷的江沙地，摆着许许多多的小地摊。

8月3日这天，江津大雾弥漫，雾锁长江，能见度极低。然而，通泰码头依然人声嘈杂，小贩叫卖声阵阵。在码头一旁，依稀可见有手持小彩旗迎客的男人和女人；几个身着黑色制服，头戴徽黑色白边、青天白日徽大盖帽的警察，背着长枪，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来穿去……直到中午过后，大雾才渐渐散去，一轮红日当头照，赤日烤得人们如头顶热锅，燥热闷人，令人难熬。

“呜——”随着一声汽笛长鸣，一艘船顶悬挂着红红绿绿的彩旗，船尾系有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民党的国旗的轮船，向码头徐徐靠拢。仔细一瞧，那船头侧舷挂着的一块长方木牌上，白底黑字写着“民惠”二字，岸上接客的人们挥着手，不约而同地喊道：

“‘民惠’轮来了！‘民惠’轮来了！”

“民惠”轮一停靠码头，船上避难者扶老携幼，争先恐后下船，秩序乱七八糟，只听小孩“哇哇”地叫个不停。这时，陈独秀在夫人潘兰珍的搀扶下，迈步走在摇摇晃晃的木跳板上，满头大汗淋漓，好不容易登上岸来。

突然一声：“米花糖要吧？江津名特产！”

把夫人潘兰珍吸引过去，陈独秀随手买了一盒递给夫人，夫人边吃，边赞不绝口：

“好香，好甜，又好脆！”

早已迎候在码头的好友邓仲纯、邓季宣、方孝远等，穿过拥挤杂乱的人群，疾步走上前，接过陈独秀和夫人潘兰珍以及搬运工人手中的行李。多年不见的同窗好友，难得相见，热烈握手相抱，相互寒暄一番之后，陈独秀笑吟吟地将夫人潘兰珍一一介绍给诸位好友，还连声说道：

“这些年来，亏得她对鄙人的照顾。”

“欢迎你，嫂夫人！我们也感谢你对我们好友仲甫先生无微不至的关照！”诸友异口同声地说。

这时，夫人潘兰珍圆圆的脸庞上，泛起一阵绯红，只是嫣然一笑。

陈独秀这对老夫少妻，随着避难的人流，漫步在江津街头，特别引人注目。顿时，江津这个弹丸之地的山城骚动了起来，少见多怪的山里人，尤其是那些女人们，三五成群，好奇地驻足而观，有的还指手划脚，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但他们并不知道来者何人，好似夹道欢迎这对陌生的来者。

这场面，这镜头，一一被摄入迎候在门前的邓仲纯之妻的眼底，她厌恶的情绪陡生，全身每根毛血管，每个细胞都充满了火，认为这老夫少妻是伤风败俗大逆不道，岂能让他们住进家门？

当陈独秀夫妇在邓仲纯等陪同下，有说有笑地来到黄荆街 83 号邓氏“延年医院”门前时，邓妻脸色骤变，一变欢迎之态，力拒不纳，“咚”一声闭门谢客。这如同五雷击顶，使陈独秀非常懊丧、尴尬，耷拉着脑袋，脸色铁青，一言不发，进退两难。夫人窘得难为情地捂着脸，此刻，她恨不得地下有缝钻进去才好……

这风云突变，使善良忠厚的邓仲纯感到愕然，木呆呆地站着，一时失去了主意。明明同妻子商定好的，妻子欣然同意，怎么一下翻脸不认，又这样无礼呢？邓妻也是受过教育富有同情心的女性，她原以为陈独秀老夫少妻年龄不大，相差 10 来岁罢了，谁知一见，

年龄悬殊到这种地步——一个近 60 岁的老头，一个 20 来岁的姑娘，这成何体统？邓氏是个大家族，虽逃难于此，也开设了“延年医院”，弟弟季宣又是二中的校长，邓氏兄弟在江津是有一定名望的。让这对老夫少妻住进家门，岂不败坏邓家的名声？于是，三十六计，只有闭门谢客为上计了。再说，邓仲纯虽是留日的医生，医道在江津是有口皆碑的，但惟独惧内，面对此状，虽然恼火万分，但也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只有面带愧色，向陈独秀夫妇表示歉意和内疚，连赔不是。陈独秀毕竟是九死一生，闯过世面，见多识广的人，虽吃了邓妻的“闭门羹”，但还是沉住气，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连声对邓仲纯说：

“仲纯贤弟，我们都是同乡好友，这也算不得什么，你夫人怕也一定有难处。”

同乡旧友方孝远，见此尴尬窘状，忙上前解围说：

“大家都不是外人，更不要见怪伤了感情。我看，还是先找一小客栈让仲甫夫妇临时歇息下来再说。”

“也好。”潘赞化赞同地说。

“这就拜托孝远先生了。”邓仲纯无可奈何地说。

## ◎ 幸亏有了个流亡的家

此时，来江津的避难者蜂拥而至，达数万人。本来不多的小客栈，一时间挤得满满的，大多又为包房而住，少有流动，几乎每家客栈门前都挂着“客满”的牌子。许多临街的居民户，也腾出房子作为临时客栈，租给避难者。即使这样，仍有大批逃难者流落街头。幸亏时值夏季，夜间铺张席子，一家老小在石板路旁露天而睡，聊以过夜。

陈独秀夫妇吃了邓妻“闭门羹”，临时找住处，倒也为难了方孝远。方孝远一连找了几家客栈，都无着落，要不是他家住在隔江的

德咸坝，且住房又紧的话，就让陈独秀夫妇暂时在家中住下再说。他在焦急万分中突然想到，他与东门城内郭家公馆房东孙茂池熟悉，不妨去试一试，请他帮助想想法子。于是，他叫陈独秀夫妇在一间小茶馆坐下。泡上一杯茶，让他们小憩等待。

方孝远快步走到东门城内郭家公馆，只见公馆门前也挂着个“客满”的牌子。房东孙茂池见他来到，忙递烟、倒茶招待，说：

“方先生，多日不见了，在忙些啥子？”

“还不是忙教学。”

“‘无事不登三宝殿’。方先生，今天来有何贵干？”

“孙老板，今天安徽来了一位避难朋友，一时找不到住的地方，你能不能给个方便，让他们夫妇临时住下，待明天鄙人找到合适的地方，就搬走。”

“方先生，眼下客房都满了。只有一小间，是留给重庆一位朋友的，他已付了房钱。”

“孙老板，能不能先让他们夫妇临时住下，总不能让朋友住在街头吧。”

“看在方先生的面子上，只能住几日，重庆朋友来了，无论如何，也得让出。”

“好。一定一定。”

“方先生，请你在旅客登记簿上，给你那位朋友登个记。”

“孙老板，这登记能不能免了。”方孝远考虑陈独秀安全，难为情地说。

“方先生，这是警察局规定的，不登记，夜里查房，那就麻烦了。”

“噢。孙老板，待那位朋友来了，让他自己登吧。”

说着，方孝远转身去接陈独秀夫妇。

不一会儿，陈独秀夫妇在方孝远陪同下来到了郭家公馆。

曾经在重庆读过书的房东孙茂池，眼帘一出现陈独秀的形象，

一愣，这人好熟悉，好像在哪儿见过，但一时又想不起来，又不好问方孝远。他灵机一动，将旅客登记簿递给方孝远说：

“方先生，请这位先生先登个记。”

方孝远接过旅客登记簿，悄声问陈独秀：

“仲甫，你看这表怎么个写法？”

“孝远，你就写：陈独秀，现年 59 岁……”

房东孙茂池一听“陈独秀”三个字，猛然想起，当年他在重庆读书时，在报纸上曾经看到过陈独秀被捕时的照片，于是，孙茂池忙上前对陈独秀说：

“陈先生，久仰大名，鄙人不知你已来江津，要不然我腾出楼上房间给你及夫人住下。先请陈先生及夫人委屈两天，明天我就腾出楼上房间。”

“孙老板，太谢谢你了！”方孝远说。

这样，陈独秀夫妇就在一间小客房里临时住下。翌日，房东孙茂池果然腾出一间自住的楼房，让陈独秀及其夫人潘兰珍住了进去，聊以安身。陈独秀对此深受感动，在危难之时，能得到素不相识、他乡朋友的相助，实在难得。陈独秀虽然在政治上一落千丈，成了末路英雄，但还没有吃过像邓妻这样的“闭门羹”。所以，他对此十分沮丧，万分感叹，人格上似乎蒙受了莫大耻辱。如果不是携带多件行李不便，如果得不到方孝远的热情照顾，即使有行李拖累，他次日也要返回重庆去。陈独秀在给从安庆来到重庆避难的三子陈松年的家书上说：

松年：

三日抵此，不但用具全无，屋也没有了。方太太（即方孝远之妻）到渝，谅已告诉了你们，倘非携带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到重庆矣。倘非孝远先生招待（仲纯之妻简直闭门谢客），即有行李之累，亦不得不回重庆也。幸房东见余进退两难，前日始挪出楼房一间（中午甚热），聊以安身，总比住小客棧好些，出门之难如此，幸祖母



(即养母谢氏)未同来也。

父字

八月九日

郭家公馆,名为公馆,实为深巷内一家小客栈,对面为江津县政府,此处是江津要地,机关大多设在这里。陈独秀租住的楼房是一间西房,太阳西晒甚为闷热,中间临时用一些木板隔成两小间,屋子不高,门框快碰到头。屋里东西很简单,内间放着一张陈旧了的板床,几件随身带的行李,靠窗的一张缺腿小长桌,放有《时事新报》、《新蜀报》等报纸,一叠厚厚的稿纸和笔墨,还有些线装书籍。外间靠墙放着一张摇摇晃晃的小方桌,两边各放一张破旧的木椅,桌上放有一把茶壶和几只杯子。房间虽小,但由于陈独秀好洁,他夫人潘兰珍勤快,收拾得还比较整齐清洁。楼上没有厨房,烧饭还得借用房东的锅灶。起初,是方孝远花钱招待的客饭,住下后,陈独秀觉得不好意思,就叫夫人潘兰珍上街买菜、买米,自己开伙了。这里虽然不如武汉那座庭院式平房那样舒适幽静,但总算暂时安顿下来,有了个流亡的家。

江津毗邻重庆“大火炉”,受到它的影响,气候也是够热的,加之陈独秀的住处太阳西晒,房间内热上加热,这使得患有高血压等多种疾病的陈独秀,暑热难耐,同时,由于旅途的疲劳,以及邓妻“闭门羹”给他精神上的刺激,没几天,心脏病和胃病一起发作,心闷、胃痛交加,脸色紫黑而苍白,他紧皱眉头,噘着嘴,扇动着鼻翼,吱嘎吱嘎地咬着牙。那身子好似千斤重,两只脚却像踩着棉花一般,软而无力。这可吓坏了陈夫人潘兰珍,她心急如焚,人生地不熟,又不知医院在哪儿,她虽然知道邓仲纯是个医生,看他那怕老婆的样子,也不好去找他诊治。于是,她找来房东孙茂池,请他帮忙找个医生来看看。孙茂池读书学过历史,知道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有影响的人物,做学生时对陈独秀便有几分崇敬,十分同情他今日的处境,才腾出一间自住房给陈独秀夫妇居住。他一见陈独秀病

成这个样子，顿生怜悯之心，他对潘兰珍说：

“陈夫人，你不要急，我这就去给你请医生。”

邓仲纯开设的“延年医院”，在江津是出了名的，他医德高，医术好，江津人有病都乐意找他诊治，而他有叫必到，哪怕是半夜三更。孙茂池出了门，便直奔“延年医院”。他进得“延年医院”，见邓仲纯正在给病人搭脉，他也顾不得许多，对邓仲纯告急说：

“邓医生，你那位同乡陈先生病得可厉害了，请你赶快去给他看看！”

邓仲纯一听陈独秀病了，一怔，顿时放下手中病人，站了起来，正欲收拾药箱，但又犹豫起来。那天，陈独秀及夫人潘兰珍，吃自己妻子“闭门羹”的情景，从眼前一闪而来，甚感万分内疚。他当天晚间就想去看看陈独秀，并向他表示歉意，但委实不好意思去，现在他生病了，连迈出这一步的勇气也没了。

“邓医生，你在想什么，快点走吧！”孙茂池催促着。

孙茂池这一催，却使邓仲纯镇静过来。现在仲甫先生病急，救人要紧，也顾不得那些了。于是，邓仲纯向看病者道声歉，背着药箱跟随孙茂池三步并作两步，赶去为陈独秀看病。

邓仲纯走进房间，陈独秀痛得正在木板床上打滚，浑身大汗淋漓，嘴里不停地呻吟着。正在给陈独秀摇扇、擦汗的潘兰珍，见邓医生来到，忙往地下“扑通”一跪，哀求道：

“邓医生，求求你救救老先生。”

邓仲纯见之，忙弯腰把潘兰珍扶起，说道：

“夫人，切切不可这样。仲甫是我的好友，我应当救他。请夫人不要心急，让我先给他检查一下。”

陈独秀听到邓仲纯的声音，忙转身，睁开紧闭的眼，没精打采地说：

“仲纯，你来了！”

“仲甫兄，我来迟了。我先给你检查一下。”

邓仲纯搭着陈独秀的脉，看了看他舌头，听筒在他胸部听了又听，又摸腹查胃，然后又量了量血压和体温，对夫人潘兰珍说：

“仲甫兄劳累过度，天热烦躁，血压有些高，心律不齐，腹部发胀，体温还正常。看样子，没有什么大的关系。我先给他打些针剂，再给他服些药，让他好好休息一下，明天病情可能就有好转。”

邓仲纯给陈独秀打了镇静剂，从药箱里取出一些药给潘兰珍，并嘱咐其服法，并请房东孙茂池随他到医院取些药来。陈独秀安静地睡了，邓仲纯才告辞说：

“夫人，请按时给他服药，我明天再来给仲甫看看。有病情，请孙先生及时告知我。”

“邓先生，谢谢侬！”说着，潘兰珍从衣袋里掏出仅剩的几块大洋给邓仲纯。

“邓先生，这是药钱，请侬收下。”

“夫人，这钱不能收，万万不能收。给仲甫兄看病收钱，那我不就成了外人吗？以后，也一律不收。”

“真不好意思。”潘兰珍说着，给邓仲纯深深一鞠躬。

邓仲纯哪能受此一礼，忙向潘兰珍也还了个鞠躬礼，转身迈步走出这地板“咯吱咯吱”响的房间。

房东孙茂池从“延年医院”取药回来，潘兰珍也向孙茂池鞠躬致谢，孙茂池连连摆手，说道：

“夫人，救人的事谁见了都会做的，何况陈先生这样有名气，又住在鄙人之处，岂能见死不救。日后夫人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孙先生，侬真是好人！”

陈独秀经邓仲纯治疗，夜间一觉醒来，顿觉一身轻松，心里好受多了，也有些精神了，睁开惺忪的眼问：

“兰珍，仲纯呢？”

“他走了。他说明天再来看侬，还给了这许多药。”潘兰珍拿着药对老先生说。

“仲纯是好人，是多年的好友。”

“多亏了邓先生，阿拉把钞票给伊，伊不肯收。”

“兰珍，你做得对。日后，他再给我看病，不要给他钱，他是不会收的，他是重友情的人。”

“也好。待日后，你有了稿费再付给他。”潘兰珍又说：

“老先生，房东孙先生也是好人，是他请邓先生来的。”

“噢。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房东孙先生也真够朋友，要不是他腾出这间房子，我可真要躺在街头了。明天我要去谢谢他。”

“阿拉已谢过孙先生。”

“噢。兰珍，你也辛苦了，时间不早了，你也该睡了。”

三

---

## 第八章

### 故土沦陷举家迁 阖家团聚梦难圆

---

#### ◎铁蹄下的安庆家

陈独秀故乡安庆，三面环山，一面临江，地处长江中游，上接湘鄂，下衔吴楚，又是大江南北的交通要道，控制东西，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1912年，陈独秀任秘书长的安徽省都督府，两边辕门上就书有：

控制吴楚

保障江淮

“中原腹地，莫要于皖”。自古建都南京的朝廷，无一不把安徽作为必争的要地。在军事上，守住安庆，长江千里天堑即控制手中，既可以保卫南京；又可以作防范武汉的基地。在经济上，可以把青弋江流域和巢湖地区的粮食，从水路运往南京，保证军粮的供应。历史上，这里曾发生过许多著名之战，如太平天国安庆保卫战，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就是一首英雄的史诗，一支革命的颂歌，一部悲壮的乐章。所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后,安庆便成了日军攻击的目标。

1937年9月,南京告危,陈独秀携带夫人潘兰珍辗转武汉避难时,他的家乡安庆时局就日趋紧张了。安徽省政府惊慌失措,将省城迁至六安,再迁金寨,大部分机关随之转移,市内学校先后停办。人心惊恐,部分居民也开始自行疏散,安庆成了一座已不设防的城市。南京失守后,安庆顿时吃紧,日军企图把安庆作为进攻武汉的据点和补给基地,以利用安庆飞机场,对武汉和内地进行轰炸。为此,1938年5月底,日军大本营下达大陆令101号命令:

华中派遣司令官应以一部部队占领安庆附近。

日军海军同时下达海令120号命令:

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应协助陆军占领安庆附近。

于是,日军从陆路、水路联合,穷凶极恶向安庆大举进攻。与此同时,日机轮番轰炸安庆沿江军事目标和民房,沿江商店、住房大半被炸毁。顿时,安庆烟雾弥空,人们慌乱一团,呼爹喊娘,凄厉哭叫声一片,纷纷关门闭户,携带细软,逃之他乡。此时,陈独秀家紧临安庆临江边南水关的“大洋房”,险遭轰炸,许多邻居房屋毁之于日机炸弹之中,火柱冲天,浓烟滚滚,一片凄惨。陈独秀一家老小,心惊肉跳,惶惶不安,刚出世不久的小孙女,在妈妈怀中吓得哇哇惊叫。陈独秀失明的养母更是惊恐不安,焦急万分。此时,陈独秀从武汉写信,一再催促养母以及松年一家尽快外逃武汉,要人不要家,然而,谢氏哪里舍得离开陈家兴旺的象征“大洋房”,不离开又怎么办呢?谢氏昼夜思考,一时又想不出妥善的办法,于是,她对松年夫妇说:

“松年、珩光,日本人就要打进安庆城,你们带着孩子赶快逃

吧，你们是陈家的命根子，日本人炸弹没眼睛。我反正老了，留下看这个家，炸死也就算了。”

“祖母，这怎么行？要死就死在一起，要走就一起走，决不能丢下你老人家。”松年夫妇说。

“唉！这日本人太可恶了！要逃就趁早，我看把房子卖了。”

松年夫妇大吃一惊，说：

“祖母，这是祖父生前建造的房产，这怎么能卖呢？”

“卖了总比被日本人炸了、烧了好，还可筹措一些逃亡生活费，出门就要钱用。”谢氏说。

“祖母，这大难临头之时，谁还敢买房产？”

“在江西财政厅任职的董先生，早就想买了，我只是舍不得，一直未同意卖。前两天他还托人来问过。松年你去告诉董先生，说我同意卖房子了。”

约个把时辰，松年回来对谢氏说：

“祖母，董先生决定买下我们的房子，价格还是与你商定的那个价钱，日内就交钱办理手续。董先生还说，在未走前，我们还可住在里面。”

“卖房是心酸的事，也是不得已的，但房卖了也没有 什么顾虑了。你们赶快收拾一下，把一些要紧的东西送到乡下，其它的东西都不要了，逃命要紧。”

陈松年吩咐妻子珩光收拾东西，他就到城郊乡下陈家剖屋，与堂兄陈遐文联系，请他帮个忙。他出了家门，急匆匆地往乡下赶。事也凑巧，他刚走出城外，迎面碰到堂兄陈遐文，急忙说：

“大哥哥，我有件事请你帮个忙。”

“什么事？松年。”陈遐文问。

“日本人快打来了，家里房子也卖啦，我有些东西想搬到乡下去，打算去武汉伯伯那里躲一躲。”

“房子卖了？”陈遐文吃惊地问。

“是的，祖母决定卖的，我和珩光都舍不得。祖母说，卖了总比日本人炸了、烧了好。”松年痛心地说。

“大奶奶说得也对。搬东西下乡，那好嘛！我明天弄船来。”

说话间，警报响了，他们被胆颤心惊躲避日本飞机的人群冲散了。

第二天，堂兄陈遐文请来了9只小木船18个人，慌忙把陈松年家里一些重要的东西搬到乡下去了，剩下也只是些不值钱的坛坛罐罐。陈松年全家人感激万分，还给了每人一块钱。

“大洋房”卖掉后，陈松年一家正欲动身去武汉，突然收到陈独秀的来信，告知松年及谢氏，他近日内将动身入川，要松年一家尽快离开安庆，一块到四川去避难。告诉他不要在武汉停留，直抵宜昌，去找在国民政府任职的好友史岳门先生，请他帮助购赴重庆的船票，他将另写信给史岳门先生。

此时，安庆已在日军陆、海、空军的炮火控制之下，上下水轮船极其不正常，有时几天才有一班船。欲溯江而逃的人把码头挤得水泄不通，日机、军舰常常轰炸和炮击码头，人们被置于兵荒马乱之中，生命受到严重威胁，谁个不想早日逃避日本的炮火。然而，要弄到船票，登上轮船，谈何容易？陈松年这逃亡之家有老有小，更令他焦急万分，整日在码头盼轮船、盼购票，一连等了好几天，一家老小好不容易乘上一条赴宜昌的轮船，依依不舍，含泪告别“大洋房”，逃难他乡。

陈松年万万没有想到，他一家逃离安庆后没几天，即6月12日，安庆即沦陷于日本人之手，买房子的董家，丢下空房，也逃难他乡了。

这天，安庆乌云密布，大雨滂沱。日本陆、海、空军联合进攻安庆。长江上，数十条日本军舰沿江西上，空中以飞机盘旋掩护，陆军则在东郊大王庙一带登陆，攻占安庆机场。然后从广济圩包抄安庆。国民党守城军——四川军阀杨森的队伍，未放一枪，仓皇逃遁。



全城百姓闻讯，丢下手中的饭碗，纷纷关门闭户，扶老携幼，惊慌逃难，沿途哭喊声震天。不少老弱病残倒毙途中，大包小裹沿途丢弃，妻离子散，呼爹唤娘，一片惨象。日军进城，几乎见到中国男人便杀，见到中国女人便奸淫，见到房屋店铺便烧，见到金钱财物便抢。血腥的侵略笼罩着整个安庆城和郊区，遍地狼藉，给安庆人带来了空前劫难。一些地痞、流氓、强盗趁机撬门破户，大肆抢劫，许多商店、住宅被洗劫一空。日军进城时，有数百名无辜群众被屠杀，小小安庆城遍地陈尸，血水掺和着雨水，滚滚流入长江……

陈松年家卖出的“大洋房”，日本兵要放火烧掉，汉奸求饶，强行霸占，弄得乌烟瘴气。进攻安庆的日本少将波田重一，以安庆人民的鲜血换来了中将军衔，为庆祝“荣升”，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强盗，大摆宴席，放假几天，让日本士兵肆意蹂躏安庆人民……

逃离安庆的陈松年，更没想到，他搬下乡的东西也遭到了日本兵的洗劫。

堂兄陈遐文，把陈松年家的东西搬到乡下后，搁在陈家祠堂里，贴了封条，又用木头把门顶着。善良而老实巴交的陈遐文，本以为陈家祖宗可以保护陈松年的财产，日本人也信中国的封建礼教，怕祠堂不会被侵犯吧。可是，发了疯的日本兵，哪顾得你什么祠堂，什么礼教，见了财物就抢，见了女人，就像恶狼似地扑上前去……没几天，日本兵扫荡来到陈独秀家乡——陈家剖屋。年轻的男人女人都被吓跑了，东洋鬼子端着枪一脚把祠堂门踢开，见祠堂里放着大箱小箱，互相就抢夺起来，把值钱的衣物洗劫一空，把100多个铜茶盘、用具等，打得粉碎，只剩下大大小小的破烂箱子。剩下的破烂，等日本兵走后，陈遐文妻子拣了，塞进破箱子里，用绳子扎好，放在自家的小阁楼上。不久，日本兵又来洗劫这个陈家剖屋，连那塞进破箱子里的东西，大多又被抢走了。陈独秀家业破产后，剩下的微乎其微的家产落入了日本人之手，成了名副其实的破屋，真正

一贫如洗了。

### ◎流亡急难好人助

由安庆开往宜昌轮船上的难民真是遭孽。舱内舱外挤满难民，连插足的地方都难觅得。6月的天气已经很热，船上臭气熏人，令人作呕，闷得人实在难熬。陈松年一家挤在通舱一隅，铺着一张草席，一家四口坐在上面。祖母谢氏热得张着大口喘气，心闷难受，陈松年不停地给祖母扇着风。溯江航行，急流难进，江水浪打浪，船行既慢又颠簸，年近八旬的谢氏，哪能受得了这等罪。船过九江，谢氏突然发病，呕吐不止，伴有高烧，昏迷不醒。这可急坏了陈松年夫妇，船又不靠岸，怎么办？陈松年急中生智，双手一拱，面对舱内难友，作揖打恭，哀哀求援：

“诸位父老乡亲，小辈祖母突然生急病，不知哪位先生是大夫，请行行好，给我祖母看看病，小辈万分感谢！”

话音刚落，一位戴着一副金丝眼镜，50开外的先生站起来，答道：

“小兄弟，鄙人是大夫！”

“谢谢，请大夫给我祖母看看病。”

那位大夫，拎着药箱，踮着脚，踩着难以下脚的间隙，来到陈松年一家的草席旁，弯腰蹲下，搭起谢氏的脉搏，又翻看了眼睑，轻声对陈松年说：

“小兄弟，你祖母晕船又中暑，年纪大了，受不了这等苦，看样子没有什么大问题。我配几片药给老人吃吃，再给她打一针，过一会就会好的，你们不要焦急。”

大夫从药箱中取出药片交给陈松年，又给谢氏打了一针，并嘱咐：

“老人需要好好的休息。”

陈松年夫妇双膝往地下一跪，感谢道：

“谢谢大夫，救祖母一命！”

大夫边把他们夫妇扶起，边说：

“不要这样。救死扶伤乃是医生的天职。”

“大夫，请问尊姓大名？”陈松年问道。

“小兄弟，这就没有必要问了。”

“大夫，这几个大洋可够医药费？”陈松年从对襟口袋里掏出大洋递给大夫。

“小兄弟，我们都是中国人，又都是逃难人，收钱不就见外了吗？”

“谢谢大夫，你真是好人！”陈松年夫妇感谢道。

这时，通舱里的难民们都向这位救死扶伤的大夫投去敬佩的目光。

经过打针吃药，陈松年祖母谢氏渐渐苏醒过来，陈松年夫妇亲切地说道：

“祖母，你醒来了，好些了吗？”

“哎，松年、珩光，我这把老骨头死了好，免得给你们增添累赘，出门真难，我要拖坏你们了。”

“祖母，快别这样说。幸亏遇上这位好大夫，到宜昌我们再送你去医院看看。”

“不用看了，就那么几个盘缠钱，留着路上用吧。”

船行数日后，陈松年一家三代四口人，终于抵达了宜昌。

宜昌，古名夷陵，地处长江三峡西陵峡口，素有“三峡门户”“川鄂咽喉”之称，为历代古战场。公元前 278 年，秦将白起大败楚军，宜昌在战火中被夷为平地，楚先王夷陵也被平毁，夷陵之名即由此而来。三国时，在吴蜀夷陵之战中，刘备欲夺荆州，亲率大军伐吴。东吴孙权命大将陆逊为都督，领兵 5 万“守峡口以备蜀”，陆逊以逸待劳，大火烧了刘备 40 多座营寨，蜀军大败，刘备连夜退入白帝

城。这就是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的故事。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宜昌就成了抗战军用物资重要转运港站，入川难民又要在宜昌换乘轮船，以过三峡天险。所以，宜昌一时难民拥挤，入川民用轮船难以乘上。

陈松年一家到达宜昌后，人生地不熟，好不容易找了一家小客栈住下，又忙于送祖母到医院看病，一时又找不到医院，陈松年心急如焚。于是，他吩咐妻子窈珩光照料祖母，他就按照其父陈独秀在信中提及的地址，在宜昌二马路和平里，找到了在国民政府任职的史岳门先生的府邸。史岳门是陈独秀的旧友，早在广州就与陈独秀相识，他很敬佩陈独秀的才识，尤其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影响，深深地印在史岳门的脑际中。陈松年来找他之前，他已收到陈独秀的来信，请他为陈松年一家入川代购赴重庆船票。

史岳门正在办理公务，见门卫通报陈独秀公子陈松年拜见他，忙叫门卫让他进来。陈松年虽已28岁，但由于出身在大家庭里，且又娇生惯养，在家中一切都得听从母亲和祖母的，与社会交际甚少，所以来到史岳门府上，心里不禁紧张而又忐忑不安，见了史岳门十分拘谨，他彬彬有礼地向史岳门深深一鞠躬，说：

“伯父大人，小辈是陈独秀之子。”

“噢，免礼，免礼。陈家公子何时到宜昌的？”

“今天刚到，我就来叩见伯父大人。”

“外出逃难，一路辛苦，现住何处？”

“住在码头附近一个小客栈里。”

“有何困难？”

“伯父大人，我祖母途中生病，想找个医院给看看，可我人生地不熟，还没找上医院。”

“好，我给你联系一下，先给你祖母看病要紧。”

“谢谢伯父大人！小辈还有一件事，想请伯父大人给帮个忙。”

“何事？”

“请伯父大人帮助购买去重庆的轮船票。”

“噢，这件事你令尊已来信说过。我与你父亲是多年的朋友，这点忙我是要帮的，你们先住下再说，我想法安排你们，顺便乘运军火的船去重庆。既安全，又可省些路费。”

“谢谢伯父大人！”

史岳门叫来门卫，帮助陈松年找医院给他祖母看病，陈松年连连感谢。

等候多日，陈松年一家才乘上史岳门安排的一条运军火的船去重庆。

到达重庆，陈松年一家由陈独秀的同乡好友潘赞化安排住在重庆绣壁街，并协助潘赞化料理筹办江津九中事宜。

## ◎家人团圆危难中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陈独秀自1913年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离开家门，在外风风雨雨飘流几十年，与家人阔别已久，更没有孝敬过养母谢氏，还没有听过孙女叫他一声“爷爷”。每每想到这些，他总是心感不安，有愧于家庭。他偕同夫人潘兰珍来到江津，生了一场小病后，这种儿女情长比任何时候都激烈，盼望能有个安定的家，不论贫富，一家老小安安稳稳过日子，以度晚年，不想再过那颠沛流离的生活。有一次他同好友邓仲纯摆谈时，他对邓仲纯说：

“仲纯，你我是当年留日的同乡挚友，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却远不如你。你学有医学，有自己的医院，还有一个温暖的家，而我人生如梦，两手空空，连个家也没有……”

“仲甫兄，我岂能与你相比，我只不过行医求生，养家活口罢了。而你想的、做的都是政治大事，在国人中影响深之。古人云：‘不以成败论英雄’，你在中国历史上是少不了要写上一笔的。”

“好，不谈政治。小儿松年已从安庆流亡来到重庆，现被潘赞化留下帮他料理一些事务。如果有便人去重庆，请给我带一口信给他，要他一家早日来江津，好让一家人在一起。我多么想有个安逸的家，也好孝敬孝敬母亲大人。”

“好，仲甫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带口信去。”

陈独秀在郭家公馆住下后，深居简出，平时少有交往。不过他经常偕同夫人潘兰珍去东门外由南京迁来的佛学研究支那内学院，同早年在南京相识精于佛学的朋友欧阳竟无、黄埔军校政治教官高语罕和前清进士苏鸿怡等人去侃《三海经》或打牌。旧友难得相聚，侃天，侃地，除了政治，无所不侃。侃得开心时，就打上几圈麻将。此时，陈独秀什么忧愁均抛诸九霄云外，倒也超脱开心。1938年秋的一天，陈独秀偕同夫人潘兰珍正欲去支那内学院，邮差送来一封电报，他一看是小儿松年打的。

“父亲，儿一家明日抵江津。”

陈独秀看完便递给潘兰珍。潘兰珍看了，高兴地说：

“明朝，松年和阿婆来了！”

此时，陈独秀悲喜交加。喜的是，在国难当头，抗日烽火四起之时，一家人能在大后方——长江上游江津山城团圆，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于是，他脸上露出几分欣慰。悲的是，想当年远离家门时，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有着鸿鹄之志，同时家业兴旺。而今却落得这样的凄凉，病魔缠身，穷途末路，松年一家及养母来了，连安身之地也没有，岂好有脸见养母呢？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他去日本留学与结发妻高晓岚借10两手镯而不允时，还是养母暗地给了他足够的路费。现在养母来，又怎样报答她老人家之恩呢？想到此，他又闷闷不乐，苦皱眉头，沉默不语。潘兰珍见状，不解地问：

“先生，你不是早就盼望阿婆和松年一家来嘛，你应当高兴才是，现在你又怎么啦？”

“兰珍，母亲和松年他们来，我当然高兴，不过我在想……”

“侬在想啥么子？”

“我在想，松年一家和母亲来了，只有这么一间楼房，怎么个住法？”

“噢，阿拉也在想。”

“哎，出门真难啊！抗战能早日胜利就好了。”

“先生，阿拉想这个样子；阿拉困的地方让阿婆困，阿拉在外头临时搭个铺，让松年伊拉先在小客栈住下，日后再想想法子。”

“兰珍你想得周到，暂时也只能这样了。请你收拾一下吧。明天你去买些菜，全家吃个团圆饭。”

“好的。”

“钱还有吗？”

“昨天，仲纯先生又送来一些钱。”

“唉，真亏了他。”

夜间，陈独秀由于白天情绪波动，血压又上升，不停地叫心口憋闷难过，辗转反侧。陈夫人潘兰珍按邓仲纯医生平日的嘱咐，边给他服用备用药，边安慰道：

“先生，药吃下去就会好的。”

陈独秀服下药后，不多久就入睡了。守候在床边的潘兰珍只打了个盹，天就亮了。

这天，大雾像往常一样，笼罩着江津山城，气压低闷。陈独秀躺在床上，面色苍白，几次挣扎着要起来，但浑身乏力，他叹着气对潘兰珍说：

“兰珍，今天我这个样子怎么好去接母亲？”

“先生，依躺着休息，阿拉去接。”停了会，她又说道：

“先生，阿拉去买小菜，一会儿就回来。”

“你去好了。”

潘兰珍提着菜篮，正欲迈步出门，罗汉来了。

“罗先生，你好！”

“你好，夫人！先生在家吗？”

“在。身体不舒服，躺着哩。”

罗汉是陈独秀的学生，追随陈独秀多年，又是托派中央常委，是陈独秀 1932 年被捕时的同案犯。出狱后，罗汉曾为陈独秀回党工作奔波过，又为陈独秀固执失去回党工作机会而遗憾。这次，他是受北大同学会的委托而来江津照顾陈独秀的。

陈独秀听说罗汉来了，振作精神坐了起来。罗汉走进房内，便向陈独秀床边走去，忙问道：

“先生，好吗？”

“老毛病，时好时坏。”

“你这些日子到哪儿去了？”

“蔡老校长要我去了一趟。”

“子民先生好吗？”

“还好。他时常惦念着您。”

“我与他多年不见了。”

“这次老校长及北大同学会委托学生，特来照顾你先生。”

“这又麻烦子民先生了。罗汉，你今天来得正好，我有一事想拜托你办一下。”

“什么事？先生。”

“今天下午，小儿松年一家及母亲从重庆来江津。我身体不好，请你代我去接一下，如何？”

“好，我去接。我在重庆见了松年，你家公子人老实忠厚，很懂事理。潘赞化先生挺喜欢他。”

“这个世道，人过于老实，也要吃亏。”

下午，大雾散去，一轮红日高挂天空。江津通泰码头像往常一样，杂乱无章，人群拥挤。由重庆开来的轮船一靠岸，难民们扶老携幼，提心吊胆地走在那木跳板上。此时，只见一位身着对襟褂的白面书生，背着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太吃力地踏着木跳板，一步一步地



向岸上走。身后一位年轻的妇女抱着一个小女孩，嘴里不断地说着：

“慢点走，当心点。”

这位年轻人就是陈松年，身后那位年轻妇女是他妻子窦珩光，陈松年背的那位失明老太，便是陈独秀养母谢氏。迎候在码头的罗汉，见了忙跑上前去，接过陈松年随身带的行李，说：

“陈伯母，你老人家一路辛苦啦。”

“松年，这位先生是谁？”谢氏问道。

“这位是罗汉先生，是伯伯北大的学生。”

“噢。”

“松年，你父亲等着你们哩。”

“谢谢罗先生。”

“上面的三轮车已备好了。”

陈松年一家上岸，坐上三轮车，进入城内，穿过热闹的通泰街和熙熙攘攘的人群，不一会儿便到了东门郭家公馆。松年一家在罗汉的引领下，登楼来到陈独秀住的那间楼房。罗汉跨进门，便说：

“先生，你家公子和母亲已经来了。”

“噢。”陈独秀硬撑着起来，摇摇晃晃走到门口，双膝往地下一跪，正在忙着拣菜的潘兰珍见了，也跪在陈独秀身旁。陈独秀悲喜交加，泪如雨下，噙着泪喊道：

“母亲大人，受孩儿一拜。”话音未落，双手抱住谢氏的腿，呜呜地哭了起来。

双目失明的谢氏，用颤抖的手摸抚着陈独秀的头和手，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阿婆，受儿媳一拜！”潘兰珍用上海——南通口音亲切地喊道。

“兰珍，伢子，你快起来。”谢氏又抚摸着兰珍的头说：

“伢子，这些年来，庆同多亏了你，你跟他吃了不少苦，陈家要

感谢你。”

“阿婆，依老人家，快别这样说。”

“兰珍，我虽然看不见，我知道你心眼好，我心里有数。”谢氏紧紧拉着兰珍的手，又说：

“庆同、兰珍，你们都快起来吧！”

“先生，你们一家人难得的团圆，大家都应高兴嘛！”罗汉在一旁劝说道。

“罗汉说得对。兰珍你快去烧饭，晚上吃个团圆饭，为母亲大人洗尘。”

“好的，阿拉这就去烧饭。”

陈独秀从儿媳珩光手中接过孙女儿长玮，亲了亲。孙女见生人抱他，“哇哇”地哭了起来。

“长玮，不哭，这是你爷爷！”珩光对女儿说。

“噢——不哭，不哭，爷爷喜欢你！”陈独秀抱着孙女，满脸喜悦，边用手拍，边哄着孙女。小孙女瞪着两只圆圆的眼睛，望着这位陌生的爷爷。

## ◎一家和睦多艰辛

陈独秀的生活本来就十分清寒，现在一家6口人过日子，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哪样少得了，日常生活也难以维持了。陈松年一家从安庆逃难出来，几经周折，从老家带出的一点积蓄，也早已花销干净。盼得一家团圆，却又多苦楚，粗茶淡饭，萝卜白菜，即使这样，还得靠北大同学会和朋友的接济。陈独秀对失明养母谢氏极为孝顺，每天早晨一碗豆浆两只鸡蛋少不了，亲自端送养母手中。每餐吃饭，他必亲自奉菜到养母碗中，晚上必和养母拉家常，尽量让养母安心、开心。夫人潘兰珍对失明婆母孝敬如母，每日不厌其烦地为婆母梳洗，修剪指甲，捶背捶腰，每日必为婆母做点可口

饭菜。婆母谢氏对儿媳的这番孝心，甚为满意，常夸媳妇贤惠，很会过日子。

一家人口众多，又挤在一间楼房里，老老少少难免发生口角。陈独秀盼一家团圆，但又图安静，可是那小孙女似故意同他作对，常常撒娇吵闹，弄得陈独秀往往心烦意躁，甚至拍桌打掌发脾气，对孙女儿大声吼道：

“你这伢子，哭死人了！吵得不得安宁。”手一挥，对儿媳珩光又大声叫道：

“珩光你还不快点，把这伢子抱到外面去！让我安静一会儿好不好？”

珩光对公公这古怪脾气，火从胸中来，真想冲撞他几句，然而看在松年及祖母的面上，还是忍了又忍。

夫人潘兰珍每每见此，便上前温和地说：

“先生，侬勿要把囡囡吓了！侬勿发火，对身体也不好。”又转向珩光说：

“珩光，侬勿生气，他就是这个脾气，囡囡让阿拉来哄哄。”

“母亲，我不会生气的。”

每当家人发生口角时，潘兰珍总是体面地处事，严于律己。这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家人又欢欢喜喜、和和睦睦相处了，连陈独秀从心里也佩服她几分。

这时，陈独秀贫病交加，拉家带口，日子越来越难过，真是度日如年。养母又患病在身，日趋严重，又无钱医治，只得靠邓仲纯分文不收的医治。在这穷日子中，最为难者当是潘兰珍。她主持家务，能干勤快，竭尽全力维持家中的艰辛生活，她多年的积蓄，早在南京监狱陪伴陈独秀时，大都花销掉，剩下的只有手上两只金戒指和一副耳环了。一天，家中揭不开锅了，她不声不响地到当铺里，把戒指和耳环当了。后来陈独秀发现了，问她：

“兰珍，你的金戒指和耳环怎么不见了？”

“阿拉收起来了。”

“我不信，你是不是当了？”

潘兰珍无言对答。陈独秀不禁心里一阵难过，说道：

“兰珍，那是心爱之物，怎么当了昵？”

“锅里米没啦，不当了，一家老小吃啥么子？”

“唉——”陈独秀长长地叹了口气，说道：

“待稿费来了，把它赎回来。”

他们老夫少妻的对话，被儿媳珩光听见了，心里也苦楚起来，她对母亲潘兰珍格外尊重，心中也暗暗思忖着，如何为母亲分担忧愁，减轻家中的负担。

陈松年来江津不久，就在江津德咸坝九中总务处主任潘赞化那儿，当一名最低级的职员，他为人厚道，又擅长木工，常常自己动手修理损坏的课桌椅，很受好评，他因此得了个“小木匠”的称号。晚上，陈松年下班归来，珩光带着商量的口气对松年说：

“松年，家里人口多，开销大，婶娘连金戒指和耳环都当了，日子难过。我看，我们到德咸坝九中去住吧，独立生活，以减轻家中的负担。你明天同潘叔叔说说看，在德咸坝九中能否弄一间房子，让我们自食其力吧！”

“珩光，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潘叔叔也难啊，那么多流亡的教职工都没房子住。”

“国难当头，大家都难。明天你同潘叔叔说说看嘛，你这个人啊，就是前怕狼后怕虎的。”

“好，我明天去试试看。”

第二天，陈松年一到学校就找了潘赞化。胆胆怯怯地对潘赞化说：

“潘叔叔，我有件事想同你说说。”

“松年，什么事？”

“我想到学校来往，家父那里实在拥挤，生活也很难，我想自食

其力，独立生活，也好减轻些家父的负担。”

“这件事，我已在考虑。前几天，我去看了你父亲，那里确实困难，我还丢了几块钱给他。不过你要征求一下你父亲的意见，他好不容易盼来家人团圆。”

“谢谢潘叔叔，我会同家父讲的。”

“你同父亲讲好了，就同我讲一声，以便作安排。”

陈松年到学校去上班，一般是早出晚归，因隔江渡船不方便。傍晚下班一回来，妻子珩光就轻声问陈松年：

“那事你同潘叔叔讲了没有？”

“讲了，他已同意。”

“这就好了。不过要先同父亲谈谈。”

“潘叔叔也是这个意思。”

一家人吃过晚饭后，陈独秀习惯地抱一会孙女儿，逗着玩，逗得好开心，哈哈笑。然后，坐在椅子上点燃一支烟，慢悠悠地抽着。这时，陈松年递上一杯茶，说道：

“伯伯，请用茶。”

“噢。”

“伯伯，小儿有件事想同你老人家谈谈。”

“什么事？”

“我同珩光商量，想搬到学校去住，好减轻家里一些负担。伯伯，你看如何？”

陈独秀听了一言未发，放下手中茶杯，站起来在这斗室里踱步。陈松年直挺挺地站着，双目凝视着父亲，心里扑通扑通跳个不停。妻子窦珩光抱着女儿，也站在陈松年身旁。过了好一会，陈独秀转身对陈松年说：

“你们搬到学校去住也好。我历来主张你们兄弟自创自立，不依靠家庭和父母，走自己的路。”陈独秀又转向养母谢氏说：

“母亲，松年他们想搬到学校去住，你老人家看行吗？”

“松年他们也快30岁了，可以单独去过了。不过要把我那宝贝重重带好。”

“祖母，你也同我们去学校住吧？你老人家一直和我们在一起的。”孙媳妇窦珩光说。

“庆同，你说呢？”谢氏转向陈独秀问道。

“我看祖母还同我们在一起过。祖母年老又患病，在城里看病方便些。”

“松年、珩光，祖母阿拉服侍，你们还有囡囡要照顾。星期天你们可要回来，阿拉弄点好菜给你们吃吃。”潘兰珍插话说。

“谢谢母亲，星期天我们会回来看你们的。”陈松年夫妇说道。

“此事你们同潘叔叔说了吗？”陈独秀问。

“说了，他同意我们去学校住，正在腾房子。”陈松年回答。

就这样，陈松年夫妇就搬到江津德咸坝九中去住了，靠着微薄的工资糊口度日。住下不久，陈松年妻子窦珩光在附近一所小学的幼儿班代课，开始了艰难的独立生活。

## ◎ 贫病交加邓氏再相邀

1937年春夏之交，天公不作美，江津全县无雨，发生特大旱灾，沟渠干涸底朝天，山区、丘陵地带尤为严重，连人和牲畜饮水都很困难。那些善良、迷信的农民烧香求佛，祈求天老爷开恩下雨，可是，夏季小满已届，天老爷仍无动于衷，滴雨不下，水稻无法播种育秧，人们心急如焚，如同热锅里的蚂蚁。直至农历四月中旬始下大雨，才播种育秧，误了季节，秋后粮食收成甚微，造成灾荒。1938年夏季，又是暴雨连连，大片农田受淹，粮食又歉产。这样，灾荒、歉产交加，弹丸之地的江津城粮食极为短缺、紧张，粮价一直有升无降，居高不下，县城百姓叫苦不迭。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大批难民蜂拥而至，如同火上加油，使本已紧张的粮食，更为紧张。粮价骤然

飞涨，一些粮商囤积居奇，闭门不售，引起民愤，以致发生抢米风潮。一天，坐落在县城麻纱市口的“永昌”号米铺，聚集着欲购大米的人群，愤怒斥责“永昌”号米铺闭门拒售，人群高吼：

“挤进去，不售就抢！”

随即一拥而入，争相用口袋装米，店伙计阻止无效，只得听之任之。抢米的人越来越多，街为之塞。抢米风潮来势凶猛，其迟来者未能抢到米的则见米铺就抢米，全城 30 多家米铺，所有大米、碾米、黄谷、碎米均被抢空。然后，抢米人群又涌向江边军粮船，荷枪实弹的士兵，只得对空鸣枪示警，驱散人群，一颗流弹击毙一青年，人群方惊骇逃散。“民以食为天”，米价飞涨，其它物价也随之水涨船高，猛涨不降。这对靠人家资助他和施舍过日子的陈独秀一家三口，那能经受得了。他在给经济上资助他的好友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军杨鹏升一封信中，说他家每月生活费达 600 元，“比上半年加一倍”。因此，贫病相交，生活十分窘迫，常常吃了早餐无中餐，凡能当的东西，大都进了当铺。陈独秀病态龙钟，脸色紫黑，背驼无神，脚上趿着一双破鞋，脚步不稳地在街上走动，知道的人背后指着他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不知道的人只当他是一个年老的市井无赖。

陈独秀穷得连报纸都买不起，常常到一家小书店去翻阅进步报刊。他一进书店门，就站在书架或书摊边一两个小时，临走却很少掏钱光顾生意。店老板心中老大不快，但由于他是知名人士，也不好意思下逐客令。

一次，他沉迷地阅读新书和刊物，由于几天未吃饱肚皮，体弱无力，站的时间过长，竟昏倒在书店里，吓坏了书店老板。老板忙叫店伙计把他好友邓仲纯医生叫来抢救，邓仲纯一见陈独秀躺在地上，嘴吐白沫，只比死人多了一口气，一阵心酸，不禁眼角流出了泪。当年风云一时的挚友，今天却落得个穷愁潦倒的末路者，于心不忍。他清楚地记得，当年同在日本留学时，陈独秀是那樣的充满

青春活力，是一个反清的勇士，是他带头剪掉了辫子；又是他与邹容、张继等，闯入陆军学生监督姚煜家，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把姚的辫子剪掉，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今天，他沦落如丐，挣扎在凄凉萧索之中，作为同窗好友岂能不管呢？应与他风雨同舟，同甘共苦，于患难中见真情。

邓仲纯叫人将陈独秀抬入家中“延年医院”，给他打针、吃药进行一番抢救后，陈独秀渐渐苏醒过来，无精打采地睁开双眼，才知道自己躺在邓仲纯医院里。邓仲纯妻端来一碗面汤，叫仲纯把陈独秀扶靠在病床上，她一口一口地喂着陈独秀。陈独秀觉得挺不好意思，他又感到仲纯之妻并不是那无情的“小气女人”，一扫心中那“闭门羹”的耿耿于怀。此时，邓仲纯妻油然而生同情感，觉得那天也过于无礼了，对不起仲纯好友陈先生，似有愧色，但又不好言表，两人在默默相视中，原谅了对方……

晚上，一向惧内的邓仲纯对妻子说：

“你看仲甫贫病到如此地步，我心里实在难过，于心不忍。”

“我也是一样。我看他那个样子，差点流出泪来，心里也挺不好受。”

“邓家与陈家是世交，我与仲甫又是同窗好友，又都流亡在外，他现在穷愁潦倒，如果我们不帮他一把，看样子仲甫活不了多久。”

“应当帮！明天你给他看病时，顺便再送些钱去。”

“你知道他那个人，一贯自恃清高，洁身自爱，常送钱去，他宁愿饿死，也不会收的。”

“仲纯，那你说怎么办？”

“我想再请他一家三口人住到医院来，和我们一起生活，待抗战胜利后，再一同回故乡安庆。你看怎么样？”

“这……个，不……过……”

“看你又婆婆妈妈起来了，有话就直说吗？”

“陈先生和他老母亲我倒挺同情，住进来我没意见，就是看不



惯……”

“气量放大些嘛，据我看，那个小潘人也挺老实，心也不坏。有些事多看在仲甫面子上，就忍着点吧。”

“好，仲纯，我给你这个面子。他们三口人吃喝没问题，我们吃啥，他们吃啥，不会亏待他们。”

“烧锅的（安庆俗语“妻子”），你真通情达理。明天，我去同仲甫讲，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到时你不要反悔。”

“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像那天闭门谢客的。”

第二天一清早，邓仲纯就背着药箱去给陈独秀看病。走进门一看，只见陈独秀一家三口，手捧着碗，正喝着一眼见碗底的稀粥汤。潘兰珍忙放下碗，亲切地问道：

“邓医生侬早饭吃过吗？”

“夫人，吃过了。”

“侬请坐！”

“仲纯，昨天多亏你救了我一命。其实，不救，让我死了倒也痛快。”陈独秀说。

“仲甫，哪能见死不救，你我情如手足。现在你好些了吗？让我给你再检查一下。”邓仲纯手拿听诊器说道。

陈独秀躺在木板床上，让邓仲纯检查。邓仲纯边检查，边轻声对陈独秀说：

“仲甫，我看你这个样子，一夜都睡不着觉，心里难受极了。我同夫人商定，再次请你一家三口去我处住，吃喝在一起，总比在这里挨饿好。同时，我随时还可给你和伯母看病，也好有个照应。”

“仲纯，你对我仲甫都快把心掏出来了。我铭记在心。谢谢你与夫人的好意，我看不必给你添麻烦了。”

“仲甫，上次内人对你无礼，请看在鄙人面子上，也不要与她计

较了。她也感到内疚,对你不起。”

“仲纯,我一生不知受过多少冤枉气,怎么会与你夫人计较那天的事呢?她也有她的难处。我真不好意思再给你们添麻烦。”

“仲甫,你我都是至交,你这个固执脾气,可以对别人施威,可不能对我邓某如此。你说对吗?”

说着,两人对笑起来。

就这样,陈独秀夫妇及其养母谢氏,在邓仲纯再次热情邀请下,勉强地住进了黄荆街 83 号邓仲纯开设的“延年医院”,依靠邓氏兄弟生活,同在一个锅里吃饭,不至于为一日三餐而担忧发愁了,眼下也只有寄人篱下屈辱而生。邓氏又免费给陈独秀及其养母谢氏治病,潘兰珍手脚勤快地帮邓妻做些家务事,两人维系着面子上的关系,倒也亲热。

陈独秀生活稍微安定,病情也有所好转,便着手研究文字学。闲暇时,常与邓仲纯谈天说地,倾诉衷肠,天涯沦落,两人情谊笃深。

## ◎开明巨商邀游白沙

陈独秀一家三口住进邓仲纯开设的“延年医院”后的一天,陈独秀正聚精会神伏案研究文字学,一张不大的桌子上摆满了书籍和稿纸,不时地摇头晃脑哼着字儿的解说。

“仲甫,你在做学问。”

陈独秀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了思路,猛抬头一看,邓仲纯来了,身后还有一老一少两位陌生客人。老者年近七旬,气宇轩昂,白发苍髯,脸色慈祥,和蔼可亲,身着布衣长袍;少者 20 多岁,西服革履,脸庞清秀,风度翩翩,一表人材。陈独秀见此,忙放下手中的笔,扶案站起,脸上泛起笑容。未等他开口,邓仲纯便向客人介绍道:

“蟾老，这位就是我常同你谈起的同乡好友陈独秀先生。”

“陈先生，久仰大名！”老者和颜悦色地说。

“鄙人不敢当。请问老先生……”陈独秀谦逊地正欲问老者尊姓大名，邓仲纯便接过话音向陈独秀介绍说：

“蟾老，是重庆洪顺祥盐号经理、江津工商银行董事。邓蟾秋先生，在工商界德高望重，故被尊称为‘蟾老’。”

“这位少爷，是蟾老的侄儿，江津工商银行经理邓燮康先生。”邓仲纯又指着那位青年，向陈独秀介绍说。

“陈先生，小辈在上海读书时，曾聆听过你的教诲。”邓燮康彬彬有礼地说。

“噢——少爷，你毕业于上海何校？”

“上海复旦大学市政系。”

“鄙人曾在复旦大学作过演讲。”

“小辈记得，当时先生慷慨激昂，讲得有声有色，对学生很有鼓舞。”

“陈先生，鄙人和侄儿虽然从商，不问政治，但慕你陈先生之名已久，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巨大，意义深远；国难当头，你积极主张和宣传抗日，爱国精神令鄙人敬佩。你偕一家人客居江津，我们叔侄当热烈欢迎。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陈先生日后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叔侄帮助的话，请陈先生直说，不必客气我们将鼎力资助。”

陈独秀听了邓蟾秋老人的一番话，心情激动不已，似乎在凄凉萧索中又寻得知音，于是说：

“我一个外乡人逃难来贵地，能得到蟾老叔侄这样热心关照，实在令鄙人感动，不胜感谢。”

“陈先生，别这样客气，大家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帮中国人理所当然。”邓燮康雍容大度地说。

“仲甫，蟾老叔侄一贯乐于急人之难，十分开明，得到过他接济

的人众多。鄙人在此开设‘延年医院’，也曾得到蟾老叔侄的扶持，我们还相识同宗，结为金兰。仲甫你有什么难处，只要说一声，蟾老叔侄就会向你伸出援助的手。”

“陈先生，今天我们叔侄在仲纯府上与你结识，感到由衷的高兴，欢迎你偕夫人方便的时候，到鄙人故乡白沙去玩玩。好，我们就告辞了！”

“蟾老、邓公子，你们走好！”陈独秀迈着一双不太稳健的步子，送蟾老叔侄出门。

从此，陈独秀与邓蟾秋叔侄过从甚密，感情日渐加深，进而得到他们多方面的照顾。

在江津提起邓家叔侄无人不知，是江津的名门望族。邓蟾秋，名鹤年，江津白沙镇人。能诗善文，一生经商，是积累了近100万元资产的巨富。却能“出淤泥而不染”，他无烟酒嗜好，不嫖不赌，为人正派。自奉甚俭，常着布衣，时戴草帽，有时还穿草鞋，待人接物和藹可亲，在重庆商界信誉很高，被工商界尊称为“蟾老”。他十分开明，不做守财奴，而是博施济众，散其财而不留，常说：

“集财非难，散财实难。集而不散，用而不当，非道也。遗之孙小，资之作恶，尤非道也。”

所以，他把钱用于发展当地的教育，为国家培养人才，他先后资助由其父邓石泉所创办的“聚奎学校”15万元，作为建设和发展之用，他对亲友中有志于学而又苦于无钱上大学的子弟，都尽力资助，使其能就学深造，而留给子孙的只有20万的财产。邓蟾秋对于穷苦无靠的贫民也是十分同情的。他晚年时，出钱筹建江津救济院，并由县政府任命为首届院长，制定了救济孤老、教养贫儿、设诊所施药、施棺施茶、检尸抬埋、灾荒救济等10项任务，同时在故乡白沙举办“石泉义仓”，储备稻谷200石，以赈济受灾群众；储备贷款2000元，以无息贷给生活急需的贫苦群众。邓蟾秋还是一个爱国巨富，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后，他得知日本早就制定了征服

中国的侵略计划,他愤怒地说:

“中华民族不可辱,爱国者要以惊醒国人为己任,团结民众,痛击日本。”

为此,他捐资印刷日本侵略中国的罪恶计划数千份,广为散发,以激发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热情。

邓燮康,1929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他在复旦中学读书时,北伐军正以破竹之势迅猛挺进,邓燮康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经邵力子之子邵志刚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五四运动中,他受陈独秀《新青年》杂志的影响,满怀豪情地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奋不顾身,走上街头散发传单,演讲宣传。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联系人邵志刚远去苏联,他因此和组织失去联系。他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即回江津,任石泉中学校长兼新本女中董事长。1932年,他与叔父邓蟾秋等征股集资10万元,创办了江津农工银行,任经理,使工农群众免受地主及高利贷者的盘剥之苦。抗日战争爆发后,江津农工银行发展为四川商业银行,分支行遍及国内各大商埠,邓燮康任总经理,在金融界享有一定的声誉。后又与人筹划合众轮船公司,任常务董事,以适应当时运输的需要。他极力支持抗日救亡运动。他与叔父蟾秋、缙仙一起,对从外省迁移到江津县和白沙镇的文化机构和公私立大中学学校以及随之而来的名流学者,竭力为他们解决生活和住地的实际困难。其中如佛学家欧阳竟无、文学家台静农、翻译家曹靖华、国立九中校长陈访先、安徽本家延年医院院长邓仲纯兄弟等,都曾分别给予帮助。还有不少流亡学生也得到邓燮康的资助。

陈独秀自与他们结识后,也得到他们的资助。冯玉祥将军到江津宣传节约献金购机抗日,邓蟾秋率儿女辈听冯演讲,深受感动,当即捐献巨款。

1939年下半年,邓蟾秋和聚奎中学董事主任邓缙仙(又名鹤丹),获悉陈独秀生活窘迫,贫病交加,十分同情,便热情邀请陈独

秀偕夫人到白沙小住和休养。

白沙位于长江上游，在江津县境内，离县城 90 华里，上接叙泸，下通渝涪，南驰黔滇，北走永壁。白沙地处长江南岸，靠山面水，沿江而建，交通方便，经济繁荣，是农副产品集散重要集镇，一向为四川著名大镇。抗战期间，白沙又成了文化重镇，沦陷区和重庆的学校纷纷向白沙疏散，人口不过两万的白沙镇，在短时间内，骤增至近 4 万人。聚有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编辑馆、审计部、战区教师服务团以及从大学、师范、中学、小学到幼儿园 20 多所学校，学生近万人。此间，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为了解决来川的抗战将士亲属的生活，亲自在白沙创办了“新运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新运动纺织厂”。

一天，陈独秀偕夫人潘兰珍，应邓蟾秋、邓缙仙兄弟之邀，兴致勃勃，从江津通泰码头乘轮船，溯江而上，约行 3 小时到达了白沙镇。邓蟾秋、邓缙仙及侄儿邓燮康等多人，到江边码头专候迎接。这天陈独秀剃了头，穿着白色对襟褂，戴着一副褐色眼镜，虽然没有当年的风采，但仍可见当年几分教授学者的风度。夫人潘兰珍向后梳着短发，穿着一身略褪色的旗袍，虽然脸色苍白，但仍见几分当年的摩登。陈独秀夫妇走下码头，邓氏叔侄与之亲切握手问好：

“陈先生及夫人，欢迎你们光临白沙！”

“谢谢！谢谢蟾老、缙仙先生及邓公子！”陈独秀举止庄重地说。

“请陈先生夫妇上轿！”邓蟾秋指着停在码头旁的崭新的轿子说道。

陈独秀在夫人潘兰珍搀扶下慢慢地坐入轿内，接着邓氏叔侄也纷纷乘着各自的轿子。几顶华丽的轿子在一队乡丁的护送下，悠悠荡荡地穿过白沙镇，人们驻足而观，好奇地议论着：

“什么大人物？这样隆重。”

“轿子里那女的好漂亮，是这个大人物的什么人？”

“管他什么人，反正是大阔佬。”

轿子绕过弯弯曲曲山城小道，约行两公里，便到了下松林邓氏别墅。这里名副其实，一片松林，郁郁葱葱，山水环绕，小溪潺潺，松涛阵阵。邓氏别墅，依山而建，古色古香，环境优美，幽静安逸，是颐养天年的好住处。陈独秀夫妇下轿后，受到邓氏阖家的热烈欢迎，安排住在设施齐全而舒适的一套住房里。邓氏叔侄视陈独秀为嘉宾，热情款待，晚间又举行家宴为陈独秀夫妇洗尘。邓蟾秋举杯致词说：

“陈独秀先生名扬海外，今日偕夫人，光临寒舍，不胜荣幸！让我们为他们夫妇洗尘，干杯！”

“蟾老、縡仙、邓公子，鄙人偕家人流亡贵地，颠沛流离，承蒙你们叔侄关照和如此的款待，我和内人不胜感激，让我回敬你们一杯！”陈独秀举杯激动地说。

席间相互频频碰杯，酒兴盎然。

“陈先生偕夫人，希望你们在叔父家玩好，吃好，休息好。白沙风光很好，你们可以信步游览。”邓夔康潇洒自如地说。

在下松林邓氏别墅小住期间，每天早晨，邓蟾秋与陈独秀夫妇必到松树林中，寒暄问好，呼吸新鲜空气，或散步在林间小道，或伸臂踢腿，活动筋骨。邓蟾秋自幼习武健身，练就一手好拳，高兴之时，就打上几招，陈独秀甚为赞赏。陈独秀偕夫人常去白沙镇逛街，见有书店或书摊，便多时滞留翻阅书刊，人们认为他是穷教书先生。有时他也品尝那有独特风味的四川小吃，尤喜食和水豆花和麻婆豆腐。晚间便和邓蟾秋摆谈或打几圈麻将，摆谈中很少涉及政治，只谈书法文字、生意经、油盐柴米、天气冷暖、儿女情长，似乎无意关心时局。只是在一次晚餐席上，邓氏叔侄与他闲聊中谈到“西安事变”，邓夔康问：

“陈先生，当时张学良、杨虎城为何不杀掉蒋介石？”

陈独秀不假思索地说：

“不杀蒋介石是延安方面的意见，主要是周恩来的决策。这是

从国家安危、民族前途着想的。如果照当时西北、东北两军一些将领的意见把蒋介石杀掉,那么,何应钦会向日本投降,黄埔学校的军官会发动内战,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会割据一方,坐观成败。这样,国内形成一片大混乱,日本帝国主义者便可坐收渔人之利,而导致祖国加速灭亡。稳定局势,促使蒋介石和全国军民一致共同抗日,是当时唯一的可行之路,周恩来算是一个极有远见的政治家。”

他的这一席话,使在座的邓氏叔侄心悦诚服,说他见解深刻,颇有远见。

俗话说:“树大招风”。随着时光的推移,陈独秀小住白沙镇的消息不胫而走,不少当地或避难于此的社会名流纷纷慕名来访,一般他都谢绝不见,但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午,邀约他去鹤年堂(校礼堂)给学生作演讲,他却欣然同意。这座学校设在名山黑石山上,因山多黑石,故名。黑石山风景如画,山间林木蓊郁,绿荫如盖;楼堂亭宇,隐约其间。黑石大小不一,形状各异,高者十数米,上呈平台,方圆数十平方;游人攀登,可憩息赏景。聚奎中学学生礼堂鹤年堂,就建在山顶。这座形式仿罗马歌剧院,结构仿重庆当时的瀛台大剧院的礼堂,占地约1000平方米,舞台上层为乐台,大厅内有看台三层可容1000人。是由邓蟾秋捐资一万多银元,于1929年建成的,故以他的名字鹤年命名此堂。堂额为于佑任所书。置身殿前,可俯览长江及四周群山景色。山麓有小河环绕,名驴溪,溪水碧蓝。两岸翠竹幽篁,绿草如茵。溯溪而上,不远处有瀑布三重,名高洞、蟾鱼洞、狗跳洞。夏季水涨,洞声若雷鸣,白练腾空,颇为壮观,令人流连忘返,心旷神怡。一天下午,陈独秀在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午的陪同下,来到了黑石山聚奎中学,他伫立鹤年堂前,一览黑石山景色。他着迷了,赞叹不已,对周光午说:

“贵校校园如此优美,雅静难得的育人的好地方。”

“这是蟾老先父邓石泉先生之远见,是他创办本校前身聚奎书



院选址于此的。”

这天陈独秀身穿蓝布长衫，外套马褂，脚踏布鞋，衣着简朴，体态清瘦，白净的脸上两眼炯炯有神，步履从容地走进鹤年堂。全体师生起立，鼓掌欢迎。校长周光午摆手，示意学生坐下，说道：

“同学们，下面欢迎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先生给大家演讲！”话音刚落，全场掌声雷动。

陈独秀操着浓重的安徽口音，慢条斯理，引经据典；抑扬顿挫，心平气和，像拉家常摆龙门阵一样，从匡衡凿壁偷光谈起，劝青年学生要珍惜光阴，努力学习，为民族作贡献。然后，又讲到东洋小日本想霸占中国，全国人民要团结一致，共同御敌，争取抗日胜利。他的讲演虽没有慷慨激昂的语调，但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鸦雀无声。演讲完毕，学生分立两旁，鼓掌致意，陈独秀对每个学生都点头慈祥微笑，稳步前行，显得非常高兴。

时值聚奎中学 60 周年校庆，又逢邓蟾秋 70 大寿。这天，前来祝贺者有当地和避难江津的各界名流以及族戚，真是高朋满座，馈赠盈门，仅各界人士赠送礼金即达 35000 多元。蟾秋老人满怀激情，当即慷慨表示：

“将所接祝寿现金，悉数捐赠聚奎中学。”

蟾秋老人此举，受到众人赞誉，热烈鼓掌致意。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午在接受蟾秋老人捐赠的祝寿现金时，决定将这笔钱作为“蟾秋奖学金”，用以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

在祝寿晚宴上，陈独秀对周光午、高语罕、邓仲纯等人赞叹道：

“一个人聚财不难，疏财实难。像蟾老 60 万家财，以 15 万赠聚奎，5 万元办图书馆，自己留下 5 万元度晚年，其余分赠亲友子侄留学费用，真是不易矣！”宴毕，他兴致勃勃，挥毫写下两行篆字条幅赠予邓蟾秋。一是“大德必寿”，一是“寿考作仁”。邓蟾秋见了这两行篆字条幅，喜笑颜开，为他 70 寿庆大为添色，连声赞道：

“陈独秀先生一手好字，功底很深，苍劲有力，独具风格。明天

鄙人就请石工把这两行篆字条幅，分别勒刻在黑石山风景最好的鹰嘴石和团石包上，以留传后世。”

“蟾老，你过奖了，鄙人只不过即兴写来，以表示对你老人家70大寿的祝贺！”陈独秀兴趣盎然地说。

陈独秀书写篆幅后，又和欧阳竟无、邓仲纯、方孝远、台静农等5人具名，由欧阳执笔写了一篇《邓蟾秋先生七十寿序》，以赞扬邓氏疏财办学之义举。

陈独秀偕夫人潘兰珍，在白沙邓氏别墅，悠闲自得小住两个多月，身体和精神好多了，不好意思再住下去，同时心里还想着那文字学，于是，谢绝蟾秋老人的一再挽留，又回到江津县城。临行时，蟾秋老人送钱送衣物给陈独秀，并欢迎他们夫妇方便的时候再来白沙小住。陈独秀对此，一再向蟾秋老人表示谢意。

这次到白沙小住，潘兰珍又一次开了眼界，倍感陈独秀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爱他并没有爱错，如果不是享老先生之福，她这个普通女工，哪能有机会接触这些巨商和社会名流呢？她对陈独秀说：

“先生，依名气真大，走到啥地方，都有人帮助依，阿拉跟依沾光了。”

“兰珍，我哪来什么名气，现在已穷到这种地步。不过人活在世上要光明磊落，对朋友要真诚。这样，在困难的时候，朋友就会来帮助你。”陈独秀风趣地说：

“兰珍，不是你沾我的光，而是我沾你的光，把你多年的积累都沾了。”

老夫少妻不禁对笑起来……

## ◎ 母亲病故披麻戴孝

在邓仲纯“延年医院”植有花草的院子里，人们常常见到一位年近八旬，两鬓斑白，稀疏银白的发髻，脸色灰白，额头有皱纹，病

态龙钟，双目失明的老太太，在一位年轻妇女的搀扶下，一双小脚，走起路来颤颤巍巍，在院子里散步、闲谈。这位老太太就是陈独秀养母谢氏，搀扶的那位年轻妇女，就是陈独秀的夫人潘兰珍。

78岁的谢氏，是当年陈氏大家庭中的“贾母”式人物，五世同堂，几代人、几房人同在一起生活，她的话就是“圣旨”，说了算数，连官运亨通的丈夫陈昔凡，还得听从她几分。然而，她却识大义，善于管家和理财，处事体面，通情达理。陈家本是绅士们向来瞧不起的小户人家，自陈独秀养父陈昔凡发迹把陈家撑了起来，大肆置房买地，一跃而为安庆的名门望族，为人们所另眼相待。陈昔凡在外忙于官府公事，家业的理财大都由谢氏掌管。为此，她常奔波于北京、上海、杭州等地查问产业经营情况。丈夫陈昔凡1913年病逝后，她则继承丈夫未了之愿，收拾家业破产的残局，又屡经陈独秀外出革命，多次祸及家门，使得她焦虑而双目失明。谢氏虽是妇道家，但她不是爱财如命的“守财奴”。家业兴旺时，她不仅善于理财，而且善于疏财，心地善良，乐于为家族兴办公益之事，接济穷人，在族人中德高望重，受族人尊敬。故《陈氏家谱》上赞曰：

“妣居巾幗，而识大义，能继公（即陈独秀养父陈昔凡）未了之愿，慷慨捐资，重建祠宇，族人怀德。”

一个名门望族的老太太，如今流离失所，沦落如乞丐，寄人篱下，靠人施舍而活，她怎能经受得了这穷愁的折磨？在入川逃难的途中，谢氏就患病在身，到江津后，贫病交加，病越染越重，且又穷得连看病抓药的钱都没有，要不是邓仲纯免费治疗，她早就不在人世了。她与儿子、儿媳住进邓仲纯家的一天夜里，她不忍心叫醒媳妇，独自起来蹲马桶解手，突然头晕目眩，天地转，身不由己扑通一声摔倒在地，马桶踢翻，溅了一身粪便。媳妇潘兰珍闻声起来，点上灯，走进房内一看，只见婆婆昏倒在地，忙上前抱起婆母，呼喊道：

“阿婆，阿婆，依老人家怎么啦！快醒醒！”喊着喊着，潘兰珍泣不成声了。

陈独秀闻讯，忙去叫来邓仲纯。邓仲纯边检查，边说：

“仲甫，伯母这跤摔得不轻啊！身体虚弱，心律不齐，脉搏微弱，我先给她打一针强心针，再给她吃点药，会很快醒过来的。但需要安静休息。”

“谢谢，邓医生。”潘兰珍连连感谢邓仲纯。

自此，谢氏一病不起，媳妇潘兰珍精心照料，日夜守候，喂饭喂药，端屎倒尿，不厌其烦，从无怨言，竭尽孝心。

随着时局的紧张，日本飞机频繁轰炸陪都重庆，江津也几经空袭，人心惶惶。谢氏闻日本飞机声惊恐万状，安庆屡遭日机轰炸的惨状，历历在目，她精神极度紧张，常常处于昏迷状态，虽经邓仲纯精心医治，仍不见好转，病情日趋恶化。邓仲纯凭着职业的敏感，不得不对陈独秀夫妇说：

“仲甫、嫂夫人，伯母病势严重，看样子弥留的时间不会太长了，你们思想上得要有个准备。”

“仲纯，这怎么得了，她老人家万一归天，那后事……”陈独秀含着泪焦虑地说。

“仲甫，这你就放心好了，一切由我们弟兄负责。”

“这，这……怎么行呢？”

“仲甫，伯母如我母，她老人家也够苦的了。”

说话间，谢氏似昏迷似苏醒，不断呼唤着：

“松年，珩光……”

“仲甫，看样子伯母想见见松年一家，我这就托人过江送信去。”

邓仲纯走后，陈独秀悲伤叹息守候在养母床前，不时轻声地叫着：

“母亲，母亲，孩儿在你身边，你快醒来。”

此时，潘兰珍从婆母一只藤箱里，找出婆母在家乡安庆早已做好的寿衣，放在床上，一旦危急之时，便给婆母穿上。

陈松年一家闻讯，哭哭啼啼赶来。松年夫妇见祖母昏迷地躺在床上，脸色惨白，失去了往日慈祥的笑容，泪如雨下，哽咽呼唤：

“祖母，祖母，我们看你老人家来了！”

陈松年夫妇与祖母谢氏朝夕相处，相依为命，感情深厚，陈独秀远离家门几十年，松年生母又过早离开人世，家中一切均由祖母操劳。陈松年从记事时起，就未见祖母过过安宁日子，而祖母对他们疼爱万分，几乎一手把松年教养成人，把他们夫妇视作陈家的命根子。现在，祖母生命危在旦夕，松年夫妇怎能不痛彻肺腑。

许久，谢氏半迷半醒，无精打采地睁开她那双眼窝下陷的眼睛，慌乱无主地瞧瞧守候在身边的儿子、儿媳，又瞧瞧孙子、孙媳和重孙女，十分费力地用手拉着儿子、孙子的手，嘴巴一张一合，想说些什么，但又说不出来。松年见状，忙将耳朵贴近祖母嘴边，想听听祖母说些什么。谢氏用尽全身力气，从半张半闭的嘴里，断断续续地吐出最后一句话：

“你……们……要……带……我……回……家……”

话音未落，谢氏头一偏，四肢一阵躁动，挣扎似地走了……

顿时，陈独秀一家嚎啕大哭，悲声阵阵，一齐扑向死去的谢氏。陈独秀悲痛欲绝，老泪纵横，心胆俱裂地哭诉着：

“母亲大人，孩儿对不起你，未对你敬孝心，未给你享一天清福，你老人家就这样走了！”

这时是1939年3月22日。历经陈家由破屋发家兴旺衰落的谢氏，走完了她那喜悲参半的人生旅途，凄凉地客死异乡。

邓仲纯夫妇听到陈独秀一家悲痛的哭声，知谢氏已离开了人世间，不禁一阵酸楚。邓仲纯叹息不已。

“陈老太死得实在太苦，仲甫一家哭得伤心，我们还是快过去看看，安慰安慰仲甫一家。”邓妻同情地说。

“好，我们去看看。帮他把丧事料理好，大家都是同乡好友。”邓仲纯应声说道。

“仲纯，你不是同寿材店打过招呼吗？”

“是的。前两天我看陈老太病情恶化，要寿材店留一只木质好一点的棺木。”

人，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流落江津的难民成千上万，由于难民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年老体弱生病者多，死亡者也多。这样，江津寿材一时供不应求，寿材店由一家而增至几家。所以，邓仲纯事先向寿材店打招呼订制。由此可见，邓仲纯兄弟对陈独秀一片同情和真挚之心。

陈独秀一家见邓仲纯夫妇来到，悲声震天动地，邓仲纯夫妇双膝跪下，向谢氏叩头致哀，不禁悲痛哽咽。陈独秀一家忙向邓仲纯夫妇叩头致谢，邓仲纯夫妇抑制住悲痛，忙扶起陈独秀夫妇及其一家，安慰道：

“仲甫、嫂夫人，请你们全家节哀，不要过于悲痛。伯母年近八旬，今日仙逝，也算是高寿了。”

“仲纯夫妇，母抚我之恩，等于生母，我对不起她老人家，未竭尽孝心。晚年受苦，又病逝于异乡，我岂不伤心恸哭。”

“仲甫，你的心情，我与内人完全理解和同情。现在，还是商量商量如何把伯母后事料理好。”

“仲纯，你看我这个穷样，身无分文，母亲这后事……唉！”

“仲甫，我与兄弟季宣已商定，伯母的丧事，我们全力资助。不瞒你说，伯母的寿材我已向寿材店定做了。”

“仲纯夫妇，你们待我陈某这等恩情，我永远铭记在心。”

说着，陈独秀向邓仲纯夫妇跪下连叩三个头，全家人见了，也一同跪下叩头。邓仲纯夫妇，忙弯腰将陈独秀一家扶起，说：

“仲甫，你们快快起来。你我都是手足情深的好友。”

陈独秀一家起来后，邓仲纯又说道：

“仲甫，你看这丧事如何办？”

“仲纯，我看一切从简，三日后安葬，便可。”

“仲甫先生，我看不能过于简单，按照我们安庆人的习俗办，鸣放鞭炮，吹吹打打，也好为安庆人争点体面。”邓仲纯妻说。

“仲甫，就按内人意见办，如何？”

“仲纯，那一切就拜托你们了。”

谢氏噩耗传出，安徽同乡好友潘赞化、方孝远等及邓蟾秋、邓燮康叔侄，纷纷解囊资助陈独秀办理母亲丧事。

出葬这天，陈独秀披麻戴孝，匍匐痛哭。在盖棺时，一家老小，扒着灵柩，哭娘呼祖母的悲戚痛哭，声声俱动悲情。陈独秀对母亲哭诉着：

“母亲，你老人家安度亡灵吧！待抗战胜利后，孩儿和松年一定带你老人家回安庆。”

猛然间，只听得杠夫一声喊，黑黝黝的棺木离地。孝眷分两队，乱攘攘哀号动天，鞭炮齐鸣，僧侣披袈裟，拍动那金铙铜钹；鼓乐手，吹吹打打，声震天地。“八仙们”抬着灵柩，徐徐抬过黄荆街、通泰街……沿途乡邻为安徽人鸣放鞭炮，送葬的独特习俗吸引众人驻足夹道而观，似长长的送葬队伍……

陈独秀安葬老母后，他那苍白的脸上还挂着深深的泪痕，深陷的眼睛布着血丝，没精打采，呆呆地坐着，无言无语，显得十分的悲痛。多日不见外人，也不出门，他在给友人杨鹏升的信中，深沉地表述了他的悲痛心情：

“弟遭丧母以后，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乎半聋，已五十日，未见减轻，倘长久如此，则百事废矣。先母抚我之恩，等于生母，心丧何止三年。”

陈独秀当年以反封建礼教著称于世，几十年之后，母亲谢氏去世，也披麻戴孝，遵守中国人传统的“丧制”，以尽孝道，寄托对母亲的怀念和哀思。故他在给杨鹏升的信中说：

“形式丧制，弟固主短丧，免废人事，然酒食应酬以及为人作文作书，必待百日以后。”

## ◎ 遭“抢白”退隐鹤山坪

陈独秀飘泊江津，危难之中盼望阖家团圆，没享受几日天伦之乐，经济无源，食不果腹，小儿被迫自立谋生，母亲含苦又离去，家破人亡，痛苦难熬，只得寄人篱下屈辱求生。陈独秀自幼性格刚烈，个性极强，抛弃家庭优越的生活条件，走南闯北，独创人生，今日寄人篱下，靠人施舍而生，这如同一条绳索套在脖子上难受难熬，极大地损伤了他的自尊心，然而流落他乡，贫病交加，穷途末路，又有何办法？

陈独秀一家流亡江津，亏得邓仲纯兄弟俩的接济和帮助，是难得的“同病相怜，同忧相交”的挚友，即使邓仲纯之妻，也是善良厚道、乐意助人的女性。对陈独秀一家三口吃喝住，对陈独秀及其母亲免费医病，邓仲纯之妻无一点怨言，落落大方，一锅吃饭，亲如一家，没有一点亏待。尤其在资助陈独秀营办母亲丧事中，识大体，顾及邓氏兄弟的面子，表现出她一片诚心和助人的美德。然而，她毕竟是旧式的妇道人家，那封建礼教的“三纲”、“五常”，又使得她气量小起来——惟独对陈独秀这对老夫少妻，横看竖看，总是看不顺眼。尤其是医院病人来往不绝，来者不知，总是好奇地问长问短，或者七嘴八舌地议论讥讽一番，她每每听到，满肚生火，伤风败俗，有损邓家的声誉。然而，她看在邓氏兄弟的面子上，时时处处采取一个“忍”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忍则忍，能让则让，只盼抗日胜利，各自返回家园。

人们常说，新疆东部天山脚下的吐鲁番盆地，气候干燥少雨，夏季炎热如焚，是我国最热的地方，自占有“火洲”之称，但还不是真热得不可忍耐之地。夏季里确实让人热得难以忍受的，是全国闻名的长江沿岸南京、武汉、重庆“三大火炉”，那种闷热劲儿，直使你觉得度过一个暑夏好像遭了一场病似的。江津就位于这“三大火



炉”之一的重庆河谷地带，夏季晴空万里，骄阳似火，把大地晒得“鼻孔生烟”。患有高血压症的陈独秀，实在难熬这“火炉”辐射之热，尽管足不出户，扇不离手，仍然是汗流浹背，热不可耐，张着大口，心胸难受，只得经常光个大膀子，下身只穿条裤衩，三家十几口挤在一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确实不大方便，而又不雅。对此，邓妻早已看在眼里，忍在心中，怒火闷在心头。但是忍耐是有限度的，只待时机一到，“忍”字就会像火山一样迸发而出。

这一天果然来到了。

1939年7月的一天，江津山城天气燥热异常，烈日灼灼，一丝风儿也没有。陈独秀身热如焚，大汗涔涔，胸闷、头晕，手中的扇儿不停地摇着。邓季宣六七岁十分顽皮的儿子，看见陈独秀光着头，穿裤衩，打赤膊，在客厅中不时地用他夫人递来的毛巾抹汗，觉得好玩，连蹦带跳地跑到陈独秀的背后，竟用手摸陈独秀的屁股玩，嘴里还亲切地喊道：

“陈伯伯好！”

对此，陈独秀顿时光起火来，把对闷热天的厌烦，化作对孩子的大声斥责：

“没有教养的伢子！”

陈独秀用力挪开孩子的手，狠狠地瞪着眼，小孩吓得呜呜地哭了起来。邓妻闻声疾步跑到客厅，火冒三丈，“忍”字抛诸九霄云外，怒气顿生，指着陈独秀的鼻子，破口厉声斥责：

“你说别人没有教养，你还是先看看你自己吧，都快60岁的老头子，还骗娶人家年轻的大姑娘做老婆，你这是什么教养？”邓妻怒不可遏地又数落道：

“三家十几口人挤在一起，男男女女一大屋子人，你一个老头子赤身裸体在中间转来转去，你这又是什么教养？”

陈独秀被邓妻这一顿机关枪似的抢白后，脸色红一阵，白一阵，耷拉着脑袋，狼狈不堪，一声没吭。他夫人潘兰珍见自己所崇爱

的老先生被邓妻如此辱骂，心痛如针刺，真想与邓妻舌战一场，把平日所受的怨气，统统发泄出来，以解心中之怨气。然而，她顾及陈独秀的体面，看在陈独秀与邓仲纯兄弟的情谊上，她还是强行克制了自己，忍气吞声，泪流满面。在前厅给人看病的邓仲纯闻声赶来时，邓妻仍在指手划脚地数落个不停。未待惧内的邓仲纯开口，邓妻又把他骂得狗血喷头：

“亏你做的好事，给人家白吃白喝，还落得个‘没教养’的名声，世上那有像你这样的肉头？我受不了……”骂着，邓妻又哭了起来。

邓仲纯被妻子骂得发愣，双手颤抖，不敢吭一声，只是呆愣着摇头……

陈独秀受到邓妻的如此抢白，精神和人格受到从未有过的极度刺激，血压升高，再次领略了无家可归，寄人篱下屈辱求生的滋味，一病数日不起。邓仲纯给他看病时，一再向陈独秀表示歉意：

“仲甫，很对不起你，请勿和妇道人家一般见识，她这个人就是心直口快，不顾前，也不顾后。”

陈独秀再也无法忍受下去，只是听着，一言不发。

这时，北大同学会派来照顾他的北大学生罗汉在日本飞机对陪都重庆实行战略轰炸中罹难，他再次陷入悲痛之中。加之江津邻近重庆，也屡遭轰炸，陈独秀更是惊恐不安，感到江津很不安全，一听到警报声或飞机声，他顿时感到紧张，心脏猛烈跳动，神不附体。于是，他又通过他在北大时的学生江津县县长黄鹏基的安排，住到江津大西门江津一中校长施民瞻家——“延陵别墅”。这个大院坐落在山坳里，交通闭塞。施家小孩又整日吵闹，使得他不得安宁，但又无处可去，只得暂时栖身于此。

事也真巧。这时，他偶然在街头地摊上发现一本《皇清经解》的手稿，署名江津杨鲁承。他如获至宝，认为写得很好，花钱买下，尔后四处打听杨的情况。一次与邓燮康等人在茶馆喝茶闲聊，他谈及此事，邓燮康告诉他：

“杨鲁丞是前清进士，很有学问，在江津很有名望，受人尊敬，但已过世。家住离城 30 余里的鹤山坪，家里还有后人在。”

陈独秀拿出那份手稿说：

“我花了两天时间，反复看了几遍，写得不错，很有价值。”

接着，邓燮康又告诉陈独秀：

“当年号称‘经史大家’的章太炎来川时，杨鲁丞曾把手稿拿去请教章太炎，但章太炎不欣赏他的作品，批了‘杂乱无章’几个字，气得杨鲁丞书都未写完就一命呜呼了。”

“杂乱无章没关系，只要稍加整理，就会有章了。”陈独秀说。

在邓燮康的帮助下，几经周折，陈独秀终于找到了在重庆任职的杨家后辈杨学洲先生，愿代为整理遗稿成书。杨被他的精神所感动并慕他的大名，就将杨进士鹤山坪石墙院旧居，借给陈独秀夫妇居住。这样，陈独秀偕夫人潘兰珍隐居鹤山坪，度过了他那凄凉的晚年。

---

## 第九章

### 隐居鹤山度春秋 家徒四壁节不变

---

#### ◎隐居石墙破屋的神秘老人

“鹤山名不著，地僻人罕寻。”鹤山坪是偏僻山间丘陵之地，地广而人烟稀少，四周高山丛林，远看似仙鹤挺立，故而得名。鹤山坪为两个乡所共有，一是因历史上出过五个举人而得名的五举乡，又名双石乡；二是因产亚麻和藤柳而出名的麻柳乡。五举乡乡政府所在地，历来为逢二、五、八赶场的集市。这里山青水秀，梯田层叠，茂林修竹，郁郁葱葱，溪水环绕，流水潺潺。一条曲曲弯弯的羊肠山路，蜿蜒通往江津县城，交通不便。一般山里人走上走下，只有爬山而行，有钱有地位者可乘滑竿，当地人称之为“轿来轿去”。攀登羊肠山路而至五举乡集市，这里有一片空场，两边有几片山间平房小店铺，向南而行，登一条石板路上丘陵地，穿过田间平缓的石板路，约行一公里多路，便到了前清二甲士杨鲁丞旧居——“杨氏山庄”石墙院。石墙院为一四合大院，坐落在鹤山坪的最高处，背山面水而立，当地人说是仙鹤的头，是风水宝地。青瓦石头高墙，石砌的八字门楼高

大，内嵌石屏风，两扇大门油漆斑驳，庭院内有一长方形花池，石条凳上放有多盆花草，清香回溢。院内有正房、客厅、厨房等 20 余间。大门外刻有“节孝牌坊”。沿墙植有多棵大黄桷树，后门植有一片竹林，蓊郁清幽，如同一顶翠绿的伞支撑在石墙院上空，远看气势异常的宏伟、幽静。只是因年久失修，墙皮亦已多处脱落，门楼的瓦也残破不全了，只能见其初建时的规模，却不见当年的光彩。石墙院大门外是一块空场，是当年杨家搭台唱戏、停马、停轿的地方。空场之外，有稀落的贫寒农舍，还有一家小杂货店。

1939 年的一天，“地僻人罕寻”的鹤山坪，突然来了一位神秘的老人和一位年轻妇女，一下惊动了少见多怪的山里人，从四面八方涌向石墙院观看。这位老人 60 来岁，腰弓背驼，老态龙钟，头顶花白稀疏头发，脸色苍白，眼皮浮肿，无精打采，穿着长衫，似一位老学者；那位年轻妇女 30 来岁，清瘦单薄，乌黑短发，白皙的脸上长有几颗暗黄色的雀斑，目光温和，举止干练。这就是陈独秀及其夫人潘兰珍。但这些山里人并不知来者何人，只觉得神秘，这一老一少究竟是何种关系，又为何住到山里来？这座偌大的石墙院，只住有女主人、主持家事的杨二太太（杨鲁丞的二孙媳）及其女佣人。杨二太太见陈独秀夫妇来到，高兴又热情，忙叫女佣人吴国兴让出她居住的一间近 30 平方米正房和一大一小两间厢房给陈独秀夫妇居住，并叫来乡间瓦匠在杨家厨房中靠门的一隅安上锅灶。陈独秀对女主人如此的照顾，连连表示感谢。女主人杨二太太说：

“学渊少爷从重庆来信说，陈先生要来石墙院居住，要我让出几间房给陈先生住。家中后辈都在外地任职，我已年老体弱，照顾不周，还得请陈先生及夫人原谅。”

“哪里，哪里，杨太太对我们外乡人如此关照，让出你住的正房给鄙人住，实在感激不尽！”

陈独秀步入鹤山坪，四周眺望，大有“世外桃源”之感。虽然偏僻，但幽静安谧，可以安下心来从事文字学研究和帮助整理杨进

上的遗稿了。潘兰珍由于穷苦人家出身，幼年过惯了穷困生活，又随陈独秀四处飘泊无定，对于环境的优劣也无所选择，只要老先生高兴、满意就行了。这样，陈独秀偕同夫人潘兰珍，就在杨氏山庄石墙破院安住下来，也算又有了个临时的“家”，可以自由生活，不再受他人的“抢白”了。

杨氏山庄石墙院，是当年“地僻人罕寻”的鹤山坪的豪门，犹如陈独秀安庆家乡那座“大洋房”一样，是本地的大庄园，闻名江津县，令人羡慕和刮目相看。杨氏建造石墙院时，正是官运亨通，家业兴旺发达之时，为建造石墙院，杨进士特从重庆请来了设计师，选了这块最好的风水宝地，请了江津有名的石匠、瓦匠而兴建了这座冬暖夏凉的“杨氏山庄”。这座山庄建成后，便成了山里人荣华富贵的象征。然而，随着杨进士的过世，后辈大多在外读书谋职且又有地位，谁也不愿回山沟来厮守这山庄，“杨氏山庄”便渐渐失去光彩，年久失修，阴暗潮湿，泥土地面，顶上又无天花板，四处通风。夏季住在里面，比在江津凉爽得多，自由得多，陈独秀也无须打赤膊了。可是，冬季到来，山高风大，西北风吼叫，里面寒风阵阵。三九寒天，屋内可要结冰块，寒气袭人，冷得御寒棉衣单薄的陈独秀不敢出门，终日烤火取暖。雨季到来，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满屋积水，日子实也难熬。室内家具十分简陋，仅有从杨家借来的一大、一小两张木床、一张书桌、几条木凳以及几个装满书的旧箱子，一间书房的地上堆满了书。然而，家虽破，但陈独秀心境平静多了，与世隔绝，悠闲自得，深居简出，潜心研究文字学，忙于整理杨进士遗稿。

一天，杨进士的一位名叫罗务滋的亲友，提着土特产、水果等，慕名来鹤山坪造访陈独秀。他见陈独秀这个学识渊博，又有名望的人物，闲居在偏僻的鹤山坪，一副清寒“隐士”的样子，感到十分不解，不禁问道：

“独秀先生，中国之大，蜀地之广，江津白沙是一县中心，哪里

容不得先生，为何偏偏闲居在鹤山坪这个僻远的小地方？令鄙人不解。”

“罗先生，鄙人闲居鹤山坪，潜心研究文字学，似如‘世外桃源’，生活虽清寒，但胸怀却坦荡，自由逍遥，鄙人几十年来，从未过过这样的坦荡生活。只有身临其境，方能觉得消闲自得。”陈独秀悠闲自得地说。

“独秀先生，想当年，你五渡东瀛求学，为寻求和宣传真理，你奔波于北京、广州、上海、南京……桃红洒绿的大城市，见过世面，经过风风雨雨，名震海内外。如今你闲居深山老林，难道不感到寒碜和心酸吗？”

“务滋先生，正如你所云的一切，我才更觉鹤山坪是我难觅的栖身之地。不觉寒碜，也不觉心酸，尤觉坦荡自乐，现录一诗，奉答务滋先生。”他抓起笔来挥毫写道：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罗务滋奉读陈独秀录的诗，赞叹不已，为陈独秀胸怀坦荡的乐观精神所感动，说道：

“独秀先生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斗士。”

“哪里，哪里……”说着，两人哈哈笑了起来。

然而，饱经患难后的陈独秀，内心还是十分孤独、悲观和无限怅惘的。他送给酒友的一首诗，正是他这时期心境的写照：

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  
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

这是他 1941 年 7 月，听说友人周光午、何之瑜、台静农、魏建

功等，于屈原祭日相聚大醉之事后，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诗兴大发，挥毫写了这首诗赠给魏建功。诗中抒发了陈独秀万念俱灰、悲观忧郁的心情，他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一生，而大半政治生涯归于“失败”，若是如此屈死异乡，倒不如像西晋皖人“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那样，醉生梦死在故乡而后快。

### ◎破屋常有要人访

鹤山坪本是个不出名的经济落后、生活贫苦的地方，少有名入、要人光顾这里，连地方“父母官”县太爷，在这里也难以觅得他的足迹。但自陈独秀这个神秘人物隐居在石墙院破屋后，这里似乎一下子也出了名，造访者纷纷而来，令山里人神秘莫测。

一天，五举乡乡政府突然通知赶场集市和农户打扫卫生，人们感到惊奇，还没听说过乡下和城里一样，要打扫街道和农户的卫生，问乡长这是怎么回事？乡长只告诉说，县里有人要来看住在石墙院的那个老头儿。

果然，不到中午时分，一顶轿子在几名随行人员陪伴下，抬到了石墙院大门口空场停下。从轿子里走出一位身着长袍，脸庞清秀，举止庄重，神气十足的50岁左右的先生，突然来访陈独秀。随行人员敲门通报说：

“陈独秀先生在家吗？新任县长罗宗文先生前来拜访。”

陈独秀一听，是新任县长来访，忙叫夫人潘兰珍开门请进，紧跟着陈独秀也迈步来到门前。随从人员介绍道：

“陈先生，这位是新上任的罗宗文县长！”

“欢迎！欢迎！”陈独秀笑脸相迎。

“陈先生，你的大名，鄙人早已慕名在心，今特来一拜！”罗县长带着尊重的口气说。

“岂敢，岂敢！”陈独秀连忙说。



“陈先生，你偕夫人住这偏僻的地方，可好？”

“这里比县城安静多了，只是人老不中用了，身患高血压和胃溃疡多种疾病，久治不见好转。”

“这都是慢性病，需要好好地治疗和调养。”

彼此寒暄几句之后，陈独秀问罗县长：

“现在粮价猛涨，你这位新上任的县太爷，将采取何种办法？”

“省府指示是叫压一下，各县把粮价压低在某一天的价格上，不准自由涨价。”罗县长说。

“压也不是办法。”

“当然，硬压是无效的。不过，鄙人刚到任，对地方情况不够了解，还没有制定平抑粮价的具体措施。省府的命令，当然也要因地制宜才行。不知陈先生对此有何高见？”

“鄙人只希望粮价平抑下来，以安民心。”

“陈先生，听说你的书法很好，很有造诣。”

“哪里，哪里。写字既要有天赋，又要有功夫，天赋表现在外秀，也要下功夫锻炼内劲。”

陈独秀见罗县长十分赞赏他的书法，感到很欣慰，说道：

“宗文先生，为祝贺你荣任县长，鄙人送你一个条幅，即杜甫《七律·曲江对酌》第二首的后四句：

穿花蛺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

罗县长接过条幅，赞赏道：

“独秀先生，你的字果然不凡，达到了‘外秀内劲’境界。”罗县长来访陈独秀，这是他到任之初，照例是要对当地有代表性人物作一次礼节性的拜访，因已预先约定去拜访另一知名人士欧阳竟无，便匆匆告辞而未详谈了。

县长拜访陈独秀，一时间轰动了静僻的鹤山坪，一传十，十传百，更觉得石墙院内这位老先生神秘，是个大人物，连县太爷都来看他。于是又引来许多当地老百姓的来访者，有的还带着菜或土豆什么的，来看这位神秘的老人。对此，陈独秀感到十分欣慰，凡有来者他都叫夫人潘兰珍烧水倒茶热情招待，有时还和他们亲切地摆龙门阵，让人感到，这个神秘的老人可怜、可亲，没有架子，天长日久，有的成了他的常客，彼此见面，都要亲切地打声招呼。

可是，有的来访者，比县太爷大几倍的人物，却不像县太爷来访那样，兴师动众，打扫卫生，而是静悄悄的，无人知晓。

陈独秀在石墙破屋住下不久的一天，突然，来了两位穿着简便服装，手里拎着水果和茅台酒的密访者。边敲门，边呼唤着：

“独秀先生在家吗？请开门。”

闻敲门声，一位身着贴身旗袍而文静的50来岁妇女，疾步来到门前，隔门问道：

“哪位先生？你找谁？”

“我是戴笠，和胡宗南将军特来拜访陈独秀先生。”戴笠应声答道。

“请你们稍候一下，我向独秀先生通报一下。”

这位妇女，就是黄埔军校著名政治教员高语罕的夫人。她转身走进房内，向陈独秀通报说：

“独秀先生，你猜来者是谁？”

“谁？”陈独秀和在一旁的一位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学者模样的老者，不约而同地问道。

“胡宗南和戴笠来了！”

“啊，是他们，他们来干什么？”陈独秀意外而感到震惊地说。

“见不见？独秀先生。”高语罕夫人问。

“语罕先生，你说呢？”

“既来了，就见一见吧。”

“好，那就请他们进来。”

高夫人应声忙去开门。门开见人，戴笠快语道：

“是你！高师母你好。”戴笠先是一惊，后又亲切地问好。

“语罕老师在吗？”胡宗南问道。

“独秀先生请你们进去，语罕也在。”

此时，陈独秀和高语罕起身迎客。

“高老师，独秀先生，你们好！”戴笠礼节性地说。

“宗南将军，久违了！”高语罕上前握胡宗南的手说。

四人相互握手问好后落座，高夫人与潘兰珍忙沏茶招待。

陈独秀开门见山问道：

“两位来寒舍，是不是蒋先生关照要来的？”

“是的，独秀先生，蒋校长问你好。”戴笠无可隐讳地说。

“鄙人是逃难入川，现隐居僻静山村，虽以国事萦怀，却并不与闻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不知二位来鄙处，有何见教？”陈独秀慢悠悠而幽默地说。

胡宗南将一张剪报递给陈独秀。陈独秀展开一看，这是1938年3月，傅汝霖、段锡朋、高一涵等9人在重庆《大公报》上，为康生诬陷陈独秀为“日本侦探”，每月领300元津贴的事件而发表的辩护启事。陈独秀看后，气愤不已，边抖着剪报，边说：

“此诬陷之事，虽经徐特立先生调解，但我陈某的人身受到极大的攻击，至今仍未忘怀。”

“独秀先生，你为人坦诚，胸怀若谷，你受到人身攻击一事，大家不平则鸣。傅汝霖等先生为你恢复名誉的启事，乃国人之公论，民心之所向。”胡宗南说。

“感谢诸位先生为鄙人鸣不平。”陈独秀有些激动地说。

“独秀先生，事已过去，那就让他过去吧。”胡宗南安慰道，接着又说：

“今天鄙人和戴笠主任特来求教，请陈老谈谈对国事的看法。”

陈独秀默默思考，眼睛凝视手中的剪报，又看看高语罕，慢条斯理地说：

“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是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弱国强敌速战困难，只有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渡过……本人国事孤陋寡闻，惟不愿公开发表言论，以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陈老见解深谋远虑，有远见，定转告蒋校长。告辞了，请陈老多保重，也请语罕先生夫妇保重。”胡宗南、戴笠边说，边走出石墙院，与陈独秀等握手告别。

陈独秀本想“息影鹤山心自闲”，与世隔绝，远离那喧闹的城市，远离那人间是非地，一心闭门做学问，做个道地的“隐士”。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要人一个接一个不畏山路蜀道难而来访。在这许多要人来访中，令他最难忘的还是那次周恩来的来访。

一天，陈独秀胃病发作，痛得在床上打滚，大汗淋漓。突然，夫人潘兰珍进来通报说：

“老先生，有两位客人要见您？”

“姓什么？什么样子？”陈独秀忍着痛问。

“一位身着长衫，头戴礼帽，浓眉大眼，满脸胡茬子的先生，操着苏北口音，说他姓周。”

“啊！姓什么？”陈独秀惊喜地一骨碌坐起，靠着床反问道。

“他姓周！”潘兰珍又重复一遍。

“难道真的是他，恩来？兰珍快请这两位先生进来。”

潘兰珍疾步向石墙院大门走去，打开两扇大门，有礼貌地说：

“两位先生请进，老先生身体不好，在房里等候你们。”

周恩来在朱蕴山的陪同下，一走进石墙院，一股凄凉、萧索之气向他袭来，不禁一阵心酸。走进房内，只见陈独秀手捂着胃，倚坐在一张木床上。盖着一床破旧的棉被，床上还放着一些发了黄的书籍，有的还夹着小白纸条。周恩来亲切地问道：

“独秀先生，久违了，你好！”

“独秀先生，恩来在百忙中，特地从重庆来看望你。”朱蕴山说。

“恩来、蕴山你们好。你们来看我陈某，不胜感激。”陈独秀费力地欲支撑起来说。

“独秀，你就靠着，不要起来。”周恩来说着，走到床边与陈独秀握手。陈独秀握住周恩来的手，心里一阵潮涌，不禁眼睛模糊，往事禁不住涌上心头。

周恩来跟他的儿子延年一般大的年龄，又是他当年的下级，但周恩来这位年轻英俊、政治上敏锐、才华出众、稳重老练、考虑问题周道、谦虚宽厚、从不炫耀自己的苏北人，给他留下深刻而良好的印象。他还记得，1927年“八·七”会议，他被解除党内总书记职务后，他仍在汪精卫通缉之列，在白色恐怖下非常危险，周恩来却没有对他另眼相待，仍跟从前一样关心他，安排他和秘书黄玠然到地下党开设的汉口花楼街的纸号里住下。纸店老板对他们很热情，也很关照，把他们当作贵宾接待，饭菜全是店里伙计到饭馆里去买，每顿饭菜都不一样，吃起来很适合他的口味。陈独秀对纸行老板的热情款待心感不安，便问黄秘书：

“小黄，你知道我们吃喝住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黄秘书看样子没法再隐瞒下去了，便如实告诉他：

“总书记，钱是周恩来同志自己掏的腰包。他把箱子里能变卖的东西全翻出来，让人拿到街上卖了，同时，他还向身边的同志借了一些钱。”

“原来是这样……”陈独秀感慨万端对黄秘书说，

“这实在难为周恩来同志了！”

这件事，陈独秀至今记忆犹新，今天，当他穷愁潦倒，英雄末路之时，又是他——周恩来，不顾工作繁忙来看他。想到此，陈独秀凄凉的心涌起一阵暖流……

“独秀先生，你身居山中，日后有何打算？”周恩来问道。

“恩来，我已病成这个样子，还能有什么期望和打算呢？只想在这僻静的地方，养养身体，研究研究文字学。”

“独秀先生，恩来这次特来江津，除探望你陈老外，还是想劝你去延安回党工作。同时，那里条件比这里总好些，还有外国的医生，可以给你治病。”

“独秀先生，你毕竟当过几届党的总书记，希望你抛弃个人成见和固执，以国家、民族为重，写个书面检查回党工作吧。毛泽东主席和中央的其他同志，都希望你去延安。”周恩来劝说道。

“恩来，我还是那个主张，回党工作为我所愿，惟书面检查……”陈独秀停了会，又转向朱蕴山说：

“李大钊死了，延年死了……除恩来、毛泽东，党中央没有我可靠的人了。我也落后了，年纪也大了，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陈独秀直言不讳地说。

“独秀先生，中央绝无强勉之意，请你再慎重考虑考虑，什么时候愿意去延安，中央都欢迎。希望独秀先生多保重，如果想去重庆看病，可随时去重庆找我，一定为你提供方便。”

“谢谢，恩来！”

“好，我们就告辞了，以后有时间，我们再来看你！”说着，周恩来、朱蕴山与陈独秀握手告别。

“恩来、蕴山，我这身子实在支撑不起来，不能送你们，请见谅，再……见……”陈独秀望着离去的周恩来、朱蕴山的背影，心里倍觉凄凉，胃又一阵剧烈地疼痛……

## ◎ 破屋穷愁友情暖

1939年冬的一天，北风嗖嗖，滴水成冰，山里的穷人闭门烤火御寒，不见人影。一位穿着狐皮袍、长髯伟岸的老者，翻山越岭，攀

羊肠小道，气喘咻咻地来到鹤山坪石墙院。

这位老者敲门踏进石墙院破屋，一见陈独秀穿着单薄破旧的棉衣，冷得瑟瑟颤抖，一阵悲酸涌上心头，不禁洒下了同情泪，当即将身上穿的狐皮袍解赠予他。陈独秀执意不收，这位老者含着泪花，颤抖而无限感慨地说：

“仲甫，你我在辛亥革命时，就是生死与共的老朋友了！当年反袁世凯时，你年轻有为，不怕杀头坐牢，一派英雄气概。今天，你穷困到这种地步，我送你一件衣服聊表老朋友一点心意，也不行吗？你若执意不收，我立即告辞！”

这位老者不是别人，正是国民政府委员、陈独秀好友柏文蔚将军，自湖南永绥到陪都重庆开会，会后专程来此看望陈独秀。

陈独秀被老朋友发自内心深处而充满深情厚意的肺腑之言，深深感动。顿时，全身心充满暖流，用颤抖的手接过老朋友从身上解下的皮袍，不禁一串热泪滚落在皮袍上，紧紧握住柏老将军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

一天，石墙破屋又来了一位躯体魁梧，容貌壮伟，蓄长髯，身穿长衫，脚蹬布鞋，年近60岁的老先生，手拎几包糕点，在石墙院油漆斑驳的大门前停步，稍稍喘了喘气，便“咚咚”地敲了几下门。

陈独秀夫人潘兰珍闻声前来开门，但门只开了条缝，她探头一望，脱口喊道：

“哦，是潘先生来了，请依快快进来。”说着，把门半打开，让潘先生进来，然后又赶紧把门关上。

“嫂夫人，仲甫在吗？”这位潘先生把手中的糕点递给潘兰珍，问道。

“在，老先生正在书房里看书哩。”潘兰珍连连点头答道。又说：“潘先生，依又破费了。”

“看老朋友，哪有空手而来之理？‘礼轻仁义重’嘛！”

“谢谢潘先生。”

这位潘先生穿过庭院，向西屋书房边走边放声喊道：

“客人来了，主人为何躲着不出来迎客？”

正在全神贯注看书的陈独秀，凭着那亲切、熟悉的声音答道：

“赞化，你来了……”

“我看你来了！”

病态中的陈独秀，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爱回忆往事。他听见潘赞化的声音，顿时便想起他与潘赞化的交往……

潘赞化，字赞华，后改赞化，为安徽桐城人，与陈独秀是同乡好友。陈独秀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当年他与潘赞化等人创建“藏书楼”，倡导革命，后又共同创办《安徽俗话报》，未几时，俄约事起，他与潘赞化等人被谗通缉，一同潜逃日本求学深造。辛亥革命后，柏文蔚任安徽都督，他任都督府秘书长，潘赞化任芜湖海关监督，两人都得到柏文蔚的信任和赞赏。后又因参加反袁世凯“二次革命”失败，两人又一同潜逃日本……更有趣的是，潘赞化在芜湖任职时，邂逅妓女陈秀清（后改为潘玉良），并纳为小妾，在家庭、社会引起一阵轩然大波，那些因走私而受到查处的不法商人，借此大肆攻击潘赞化，唯有陈独秀热情支持，认为潘赞化把陈秀清从火坑中赎出来，是正义和同情之举，无可指责，同时协助做好家庭工作。后来两人又同寓居在上海渔阳里，过从更密，潘赞化与陈秀清正式结婚时，他与夫人高君曼是唯一的来宾和证婚人。几十年之后，又同时避难江津，小儿陈松年就在他手下谋事求生……

陈独秀想着，潘赞化已哈哈笑着，迈步走进书房。这是陈独秀靠灶房一大间会客室的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内套小房间，东墙有窗，缕缕阳光射进，光线明亮，安逸幽静。靠窗摆有一张陈旧的书桌，书桌和靠墙的木凳上堆放着书报杂志，陈独秀一天的大半时间，都是在这斗室内度过的。正坐在书桌前木椅上看书的陈独秀，见潘赞化走进书房，忙放下手中的书，摘掉老花眼镜，挪开椅子吃力地支撑站起，欲向门口迎去。潘赞化见状，紧步向前，边抓住陈独秀的手边



劝阻道：

“仲甫，你坐着别动，我又不是什么客人，你快坐下。”说话间，又把陈独秀扶回椅子上。

“那你也坐。”陈独秀指着靠墙的一张木凳子说。

“好，我坐”潘赞化坐下，说道：

“仲甫，近来因学校事忙，多日未来看你，你可好？”

“时好时坏，不过住下后，心情比在县城里平静些，能坐下看看书。”

“这我就放心了，多日不见怪想你的。”

“如今，能常来看我的除了你和仲纯外，实在是不多了。”陈独秀探过身子，拍拍潘赞化的手臂，无限感慨地说。

“现在国难当头，朋友都忙着抗日大事。你躲在这偏僻的山村，交通不便，朋友们想来看看你也挺不方便。”潘赞化解释、安慰说。

“这倒也是。不过，有心的朋友，如柏文蔚将军，不顾路远，攀山还来看我，令鄙人欣慰。”

“柏将军来过？”

“是的。他还同我问起你，因时间仓促不能去看你，还要鄙人转告他对你的问候。”

“唉，我同柏将军已有多年未见了。”

“老将军重感情，你看我身上穿的这件皮袍子，就是他解赠予我的。”陈独秀指着身上的皮袍说。

“仲甫，这可是一件贵重的皮袍子，由此可见，柏将军对你友情之深。”

“我受之有愧。我一再拒收，而老将军……”陈独秀心情激动起来。

“仲甫，我看你还是搬到县城里去住，无论看病，还是生活，城里总比这里方便，朋友也好随时有个照应。”潘赞化劝说道。

“赞化，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个安静的地方。山村有山村的乐趣，

空气好，又安静，耳目闭塞，什么事见不到，什么话听不到，心里便不会生烦，自然平静，对我的高血压病大有好处。所以，县城我不会再住，重庆更不想去，除非抗日胜利，你我同返故土安庆。”陈独秀固执地说。

“仲甫，你这固执脾气，真拿你没办法。好了，我是随便说说，你喜欢这里就安心住下吧，少闻闲事也好，我会常来看你的。”

这时，陈独秀的夫人潘兰珍端着一杯热茶，递给潘赞化，客气地说道：

“潘先生，依请用茶。”

“哦，谢谢嫂夫人。嫂夫人，仲甫我可拜托你了，请你多多照顾。”

“照顾老先生，是阿拉应该的嘛，依放心好啦。”

“谢谢嫂夫人，仲甫也亏你了。”

“潘先生，依同老先生好好谈谈，阿拉烧饭去。”潘兰珍说着，转身往外。

“嫂夫人请留步。”潘赞化叫住潘兰珍，忙从衣袋里掏出大洋和一叠钞票，递上前去说：

“嫂夫人，这是我们九中几位安徽校友凑起来的钱，托我顺便送过来。给仲甫兄补补身子。”

“不……不……阿拉不能收……”潘兰珍连连后退，又抬眼瞧瞧老先生陈独秀。

“仲甫，这是同乡好友的一番心意，不收哪行呢？我也不好向几位校友交代。”潘赞化又转向陈独秀说。

陈独秀见此执意不过，便对潘兰珍说：

“既是这样，那就收下，别再推来推去。”潘兰珍从潘赞化手中接过钱，便退出了书房。

“赞化，无功受禄，心实在不安。请你回去转告我对九中的同乡和朋友的谢意。”

“仲甫，我一定转告。这是大家的一片心意，你不必有什么不安，同乡帮同乡，理所当然。”潘赞化说道。

“唉，这几年我陈某亏了同乡、朋友们的资助，同时也得到北大同学会朋友的帮助，本可以过得去的，可是眼前这物价飞涨，日子也越来越难过了，加之病魔缠身，要不是仲纯三五日上山给我来看病，我早就……”陈独秀有些寒酸地说。

“仲甫，目前是困难时期，朋友应当患难与共嘛，打败日寇，还我山河，返回家园，各自可以安居乐业了。”

“这是众人所愿。唉，安庆现在不知被日本人糟踏成个什么样？我家那房子还不知在不在？”

“仲甫，你家那房子不是……”

“什么？我家那房子怎么啦？”

“仲甫，我听松年说，你家房子不是卖了吗？”

“噢，你……你看我倒糊涂起来了，房子已易主他人，我想那房子，太……”

“卖房子也是不得已的事，卖了总比日本人烧了好。”潘赞化安慰陈独秀。

“那房子是先辈亲手所建，而败于我……这个……”

“仲甫，我们不谈这些。这么多年来，你还没送过我一个字，今天能否赏个光。”

“赞化，我的字一个钱不值，更没有收藏价值，你要它有什么意思。”

“仲甫，你不肯赏光，那我就告辞了。”

“好，好，我这就写，你可不要走。”

说着，陈独秀摊纸，握笔，又迟疑起来，转向潘赞化说：

“赞化，写什么？”

“那你就写挂在墙壁上的岳飞写的‘还我山河’四个字如何？”

“好！”陈独秀挥毫一气呵成“还我山河”四个篆体字。

潘赞化看了赞叹不已：

“好字！气吞山河，一派豪迈气概，抒发了抗日必胜的博大胸怀。”

“哪里，哪里。”

说话间，夫人潘兰珍进来请道：

“潘先生，请用午饭。”

“好，赞化，过去吃饭。”陈独秀起身拉着潘赞化的手走出书房。

午饭后，两人又天南海北地侃了会，太阳西斜，潘赞化不得不起身告辞。

陈独秀依依不舍，拉着潘赞化的手说：

“赞化，你何时再来？”

“过几天，我把手头的杂事料理完，就来看你。”

“好，好，下次来最好能住上几天，同我多聊聊。”

“一定，一定！你要好好休养，不要整天关在书房里。”

“兰珍，你送送赞化。”陈独秀喊道。

“好的，阿拉送潘先生。”潘兰珍答道。

“不必客气，嫂夫人免送。”潘赞化说完，转身就往门外走。潘兰珍也紧跟着出了石墙四合院。

他们边走边说。

“嫂夫人，我看仲甫不是以前的陈独秀了，开口闭口离不开过日子，大讲生计，讲房子，讲衣食住行，这在过去是没有过的。他现在是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这对他身体不利。”

“唉，他从南京监狱出来，一直很苦闷，常常一个人在书房里发呆，沉默寡言，还无缘无故地叹气。有时他还说，‘还是监狱里好，不用操心吃喝’。”

“嫂夫人，你要精心照顾你家老先生，他若发脾气，你不要理他，你宽心些，他一生都是这怪脾气。”

“潘先生，阿拉知道，请侬放心。”

“嫂夫人，你自己也要多保重，这些年来你也够辛苦的了。请嫂夫人留步。”

“好，阿拉不送了，依走好，有空再来。”

“我会抽空来的。”潘赞化说着，已下了青石台阶。潘兰珍还站在那儿，默默望着潘赞化远去的背影……

没隔多久一个星期天，潘赞化带着几个慕陈独秀之名的学生，又来鹤山坪看望陈独秀。临行前，他嘱咐学生：

“你们向陈仲甫先生要字，他的字写得好。你们只要买三斤白糖、两斤猪肉，再带些鸡蛋送给他就行。”

于是，学生们就凑钱买了些薄礼送给陈独秀。陈独秀见学生们诚意送来礼物，在潘赞化的劝说下，也慨然接受。学生向他要字，他欣然同意，要学生写下姓名作书落款，当场用些杂乱纸张即兴挥毫，学生们得之高兴万分，视作珍品。

接着，他们海阔天空地摆谈起来，学生在一旁，两人也不避讳，无所不谈。陈独秀风趣地问潘赞化：

“赞化，你那位在法国的小娘子，可有信给你？”

“时有信来。战火纷飞，国外来信不易啊！”

“她嫌你老了，在法国可抛了你……”

“仲甫，我那娘子不是那样的女人，同你的兰珍一样，对我可忠哩……”

“哈哈……”说着，两人对笑起来。潘赞化高兴地用手向陈独秀胸前一摊说：

“老兄，你我逃亡至此，有家归不得，生活穷愁，你还有这样的雅兴开起玩笑来……”

“不说，不笑，不成老少……”陈独秀兴致勃勃地说。

两人又仰面大笑，在旁的学生不知他们笑些什么，也随同笑了起来。此时，石墙破屋内笑声盈盈，陈独秀笑容满面，与潘赞化滔滔不绝叙友情。

中午时分，潘赞化和学生都留在陈独秀处吃饭，夫人潘兰珍端上一碗碗白菜、萝卜之类的素菜，但她做的白菜很好吃，带有上海风味，学生吃了赞道：

“陈师母做的菜比学校食堂的菜味道好吃多了，吃了还想吃！”

陈独秀听了很是开心，对学生说：

“好吃，你们就多吃些，不要受拘束。”接着又说道：

“困难时期，我们都流亡在外，能吃上这样的饭菜也不容易了。待抗战胜利，让我们好好地庆贺一番！”

说得学生们连连点头，并向陈独秀投去敬佩的目光……

陈独秀隐居鹤山坪后，山里人每隔几天，就会见到一位中等个头，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文质彬彬，身着半旧的洋装，身背一只皮质并印有红十字药箱的50多岁的医生，敲石墙院门，给住在里面的那个神秘老人看病。这位医生就是“延年医院”院长、陈独秀同乡故友邓仲纯。

尽管邓妻对陈独秀夫妇不礼，但邓仲纯与陈独秀一直保持着深厚的感情，无论医院里怎么忙，他每隔几天必上山来看望陈独秀，免费给他检查治疗一次，并作详细的病历记载，走时还留下一些必要的备用药，嘱咐潘兰珍用药方法。邓仲纯似乎成了陈独秀的“保健医生”，来时还常带些吃的东西或塞些钱给潘兰珍。山上交通不便，陈独秀与外界的通信往来，也一直由邓仲纯收转，他又成了陈独秀的义务交通员。对此，陈独秀铭记在心。邓仲纯如同潘赞化，也是陈独秀天涯沦落时，可诉衷肠的患难之交。

1942年4月的一天，时值春暖花开，邓仲纯又上山来看望陈独秀。他一踏进石墙院门，陈夫人潘兰珍哭哭啼啼对他说：

“邓医生，依来得正好，阿拉老先生病了几天没起来，一夜到天亮地呻吟着，把阿拉急煞了。”

“嫂夫人，你不要急，我去给他看看。”

邓仲纯大步走进陈独秀阴暗潮湿的卧室，只见陈独秀蜷缩着身子，像个半死半活的人躺着，忙心酸地叫道：

“仲甫，仲甫，我来看你了。”

“仲纯，是……你……来了。”陈独秀没精打采地说。

“是我，仲甫。你躺着，我来给你看看。”

邓仲纯手拿听诊器听着陈独秀的胸部，然后，又仔细搭着脉，看看陈独秀的舌苔……

“仲甫，你这病不轻啊，心脏在不断扩大，血压又高而不降，我看你还是到重庆去看看吧。”

“我不去，哪里也不去，死就死在这里，只要你常来看我，我就行。”

“仲甫，我会来看你的。我也拿你没办法，我给你打针，再吃些药，你会好些的，但不能治本啊。”

“仲纯，你今天不要走，陪陪我，明天再走，好吗？”陈独秀几乎哀求道。

“好，仲甫，我今天不走，我陪你。”邓仲纯见老友如此哀求，也不忍心让他失望。

第二天一觉醒来，陈独秀自觉轻松许多，也能起来靠床躺着，似带几分感激的心情说道：

“仲纯，要不是你昨天及时赶来，我怕就见不着你了，真谢谢你了。”

“仲甫，不要谢，你我不是外人。医院里有不少事要处理，我就走了，我留了些药，叫嫂夫人按时给你服药。你要好好休息，心想开些，过几天我再来看望你。”

“好，你走好！”陈独秀又喊道：

“兰珍，你送送仲纯！”

“好，阿拉送邓医生！”

邓仲纯走出石墙院大门，停住脚步对潘兰珍说：

“嫂夫人，我有句话想对你说，不过你……”

“邓医生，侬有话就直说好了。”

“看样子，你家老先生怕很快不行了，嫂夫人你得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才是。”

“邓医生，阿拉心中有数。”

“嫂夫人，你家老先生有情况，可随时叫人来喊我。你自己也要多保重。”

“谢谢邓医生，侬走好！”

### ◎破屋雨漏缸无米

春夏之交，青黄不接，鹤山坪雨雾笼罩，倾盆大雨一个劲儿地下了好几天。外面雨声哗哗啦啦，石墙屋内滴滴嗒嗒，地面水汪汪，凡能用来接雨的大盆小盆，都被潘兰珍用上了，而且忙个不停，但无济于事，雨水照样无孔不入滴嗒滴嗒地漏入破屋里，唯有卧室靠床的一隅，幸好雨前请来瓦匠拣了漏，虽无瓦可换，但毕竟雨漏较少。一张床上大半堆放着书籍和几只破箱子，上面又覆盖着芦席。陈独秀躺在床上，胸闷烦躁难受，不停地呻吟着：

“兰珍，兰珍，你不要离开我，我好难受。这天好像故意同我作对，天老爷要叫……我……去了……”

“老先生，我不离开你。天，明天或许会好的。”

“天好了，就好，再下，你那米缸也要底朝天，锅也要……揭……不开了……”

“老先生，侬不要烦，好好养身子，米缸里米还有，侬不信，阿拉这就拿些来侬看看。”说着，潘兰珍从米缸里捧出一把米给陈独秀看，说道：

“老先生，侬看，缸里米还够吃些日子，你放心好了。”

“俗话说：‘缸里有米，心里不慌。’有米，我就放心了。这山里的



人都很穷，米没了，还没处借。哎……”陈独秀长长叹了口气，又说道：

“过这穷日子，还不如在南京坐牢，有吃有喝，用不着犯愁，更不用操心，需要吃的时候，几样菜人家就端来了；需要喝的时候，就有人送来，不合口味，还可骂他几句……”

其实，潘兰珍比陈独秀心里还焦急万分。那米缸里的一点儿米，还是请杨家女佣人吴国兴，通过村长用一件衣服抵押借来的，她瞒着陈独秀，否则锅早已揭不开了。这点儿米，又省着给陈独秀吃，她已吃了几日她和老先生种植的土豆稀饭填肚皮。连日大雨，邓仲纯医生也无法上山给陈独秀看病，邓医生留下的备用药用完了，陈独秀现在病又犯了，手中又没钱上镇里去抓药。北大同学会照顾陈独秀的何之瑜先生，也没法上山送钱来，雨下个不停，陈松年也没法上山来……这真是急煞了潘兰珍，天天盼着雨停、天晴，可是天公仍不作美。

第二天，一觉醒来，阴暗潮湿的破屋里，听不到滴水声，屋里也亮些了，潘兰珍心想，雨可能停了，于是，她轻手轻脚地起来，穿上衣服，打开门，果然雨停了。在天井里，她抬头向天空一看，乱云纷散，天渐开，心里一阵高兴，自言自语道：

“天晴就好了！”

这时，她突然听到陈独秀的呼叫声：

“兰珍，兰珍，你在哪儿？天还下不下了？”

“哎，我在天井里看天气，雨停了，我这就来！”潘兰珍应声走进了房内，对陈独秀说：

“老先生，雨停了，看样子不会下了。”

“不下就好。你快帮我把衣服穿了，让我出去透透空气，这几天快把我闷死了。”

“好，阿拉帮侬穿！”潘兰珍拿起衣服，帮陈独秀穿着。

穿好衣服，潘兰珍小心翼翼地搀扶陈独秀步履艰难地走到庭

院天井，让他倚墙站着，说道：

“老先生，依别走动，阿拉把椅子搬来，让依坐。”

陈独秀靠墙伸了伸胳膊，深深地吸了几口新鲜空气，顿觉轻松舒服。潘兰珍从书房里搬出他平日写文章坐的木椅，让陈独秀坐下，说道：“老先生，依坐着，阿拉给依打水洗脸。”

平日里，陈独秀洗脸都是靠潘兰珍帮忙的。她若是早晨去买菜，她总是在杯里倒满刷牙水，在牙刷上涂上牙粉，铜盆里倒好洗脸水，一样样给他准备好，他一起来，就能洗上脸。待她买菜回来，再帮他梳头。若是潘兰珍不在，他连洗脸都犯愁，不是找不到牙刷，就是找不到毛巾，一时无措，有时气得把铜盆“哐啷”甩到地下。

潘兰珍端来洗脸水，帮助陈独秀慢条斯理地刷了牙，洗了脸，又帮他梳理稀疏的头发。几根落发掉落在陈独秀身上，陈独秀见了感慨地说：

“发落人衰，这几日发又落许多，只落不长，人也快不行了！”

“老先生，依别想这许多。人的头发，和树叶子一样，落叶长新的，依的头发也会长的嘛。”

“不会长的。树老朽了，叶落了，也不会长的。”

“老先生，依饿了，几天没吃啥么子，阿拉给依做早饭去。”

不一会儿，潘兰珍端着一碗葱花鸡蛋汤面走过来。这是陈独秀在上海时就爱吃的东西，悠荡在汤上的葱花，翠绿清香扑鼻，潘兰珍一边把碗递给陈独秀，一边亲切温柔地说：

“这是依爱吃的葱花鸡蛋汤面，锅里还有。”

“噢，好香！兰珍依也吃。”陈独秀从潘兰珍手中接过碗说。

“依吃，阿拉也吃。”潘兰珍答道。

这碗里的鸡蛋，是潘兰珍同陈独秀喂养的几只鸡生的蛋。原先，他们靠朋友接济还能买得起鸡蛋，可是物价一日三涨，手头越来越紧巴，生活日渐窘迫，鸡蛋越买越少，而鸡蛋陈独秀又爱吃，怎么办呢？去年春上，她看到邻居买小鸡养，也买了十几只喂养，她怕

被老先生见了不高兴,她就放在厨房里。由于山里春天气温冷暖变化无穷,又瞒着老先生不好放出来,这样就死了好几只。然而,鸡一天天长大,老关着也不是事;于是,她每天趁老先生午睡,就把鸡放出来活动活动。一天午睡,陈独秀被叽叽喳喳的小鸡声吵醒,他忙叫道:

“兰珍,哪里来的小鸡声?”

潘兰珍听了,吓了一跳,忙欲将小鸡关起来。说时迟那时快,陈独秀已走出房门来到她的面前,高兴地问道:

“兰珍,这些小鸡你从哪儿弄来的?小鸡活蹦乱跳,养得不错嘛!”

潘兰珍放下手中的小鸡,脸色白一阵,红一阵,木呆呆地站在陈独秀面前,腿直打哆嗦。看样子瞒不下去了,不说也不行了。她颤抖着说:

“这些鸡是阿拉买来养的,长大好生蛋把侬吃。”

“噢,没听你讲过吗?”

“阿拉怕侬不同意养,就瞒着侬。”

“你这伢子,养鸡又有什么不好。小时候,我母亲养许多鸡,我常帮她拣鸡蛋,可开心啦!母鸡生下蛋,高兴得‘呱呱’叫个不停,连主人也感到有几分光彩。”

潘兰珍听了陈独秀这一席高兴的话,心中的那块石头也落了地,一扫脸上那惊吓的面容,弯腰又把捉放在盒子里的小鸡放了出来。放出来的小鸡,展开那翅膀,自由自在一个劲儿地追逐。陈独秀见景生情,说道:

“鸡和人一样,有了自由才能长大,你关着它,岂不要把它闷死。兰珍,白天你就把鸡放着,你去买菜,我喂食。自家的鸡生的蛋才新鲜,有营养。”

“好的。老先生侬也喜欢鸡,我就不关了,把自由还把伊拉!”

“这就对了……”说着,老夫少妻对笑起来。

到了秋冬季节，鸡养大了，一个接一个地下了蛋，陈独秀每天都要从鸡窝捡几只鸡蛋，他比潘兰珍还开心，尤其是那一只九斤黄的雄鸡，他倍加喜爱，每天晨晓，九斤黄就会昂头“喔喔”报晓，陈独秀听到金鸡报晓，他心里似乎充满着一线希望，又迎来了新的一天……

陈独秀手端着葱花鸡蛋汤面，筷子拌了拌，喝了几口清香面汤，嘴想吃可胃不适，眉头苦皱，又把碗递给少妻潘兰珍，说道：

“兰珍，你端去吃吧，胃不好，不想吃。”

“那我给侬烧粥去。”

“不用烧，到中午再吃吧。”

“那也好。老先生，侬先在这里坐一会，阿拉把屋里面漏下的雨水，去扫一扫。”

## ◎破屋人穷清白在

雾消云散，天气晴和，到了中午时分，久违的太阳露脸了，陈独秀闭目养神，沐浴在久雨后的阳光下，身觉寒气外泄，暖洋洋舒服多了。

这时，石墙院门突然传来一阵“咚咚”的敲门声，接着有人问话：

“独秀先生在家吗？”

陈独秀好多天没听到朋友的敲门声了。这时，他喜出望外，十分高兴，忙向房内的潘兰珍叫道：

“兰珍，兰珍，外面有人敲门，你快去看看谁来了？”

“噢，老先生，我这就去！”潘兰珍忙放下手中的东西答应道，疾步向院门走去，问道：

“啥人敲门？”

“夫人，是我们，特来看独秀先生的。”

潘兰珍闻声把门开了条缝探头向外一望，惊喜道：

“噢，是罗先生和傅先生，快快请进！”她把门打开。

“夫人好！先生在吗？”

“你们二位好，老先生在天井里晒太阳哩。”

陈独秀闻客人声，扶着椅背，撑着身子站起，正欲迈步去迎客，两位客人已走到庭院天井，亲切而有礼貌地喊道：

“老师，学生看你来了！”

“噢，是家伦、斯年来了！兰珍，快端凳子让他们坐。”陈独秀见学生罗家伦、傅斯年来显得十分高兴。

“老师，你快坐下，别起来！”罗家伦忙上前一步，把陈独秀扶着坐下。

“老师，南京一别，几年未见，这些年来，你可好？”傅斯年说。

“人老了，不中用了。”

“老师，我和斯年到重庆办事，特来江津看你，可是一连下了几天大雨不能上山，如果今天雨不停，我们就看不到老师了。”罗家伦接着说。

“家伦、斯年，你们来看我，我很高兴。听说，你们都在国民政府里任职，当了大官。”

“老师，我们只不过为抗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哪里当什么大官。”傅斯年笑着说。

“老师，我们听说你身体不好，十分惦念。你有什么困难，需要学生帮助解决的？”罗家伦关心地问。

“你们来看我就好，困难虽有，我还能克服。”

“老师，你隐居山间，条件太差，你看这屋子里阴暗潮湿，四处漏雨，怎好长期住下去？依学生看，还是住到县城或重庆去。”

“老师，斯年说得对，你这就跟我们走吧，我们对你也好有个照顾。”

“谢谢你们好意，这里条件是差，但很安逸，少有是非，除非抗

战胜利，我哪里也不会去的。”

“既然老师愿意住在这里，学生也绝无强勉之意，有机会，我们会常看你的。”

“老师，当年我们都受教于你，老师之恩，我们铭刻在心。既然老师不愿住到别处去，为表示学生一点心意，我和家伦兄弟商定，这些钱给老师聊以养身。”说着，傅斯年把大洋和一叠钞票塞到陈独秀手中。

“家伦、斯年，你们来看我的情，我领了，但这钱不能收。”陈独秀又把钱塞回给傅斯年。

“老师，这是学生的一点心意，这钱你如不嫌少，请老师务必收下。”罗家伦又恳切地说道。

“你们把我陈某当乞丐施舍，是吗？你们的钱我是不会收的。”陈独秀满脸气色地说道。

陈独秀的拒绝，弄得罗家伦、傅斯年十分尴尬，半天不语。过了好一会，罗家伦不快地说：

“老师你曲解了学生的心意。老师的为人，学生是知道的，你既然不肯收下这些钱，我们也不强勉，那我们就告辞了！”

“望老师多保重！”傅斯年接上说。

罗家伦、傅斯年高兴而来，扫兴而走。临走时，陈独秀还十分冷淡地说：

“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不送了，请走好！”

没过两天，邓仲纯医生上山来给陈独秀看病，又带来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朱家骅赠他的5000元支票一张以及叛徒任卓宣汇给他的200元，他拒绝收之，要邓仲纯退还给他们。后来，朱家骅又托张国焘转赠，他又拒收。张国焘再托郑学稼寄赠，他还是不收，又叫邓仲纯退回了。弄得邓仲纯十分为难，而又不解地问陈独秀：

“仲甫，这都是朋友的心意，你这样做缺礼也！”

“仲纯，这些人的钱不能收，我宁愿穷死，饿死！收了这些人的钱，是非多。王明、康生对我人身攻击的那件事，弄得我够苦的了。”

“仲甫，你说得有道理。人穷，穷得要有骨气。”

陈独秀一贯自恃清高，洁身自爱，正如他赠友题写的于谦幼年时写的一首诗：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1941年春节，鹤山坪山间虽然贫穷，但家家户户仍然忙着置办年货，笼罩着节日的气氛。而家境十分清寒的陈独秀，却冷冷清清，无力去置办大鱼大肉，他夫人潘兰珍对此也无什么怨言，只得过个清闲年了。这时的陈独秀别无他想，也无他求，只想在年夜饭桌上能欣赏到，早年与之相识的精于佛学的朋友欧阳竟无收藏的《武荣碑》帖（全名为《汉执金吾荣碑》，“荣”字含和，桓帝末，官至执金吾丞，灵帝初卒。碑为隶书，阳文）。这是他十分羡慕而欲借的，他曾多次向欧阳竟无试探过，欧阳竟无不是一笑了之，就是摇头，或默不作声，弄得陈独秀一时无可奈何。春节前，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忙叫夫人潘兰珍磨墨，挽袖铺开纸张，挥毫写了《赠欧阳竟无诗》一首，“以诗代柬”，向欧阳借《武荣碑》帖，诗中写道：

贯休入蜀唯瓶钵，久病山居生事微。  
岁暮家家足豚鸭，老侬独羨武荣碑。

欧阳竟无收到陈独秀差人送来的这首诗后，不禁为他的清贫生活发出无限的感叹，同时也为他这位早年朋友虽穷愁潦倒，却羡慕《武荣碑》的恳切心情所感动，不得不开戒——忍痛割爱，将所珍

藏的心爱之物——《武荣碑》帖，破例借给陈独秀。

陈独秀借得《武荣碑》帖，如获至宝，果然在年三十晚上，当别人家在鞭炮声中热热闹闹吃年夜饭之时，陈独秀却在夫人潘兰珍的陪伴下，挑起油灯，兴致勃勃地欣赏这《武荣碑》帖，时而默默吟诵，时而比划着隶书的笔锋，赞叹不已，其乐无穷，胜过除夕晚饭的一杯酒……

### ◎名大惹贼家被窃

1940年8月3日，江津县警察局突然接到鹤山坪五举乡政府的报案，住石墙破院的陈独秀寓所被窃。此时，正在县城“延年医院”邓仲纯医生处看病并在黄荆街小住几日的陈独秀，万没想到灾难会落到他这个一贫如洗的穷鬼头上。当他得知寓所被窃时，气得半晌说不出话，妻子潘兰珍吓得不知所措，虽然没有什么家当，但也是日常过日子所必需的东西，家当被偷了，这本已很穷的日子又怎么过呢？于是，他们急匆匆地赶回石墙寓所。进得房间一看，窃贼是从卧室南窗爬进来的，窗门敲破，桌上还留有脚印，东西被翻得七零八落，他的全部财产——几只装着换洗衣服的旧皮箱、几年来写的《文字学》手稿和一枚篆刻阳文“独秀山民”玉印章全部被窃。在失窃衣物中，惟有文稿和印章这两件是陈独秀的心爱之物，窃之最为痛心。正如陈独秀8月3日在致好友杨鹏升的信中所说：

“窃去衣物等十余样。惟失去兄在武昌所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及弟尚难出版书之草稿，殊为可惜也！”

江津县警察局接到五举乡报案后，例行公事，立即派员上山查缉一番之后，失窃衣物居然大半得以物归原主，惟文稿和印章这两件陈独秀的心爱之物，却无影无踪，陈独秀痛心不已。当友人前来安慰时，他却幽默风趣地说：

“这窃贼也真风雅啊！”



“树大招风”。陈独秀生活在石墙破屋里，穷得叮当响，有时揭不开锅，不得不靠典当过日子，凡稍值钱的衣物早已进了当铺，连柏文蔚将军解赠予他的贵重皮袍也进了当铺。房东杨二太太还买过他妻子潘兰珍的旗袍等衣物。然而由于他名气大，又是外来户，常与之来往的又都是些富户名绅，在窃贼的眼里，陈独秀很有钱，箱子里装的不是金就是银，偷之必发横财。岂料，箱子里装的尽是些破旧的换洗衣服，不值几文。所以，县警察局侦缉破案时，衣物大半追了回来。不过有的人认为，陈独秀被窃还有着政治背景。陈独秀曾是共产党的要人，县城不住却偏要隐居在深山老林，来看他的人又很多，国民党对他不放心，便暗中派人监视，只见他整天闭门伏案写东西，又不知写些什么，写给哪些人，于是趁陈独秀夫妇小住县城几日之际，便蓄意制造了一个盗窃的假象，借以检查他的行动和书信。事发后，江津县长黄鹏基曾说：

“重庆方面很不放心陈独秀，经常派人来过问陈独秀的行动和了解与陈有交往接触的人。”

对此，陈独秀心中也是明白的。他表面上虽然自由，但实际上从南京监狱出来后，所到之处均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监视和软禁。陈独秀给受北大同学会委托照顾他在江津九中任教的何之瑜的信中，谈到国民党当局派密探到该校侦探陈独秀的情况时，嘱咐何“不必谨慎过度”：

“他们愿探的三件事：（一）我们与干部派（即指中共）有无关系；（二）我们自己有无小组织；（三）有无反对政府的秘密行动。我们一件也没有。言行再加慎重些，他能探听什么呢？”

陈独秀被窃后，心情极度抑郁，精神不振，写作兴趣大减，时时叨念他那失去的印章和文稿，甚至达到如痴状态，希望有朝一日能失而复得，那文稿是他在病中呕心沥血，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出来的啊……

## ◎缸中无米助人乐

物价一日三涨，靠人接济过日子的陈独秀夫妇，日子越来越难越窘迫，不时还得借米下锅，连陈独秀平日最爱吃的洋芋、菠菜、辣椒之类的蔬菜，也常常无钱可买。这可急坏了妻子潘兰珍，怎么办呢？手脚勤快的潘兰珍，瞒着陈独秀在石墙后院的一块空地上，挖土翻地，向邻人讨来种子、种苗，种上了洋芋、菠菜、葱子、蒜苗、辣椒等多种蔬菜。陈独秀发觉了，写作空闲时，也同妻子潘兰珍一道种植，浇水、施肥、捉虫，忙得不亦乐乎。有时他们夫妇外出到江津县城看病或办事，则请杨家的伙房帮助照料。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他们种的蔬菜长得很好，连邻人也称赞几分。有了自种的蔬菜，也不用花钱买了，冬天还可收藏些洋芋，腌些咸菜，以助度冬。他们夫妇吃着亲手种的蔬菜倍觉有味、高兴。陈独秀常对兰珍说：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是一件最快乐的事。”

他和潘兰珍在石墙后院，还亲手种植了梨树和柑桔。当他们第一次吃自己种植的香甜可口的梨子和柑桔时，嘴里甜滋滋，心里乐陶陶。陈独秀还爱种植花草。天井里几盆兰花，原是杨二太太家种的，陈独秀常常给花儿浇水，还时不时地把兰花的叶子翻过来捉虫。在他的精心浇灌下，兰花开得香味四溢，随风飘出石墙院，人们闻到兰花香，就知道这是石墙院内那个神秘老头浇培的兰花。

陈独秀穷得缸中虽常无米，但他却十分同情山里的穷苦人，乐意助人。

一天，他同潘兰珍正在吃早饭，杨家女佣人吴元珍的女儿小蓉蓉，穿着破衣，打着赤脚，来到他的房间，站在一旁，两只小眼睛盯着陈独秀正在吃着的白馍馍。平日喜欢小孩的陈独秀忙问道：

“小蓉蓉，早饭吃没吃？”

“陈伯伯，还没……吃。”小蓉蓉结结巴巴地答道。

“来，我给你一个馍吃。”

小蓉蓉想吃，但又不好意思伸手去接馍，怕妈妈见了骂她。因妈妈对她说过，不让她吃陈先生家的东西，陈先生家也很穷。

“小蓉蓉你吃，你妈不会骂的，是我给你吃的。”

潘兰珍忙把一只馒头塞到小蓉蓉的手中，说：

“小蓉蓉乖，快吃，吃了再给你。”

小蓉蓉接过馍馍没有吃，仍站着不动。陈独秀又问道：

“小蓉蓉，馍你怎么不吃？”

“我留给弟弟吃。”小蓉蓉说道。

“噢，你真是个好伢子。你把这个馍吃了，我再给你一个，好吗？”陈独秀亲切而微笑着说。

“陈伯伯真好，我吃。”小蓉蓉嘴甜地说。

小蓉蓉大口大口地吃着馍，陈独秀见了很开心，又问道：

“馍，好吃不好吃？”

“好吃。”小蓉蓉边吃边说。

“来，这个馍拿回去给你弟弟吃。”

“谢谢陈伯伯。”说着，小蓉蓉手拿着馍，转身拔起小腿儿跑了出去。

其实，陈独秀好多天没吃上馍馍了，而馍馍又是他喜欢吃的，因为好消化。这几个馍馍，还是邓仲纯上山给他看病时，从江津县城特地给他买来的。潘兰珍一个也没舍得吃，她见老先生把馍给小蓉蓉吃，心里好像刀割一样痛，但她又被陈独秀这种同情心所深深感动，于是她对陈独秀说：

“老先生，你心真善良。馍馍你自己舍不得吃，还给小蓉蓉吃。”

“兰珍，你看小蓉蓉这可怜的样子，站在面前，我能吃得下去吗？我们虽穷，总比穷人好些。”他无限感叹，又说道：

“当年我和李大钊等人创建共产党，就是想解放穷人，让穷人

都能吃得饱，穿得好，可是……哎！”

陈独秀早晚常偕同潘兰珍漫步田间，闲谈散心，不时又与农民问好，摆谈，这已是他的习惯了。一天，他同夫人潘兰珍散步路过邻居曹家门口时，只听得一阵“哎哟，哎哟，疼死我了……”的痛苦呻吟声。陈独秀心中不禁一阵心酸、难过，不由自主地迈步进门问道：

“你家奶奶怎么啦？”

“奶奶病了。”

“看了没有？”

“陈先生，不瞒你说，家里连锅都揭不开了，哪来钱给奶奶看病。”

“噢！你不要着急。”陈独秀转向潘兰珍说：

“兰珍，你身边还有钱吗？”

“老先生，还有两块买米的钱。”

“你把两块钱给他，救人要紧。”

潘兰珍立即从袋里掏出仅有的两块钱，递给陈独秀。陈独秀对姓曹的邻居说：

“你快上街去给你奶奶抓药去！”

“这……这怎么……行……陈先生。”这位姓曹的邻居连忙摆手说。

“大家都是邻居，还能见死不救吗？”

“谢谢陈先生！”这位姓曹的邻居双膝跪下，连声谢道。

“快起来，不要这样！”陈独秀忙上前扶起那位姓曹的邻居，转身就走出门外……

没过几天，这位姓曹的邻居奶奶病好了，提着一只老母鸡上门感谢陈独秀。

“陈先生，你是我救命大恩人！”

“曹奶奶，不要这样说。你病好了就好，不用谢。老母鸡你老人家自己留着补补身子，我是不能收的。”

每逢鹤山坪赶场这天，他总会站在路边，向赶场回来的人打打招呼，或问一问当天的米价行情，集市热闹不热闹之类的问题。这实际上，他是在了解信息和抗日情况。有一天，他听赶场的人说，县里来了个宣传小分队，说国军节节败退，中国快要灭亡，要做亡国奴了。他听了十分气愤，认为这是在宣传亡国论，于是他向人们说：

“你们不要信那一套，中国不会亡，国共合作，全国人民齐心抗战，日本人迟早要被赶出去的，中华民族是有复兴希望的。”

人们听了他振奋精神的话，连连点头赞同道：

“陈先生说得有道理，我们不会做亡国奴的。”

随着时光的推移，山里人虽然不完全知道住在石墙破屋这位神秘老人曾是共产党的总书记，但总觉得这位老人并不神秘，和蔼可亲，没有架子，还能接济穷人，又知道这位老人很有学问，字写得很好。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周围山里人，只要有红白喜事，或逢年过节，便纷纷上门请他书写对联。凡是穷人，陈独秀便分文不收为之书写，其联文大多摘录古诗词，有时也当场即兴写来。山里人纯朴情真，见他分文不收，觉得过意不去，有时拎点农产品，或者送点烧柴之类的东西，他执意不收，劝说不让，有时他也让潘兰珍收下，还叫写上姓名，他对妻子说：

“无功不受禄，山里人也很穷，为他们写几个字，也是一件快乐的事。”

天长日久，山里人对他们夫妇也很尊敬。只要他和夫人站在门口或者早晚散步，邻人见了，总是亲热地向他们夫妇打招呼。学生见了，总是向他弯腰鞠躬，毕恭毕敬地站在路旁，让他们夫妇先走。有时，他也摸摸学生的头或书包，问问学生读书或家里的情况。若是早晨遇到学生，他总是问：

“小朋友，这么早呀！”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转眼间，1942年春节来到了。这次过年，他可不像1941年过年那样，只想在年夜饭桌上能欣赏到《武荣碑》帖

的冷清样子，上门请他写对联的人特别多，山里人讲究吉利，凡上门者大都拎着一些年货送给他，因为过年，他又不好固执不收，他只得贴纸贴墨，书写对联回赠山里人。这样，陈独秀年货甚丰，鸡鸭鱼肉都不用花钱买了。于是，他托人下山叫小儿松年一家上山过个团圆年。

说起陈松年一家，日子也十分难过，一家四口只靠他那微薄的薪水，有时还要给父亲看病抓药，安徽同乡他大都借过钱，可以说欠一屁股债。有时潘赞化看不过去便卖点珍藏的字画接济他。所以，陈独秀隐居石墙院后，一家人还没在一起过个团圆年。

陈松年及其一家，早想与父亲过个团圆年，可是这经济拮据也使得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当父亲托人捎信叫他一家上山过年时，起初他不想来，心想待过了年三十，初一上山给父亲拜个年就行了，父亲也够困难的，一家人在一起过年，哪来那么多钱？还是经妻子窦珩光劝说后，年三十那天一家四口才赶上山去。

陈独秀见小儿松年一家上山过年，心里可高兴了。大孙女长玮见爷爷，嘴甜地喊道：

“爷爷，你抱抱我！”

“好，爷爷抱你！”陈独秀高兴得一手抱大孙女长玮，一手抱刚出世不久的小孙女长琦，在房间里转来转去。

儿媳窦珩光见公公吃力地抱着两个孙女，忙叫道：

“长玮，快下来，爷爷抱不动了！妈喜欢。”

懂事的长玮对爷爷陈独秀说：“爷爷，爷爷，我要下去玩！”

“好，你下去玩，我抱长琦。”

除夕夜，陈独秀按照家乡安庆的风俗，叫小儿松年鸣放了鞭炮。鞭炮在鹤山坪山间夜空，劈里啪啦地响个不停，全家人欢欢喜喜地吃了个团圆饭。陈独秀喜笑颜开，尽情享受那天伦之乐。没想到，这竟是他在这人世间过的最后一个团圆年……

---

## 第十章

### 老夫少妻情不移 陪伴终生终无悔

---

#### ◎偏信单方反被误

陈独秀自幼吃饭，就如同他那刚烈的性格，狼吞虎咽，从不细嚼，几大口就将一碗饭吞下。为此，他还被他那慈爱的母亲训斥，甚至打骂，过后，又一再好言好语劝他，吃饭时要文静些，慢吃细嚼，不要把胃弄坏了。他见母亲那和蔼可亲的面容，嘴里虽不愿反抗，但心里总是怏怏不快，认为母亲管得太宽太严了，连吃饭这件小事，也不能任他顺其自然。平日，他最厌烦赴宴，应付不了那酒席上的慢腾劲儿。几十年之后，尤其他早年四处奔波革命，生活无规律，过着亡命的地下生活，果真应了他母亲的话，得了胃病，而且愈染愈重。他就是因患胃病，在病榻上被捕而关进南京监狱的。在南京监狱中，伙食原来是两菜一汤，他没那个耐性细嚼慢咽，便吩咐看守将菜、汤混在一起，吃起来方便，有时还将饭倒进菜里拌和，吃得更快。几次狱中铁窗生活的折磨，心情忧郁、凄凉，又患上了高血压，久治不愈，不时发作。

陈独秀流落江津，息影鹤山，贫病交加，穷愁潦倒，一日三餐难糊口，营养尤缺，体质虚弱，胃病、心脏病等多种疾病一齐缠身，每沉愈下，已到了风烛残年。1940年，北大同学会曾请重庆名医给他诊断，医生检查后说，陈独秀的心脏不能再扩大半指，否则活不了三年。这虽然瞒着陈独秀，但他心里也有所明白。“土方胜似名医”，久病、治病心切的陈独秀对此相信无疑。当时的江津县长罗宗文，曾向陈独秀介绍说，玉米缨能治心脏病。于是他常托人从乡间弄些鲜或干的玉米缨煎水喝。他隐居鹤山坪后，又闻当地民间传说一单方，即用蚕豆花泡水服，可以治疗高血压。每年春光明媚，蚕豆花开时，陈独秀都偕同潘兰珍，一边春游，欣赏春天万物生机的景象，一边到田间采摘些蚕豆花，晒干泡服，喝时尚有一股清香野味，虽无什么明显效果，也无损害。

年复一年，转眼间到了1942年春天。春回大地，万象更新，鹤山坪春花怒放，桃红李白，映山红尽染，蚕豆花儿香，麦苗长，一派山光春色。在石墙破屋熬过寒冷冬天的陈独秀夫妇，被这飞花点翠的春色迷住了。一天，陈独秀在潘兰珍的搀扶下，漫步山村小路和田间，一览春色心旷神怡，并采摘些蚕豆花儿。不料，猫儿脸的春天，突然间春雨霏霏，他们夫妇俩忙摘了些蚕豆花，便疾步赶回石墙院破屋。待天晴，蚕豆花连晒数日方干。

位于长江上游的江津，春天总是雾天，雨天多于晴天，空气潮湿，气压较低，正是百病皆发的时节。陈独秀住的石墙破屋，顶漏地湿冒水，他整天感到胸口憋闷，像猫儿抓、针刺般的难受，头昏目眩，又伴有高烧，不时昏睡不醒。5月12日，天黑鸦鸦的一片，雨欲下又不下，气压低得使陈独秀喘不过气来，血压上升而不降，他心慌意乱，想到室外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此时，照顾他几夜没合眼的潘兰珍，正疲倦地伏床沿而睡，他又不忍心把她叫醒。于是，他硬撑着坐起，轻轻慢慢地穿好上衣，当他弯腰穿鞋，扶着床沿欲站起之时，两眼一黑闪金花，两腿一软，“咕咚”一声猛然栽倒床前。



这一声响，惊醒了正在熟睡的潘兰珍，她睁开惺忪的睡眼，看见陈独秀趴在床前的地上，刹时心里一阵惊慌，忙窜上前去用尽全身力气把陈独秀拽起，扶到床边坐下，给他脱掉鞋，让他和衣歪歪扭扭地躺在床上。潘兰珍两眼挂着泪珠，心疼地说：

“老先生，依摔得怎么样？”

“没事，我是不小心才摔倒的。”陈独秀摇摇头说。

“哎呀，依起来怎么不喊阿拉一声，看依摔成这个样子。”

“你几天没睡好觉，我怎么忍心叫醒你。”

“都怪阿拉不好，阿拉也不知怎么睡着了。”

“兰珍，你累了，看你眼睛都红了。”

“阿拉没累。依好好躺着，有事就喊阿拉，不要硬支撑着。看依身子弱得一阵风都能吹倒，哪能一个人到外头去。”

“兰珍，我心里好难受，你去泡点蚕豆花水给我喝喝。”

“好的，阿拉去给依泡。依躺着不要起来。”

潘兰珍便到厨房收拾炉灶烧水，不一会儿，潘兰珍端一杯开水冲泡的蚕豆花水给陈独秀服。陈独秀从夫人手中接过杯，吹了吹，便大口大口地喝着，一杯没喝完，陈独秀便觉得腹中不适难受，肚子里“咕噜咕噜”地叫着，他苦皱着眉头，连叫数声。

“兰珍！水苦，涩嘴，肚里难受！”

潘兰珍闻声，心里慌了，这是怎么回事？以往喝蚕豆花水从来没这样过，老先生几大口就饮完一杯。她忙察看蚕豆花，不看则已，一看她吓了个半呆——晒干的蚕豆花中，有不少发霉变质了，泡服的水呈黑色，味儿不正。陈独秀中毒了，腹胀疼痛，上吐下泻，脸色苍白，眼睛无神，只是手紧紧地拉住潘兰珍的手，有气无力地呻吟着，嘴里喃喃地说：

“兰珍，我好怕，你不要离开我，你一步也不要离开。”

“老先生，阿拉不离开依，阿拉永不离开依。”

## ◎她像个尽职的护士

事也真巧。5月13日下午，好友包惠僧从重庆特来访。故人相见，陈独秀喜形于色，心中无限高兴，欣慰万分，好像吃了一剂良药，顿觉身轻神爽，娓娓畅叙友情。每每友人来访，他都叫少妻弄几个可口的乡间小菜招待一番。5月，正值四季豆上市，他叫少妻潘兰珍用四季豆烧肉招待包惠僧。陈独秀也十分爱吃，加之几天少有饮食，蚕豆花水中毒后拉肚子，腹中空空，很想吃点东西。不想，中午陪包惠僧吃食过量，晚餐接着又吃。这样，旧病未好，新病又发，导致消化不良，腹痛如刀绞，夜不成寐，半夜“哇哇”呕吐不止，吐后稍适，但精神十分疲惫，双目无神近乎凝滞，彻夜不安。后又服“骨炭末”，似觉稍微舒服。17日晨，陈独秀支撑起床欲进厕，顿觉一阵晕眩，心蹦蹦地跳，手捂心口，定了定神，便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动，正当他抬腿跨出门槛一刹那间，不料脚被门槛绊了一下，身子猛地往前一纵，“咕咚”摔倒在门口，“哎呀”一声痛叫便昏厥过去。

正在厨房煮早饭的潘兰珍，听到陈独秀的痛叫，心里一揪，忙放下手中的烧柴，三步并作两步跑进房门一看，她傻了：老先生躺在地下，嘴吐白沫，脑袋鼓起个鸡蛋大的血包，手被蹭破皮肉，鲜血正往外流，浑身上下沾满潮湿的泥巴。潘兰珍弯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把陈独秀拖起，架到床上。她从厨房里打来清水，轻轻地给他擦洗手脸，用邓仲纯医生留下的纱布给他包扎伤口，忙得汗流满面，但她没有一句抱怨，默默地像个尽职的护士一样，精心照料着陈独秀。

陈独秀表情痛苦地躺在床上，耷拉着脑袋，不时在枕头上扭来扭去，一副苍白的狼狈样。他除了呻吟，也没说一句话，只是用那颤抖的手拍拍床沿，示意少妻坐下。潘兰珍顺从地在床沿上坐下，拉过他那青筋凸突的手，温柔地握在自己的手掌心里。过了好一会，

陈独秀才用颤抖沙哑的嗓音，断断续续地说些什么，潘兰珍贴近耳朵，才听清楚：

“兰珍，我想回……安庆，看看……家里……房子，不知被……日本人……弄成个……什么样……”

“依好好地休息，等依病好了，日本人赶走了，阿拉同依一道回安庆去窥窥。”

“兰珍，我怕等不得到那……个……日子……要能……现在……回去……就好了。”

“老先生，会等得到的，依想开点，现在依这个样子哪能回去。”

潘兰珍深知老先生此时的心境，他太害怕孤独，心里太苦闷，感情太脆弱，不能再刺痛他的心而使他悲伤难过。于是，她便把他的手塞进被里，忙起身说：

“老先生，依躺着好好养养神，阿拉去给依熬点粥来。”

“兰珍，你……又……走了……”

“粥熬好，阿拉就来。”潘兰珍转身走向厨房……

傍晚时分，陈独秀腹胀剧烈疼痛，勉强起身欲入厕，刚起又一阵天昏地暗，“扑通”晕倒床上，刹时四肢僵直，冷汗如注，昏迷不醒，吓得少妻不知所措。

深山夜晚，大地沉睡，万籁俱寂，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声，一个流落他乡的妇道人家，又有何回天之力？在微弱的煤油灯光下，潘兰珍满面泪水，寂寞地守候在唯一可依赖、生命垂危的亲人身旁，不时地给昏迷不醒的陈独秀敷换湿毛巾，又不时地呼唤着：

“老先生，老先生，依快醒醒……”

三更半夜，陈独秀苏醒过来，慢慢睁开无精打采的眼睛，正欲启动嘴唇，想说什么，旋即又昏迷过去。艰难之夜，周而复始，陈独秀浑身颤抖，冷汗涔涔，高烧不退，病情更为恶化，他正向死神挪去……

## ◎遇故人“妙手回春”

18日，陈独秀好似睡了一夜长觉，苏醒过来，长长地吁了口气。守候在身边、眼睛充满血丝的少妻潘兰珍，见陈独秀醒来，略带几分高兴地说：

“老先生，依终于醒过来，把阿拉吓坏了。”

“兰珍，我……怎么……啦，我……不是……在睡……觉吗……”陈独秀低声无力地说。

“老先生，依昨天夜里就昏迷不醒，刚刚醒过来。”

“噢，我……什么……也不知，好像在……睡……觉，又……好像……到……一个……遥远……可怕……地方，吓了……一身……大汗……”

“老先生，依醒来就好。”

“兰珍，看样子我的病不轻，怕……难……好了。你快……请人……叫松年……他们上……山来，我想最……后……”陈独秀哽咽了，老泪从眼角流了出来。

“老先生，依别往坏处想，依会好的，阿拉还要同依一道回安庆老家去。”

“兰珍，我的病，我……知道……”陈独秀有气无力，停了会，又断断续续地说：

“兰珍，你……拿笔……墨来，扶……我……坐起，给……仲纯和重庆……周纶……曾定天……两位……名医……写信，请……他们……务必来……鹤……山坪……给……我……看看，死……了……也瞑……目……”

少妻潘兰珍将笔墨纸张拿来，并扶老先生靠床坐起。陈独秀侧身伏在靠床的一张破旧的木桌上，铺开纸张，妻子磨墨，陈独秀提笔，然而并非像往日那样潇洒自如，而是笔重千斤，艰难而凄楚，一

个字也写不出。

“咚咚”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几天恶病中的陈独秀，听到敲门声，精神为之一振，似乎从敲门声中捕捉到一线希望，忙放下手中的笔，对少妻潘兰珍说：

“兰珍，有人来了，快去开门！”

几天没听到敲门声的潘兰珍，心中也有几分高兴，心想怕是陈松年或邓医生来了。于是，紧步走到石墙院门，亲切地问道：

“啥人？”

“婶娘，是我来了。”

“噢，松年来了！”

潘兰珍打开门，见松年拎着个药箱站在门外，后面还跟着一位60来岁的老先生。

“松年，依来得正好，老先生这几天病可重啦，正要请人给依送信去。”潘兰珍焦急地说。

“婶娘，你莫急，我把邢老医生请来给父亲看病。邢老还是父亲的故旧。”

“快请老医生进来。”潘兰珍向邢老医生深深鞠了一躬，感激万分地说：

“感谢邢老医生上山来，实在叫阿拉过意不去。”

“嫂夫人，我跟你家老先生也算是老交情了，你不必客气。”邢老医生忙拱手还礼。

三人一起迈步进屋，潘兰珍顺手关上们。

靠床伏桌的陈独秀，起先听到敲门声一阵高兴，当少妻潘兰珍出去开门之时，他又一阵头晕，眼冒金花，笔一甩，又昏了过去……

当邢老医生在潘兰珍、陈松年的陪伴下，走进卧室时，只见陈独秀像死了一般，直挺挺躺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吐着粗气。邢老医生见状，直奔床前，拽住陈独秀骨瘦如柴的手，搭脉、量体温、摸腹、听胸检查，急速打开药箱，取出针管，细心地给陈独秀注射药剂，

又给他灌肠，忙得满头大汗。潘兰珍见此，忙递上毛巾，邢老医生接过毛巾抹了抹汗，便顺势坐在床沿，又搭起陈独秀的脉，静静地观察，一句话也没说。潘兰珍、陈松年也没吭一声，把希望全寄托在邢老医生的手上，似乎有邢大夫在，心里也踏实多了。

这一切，陈独秀全然不知，任凭邢大夫摆布。大约到太阳快要爬进深山之时，陈独秀才渐渐苏醒过来，微微睁开眼睛，瞟了瞟来人。过了好一会，陈独秀哑着嗓子，低声问道：

“兰珍，谁来了？”

“是松年来了。”潘兰珍答道。

“父亲，是小儿来了。”陈松年弯腰，贴近陈独秀耳边说：

“还有一位客人。”

“谁？是仲纯，还是赞化？”陈独秀问。

“是我，邢叔德。”邢大夫搭着陈独秀的脉说。

“仲甫兄，你还记得我吗？”

陈独秀两只无神的眼睛，盯着邢叔德好一会儿，摇摇头说：

“认……不出……了，瞧我……这眼……力。”

“仲甫，你还记得光绪三十二年，我们同乘海轮去日本求学吗？我在船上被盗去了所有钱财，我急得要投大海一死。后来，幸亏你鼓动全船旅客解囊捐款相助，才救得我一命，才有我邢叔德的今天。”邢叔德回忆着对陈独秀说。

“噢……好像有这么回事。这已是数十年前的区区小事，你无须这般记挂。”陈独秀摇摇头说。

“仲甫兄，这件事我一直记挂心间，到处打听你的消息。要不是你尊公子告知，哪里知道，当年如雷贯耳的陈独秀，便是你仲甫兄。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

“那是过去的事了，还是你行医好……”

“父亲，邢老医德在江津有口皆碑，很有名气。他听说你身体有病，放下手中的事，特上山来给你看病。”陈松年插话说。

“噢，叔德，谢谢你，辛苦了。”陈独秀用感激的目光望着邢叔德。

“仲甫兄，你我是多年的旧交，对我就不必谢言了。你救过我的命，我为你治治病，还不应该吗？你这样客气，叫我叔德心怎安？”

“好，那我我就不必客气了……”

注射进陈独秀肉体的药剂发挥效应了，加之与故旧邢叔德的摆谈，陈独秀心情多天没有像今夜这样畅快，精神也好得多了，也想吃点东西，话也多了。少妻潘兰珍和小儿陈松年，也一扫脸上的愁容，心里也都松了口气，不得不由衷地感谢邢老医生的妙手回春之道，把陈独秀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潘兰珍无限感激地说：

“邢老医生，阿拉真不知如何感谢侬，要不是侬老人家上山给阿拉老先生看病，老先生怕……”

“嫂夫人，你快别这样说。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何况你家老先生是我当年的救命恩人。”

“邢叔叔，请你受侄儿一拜。”陈松年双膝欲跪下。

“少爷，万万不可这样！”邢叔德放下正搭着陈独秀脉的手，双手向前把陈松年劝挡住。

此时，陈独秀似乎安详地睡了。

常言道：“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报恩心切的邢叔德丢掉手中的病人，关了县城诊所的门，几乎三天三夜守候在当年救命恩人陈独秀的病床前，眼见陈独秀从死亡边缘挣扎了回来，心才觉得宽了些，了却了多年欲报恩之愿。然而，他心里还装着县城里那些盼望他的病人，不得不返回县城料理一下诊所的事务。临行前，他不像潘兰珍和陈松年对陈独秀病情那样乐观，而是苦着脸对他们说：

“仲甫兄的病实在不轻。不瞒你们说，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由于高血压已严重影响到心脏，加之食物中毒，稍不小心，就可能发生生命危险。你们这几天不要离开病床，他的病随时都会反

复,护理务必精心,切切不可大意。”

“邢老医生,阿拉知道。”潘兰珍说。

“邢伯伯,我这几天不走,留下和婶娘照顾家父。”陈松年接上说。

“这就好。我回县城把诊所里的事料理一下,过几天再来,带点好药来。仲甫兄已睡着了,不必叫醒他,我这就告辞了。”邢叔德已跨出了石墙院大门。

“邢老医生,依走好!”潘兰珍有礼貌地送着邢叔德,接着又转向陈松年说:

“松年,依送送邢老医生。”

“婶娘,我送邢伯伯!”陈松年一手拎过药箱,一手扶着邢叔德走下了青石台阶。

## ◎九死一生盼阳光

陈独秀的病情,果然不出邢叔德所料,两三天之后,又恶性发作了。

这天清晨,陈独秀一觉醒来,睁开迷迷糊糊的眼睛,一缕缕灿烂的阳光透过南墙窗户射进阴暗潮湿的房间,又隐约听到户外树上鸟儿“唧唧喳喳”地叫着,心中涌动起一股渴望的情绪,他多么想到户外享受那阳光的温暖,看看那枝头上自由歌唱的小鸟儿。他转着脑袋,左顾右盼,却不见妻子和儿子,骤然间,一阵孤独感猛然袭来,他顿觉恐惧,慌忙用尽全身力气,连连呼喊道:

“兰珍!松年!”

没有人答应。除了户外枝头上鸟儿在那明丽的阳光下清脆悦耳的叫声外,屋子里静得连心跳声都能够听得见。此时,陈独秀的孤独、惧怕之感,越来越强烈,似强烈的台风向他冲击而来,他再也躺不住了,他要摆脱这孤独,这惧怕,他要到户外去,求太阳神保佑



## ◎“怕等不到那个时候”

陈松年转身向外走去，到镇上去请医生。

“无巧不成书”。当陈松年急匆匆地走到石墙院外那青石台阶时，正好与背着药箱、气喘咻咻的邓仲纯相遇，两人几乎同时惊叫道：

“噢！是邓伯伯。”

“噢！是松年。”

“邓伯伯，你来得正好，家父的病可危险啦，连日来多次昏迷。早上跌倒昏迷不省人事，现在还没醒来，婶娘急煞了，我正去镇上请医生来抢救，然后下山去请你老人家。”陈松年急忙地告知家父的病情。

“松年，你不要急，这是我早已预料到的。昨天邢大夫告知你家父病情正在恶化，今天一清早我就赶上山来了。”邓仲纯安慰陈松年说。

“邓伯伯，麻烦你老了，真不好意思。”

“客气话不说了，快点去给你父亲瞧瞧！”

陈松年从邓仲纯手中接过药箱，一只手拎着，一只手搀着邓仲纯的手臂，快步向石墙院赶去。

邓仲纯一进陈独秀卧室，见到当年在日留学时充满活力的同乡好友陈独秀，面色苍白生命垂危地躺在病榻上，加之潘兰珍那副哭丧着的脸，不禁心酸起来，眼泪簌簌地往外流。他本能地跨步上前，坐在病榻上，拉起陈独秀的手，聚精会神地搭脉，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只“嘀嗒嘀嗒”走着的怀表，默默地数着陈独秀脉搏跳动的次数。潘兰珍见邓仲纯未请而及时赶来，心中感激万分，忙往前一跪，连磕三个响头，哀求着：

“邓医生，请依行行好，想一想办法把老先生救活！依的大恩大

## ◎“怕等不到那个时候”

陈松年转身向外走去，到镇上去请医生。

“无巧不成书”。当陈松年急匆匆地走到石墙院外那青石台阶时，正好与背着药箱、气喘咻咻的邓仲纯相遇，两人几乎同时惊叫道：

“噢！是邓伯伯。”

“噢！是松年。”

“邓伯伯，你来得正好，家父的病可危险啦，连日来多次昏迷。早上跌倒昏迷不省人事，现在还没醒来，婶娘急煞了，我正去镇上请医生来抢救，然后下山去请你老人家。”陈松年急忙地告知家父的病情。

“松年，你不要急，这是我早已预料到的。昨天邢大夫告知你家父病情正在恶化，今天一清早我就赶上山来了。”邓仲纯安慰陈松年说。

“邓伯伯，麻烦你老了，真不好意思。”

“客气话不说了，快点去给你父亲瞧瞧！”

陈松年从邓仲纯手中接过药箱，一只手拎着，一只手挽着邓仲纯的手臂，快步向石墙院赶去。

邓仲纯一进陈独秀卧室，见到当年在日留学时充满活力的同乡好友陈独秀，面色苍白生命垂危地躺在病榻上，加之潘兰珍那副哭丧着的脸，不禁心酸起来，眼泪簌簌地往外流。他本能地跨步上前，坐在病榻上，拉起陈独秀的手，聚精会神地搭脉，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只“嘀嗒嘀嗒”走着的怀表，默默地数着陈独秀脉搏跳动的次数。潘兰珍见邓仲纯未请而及时赶来，心中感激万分，忙往前一跪，连磕三个响头，哀求着：

“邓医生，请依行行好，想一想办法把老先生救活！依的大恩大

德，阿拉今生来世也不会忘记。”

邓仲纯见之，忙摺下陈独秀的胳膊，向前扶起潘兰珍，说道：

“嫂夫人，快起来，万万不可这样！同仲甫兄并非一般之交，我一定尽力为他治病。”稍停，他又对潘兰珍和陈松年说：

“仲甫兄的病确实不轻，需要安静，你们也不要过于焦急。我先给他注射强心针，待他苏醒再细问病情。”

邓仲纯从随身带的药箱中取出针剂，轻轻地给注进陈独秀那瘦弱的肌体之中。接着，他又搭着陈独秀的脉搏，看着怀表……

片刻，强心药剂发生作用，陈独秀的眼皮微微翻动，“咕噜”长喘一口气。站在一旁的潘兰珍和陈松年，心中也稍稍松了口气。这时，陈独秀慢慢睁开双眼，左右晃晃头。当正在给他搭脉的邓仲纯出现在他那半开半闭的眼帘时，他心头一阵喜悦，用力启动嘴唇，好不容易断断续续而低声地说：

“仲……纯兄，你……来啦，太……谢……谢……你……了……”喘了口长气，又说道：

“我……以为……见不着……你……”

“仲甫兄，琐事缠身，我来迟了，你吃苦啦！”邓仲纯安慰道：

“仲甫兄，你的病会好的。抗战胜利后，我们一道回安庆家乡去，你一定要好好地活着。”

“怕……怕……等不到……那个……时候……”陈独秀断断续续的言词从牙缝里挤出，更显凄凉、悲伤。旋即又昏迷过去……

## ◎弥留之际为妻留遗言

不日，专程去重庆请陈独秀所信赖的周纶、曾定天两位名医的人回来了。说两位名医虽然医务繁忙，还是仔细研究了陈独秀的病情，确认陈独秀病已垂危，实无挽救之方，故未前来诊治。但为表示对陈独秀的最后友情，他们又各赠药品，尤其是周纶医生慷慨大

方，友情为重，将其夫人预防血压变化的贵重药品分赠给陈独秀，令邓仲纯及潘兰珍、陈松年感动不已。

陈独秀再次从昏迷中醒来，未见他所信赖的周、曾两位名医来给他诊治。心中生还的一线希望，如同肥皂泡破裂了。数日间，陈独秀苦闷不安，辗转床第，接二连三的昏厥，可累坏了邓仲纯，一天24小时守候在陈独秀病榻前，尽心尽职为陈独秀作最后的诊治。尽管陈独秀时有苏醒，然而病已垂危，奄奄一息了，不得不派人通知在江津九中任教、受北大同学会委托照顾陈独秀的何之瑜先生及把陈松年一家接上山来。

何之瑜，这位跟随陈独秀多年的北大学生，湖南人，很有学问，教学有方，颇受师生尊敬。他对陈独秀，尊师如父，对其照顾无微不至。他闻陈独秀病危后，当即转告北大同学会，并星夜赶上鹤山坪。

几经折磨，陈独秀昏昏醒醒，醒醒昏昏，被病魔折腾得只不过比死者多了口微弱的气息。陈独秀一旦醒来，他心里也明白，弥留的时间不多了，飘泊潦倒的一生也将结束了，万分悲楚时时从心中涌起，老泪从眼角很深的鱼尾纹中流了出来……

1942年5月25日下午，从昏厥中醒来的陈独秀，挥着无力的手，示意少妻潘兰珍来到病榻前，轻声、嘶哑而悲凉地说：

“兰……珍，我……就要……”

“不！不！老先生，依会好的，依不能一个人走……”潘兰珍呜呜地哭。

“兰……珍，我……有话……要对……之瑜讲，你……去……请他……来。”

何之瑜一上鹤山坪，里外联系，均由他张罗，也够累的了。此时，他在一侧正与陈松年以及来探望陈独秀的友人，商办有关陈独秀的后事。此时此刻，先生令夫人潘兰珍请他去病榻，他清楚地意识到，不为别的，看样子先生要留下临终遗嘱了。果不出所料，陈独秀不停地喘气，艰难而断断续续地，几乎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

“之瑜，你受北大同学会的委托照顾我多年，其情毕生难忘。现在，我快要……离开……”

“先生，你别这样说。我对先生照顾不周，还得请先生多多包涵。”何之瑜忍着悲痛说。

“之瑜，你是我最可信赖的人。我死后，丧事从简，也不要登报。”停了会，陈独秀交代说：

“小儿松年早已分居独立，惟有夫人家中无亲人可依靠，放心不下，请你务必多多关照，并要嘱夫人，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自立。我在南京狱中，朋友赠我的5个显德四年的古陶瓷碗，留给兰珍，后事料理后，稿费如有多余，也留给她一部分。此外……”话未说完，由于感情极度冲动，他旋即又昏了过去……

## ◎ 魂断鹤山妻悲哀

陈独秀仰卧在床上，一双眼窝下陷的眼睛，睁开的次数越来越少，被瘟神糟踏得不成样子的脸部，在暗淡、闪烁不停的煤油灯花照耀下，变得越来越惨白无神了，只剩下一颗赤裸裸的灵魂了。高烧、心口剧烈疼痛，像一场暴风雨，使他周身不时地惊跳、抽搐，两只手抖动不停，不时猛抓胸口。这双手过去曾是那么有力，高擎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揭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帷幕，开天辟地举起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如今却变得骨瘦如柴，条条青筋裸露，不忍目睹，那一颗有气无力的头在枕上微微晃动，让人瞧着心慌意乱。他的嘴唇已经向里抽缩起来，每次带着很大的痛苦微弱地呼吸一次，就像吞东西一样，一张一合，而且这微弱的呼吸次数也越来越少，靠着邓仲纯的输液维持着他那垂死的生命……

昏迷两天的陈独秀，像是在漫长的黑暗中，又像是在梦中度过。他仿佛回到了那阔别多年的故土安庆，他家那大洋房还在，他迈步进门，可是，房子里陌生人不让他进去，说这房子已易他人。他

与房主人争吵，房主人拿出房契给他看，那上面明明写着新主人的尊姓大名。他二话没说，转身便走。可是，他无家可归，往哪儿走呢？忽然间，他想到江边那神奇的古塔。这古塔曾经给他带来许多美好的传说，是他可归宿之地。于是，他疾步走去，登上了那神奇的古塔，极目远眺，一览长江美景，舒展双臂，大声疾呼。突然间，脚下滔滔江水，一个猛浪打来，古塔倾斜倒入江中，他从塔门一跃投入大江，不禁啊一声惊叫，吓得陈独秀在床上左右滚动，四肢抽搐痉挛，躁动了一阵，“咕嘟”一声，头歪倒一侧。

陈松年见之，赶紧冲到床前，一把托起陈独秀的头，扯着嗓门喊道：

“父亲，父亲，你怎么啦？快醒醒呀！”

然而，陈独秀没有醒过来，任凭潘兰珍和陈松年怎么摇晃，陈独秀再也无一声应答。邓仲纯拉起陈独秀一条胳膊，任凭怎么搭脉，脉搏再也不跳动了。是的，他不能应答了，他的脉搏再也不可能跳动了。他那颗憔悴的心再也经不住他那狭窄胸腔的挤压，已经停止了那最后的跳动。久治不愈的高血压引起突发性心脏病，使他走完了他那曲曲折折、功过是非皆有的人生旅途——与世长辞了！享年63岁。此时，是公元1942年5月27日晚9时40分。

顿时霹雳一声，潘兰珍心胆俱裂，她失去了患难与共、唯一可依赖的亲人，她搂住陈独秀已经开始发凉的身体，悲痛欲绝，失声痛哭，泪如泉涌，哭得是那样的凄凉，哭诉得又是那样的悲哀：“老先生，你走了，让我一个人怎么活下去！老先生，老先生，你怎么一个人走了，为何不将我一同带走……”

陈松年夫妇、孙女长玮、长筠，哭爸叫爹的，一齐跪到在地，哭声震天，冲出僻静的山村鹤山坪石墙院，打破了寂静的山村夜晚。在侧的何之瑜、邓仲纯、包惠僧等，作为陈独秀生前的好友，也不由得悲恸哽咽，叹息不已。

这天晚上，虽然天气阴冷，还夹着丝丝细雨，但石墙院的村民

们闻得这凄厉的哭声，心知一定是陈先生去世了。于是，他们纷纷来到上房，看见与他们朝夕相处、待人和气而有大学问的陈独秀静静躺在那里，又见潘兰珍及其陈松年一家和友人，在旁哭个不停，纯朴的山里人也心酸起来。杨家女佣人吴元珍也呜呜地哭了起来。潘兰珍见邻人来了，更是伤心落泪，愁肠寸断，哭声震天动地……

## ◎ 眷恋人世眼不闭

正在潘兰珍及陈松年一家哭得死去活来，悲恸万分之时，到重庆请周恩来为陈独秀找医院的潘赞化，星夜赶到鹤山坪。他走到院外，听到屋里哭声连天，知道事情不妙。于是，他大步流星地跑进屋来，一看屋里那凄凉惨景，心里立即明白了怎么回事，不禁老泪纵横，悲哀哽咽。他拨开人群，冲到陈独秀尸旁，猛力抓住陈独秀的双肩，用力摇动，痛彻肺腑，诉说着：

“仲甫呀，仲甫，我来迟了！你怎么这么急着走了呀！周恩来已在重庆帮你找好医院，也请好了大夫，等着你去住院治病。你真不够交情，你该领周恩来的情，太不够朋友了呀，你辜负了周恩来的一片好心。”

陈松年见潘赞化声泪俱下地哭诉，忙劝慰道：

“潘伯伯，你老也尽了朋友的心，小辈铭记在心。请你老也别太难过了。家父命该如此，拿他也没办法，你老快快请起。”

陈松年一把拉起潘赞化。潘赞化用手抹了抹两行老泪，顺手又把潘兰珍拉了起来，劝慰道：

“嫂夫人节哀，人死也不能复生，别哭坏了身子，请多保重！”

在一旁的邓仲纯插话说：

“大家都别哭了，快按照我们安庆家乡的习俗，先给仲甫兄净身，然后再商议怎么料理后事。”

几个人一齐动手，把陈独秀的尸体抬进了杨进士下房老堂屋。

放进一个大澡盆里，给他洗脸、净身，并用白棉花搓绳，将陈独秀尸体密密麻麻缠裹。然后，给他穿上一件白布内衣，外套一件白绸上装，下身穿着一条青丝棉裤，脚穿一双黑布鞋。头点一盏油灯，潘兰珍、陈松年及其一家，跪在一旁守灵……

他们把这一切收拾停当之后，人们才发现陈独秀两只眼睛还圆圆地睁着，似乎还在望着那熟悉的亲人和生前好友，似乎还眷恋着那充满阳光的人世间，似乎心中还有什么话要说……怎么也不愿闭上眼。

潘赞化见状，俯下身子，悲酸抽泣道：

“仲甫呀，仲甫，你还有什么不瞑目的？你这一生有光辉之时，英雄过，风尘过，已名垂青史，你就把眼睛闭上吧……”

然而，陈独秀的眼睛依然不闭，潘赞化不得不用手把他的眼皮往下抹了又抹，直到他那双当年炯炯有神的眼睛完全合上，潘赞化才松了手。

此时，邓仲纯在油灯下检点药箱和治疗器具时，在陈独秀书桌上看到5月13日，陈独秀生前写下的他一生握笔的最后一个字，正好是《小学识字课本》中的“抛”字。邓仲纯不禁一阵酸楚，无限感叹道：

“仲甫呀，仲甫，你在他省异乡石墙院，抛弃了你追求一生的事业，抛弃了你的亲人，抛弃了你的一切朋友，抛弃了你呕心沥血、精心研究的《小学识字课本》，而离开了人世间。哎，也好，也好，世界抛弃了你，你也彻底抛弃了人世间的的是是非非，在极乐世界可以自由自在，也无须烦恼和忧愁了……”

## ◎ 生前至交捐资办丧事

一代杰入消失了。陈独秀走完人生旅途，凄凉病逝的噩耗，迅速从鹤山坪传到江津县城，传到陪都重庆。他的生前友好、皖籍同



乡、北大的学生和一些在江津工作的地下党员，从四面八方，纷纷步行来到鹤山坪，吊唁、致哀，给他敬香，为他烧纸……潘兰珍、陈松年及其一家披麻戴孝，见前来吊唁者，便跪倒匍匐痛哭，上下一片悲痛。

此时，既悲痛又忙碌的要数何之瑜了。他既要安慰先生的亲属，又要召集各方人士商办陈独秀的后事，里里外外忙个不停。

5月28日，各方人士及陈独秀生前好友，不期而会于鹤山坪石墙院破屋，共同商办陈独秀的后事。

何之瑜带着商议的语气对各方人士说：

“瞻秋老人、诸位先生，独秀先生已溘然长逝，鄙人受北大同学会之委托，料理先生后事责无旁贷。今日特请诸位商议料理先生后事有关事宜。一是筹措殓殡仪等费用，日后由北大同学会偿还；二是如何遵先生之嘱，丧事办得既简朴，又庄重肃穆。下面先请夫人潘女士和公子松年先生谈谈，有些什么想法和要求。”

“诸位长辈、诸位先生，家父人都走了，我看后事不必那么铺张，买口薄棺，就地安葬，待抗战胜利再迁移安庆。”陈松年寒碇地说：

“家父后半生萧条，经济拮据，生活上靠诸位朋友慷慨资助，没留下一文钱，婶娘以后还要过日子，能省就省。”

“花销大小无所谓，关键是老先生他已经看不见了。”潘兰珍接上说：

“简单一些办好，能有口棺材挡挡土就行了。”

“这不行！”潘赞化感慨地说：

“仲甫，算是一条汉子，毕竟有过辉煌的时刻。青年时期向宗教宣战，向偶像宣战，有一种凌厉之气，不失为一个先驱者；一生坚贞，身后穷愁，毕竟是一个操守者。因此，我们要对得住他。用最好的木头，请最好的木匠，给他打一口像样的棺材。当然，要大操大办，搞得轰轰烈烈显然是不可能的。”

“潘伯伯，你的心情侄儿能理解，作为后辈的何不想为家父后事办得体面一些，可是，打口像样的棺材，哪来这笔可观的钱？”

“松年，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你不用操心。”

众人随声望去，说话者是一位身着白布对襟、外套单马夹，满头银发，面色慈祥，目光和蔼，七旬有余的老人，右手摸着满把银须，说道：

“独秀先生知识渊博，又有很高的名望，避难江津，生活虽穷愁，但矢志不渝，潜心研究文字学，积极宣传抗日，令鄙人敬佩。”这位老者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踱了几步，又说：

“独秀先生，生前和鄙人及夔康侄交往甚密，感情笃深。昨夜，他已走完人生之路，离开了人世间，鄙人同诸位一样痛彻肺腑。至于他的身后大事，棺木衣衾等费用，均由鄙人和夔康侄共同负担，以表示对斯人的哀悼和缅怀。不过具体事宜，烦请各位分头操办，老夫实因年事高，力不从心了。”

这位老者，就是当地名绅富商邓蟾秋老先生。

“蟾秋老人，你慷慨解囊，正如先生生前为你70大寿所题‘大德大寿’、‘寿考作仁’的条幅一样，令人铭记和感动，此义举足可告慰先生在天之灵了。”何之瑜说着，转向邓蟾秋老人深深一鞠躬，又对陈松年说：

“陈公子，快给蟾秋老人磕头致谢！”

陈松年向邓蟾秋老人面前一跪，连磕三个响头。邓蟾秋老人忙上前扶起陈松年，说：

“陈公子快请起来，不必谢言。”

“诸位先生，还敬请你们商讨一下，独秀先生安葬之地，是就地安葬，还是葬于江津县城？”何之瑜又带着商量的语气说。

“诸位，独秀先生归宿之地，我与蟾秋叔父已商定，我愿将县城大西门外鼎山山麓康庄前坡一块园地，捐赠为独秀先生的墓地。”

一位中年人慷慨地说：

“此处，为鄙人避暑山庄，面对波涛滚滚的长江，后倚松竹茂密的春山、桔园；庄前屋后花香草绿，掩映在密密桔林之中，幽静、安逸。日机轰炸陪都重庆，祸及江津时，独秀先生生前，曾在此处避难小住，闲时先生常到前坡眺望远景，一览滔滔江水，心旷神怡。对此处景致，他曾多次赞叹说：

“‘得此佳景，平生足矣’。

“为此，我们叔侄捐赠康庄前坡，以了却独秀先生的宿愿。各位以为如何？”

这位中年人话音刚落，在座的异口同声赞道：

“好地方，就安葬于此！邓先生不愧为热心肠的开明人士，令人铭记。”

这位邓先生，即邓蟾秋老人侄公子邓燮康。

“纵浪人间四十年，鹤去人空剩古津。”陈独秀虽穷愁潦倒，寂寞悄然离去，但江津各界人士对他仍深深怀有旧情。于是商定，为沉痛悼念陈独秀，寄托对离人的哀思，由邓燮康和周光午主持举行简朴的追悼会和安葬仪式。后事商定后，何之瑜呼唤陈松年给邓氏叔侄和各方人士匍匐跪拜，以叩谢大恩大德。

“之瑜先生，快请陈公子起来。他们一家也够悲痛的了。”邓蟾秋老人见陈松年又跪拜，忙挥手对何之瑜说。

各方人士均因慕陈独秀之名，分头筹办丧事。根据邓蟾秋老人之嘱，选用四川产贵重木材香楠木为棺木。楠木为常绿大乔木，叶子呈椭圆形，表面光滑，背有软毛，绿色，结果实蓝黑色，质地坚硬耐腐，且有香味；是建筑和造船的贵重材料，只有富有者或知名人士，才有经济实力用这上乘的棺木。邓蟾秋老人还叮嘱，请当地最好的木匠师傅日夜赶制四瓦式的棺材，雕花、上漆。与此同时，分头设计墓地和挖掘墓穴，勒刻墓碑……

## ◎ 择遗像松年心悲痛

常言道：“孝子难当”。披麻戴孝的陈松年，是陈独秀悄然离去时唯一在身边的子女。长子延年、次子乔年，早于1927年和1928年牺牲于上海龙华塔下。陈独秀与第二位妻子高君曼所生子鹤年、女儿子美，因高君曼1931年含愤死去后，与陈独秀失去联系，不知飘落何方。此时，只有三子陈松年为陈独秀守灵、捧灵了。

这几天，陈松年已累得精疲力竭，脸色惨白，哭肿了双眼，还得支撑着当孝子。各方人士商定丧事后，陈松年遵何之瑜之嘱，含泪清理陈独秀遗留下来的几帧发黄的照片，以挑选一张作为遗像。

陈独秀生前四处奔波，四海为家，飘泊无定，留下的照片很少。摆在陈松年面前的只有三帧照片：一是摄于1904年青年时代的照片，已陈旧模糊，但当年的青春活力依稀可见，用作遗像显然不协调；二是摄于1937年冬，身着西服，头已秃顶，头发稀疏，脸庞瘦削，颧骨凸起，胡子拉碴，愁容满面，如此遗像，看了令人忧伤、凄凉，不是个滋味；三是头戴毡帽，留着山羊胡须，身着长袍，坐在藤椅上，目视前方，显得从容镇定，气宇轩昂。照片上方写有“民国二十六年摄于南京监狱”的手迹，背面也留有同样的文字。

面对这张照片，陈松年不禁又是一阵悲痛，泪水簌簌地往下流。当年他与妻子8次去南京探监的幕幕情景，先父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那时陈独秀虽然关押在监狱里，但他的心境仍然坦荡，对生活充满希望。正如陈独秀为刘海粟先生书写的对联那样：

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这副对联纵横恣肆，气势磅礴，抒发了陈独秀当时在狱中的坦荡心境和其志未丧，其气势若长虹的情怀。没想到，6年后的今天，

陈独秀历经沧桑而离开了人间，留下了这张有纪念意义的照片。想到此，陈松年用手轻轻拂去照片上的灰尘，仔细端详一番，认为用这张照片作为先父标准遗像，最为适合，其意无穷，令人思绪万千，缅怀之情油然而生。何之瑜见了，十分赞同用这张照片为陈独秀的标准遗像，于是，当即差人送江津县城请人放大洗印。

### ◎ 乡邻护送葬康庄

陈独秀已净身的遗体，在杨进士下房老堂屋里停放了三天三夜。陈独秀避难在江津所有的晚辈，都纷纷赶来奔丧，亲人们按照老家安庆的习俗，为他披麻戴孝，轮换着为他守灵。从鹤山坪请来的木匠师傅，起早贪黑，一天多的时光，把一口厚实四瓦式的楠木棺材赶制出来，雕了花，上了黑漆。

安庆的习俗与有的地方不同，死了人则要鸣放鞭炮，鞭炮越响越吉利，认为人死了同样是喜事，只不过是“白喜”。棺材打好后，在噼哩啪啦的鞭炮声中，几个身强力壮的大汉把陈独秀的遗体抬入棺材内，顿时，陈独秀的亲人哭声震天，尤其是潘兰珍扒着灵柩嚎啕大哭，悲惨、凄凉地呼唤着：

“老先生，老先生，你死得好苦！要我今后怎么活下去……”

潘兰珍的阵阵哭声，令人心碎，在旁的邓仲纯、潘赞化等好不容易把她劝慰离开灵柩旁。几个大汉又用100斤石膏、100斤枫炭末、100斤谷壳灰拌和混合物，把棺内空隙处塞得紧紧的，以增强吸水和防腐力。棺木花板上还扎了一朵很大的白绸花。

1942年6月1日出殡这天，气候闷热，天低云垂，晨下丝丝小雨。石墙院内悲声恸哭，从乡间请来的鼓乐手，一个劲儿地吹打着，格外凄凉和悲苦。

在一阵长长的鞭炮声中，猛然间，只听得杠子头李海廷响亮的号子一响，16名壮汉杠工，一齐用力抬起盛殓陈独秀的那沉重的

黑漆大花板楠木棺材，迈着稳健的步伐，徐徐地抬出了石墙院破屋院门。陈松年丧服端灵，穿着白衣的童男童女各牵一条连在灵柩上那朵大白花的白绸开路，陈独秀的亲人身着丧服，同乡、朋友、学生及朝野名流胸前戴着白花，排着长长的队伍相伴在灵柩的后面，一边号哭，一边抛散钱纸。那些钱纸，在风中飘飘荡荡一阵，便落在路边的草丛中，似一朵朵白花在山间草丛中开放。

左右乡邻闻讯，不期而会，一二百人沿途护卫，一个跟着一个，且燃放鞭炮，以示对一代杰人景仰惜别之情。双石、麻柳两乡小学的学生，一律着白衬衣，手持童子军棍，乡丁们则肩扛长枪，枪上扎有一白花。灵柩所经之处，附近的村民也大都赶来夹道相送。如此殡仪，在抗战那样乱哄哄的时局下，在那僻静的山村，是颇为热烈、隆重的了。

当灵柩抬至双石桥观音岸时，寨门狭窄，16人抬的棺木不能过寨门，怎么办？杠子头李海廷察看一番后，当即用木棒绑架，灵柩越墙而过。此时杠子头号子喊得更高亢，鼓乐手唢呐吹得更响，震天动地，在山间回响。抬至江边，灵柩乘船至康庄河下，一般送葬人员步行，经五举沱柑桔林而到达葬地。

与此同时，江津县各界人士及陈独秀生前好友，袖戴黑纱，胸佩白花，迈着沉重的步子来到江津九中高三分校礼堂，参加陈独秀简朴而肃穆的追悼会。当地的安徽同乡和高三分校学生也都参加了追悼会。会场内，没有落套的花圈，也没有青松翠柏和鲜花，只有陈独秀那幅遗像置放在礼堂主席台的桌上，两边摆放着几幅纸挽联。上面写道：

君是降龙伏虎手拈花微笑散诸天  
苍茫五十年前事贝叶重缮益惘然

纵浪人间四十年我知我罪两茫然

是非已付千秋论毁誉宁凭众口传

伊人去兮事迹犹存

一生功过自有评述

是日下午，烈日当空，载运陈独秀灵柩的木船，至山脚康庄河下，16人抬的棺木在阵阵有节奏的号子声中，抬至康庄园地。此时，参加追悼会的各界人士、陈独秀生前友好及江津九中部分学生，也来到康庄。女学生穿着一色的蓝衣衫，头上戴着小白花，由邓燮康和周光午主持举行简朴的葬仪和谒碑仪式。邓燮康长女邓敬苏、次女邓敬兰姐妹俩，毕恭毕敬地立在墓碑两旁。仪式开始时，邓敬苏姐妹俩将墓碑上红绸徐徐取下，一块峡石墓碑上镌刻隶书：

独秀陈先生之墓(1879—1942)

这隶书为陈独秀生前同乡好友台静农教授之手笔。参加葬仪者达几十人，并在陈独秀一抔新土、圆形墓前摄影留念。

此时，最为悲痛的当是陈独秀之妻潘兰珍，她扶着一棵桔树啜泣不止，脸色惨白，一双眼睛里充满了血丝，邓燮康夫人等一直跟随劝慰。陈松年一家跪在墓前烧纸送亡灵，悲惨凄楚。陈松年嘴里不断呼唤道：

“父亲，你老人家安度亡灵，待抗战胜利，小儿一定带你和祖母回安庆老家！”

陈独秀入葬后，人们即修筑道路，铲除杂草，清除污秽，种树蒔花，敷布景物，此地鼎山虎踞，几江龙蟠，岚光映耀，帆影出没。陈独秀亡灵，可以安矣。

陈独秀一生春秋度尽，从陈家破屋发迹曾经几度风流，又曾几度曲折、怅惘；一生探索，可一生未探索到自己应有的归宿，连他自己也没想到，晚年却寂寞、凄凉地归宿于他省异乡石墙破屋，孤伶伶地葬身于鼎山脚下，正是鼎山青松映孤坟。

陈独秀这个近代杰入消失了，人们回味着中国历史的这段终结。当时的《时事新报》、《新民报》、《江津日报》等，对陈独秀度尽人生春秋，作过简单的报道及评价。1942年5月29日，《江津日报》一版是这样报道陈独秀逝世的：

一代杰入陈独秀先生于本月二十七晚九时四十分急性胃炎与脑充血齐发，医药罔效，溘然长逝于县属鹤山坪乡寓，享年六十四岁。陈氏生于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安徽怀宁人，字仲甫，原名伸，一名由己，号仲子，别号熙州仲子，日本及法国留学生，曾任北大文学科学长，主编青年杂志，后因思想左倾，主持共产党，被拘南京模范监狱。抗战军兴，旋即出狱入川，隐居津门，研究小学，贡献颇多，今年不幸逝世，实为学术界一大损失。先生公子女供职于国立九中。一生坚贞，身后萧条，亲友学生，将集议救济办法。六月一日发柩于县城之南某地，殆抗战胜利再移运回原籍。

陈独秀在石墙破屋度尽人生春秋之后，许德珩作探望记事诗一首：

得知陈独秀，养病在江津。  
船行到白沙，过此都停轮。  
便道去探望，探望此老人。  
别已十余年，重见百感中。  
今非昔所比，白发老病身。  
坐了五年牢，战起得为民。  
今往江津市，仆仆感风尘。  
无人与往来，邓初<sup>①</sup>照顾频。  
曾谈文字学，对此兴趣真。  
拜访二三次，师友已情亲。  
狱中有著作，此情实可真。

<sup>①</sup> 邓初即仲纯。



谁知三年后，客死在江津。

## ◎潘兰珍晚景凄凉

陈独秀与世长辞，最为悲痛的莫过于爱妻潘兰珍了，她失去了患难与共的唯一亲人。人走房空，只留下一堆她和陈独秀亲手种植收获的土豆及共同栽种的一株庭院梨树。望着几件向邻居借来的破烂桌椅和四壁萧条的陋室空堂，耳畔回响的只剩下陈独秀弥留前的遗言：

“兰珍吾妻，望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

然而，一个妇道人家哪有可能左右逢源，百事顺遂，生活出路何在，她整日悲痛，愁眉不展。

此时，跟随陈独秀多年直至为其妥善办理后事的何之瑜，四处奔走，为潘兰珍女士寻找工作和安身之处。这也是陈独秀临终之前对他的嘱托，岂能不为之尽力？天无绝人之路。幸亏陈独秀名气大，慕他名的人多，总算在重庆附近一家私人农场给她找到了一份工作，生活亦能自主、自立，何之瑜也算了了先生的遗愿。潘兰珍对何之瑜这种热心奔走、真诚助人的精神感动不已，饱含着泪水对何之瑜说：

“之瑜，你是我今生今世的大恩人！我要烧香叩头，求菩萨保佑你！”

“夫人，千万别这样说！这是先生之嘱。先生生前对学生的教诲之大，我永远铭记在心。目前，还是抗战时期，国难当头，人民生活贫苦，待抗战胜利后，学生再为夫人另择工作，请夫人先在农场暂且栖身下来。”何之瑜也几乎含着热泪对潘兰珍说。

“之瑜，谢谢！目前，我也只好这样了，只要能找碗饭吃就行了！”

潘兰珍在农场栖身下来。她手勤脚快，不多言语，农场老板对

她也比较关照，让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每月的工资虽然不多，但也够她一人自主、自立的生活了。然而，空闲下来，她总感到在他省异乡十分寂寞，不时惦念着在老家南通托人抚养的养女小凤仙。在农场生活了4年之后，1946年，她带着陈独秀留下的部分稿费、文稿、字画和5个古瓷碗等，又重新回到了上海。好不容易在浦东租了一间房子，并在一所小学找了份煮饭的工作，以此谋生。安顿后，她便托人到南通接回日夜思念的养女小凤仙。

此时的潘兰珍虽然饱经风霜，尝尽人间甘苦，已是个30多岁的妇女，但长得比较丰满，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在她对陈独秀尽完纯真爱情的责任之后，她又与国民党的一个低级军官结了婚，组成了新的小家庭。以为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然而命运之神又将厄运降临在她的头上，她的新夫又暴病而亡。这个沉重的打击，使得精神本已支离破碎的潘兰珍，再也支撑不起来了——子宫癌病魔缠住了她，住进了上海一家医院，于1949年11月，在自食其力的艰苦生活中，终于走完了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程——离开了人世间。

## ◎养女凤仙与古瓷碗

提起小凤仙，童年和她的养母潘兰珍一样，还有一段苦难史。

1931年秋的一天，潘兰珍下班回来，在她居住的同兴里附近，发现一个身着破衣，蓬头散发，面黄肌瘦，光着脚丫的三四岁的小女孩，在萧瑟的秋风中，依靠在一位躺在路旁患着重病的农村妇女身边，哭叫着。心地善良的潘兰珍被这小女孩的哭声打动了，一股怜悯之情油然而生，忙停下脚步，弯腰问道：

“小妹妹，你别哭，你几岁啦？”

“4岁。”

“从哪儿来？”

“跟妈妈从南通逃荒来！”

潘兰珍一听“南通”二字，倍加同情地问道：

“她是你妈妈？”

小女孩怯怯地点点头。

“她怎么啦？”

“我妈妈病了。”

躺在路旁的那位农村妇女——小凤仙的妈妈，听到有人跟女儿说话，强睁开眼，没精打采地向潘兰珍看了看，想说什么，但又无力说出。潘兰珍见状，亲切地问道：

“阿嫂，我也是从南通逃荒到上海来的。我们是同乡，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阿妹，我命真苦，逃荒出来又害上了鼓胀病，连一顿饭也吃不上，哪来钱看病，现在腹内已积满水，看样子活不长了。我只放心不下这个4岁的囡囡，我死了，她靠谁呢？”小凤仙的生母声泪俱下，十分悲伤。

“阿嫂，你不要哭坏了身子，你们母女俩怪可怜的，天下穷人是一家，哪有见死不救的呢？”

“阿妹，你行行好，救救我囡囡吧？”

“阿嫂，你看这样好不好？”

“阿妹，你怎么做都行。”

“我结婚后，还没有生小囡，我想将你囡囡收养下来，你看行不行？”

“行，行，谢恩谢德！”小凤仙生母忙硬撑起身子，欲跪下叩头。潘兰珍忙上去劝阻说：

“阿嫂，不可这样，大家都是同乡。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会，我回去同我的老先生商量一下。”

说完，潘兰珍就向住处走去，边走边想：

“收养一个陌生的穷小囡，不知老先生能否同意。”潘兰珍走进

家门，正在伏案抄写稿件的陈独秀见她回来，像往常一样放下笔，忙倒上一杯茶递给潘兰珍，笑嘻嘻地说：“兰珍你回来啦！快吃杯热茶。”

潘兰珍接过茶杯呷了口清甜的茶水，向陈独秀投去温馨的一笑，贴近陈独秀，便轻声曼语地和陈独秀说起路边所见之事，并带着商量的口气说：

“老先生，我想收养这个可怜的小囡为女儿，你同意吗？”

“兰珍，你的心真善良，我怎能不同意？”

“你真的同意？”

“同意，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老先生，你真好！”潘兰珍高兴得像个孩子。

“兰珍，不能白领人家的孩子，要给人家钱，也是救人一命。”陈独秀怜悯而真诚地说。

“老先生，给多少钱？”

“兰珍，你给就是了。”

“给 50 块银洋。”

“好！快去把孩子领回来。”

潘兰珍带着银洋，高高兴兴地跑到小女孩和她的妈妈那儿，附耳对小孩妈妈说：

“阿嫂，我老先生同意收养你囡囡，给你 50 块银洋，去把病治好。”

“阿妹，你和你先生真是好人！大恩大德，长命百岁！我死了，眼也闭了！”

“阿嫂，快别这样说。你的病会治好的，我将囡囡领走了。”

这位农村大嫂手握银洋，满眼泪水，眼睁睁地望着潘兰珍，从自己身边抱走亲生女儿，是喜是悲？

小凤仙进了潘兰珍家门，也给这对老夫少妻带来了无限的欢乐，他们视小凤仙为亲生女儿，省吃俭用，给小凤仙做新衣，做好吃

的。陈独秀很喜欢小凤仙，经常抱在怀中，他教潘兰珍识字时，就让小凤仙坐在他的腿上。在潘兰珍和陈独秀的精心抚养下，小凤仙脸色泛红了，圆圆的脸蛋，天真可爱，她撒起娇来，逗得老夫少妻笑个不停。

1932年陈独秀被捕后，潘兰珍将她送回南通托人收养。从此，小凤仙天天盼着养父母回来……

如今十八九岁的凤仙，已长成一个大姑娘了，一见养母，她既感到陌生，又放声撒娇地哭叫起来，一头扑到潘兰珍怀中：

“妈妈，你好狠心，把我放下不管。妈妈，我好想你，我再也见不到爸爸了……”

凤仙的声声哭叫，如同钢针阵阵刺痛潘兰珍的心，她说什么呢，又有什么好说呢？她紧紧抱住凤仙，伴随着凤仙的哭叫而泪如泉涌，似乎只有这默默的泪水，才能倾注她内心的悲痛和对小凤仙的母爱……

时光流逝，转眼间到了1987年，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在陈独秀和潘兰珍离开人世间几十年之后，在上海滩突然冒出个陈独秀养女和古瓷碗之谜来，刹时间传遍上海滩，以至海内外，令人蹊跷。事情是这样的：

1987年的一天，一位戴着眼镜，梳着短发近60岁的妇女闯进了上海市第五律师事务所的大门。一进门，她便直嚷着要找一位姓李的律师，声称她是陈独秀的养女，为继承陈独秀的遗产而来。

陈独秀的养女？这位见多识广的李律师感到有些惊奇。只听说，陈独秀有子女在安庆，怎么上海又冒出个养女，李律师及其助手忙放下手头的工作，热情接待了这位名叫潘凤仙的农村妇女。一提起自己的身世，这位老妇便从陈独秀与潘兰珍的结合，收养她为养女，以及古瓷碗来历滔滔不绝起来。说的人有声有色，听的人扑朔迷离。继承遗产，当然要有产可继。潘凤仙作为养女，她要继承的是什么呢？当律师问她时，她的回答令人吃惊：

“我要继承的只是陈独秀留给我养母的5个古瓷碗。”

接着,这位老妇数落起这5个古瓷碗的下落。

1949年,潘兰珍因患子宫癌住进了医院。入院前,她把行李收拾好存放在陈独秀的一个学生家,那5个古瓷碗则寄放在由陈独秀朋友汪孟邹经营的亚东图书馆内。大约半年之后,潘兰珍病逝了,那5个古瓷碗则一直由汪孟邹保存。1952年刮起一场反托派斗争风波,陈独秀的一些朋友先后被捕,那5个古瓷碗也被作为托派的财产进了公安局。

1949年,潘兰珍去世时,养女凤仙已十八九岁,她长得倒也朴实,富有一种自然的美,含情脉脉,逗人喜爱。她像养母一样,勤劳俭朴,自主、自立。潘兰珍患子宫癌病情恶化住进医院时,她正在苏州一个由陈独秀的学生和朋友合伙办的一所学校里当勤杂工,对潘兰珍的病情一无所知,直到潘兰珍病危,才有人把她从苏州叫回上海。她来到养母身边,潘兰珍苍白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并嘱咐潘凤仙:

“生活一定要自主、自立,将来找一个诚实、可靠的男人,生活苦些不要紧,最要紧的是感情,相依为命。”

潘凤仙拉着母亲的手,泪如泉涌,连连点头……

潘兰珍已危在旦夕,不过精神仍十分清楚,一阵剧烈的疼痛之后,她又喃喃地向潘凤仙交代说:

“你爸爸留下的5个珍贵的古瓷碗,我存放在亚东图书馆汪孟邹先生那里,你务必把它取回收藏好,那是珍贵之物,万万不可变卖……”

养母气断,潘凤仙失去了唯一可相依为命的亲人,悲痛万分,嚎啕大哭。一个孤苦伶仃而情窦初开的少女,生活无依无靠,怎么办呢?生活所迫,不久她便和一位心地善良的工人结了婚。

人们不禁要问,潘兰珍去世后,她为何不去亚东图书馆将5个古瓷碗取回呢?迫于当时的历史原因,运动一个接一个,一会儿刮

“左”风，一会儿刮右风，一个弱女子，哪里还敢提及和陈独秀的那一层父女关系，当然更不敢想那5个在公安局的古瓷碗了。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身碎骨。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强劲东风，吹拂神州大地，压抑在人们心中多年的愁云惨雾为之一扫，精神上又获得第二次解放。对陈独秀这位早已有了定论的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有所松动，有关陈独秀的家庭和婚姻关系等，不时见诸报端。在这样一种气氛之下，当年只求安安稳稳过日子的潘凤仙，似乎也不安分起来，觉得有必要向社会公布她和陈独秀的那层鲜为人知的关系。经过深思熟虑，她向中央有关部门发出了一封封说明自己身份的信件，有关部门很快派人来上海查实了潘凤仙的身份。出乎潘凤仙意料之外，党的统战政策也落实到她的身上，她荣幸地当上了宝山县政协委员，扬眉吐气，喜从心来。她对上门祝贺的亲友们一再说：

“这是我连做梦也没想到的事，要是母亲活到现在该多好！”

默默无闻的生活结束了，潘凤仙便自然地想到本该属于她的私人财产，便想到了那5个古瓷碗，于是，她闯进了律师事务所的大门……

---

## 第十一章

### 魂归故里合妻冢 鼎山青松招旧魂

---

#### ◎许诺变遗言

叶落归根，这是生物的自然规律。人们常用它来形象比喻远离他乡的人，老了思念生他养他的故乡之情，更盼百年之后能“魂归来兮”——安葬故土。

陈独秀在石墙破屋生命垂危之时，急切地盼望重庆两位名医来给他医治，渴求生存的一线希望，更盼抗战胜利后能重返故里。然而，人的生死之权，并不掌握在人自身手里。陈独秀未曾料到半杯蚕豆花水，竟送他去见了上帝。所以，在刹那间的弥留之际，他只顾嘱其妻子潘兰珍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自立，还未曾来得及立下魂归故里的遗嘱，就凄凉地走了……

他的三子陈松年却没有忘记，还清楚地记得，祖母谢氏 1939 年在江津去世时，先父陈独秀身着麻衣，悲痛不已，在祖母遗体入殓时，对祖母哭诉许诺：

“你老人家安度亡灵吧，待抗战胜利后，孩儿和松年一定带你老人家回安庆！”

谁料，未等抗战胜利，陈独秀却匆匆离开了人间。



他的许诺竟成了遗言。子承父嘱，在陈独秀入殓时，陈松年同样哭诉着说：

“你老人家安心地走吧，待抗战胜利后，小儿一定把你及祖母带回故乡安庆！”

陈松年不禁又想到生母高晓岚 1930 年过世前，每逢清明时节都要带他去安庆北郊扫墓祭祖坟，还常说：

“这地方好，附近有桃园、松树、安逸清静。”言下之意告诉他在她百年之后，即归宿于此。

高晓岚病逝后，陈松年按照母亲生前的意愿，将母亲葬于无名碑处，并在坟旁留下块空地。陈松年当时想，母亲生前长期与父亲分离，一生不快，只要有可能，等父亲百年之后，一定将他俩合冢，让他们老人家在九泉之下相依为命。于是，陈松年噙着泪水同婶娘潘兰珍及妻子窦珩光商定，不论如何困难，一定要将陈独秀和祖母谢氏的灵柩迁徙回故乡安庆。潘兰珍连连赞许道：

“老先生弥留之际，多次同阿拉说要回安庆老家。把老先生灵柩迁回安庆，也是老先生生前的愿望。阿拉是个妇道人家，力不从心，希望松年你们一定要把老先生灵柩迁回老家安庆，不能让他一个人孤伶伶地留在江津。”

“婶娘，你放心好了，我同松年即使变卖一切，也要把公公和祖母的灵柩迁回安庆，了却他老人家的宿愿。”陈松年妻子窦珩光说。

“这就好，阿拉也就放心了。”

1942 年陈独秀病逝时，正是抗战关键时刻，日本强盗还在作最后的垂死挣扎，安庆城仍在日本侵略者屠刀之下，运迁灵柩还不是时候，只得暂时搁下，等抗战胜利后再说了。

## ◎ 隐姓埋名运灵柩

转眼到了 1945 年。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赶走了

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战的胜利。陈松年和江津九中的师生走向街头，鸣放鞭炮，游行庆祝抗日胜利，人们欢呼，人们跳跃，逃难在江津的安徽同乡，纷纷返回家园，结束那苦楚万分的流亡生活。不虞，内战烽烟又起，刚刚好转的形势又急剧恶化。善于思索的陈松年感到势头不对，在离开江津返回老家安庆之前，如果不抓紧时机移运先父及祖母灵柩回安庆，那内战又不知要打到何年何月，移运灵柩宜早不宜迟。于是，他写信给在安徽任教的堂兄陈遐年商定，1947年2月从江津移运灵柩回安庆。

战火纷飞的岁月，移运灵柩实也不容易。江津安徽人很多，提起陈独秀大多知道。陈松年向他们打听哪里有运灵柩的船只。有人告诉他，重庆江北有运灵柩的木船，可直达上海。陈松年马不停蹄地赶到重庆，一打听，只有浙江会馆有木船运灵柩。他到那里一看，吓了一跳，有几千副待运的灵柩放在那里，黑鸦鸦的一片，都是抗战时期，在四川死去的沿海和安徽避难的人。

人们不禁要问，为何只有浙江会馆能运灵柩？这当然是依靠蒋介石的权势了。蒋介石是浙江人，沿途谁敢得罪浙江帮？运灵柩不仅是桩冒险的事，沿途均可能碰到检查甚至严加处罚，因为，运灵柩可夹运私货。四川出产木材，大木船到上海拆掉再卖木板，这就是一笔大生意。除浙江会馆敢做此生意外，其他会馆或商行是绝不敢问津的。

陈松年与浙江会馆联系好运灵柩事宜之后，又迅速返回江津，拜见江津各界人士，叩谢邓蟾秋老人及其侄公子邓燮康。邓氏叔侄虽有挽留陈独秀墓之意，但实因陈独秀生前对养母谢氏许下的诺言以及陈松年的一片孝心，邓蟾秋不禁感叹道：

“独秀先生漂流一生，晚年归宿江津。抗战胜利了，是该回故土安庆安度亡灵了。”他又问陈松年：

“陈公子，运灵柩是要花费一大笔钱的，钱筹集得如何？还有什么困难？”

“蟾秋老人，我已变卖了凡能卖的东西，又与安徽同乡好友借了一点钱，勉强可以支付运灵柩这笔费用，谢谢你老的关心。”

“陈公子，我看这样好了，你先把运灵柩的费用支付了，待你全家回安庆时，我同叔父再资助你们一点路费。”邓燮康接上说。

“谢谢你们。家父过世及安葬费你们鼎力资助，我们陈家永远铭记在心，至于回安庆的路费我再想法子筹集，不好意思再麻烦你们了。”

“陈公子你不必言谢，到时再说吧。不过，你们全家离开江津回安庆老家时，一定要告诉我们一声。”邓蟾秋老人说。

“你老人家放心，到时候我一定到贵府再叩谢你们叔侄的大恩大德。”陈松年诚恳地说。

之后，陈松年雇请木船，将他父亲陈独秀和祖母谢氏的灵柩运往重庆浙江会馆。当掘土运灵柩时，江津各界人士及安徽同乡，纷纷赶至墓地和江边，鸣放鞭炮，向这位曾经沉睡这里的一代杰人亡灵依依惜别……

两副灵柩运抵重庆，办好托运手续后，陈松年又在灵柩上刻上逝者的姓名，写上地址和接收人的姓名。但在陈独秀灵柩上刻姓名时，他迟疑了好一会，如何刻写？刻上“陈独秀”三个字，怕在沿途惹出麻烦，因“陈独秀”名声太大。于是，他只得隐其名，刻上陈独秀科考之名“陈乾生”，这是多数人所不知道的。办好托运手续，陈松年当即写信给安庆堂兄陈遐年，告知他运灵柩手续已办好，待陈遐年收到灵柩后，他及全家将重返故乡安庆。在这期间，他的妻子窦珩光有孕在身，即将临产，他已生有二女，只盼望得一贵子。

事也真巧。1947年2月，陈松年从重庆办完托运灵柩的手续返回江津，还没进家门，在半路上就有人向他贺喜：

“陈家公子，恭喜你喜得贵子。”

人逢喜事精神爽。陈松年听说妻子生了个儿子，喜从心来，三步并作二步，急匆匆赶到家中。进了家门什么也不顾了，急奔房内

看刚出世的儿子，从床上一把抱起襁褓中的儿子，只听得那刚来到人间的儿子“哇哇”一阵啼哭，心疼地边抖晃，边哼着：

“噢，别哭乖伢子，爸爸回来了。”

妻子窦珩光见了忙说：

“松年，快把伢子放到床上，别吓了伢子！你这些日子为公公迁运灵柩够辛苦的了，好好歇歇。”

在这喜出望外中，陈松年不禁又感到一阵心酸和遗憾，先父未能见到这个孙子，若是见了，他老人家该多高兴……

## ◎乡友迎柩悲

1947年6月2日上午，一艘从重庆直达上海的货运大木船，在古城安庆码头徐徐停靠后，只见身强力壮的搬运工人，在一阵号子声中，将一副黑漆四瓦式的楠木灵柩和一副松木金箱式的灵柩抬到岸上。这就是陈独秀及其养母谢氏的棺木。

这时，只见一位50多岁，仪表堂堂的老先生，正在用手摸灵柩，仔细查看和验收灵柩上的姓名，然后，挥笔签字办理接收手续。这位老先生就是陈松年堂兄陈遐年教授。此时，在码头上还见到一些擎着白布旗帜的人，庄严肃穆，来迎接陈独秀灵柩。他们是安徽大学总务长、陈独秀同乡好友胡子穆及安徽大学文理两院著名教授和学者以及本家亲戚，有的是慕陈独秀之名而来迎接陈独秀灵柩的。胡子穆是胡玉美的后裔，早年曾与陈独秀一起东渡日本留学，交往甚密。亡友漂泊一生，今天总算魂归故里，胡子穆摸抚着陈独秀灵柩，不禁想到陈独秀晚年曾书赠他的条幅：

嫩秧被地如茵绿，落日衔天似火红。  
闲依柴门俞晚眺，不觉辛苦乱离中。

亡友通过描写乡村傍晚景色，抒发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离乱世事无限感慨的情怀。陈独秀当年书赠条幅时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而今，他却长眠于楠木灵柩之中。想到此，胡子穆潸然泪下，悲痛满怀。

陈遐年验收灵柩后，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抚棺凄然哭诉道：

“叔祖母大人，叔父大人，你们回来了！你们听见了吗？”

在一阵鞭炮声中，在迎接人的护送下，16个杠手，将两副灵柩抬至安庆西门外古刹太平寺存放，等候陈松年一家返回安庆后入土安葬。

### ◎孝子贤孙心如愿

是年7月，陈松年接到堂兄陈遐年收到灵柩的信后，心中的石头落地了。自重庆办理托运灵柩手续后，陈松年夫妇就焦急地盼望灵柩能早日平安运抵故乡安庆，有时因事去重庆，就到浙江会馆去看看，或催催。但那里黑鸦鸦的灵柩，是严格按照编号顺序装船运出的，急不得恼不得，唯一的办法——只有等候。同时，那个内战又起的动乱年代，谁能担保运灵柩这事不出意外，苦苦等了5个月，这下总算实现了先父陈独秀的遗愿，而陈松年则成了名副其实的孝子贤孙。此时，安徽同乡潘赞化、邓仲纯等大都陆续离开江津返回安庆故土，要不是等待托运灵柩这件事，陈松年一家也早已回到了安庆。接到堂兄陈遐年信之后，阔别家乡安庆在外避难的陈松年，归心似箭，于是与妻子窦珩光商议：

“珩光，先父及祖母灵柩已安全运抵安庆，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我们随先父在江津避难10年，无时不思念安庆，现在是回归故乡的时候了，赶在秋后安葬先父和祖母的灵柩，你意如何？”

“我们是该回去了，应当早日让公公和祖母灵柩入土。我们避

难江津 10 载，江津的父老乡亲养活了我們，没少关照我們陈家，你应当向蟾秋老人及燮康先生和各界人士叩谢告别。”陈松年妻子窦珩光通情达理地说。

“珩光，你说得对。江津情谊不能忘，尤其是蟾秋老人及侄公子燮康先生之恩，我們陈家要永远铭记在心。”

是年秋天，陈松年一家登门叩谢邓氏叔侄告别江津父老乡亲，从重庆乘军事学校所包的轮船，顺流直抵南京后，换乘轮船到安庆，终于回到了故乡的怀抱。

深秋的安庆，寒意开始袭人，秋风扫尽落叶，树枝光秃秃的。安庆北郊叶家冲黄土一片，扁平的土墓散见冲头、田间。

一天，只见一路行人抬着一副四瓦式楠木灵柩走来，既没有吹打，也没有鸣放鞭炮，只是默默地抬到立有一块碑石的土坟前轻轻放下。这灵柩里沉睡的正是陈独秀。这土坟里沉睡的是陈独秀的结发妻子高晓岚。几个农民装束的抬灵柩人，在陈松年的指点下，挥锹挖掘坟旁的空地。不一会儿，墓穴挖好，便抬着灵柩入穴。这时，陈松年及妻子儿女齐跪在墓前烧纸招魂，洒酒祭祀。陈松年悲痛地呼唤着：

“母亲大人，父亲大人回来了！愿你们老人家在九泉之下相亲相爱，相依为命，安度亡灵！”

全家人叩头，以寄托对先辈的哀思。

片刻间，挥锹盖土，一座合家新坟出现在安庆市郊叶家冲黄土地上，从此，陈独秀这位青年时代叱咤风云、晚年凄楚的一代杰人便安然长眠于他的故乡。

陈松年以其陈氏四兄弟之名镌刻泣立碑石：“先考陈公乾生字仲甫之墓”。隐其赫赫有名、如雷贯耳的“陈独秀”三字，以防不测之风云。

## ◎ 碑石铺路墓难觅

从古城安庆驱车,沿去合肥方向的集贤路北行,约 20 分钟,车至太平天国安庆保卫战古战场隘口——集贤关附近的水泥厂,车离开柏油大道向左行,便钻进一条新修的弯弯曲曲的乡间公路,几分钟后,车在一片树林前停下。顿时,满目皆是郁郁葱葱的松树、杉树,簇簇青竹挺立,鸟儿在枝头叽叽喳喳地欢叫,散发着春天的气息。隔着树林,透过林间,隐约可见一圈白色的东西在林中漂浮。沿着 48 米石阶长廊而上,临近一看,那漂浮的白色东西,原来是一座洁白的墓石,墓前矗立着两米高的白色墓碑上,刻着 5 个肃穆显赫的繁体隶书字。它告诉人们,这就是在原荒草覆盖的陈独秀土墓墓地上重新修建的“陈独秀之墓”(即与结发妻合冢之墓),并初步建成陵园,成为安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里背依巍巍龙山,山青水秀,林木飒飒有声。金色的太阳透过茂密的树林,染红了小山坡,使集贤关内的秀丽景色分外诱人,成了人们拜谒游览胜地。

这座崭新的洁白陵园,是怎样从荒草覆盖的陈独秀墓地修建起来的呢?话还得从头说起。

1947 年秋,陈松年将先父陈独秀灵柩从遥远的长江上游四川江津迁移回故乡,并与生母高晓岚合冢于叶家冲荒原之后,他算了却了多年铭记心间的夙愿。打那以后,每逢清明时节,他都要带着妻儿来这里踏青扫墓,祭祀先辈,并覆盖上几锹新土。年复一年,风风雨雨,从不间断,土墓一年比一年增高增大。

然而,到了 1966 年,一场“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洗劫神州大地,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人们过着如同惊弓之鸟般的生活。早已离开人间的陈独秀,被揪出来示众,当作全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批判。两报一刊的大块批判文章,大有把陈独秀从土墓中挖

出来作为错误路线的靶子来声讨之势。作为陈独秀孝子贤孙的陈松年一家，在这白色恐怖下，惶惶不安，株连之难在所难逃，他时刻准备戴高帽，进“牛棚”，哪敢再去祭扫先父陈独秀之墓；同时，又怕暴露目标而被“造反有理”的造反派们挖掉、砸烂。即使这样，这座土坟也没逃脱厄运，那墓碑华表，被撬走垫路，后又成了垒猪圈的墙石，土坟风吹雨打，年久无人祭扫覆盖新土，随着时光的流逝，墓已塌落，像个扁平的面包，覆盖在枯草和树枝之下，成了被人们遗忘的角落。

春雷一声巨响，大地万物复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吹拂神州大地之后的一个清明节，一位七旬老者，手拄拐杖，步履艰难，穿过松树、杉木丛林，东看看，西找找，好像在寻觅什么，过了一个多时辰，这位老者什么也没有寻到，顿时心急如焚，忐忑不安，嘴里反复喃喃地说：

“墓明明在这里，墓碑和华表怎么不见呢？这里原来是荒草黄土坡，怎么成了树林？难道墓被人挖了，这怎么得了……”

这位老者便是陈松年，他是来踏青、祭扫先父与生母合冢之墓的。一时觅不得先父与生母的合冢墓，急了起来，痛心疾首，内疚不已，十多年未来扫墓，太对不起九泉之下的先父与生母……

年近七旬的陈松年，不得不请安庆市政协委员李帆群陪同他，踏破丛林寻找，走村串户访问当地百姓，一问三不知，似乎还不知道陈独秀何许人也，更不知他的什么坟了。几经周折，好不容易在丛林中寻找出一方荒草干地，墓碑、华表全不见了，陈松年不敢认定。后来，访问一位自称当年曾抬陈独秀灵柩安葬的老农，经他确认，这荒草干地确是陈独秀和结发妻合冢之墓，墓碑、华表早已被人撬去铺路了。陈松年心情凄凉，不禁一阵心酸，老泪横流，双膝盖在地上，哭诉着：

“先父、生母，孩儿对不起你们老人家……”

在旁的李帆群先生不禁抚膺叹道：



“一代哲人，‘思想明星’，为何只落得孤坟鬼影，茕茕孑立？”他又感叹道：

“天下之大，哪儿找不到石头，偏偏少了这块墓碑垫路呢？是农民的无知，还是什么……”

李帆群也潸然泪下，他弯腰扶起陈松年，安慰道：

“松年先生，快快起来！此罪过，岂能归罪于你，是林彪‘四人帮’之罪！现在乌云已过，阳光普照，你先父、生母在天之灵，一定会宽恕你的。”

陈松年又弯下腰，双手拂地，捧起几把新土折了几支松枝撒在坟上，深深弯腰三鞠躬，以示忏悔和缅怀之情。

为了便于日后寻找墓地，陈松年在一棵树上划去一块皮，作为标志。哪知日后再来墓地时，树却被人砍伐了。这时，只有这时，他才醒悟地意识到重修墓地和重立墓碑的必要了。

## ◎ 土墓两修重立碑

土墓要修，碑要重立，但仅靠微薄的退休金维持生计的陈松年，哪来钱修墓？急得宁愿勒紧裤带过日子也不愿伸手的陈松年，日夜寝食不安，脑子里想的总是钱，钱……

李帆群先生深知陈松年的家底，祖辈家业破产，父辈未留下分文，10年江津流亡逃难，家中凡值几文的东西在江津就变卖无存了，陈松年是无能为力修复陈独秀墓碑的。李帆群这位年轻时曾经受到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影响的老先生，深深知道修复陈独秀墓的价值及其影响，于是，他对陈松年说：

“松年先生，依鄙人之见，修你先父独秀先生之墓，不仅是你家庭的事，也是社会的事，其价值及影响远远超过你家庭的范围，对历史、对社会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然而，就你的经济能力是难以修独秀先生之墓的。”李帆群十分同情地说：“这件事只有向省、市

有关部门要求资助点钱重修你先父独秀先生之墓。”

“帆群先生，这件事我也曾想过，怕难也。一是家父是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二是国家当前经济不宽裕，岂好向政府伸手要钱修墓。”陈松年为难地说。

“松年先生，你的这种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你要相信党是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是会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何况独秀先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个有影响的人物，我看你不必有过多的顾虑。当然，目前国家经济确有困难，要拿出一大笔钱来修独秀先生之墓，怕一时难以办到，要求有关部门资助少许钱修修土墓，我看还是有可能的。不妨写信向省市有关部门反映反映，也许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于是，陈松年带着试试看的心情，第一次向党和政府伸手，写信给省市有关部门，十分恳切地要求能资助点钱重修父亲之墓。信发出后，不抱多大希望的陈松年，心里又盘算着，万一得不到有关部门的资助，他就向本家亲戚先借点钱，简单地修一下，日后设法还钱。

时间一天天过去，陈松年急切地盼望着省市有关部门的答复。1979年10月，陈独秀诞辰100周年之际的一天，安庆市文化部门突然通知陈松年，决定资助200元，以其后裔之名修陈独秀之墓。这位性格内向的老人拿到200元资助费时，心情激动不已，几乎流出老泪，他顾不得回家，一个劲儿地往李帆群家赶去。进得李帆群先生家门，就十分高兴地说：

“帆群先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使得你这样高兴。”李帆群惊诧而又笑着问。

“市文化部门已资助我200元修墓，你看这钱……”陈松年高兴得指着手中的钱说。

“这太好了！钱虽不多，但意义太深了。”

“帆群先生，你说得对。这看起来是200元钱，但对我们陈家来

说,却是政治上求得解放的好兆头。”陈松年从内心深处感叹道。

陈松年拿到资助费后,赶在1979年10月9日,陈独秀诞辰100周年之日,以其陈氏兄弟之名,对陈独秀与高晓岚合冢墓作了简单修整,并重立一块高不足一米的碑,碑文写道:

“公元一九七九年十月九日。陈公仲甫、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子延年、乔年、松年、鹤年泣立。”

立碑那天,陈松年及其子女鸣放了长长的一挂鞭炮,烧纸、洒酒祭祀,寄托对先人的哀思。向来寂静的山坡,在鞭炮声中,一下躁动起来,乡邻男女老少及行路人,闻声而来观看。一看碑文,不禁一惊,呀,这里原来长眠的竟是赫赫有名的陈独秀!

几锹新土,土墓得以简单修整,一贯知足常乐的陈松年,心中约略平静,这对他来说,已是不易之事了,这了却了他的一桩心愿。

不久,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下震撼了陈松年20来岁的小女长璞的心,深感党中央之英明,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几度坐下,拿起笔,摊开纸,又放下,锁眉思忖,写还是不写,写了,是吉还是凶……1981年5月的一天,这位性格开朗,易于接受新鲜事物,敢想敢为的青年人,终于鼓足勇气,拿起笔,摊开纸,唰唰地写起来……

她瞒着爸爸,饱含热泪和希望,给党中央写信,大胆而恳切地提出修建祖父陈独秀墓地的问题。信投进邮筒后,她写信的勇气,似乎全没了,心里忐忑不安,不禁惆怅起来,8分钱邮票将招来什么样的后果……不过,她生性倔强、乐观,对生活充满激情和希望,她相信党中央是会给她满意答复的。于是,她天天盼,日日盼,急切地盼望着敬爱的党中央复信。同年7月,日理万机的邓小平同志在她的信上亲笔批示:

陈独秀墓作为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请安徽省考虑,可否从地方财政中拨款修墓,并望报中央。

消息传来，她欣喜若狂，一扫惆怅，奔走相告。此时，她的老父亲陈松年才知道小女长璞写信给党中央，老人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并风趣地对长璞说：

“你胆大包天！这等大事，你也把老子撇在一边，万一……”

“万一什么？”长璞接过话头说，“你平时不是常对我们说，要相信党嘛。我作为一个公民，给党中央写信反映自家的事，有什么可怕的。”她高兴地数落起父亲说：

“要是事先让你知道，你一惯谨小慎微，连走路都怕树叶打落头上，你能让我写吗？那党中央和小平同志怎么知道爷爷的墓年久失修呢？”

父女俩对笑起来，其乐无比。

邓小平同志的亲笔批示，引起党中央、安徽省和安庆市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1982年，在国家经济不宽裕的情况下，又拨款2万元，在原荒草覆盖的陈独秀墓上，按照四川江津原式并仿照杭州西湖旁岳墓进行扩建，建起初具规模的陵园，安庆市人民政府将其作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现在，展现在人们面前的陈独秀墓地，由长廊、石栏、供奉台、围栏、圆墓等组成，均用白石料砌成。整个墓呈正方形，约125平方米。地面由白长条石铺成，主墓圆形，高约1.8米，直径3.6米，四周白石，顶部的黄土微微突起，长着青草，其间点缀着几朵不知名的野花。墓坐北朝南，背依大龙山的茂林修竹，面向果木林场，四周松杉环绕，清雅幽静。沿48米石阶长廊而上是墓地的白石栏杆，敞门左右，各筑有“丁”字形石桌。整个墓地显得幽静、肃穆，富有陵园、风景融为一体之雅。

随着新闻媒介的传播，陈独秀墓重修一事，不胫而走。安庆本地人，不论过去是否知道陈独秀墓的，节假日都纷纷前来瞻仰、参观、凭吊。原通往墓地的乡间小路狭窄，荒草荆棘丛生，阴雨天道路

泥泞，车人难行，十分不便。1989年5月，安庆市有关部门和陈独秀墓所在地乡村集资10万，修筑了一条宽50米、长700米直通墓地的柏油公路。墓前设有简易的停车场，为游人游览参观提供了方便，也使沉睡在这里几十年的一代杰入，听到家乡人民在改革开放大浪潮中前进的脚步声，不再感到凄凉和寂寞。

### ◎儿孙雨中祭扫墓

1989年，清明时节，春雨霏霏，寒意犹在。一天，一辆轿车，穿过刚刚竣工的通往陈独秀墓地的乡间柏油公路，直抵墓前车场停下。打开车门，从车上走下一位中年妇女、一位年轻女子、一位十几岁小男孩，她们忙撑开雨伞，从车门内搀扶出一位身着灰色中山装棉衣，头发稀疏花白的老者。这位老者就是80岁高龄的陈松年，那位中年妇女是他的二女长琦，年轻的女子是他的小女长璞，小男孩是他的外孙、长璞之子姜仲毅，他们一家是来踏青扫墓祭祀祖先的。

陈松年在女儿的陪伴下，拄着手杖，沿着青石铺成的通道，缓缓而行。当踏上48米石阶长廊，一步步攀登时，洁白的墓石似乎又在林间浮动起来，好像一个活着的陈独秀，在那里悠闲自得地等着他家人的来临。陈松年一行无言无声，默默而行，伴随的只有那霏霏春雨打落在树梢的声音。登完最后一级石阶，他们来到那白色的墓前。陈松年一行，毕恭毕敬地向陈独秀之墓行三鞠躬礼之后，他的女儿顺手折了树枝，轻轻地拂扫着墓周围的树叶杂物，小外孙折几支松枝，放在老外公的碑石下……

雨越下越大，一阵寒风袭来，伫立碑石前的陈松年，不禁打了个寒颤，女儿忙上前劝他找个地方坐下休息一会儿，他摇摇头。他拄着手杖，在风雨中绕着石墓走了一圈又一圈，缓缓地，低着头，口里吟唱着一位学者在谒陈独秀墓时所作的诗：

大龙山下叶家冲，霜草凄凄夕阳红。  
姓家何须铭华表，墓前常献野花丛。  
“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石破天惊功业在，休将成败论英雄。

诗吟毕，陈松年眼睛已盈满泪水，心潮滚滚，往事一幕幕展现在眼前……

陈松年及其家人，在陈独秀的墓前盘桓多时，没有言语，只在我心中默默地凭吊。不知不觉间，雨停风住了，天空渐渐亮了起来，光线透过繁密的枝叶射进林间，使墓地显得格外洁白。伫立墓旁的陈松年，不禁弯腰蹲下，双手捧起一把泥土，放在鼻下闻了又闻，那泥土的芳香气息，使他全身心感觉到春天真地来到了人间。然后，他把一捧泥土撒在陈独秀墓顶之上，懂事的小外孙又折了几朵白色野花插在其间。这几朵白色野花，在墓顶野草丛中，像白色的蝴蝶翩翩起舞，正表达了陈松年一家对先人深深的缅怀、凭吊之情。

陈松年在女儿的一再劝慰下，拄着手杖迈着沉稳的步伐，一步步地走下石阶，不时回头眺望那松林中的洁白的墓石，依依不舍地走出树林，肃穆的面容便也渐渐地舒展开来……

万万没想到，这竟成了陈松年为先父陈独秀祭扫的最后一次墓，他于次年4月便离开了人间。

1989年4月初，几江傍岸的江津古城，春光融融，和风拂煦，万象更新。大西门外，背山面江的鼎山麓一片绿妆，万木争荣竞秀，随风摇曳的苍松翠柏丛中，显露出一座崭新的洁白条石砌成的墓地，只见游人络绎不绝，凭吊者，纷纷献上白花或花圈，或摄影留念……

这是四川省江津县人民政府根据县政协的议案，为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和陈独秀诞辰110周年拨专款修复的陈独秀原墓址。

已成为江津县文物保护单位。立有墓碑，碑石后刻有“陈独秀原墓址简介”：

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字仲甫，安徽怀宁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一九三八年八月流寓江津，一九四二年五月病逝，安葬于此，一九四七年六月，其子松年，迁墓返乡，葬于安庆市北郊。

现墓地，系按原墓样修复的。

陈独秀早已于40多年前魂归故里，如今江津重新修复陈独秀原墓址，这不正是新坟招旧魂吗？如果陈独秀在天有灵，他会溯江而上，重游故地。

### ◎子孙难忘江津情

1989年3月的一天，在多日霏霏春雨之后，难得一个春光融融的日子，陈独秀三子、八旬老翁陈松年，像往常一样手拄拐杖，正欲下楼出门散步，邮递员送来一封信，他放下手杖，戴上老花镜，信封上一行鲜红的字映入眼帘：

“噢，是江津县政协的来信。”他小心翼翼地取出信瓤，展开一看，喜出望外，激动不已。信上写道：

松年先生台鉴：

根据县政协议案，县委、县政府决定拨专款，按原墓样重新修复的陈独秀先生在江津的原墓址，已于3月8日竣工，并定于4月1日举行落成揭幕仪式，特敬请陈松年先生前来参加落成揭幕仪式。

……

信中还告知陈松年，墓石后面除刻有陈独秀生卒年外，还说明1947年陈墓由其外甥女吕秀珍迁墓回乡。读到这里时，陈松年连连摇头自言自语：

“不对，不对，先父的墓是我迁回的，而不是吕秀珍，要尊重历史事实，不能贻误后人，要写信向他们说明。”

向以知足常乐的陈松年，安庆父墓两次得以重修，又重立了碑石，已是心满意足了，对党和政府感激涕零，了却了他一大夙愿。然而他连做梦也未曾想到，先父灵柩迁回故乡已有40多年，今日江津在经济不宽裕的情况下，又花钱按原墓重新修复陈独秀江津原墓址，这怎能不使他心情激荡？他由衷地感到，如果先父在天有灵当含笑九泉，这对他们陈氏后裔也是极大的安慰和鼓舞。江津是他的第二故乡，在他一生中是难以忘怀这块热土的。抗战时期，国难当头，他全家随父避难江津10年，江津的父老乡亲没亏待他们一家。时光虽已流逝40多年，陈松年仍时时记忆犹新，铭刻在心，常常对儿孙谈起，要他们永远记住江津父老乡亲对他家避居江津时期的关照和帮助。1989年他被在合肥任教的儿子长琦接到合肥过中秋节时，他还对出生于江津的儿子说：

“长琦，你不要忘记自己出生之地江津。江津是个好地方，山美水美，人更好。对于我们陈家来说，永远不要忘记江津。”他又感慨地说：

“我真想在有生之年重游故地，但年岁已高，身体又不好，力不从心了。”

“父亲，待明年放暑假有机会，小儿陪你去江津一游，我也去看看出生地。”长琦心领神会地安慰父亲。

现在，江津政协又发来邀请，他是多么想趁此机会故地重游，亲眼看看重建的先父江津墓原墓址。可是现在年至耄耋，参加老干部合唱团演出，不慎腿又摔伤，寸步离不了拐杖，病又缠身，要是能减去10岁该多好！想到此，陈松年无限感叹地说：

“哎，人老了，有生之年江津之行是难以成行了。只能写封信去感谢江津各级领导和父老乡亲对陈家的盛情了。”

于是，陈松年提笔写道：



江津县政协并各位领导：

来信收悉。贵县在经济不太富裕的情况下，拨专款重新修复先父陈独秀江津原墓址，这对我们后裔来说，是极大的安慰和鼓舞，鄙人表示由衷的感谢！本应亲赴江津参加先父原墓址落成揭幕仪式，实因年老体弱，力不从心，不能前往，甚感遗憾，请你们见谅，多多包涵。

另外说明一点：先父之墓是鄙人1947年从江津迁回安庆与生母合冢，而不是吕秀珍，如有可能，望能重新刻写，以免以讹传讹，贻误后人。

不久，陈松年又接到江津县政协文史办寄来的有关新修复的陈独秀江津原墓址的彩色照片，他高兴得像孩童一样，戴着老花镜仔仔细细地端详，并对在旁的同乡友人操群说：

“江津县政协同志曾来信说，他们已修复了先父陈独秀原墓址，但还没有见过照片，今天见了，这太好了。”

“对历史作过贡献的人，人们是不会忘记的。陈独秀先生虽然离去，但江津人还在惦念着他，今又修复原墓址，实在令人感动。”操群说。

“你看，操老！”陈松年端详着照片对操群说：

“从照片上看，新修复的墓址比原来的规模大，质量好，原为土墓，现为白条石莹墓，很有点气派。同时，也符合墓的规格，既有墓碑，又有文物保护标志碑石，并且刻有“陈独秀原墓址”字样，这使人一看便知道是原墓址，不会产生误解，因真墓葬在安庆北郊。”

“松年，你先父陈独秀先生在江津的原墓址，是否和安庆墓的形状一样？”操群不解地问道。

“总的来说，外形大体相同。安庆的墓地是根据我的回忆，仿造江津原墓而重新修建的；江津修复先父原墓址时，曾绘图寄给我征求意见，力求使原墓址和真墓外形大体相同，使之异曲同工。”

“这很有意思，原墓址和真墓，一个在长江头，一个在长江尾，

滔滔万里长江把江津和安庆连结在一起，同饮一江水，同招一个魂。”操群饶有兴趣地说。

“江津的同志办事很认真。”陈松年对操群说，“你看信中还说，碑石后面原写的‘1947年由其甥女吕秀珍迁墓回乡’，用泥封上，重新刻写为由我迁墓回乡，他们尊重事实，令鄙人感动。”

“你写信去更正的？”操群问。

“是的。我本想重游江津故地，实因年岁已高，身体又不好，未能如愿，现在见到了先父重新修复的江津原墓址照片，仿佛也见到了江津大地，心里得以安慰。依依几江情，陈家子孙难以忘怀。”

---

## 第十二章

### 童年游伴创人生 延年乔年路相同

---

#### ◎血染龙华的两兄弟

1927年4月，中国大地风云骤变，一片白色恐怖。蒋介石背叛革命，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人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刹时间，素有“十里桃红”之称的上海龙华，变成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刑场。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就设在这里。

7月4日，上海龙华塔下枫林桥畔，乌云笼罩，戒备森严。

一辆囚车开到这里，车上跳下5名刽子手。他们从密封的囚车里，押出一位五花大绑，皮肤黝黑，两眼闪着坚毅目光的年轻人。监斩官验明身份后，吼叫着：

“刑斩！”

几名杀气腾腾的刽子手应声冲上前去，挥舞着屠刀，声嘶力竭地高叫：

“他妈的，给我跪下！”

年轻人面对屠刀立而不跪，横眉冷对刽子手，突然

发出震天动地的怒吼：

“共产党万岁！”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刽子手恼怒了，立即将他强行按倒在地，但就在这一刻，被五花大绑的年轻人突然纵身一跃而起，吓得刽子手纷纷舞刀乱砍乱劈，转眼间，这位英勇的革命者便被分尸惨死在血泊之中……

时隔一年之后，1928年6月6日，上海黄浦江上空依然阴云密布，黑风恶浪滚滚，也是在这龙华塔下，又一位皮肤白皙，英姿勃勃的青年，被国民党反动派五花大绑押到这里，他昂首挺胸，正气凛然地斥问监斩官：

“共产党人何罪之有？该杀的倒是你们，是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卖国者！”

监斩官理屈词穷，一边后退，一边喝令：“开枪！”

又一位青年饮弹倒下，壮烈牺牲……

这两位牺牲的青年是谁？前者是陈独秀的长子、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江浙区委书记陈延年，牺牲时年仅29岁；后者是陈独秀的次子、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陈乔年，是年26岁。

龙华塔下，陈氏兄弟忠骨长眠。他们为了党的事业、人民的解放，宁死不屈，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被誉为党的坚强战士、人民的忠诚儿子、安徽的两位英雄。

## ◎两兄弟出世父在他乡

1897年，18岁的陈独秀赴南京参加江南乡试落第后，在养父陈昔凡的操办下，在吹吹打打的喜庆中，与比他长三岁的元配高氏完了婚。不久，或者说，陈独秀还沉浸在新婚蜜月之中，他的养父陈昔凡因治河有功，在官惠政，由奉天新民县知县升任辽阳州知州，

为使陈独秀不荒废学业，他东北上任时，把陈独秀带在身边亲自教导。

次年，陈独秀元妻高晓岚肚皮躁动，一阵剧痛，随着哇哇的哭声，一个黑而泛红，腰圆腿粗，满身胎毛的小生命落地了，接生婆边剪脐带，边高声向陈昔凡夫人谢氏贺喜道：

“陈夫人，恭喜你添了个孙子！”

谢氏一听添了个孙子，满脸生喜，笑呵呵地走进了产房。

这个来到人世间的小生命，便是陈延年。此时，他的祖父陈昔凡和父亲陈独秀在东北，他的祖母谢氏忙请人写信去东北向他们报喜。

陈昔凡和陈独秀在远离家乡的东北，接到家中报喜讯，皆大欢喜，但老少各有不同。陈昔凡娶三妾，未得一子，陈独秀过继为儿，现又添了个孙子，有了子嗣传宗接代，家业后继有人，当然喜从心来。这时的陈独秀虽已19岁，但他还是个满身稚气的孩子，当了父亲还满面羞色，当别人前来贺喜时，他还羞红着脸，觉得挺不好意思的。陈昔凡为给孙子操办满月喜庆，把公务交代一番后，又携陈独秀赶回家乡安庆。

陈昔凡进得家门，见到谢氏怀中抱着用水红色小包袱裹着的孙子陈延年，张着没有牙齿、红得像樱桃的小嘴巴，闭着眼睛，直着喉咙，号哭着时，喜上眉梢，乐陶陶地说：

“好一个小黑伢子！长大了一定像他外公是个武官。”

陈独秀见到延年这个小黑子，虽不是那样十分亲昵，但延年那黝黑的脸蛋，浓眉的大眼，乌黑的头发，巴嗒着的小嘴，倒也喜欢起来。

是年秋，陈独秀在康有为、梁启超要求民主、发展资本主义的百日维新运动的影响下，顾不得家庭的阻止，一人独赴杭州求是书院，后又开始了最初的革命活动。这样，小延年一降临人间，父亲就远离，未能温馨地享受父爱，以至后来父子感情淡薄。

延年三四岁时，微黑的脸蛋像个小皮球，身体结实，喜静不爱动，与腆着大肚子的母亲高晓岚寸步不离，十分亲昵。母亲有时间问他：

“你喜欢弟弟，还是喜欢妹妹？”

“我喜欢弟弟，不喜欢妹妹，妹妹爱哭。”

小延年的嘴真灵。一天，挺着肚子的母亲，果真给他生了个皮肤白皙，脸蛋俊俏，眉清目秀的小弟弟，小延年高兴得叫了起来：

“我有小弟弟了！”

祖母谢氏、母亲高氏见延年这样高兴，也喜从心来，祖母还夸他说：

“延年，你这伢子嘴真灵。”

延年的小弟弟，就是乔年。乔年的出世，和他哥哥延年一样，他的父亲也远离了家门，这也是令他们的母亲高晓岚所不快的事。儿子出世全家欢喜，如果丈夫在身边，那给她又是多大的安慰啊！最起码的，在她分娩时，也可减少几分疼痛……然而，乔年降临人间时，他的亲生父亲陈独秀，由于在杭州求实书院求学时，跟同学们进行反满演说，1901年因警察追捕逃到南京，后又回到家乡安庆建立藏书楼，传播革命思想，被清政府列为首要分子加以追捕，于1902年又亡命逃到日本。此时，乔年正诞生于安庆大南门南水关道院。

## ◎父亲反袁两兄弟险落虎口

延年比乔年长三岁，兄弟俩虽是一母所生，但相貌和性格迥然各异。延年皮肤粗黑，瓜子脸，个子不高，身体壮实，不像读书人家出生的孩子，性格内向，稳重而又倔强，气宇深沉，不苟言谈，像个“黑面武生”。弟弟乔年生来皮肤白皙，圆圆脸身材俊俏，像个“白面书生”。乔年性格活泼开朗，喜欢嬉闹，爱唱戏，逗人喜爱。亲友上

门，见到形影不离的兄弟俩，都说陈家风水好，生了一对“文武双全”的孩子，将来陈家的风水会更好。一时间，光耀了陈家门庭，陈昔凡夫妇满面的福气。高晓岚尤其爱子，给她的孤独而寂寞的婚后生活带来了欢乐，倾注全身心的母爱来哺育她的两个爱子。

兄弟俩虽然性格各异，但他们平日相处亲密无间，是童年的游伴。他们兄弟俩聪慧过人，勤奋好学，走着完全相同的生活道路。由于父亲陈独秀少年出门，半生亡命，对于家庭很少照顾，因而兄弟俩自幼便育于祖父陈昔凡身边，童年和少年时期大都在安庆度过。其间，他们两兄弟曾随祖父陈昔凡到过东北和北京，但为时甚短。他们大约都是五六岁时便进了私塾读书。他们住宅附近有位教私塾的汪洋老先生，藏书丰富，兄弟俩经常整天坐在老先生的书房里博览群书，并且过目成诵，读了许多经史典籍，国学方面很有根底。家中的先辈们常说：

“现在科举废除了，要不然他两兄弟都可进翰林院。”

兄弟俩同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从小生活优越，受到封建教育的熏陶。然而，1913年兄弟俩突遭不幸。

这一年，延年15岁，乔年12岁。他们的父亲陈独秀在家乡安庆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协同都督柏文蔚举旗讨袁，参加“二次革命”，宣布安徽脱离袁世凯的北洋军阀政府，被袁世凯视为眼中钉。讨袁失败后，安庆一片白色恐怖，柏文蔚、陈独秀东逃日本，全家惊慌失措。此时陈独秀养父陈昔凡刚去世，还停棺在家中。袁世凯的爪牙倪嗣冲，秉承袁世凯旨意，立即派兵，荷枪实弹包围和查抄了陈独秀安庆南水关李鸿章公馆隔壁27间中西式住房，家被洗劫一空，并要谢氏和高晓岚交出陈独秀之子——延年和乔年，扬言要斩草除根，吓得婆媳俩心惊肉跳，下跪求饶。然而，倪嗣冲的部队在陈家翻箱倒柜，左邻右舍搜查，未能搜捕到延年和乔年兄弟俩，这更令谢氏和高晓岚心急如焚，他们兄弟俩到哪儿去了呢？

这天清晨，兄弟俩背着书包，正迈步出门上学，突然闯进一位

身着长袍、留着长长胡须的老者，拦住延年、乔年兄弟俩，贴耳对延年说：

“你们兄弟俩赶快逃走，马上有大兵来抓你们了，快，赶快逃走！”说完，这位老者转身离去。

说时迟那时快，机警的延年和乔年兄弟俩，顾不得回家告诉祖母和母亲，拔腿就向他们往日捉迷藏的后门跑去，互作人梯，迅速爬上了屋顶，疾步跳下，穿过小巷，拼命地跑……

刹时间，倪嗣冲的部队包围和查抄了陈独秀家。他们的祖母和母亲怎么也没想到，他们兄弟俩已虎口逃生，免遭了毒手。倪嗣冲的部队误将与延年同年的陈独秀侄子陈永年抓去，钉了8斤重的脚镣关进大牢，以为可以向袁世凯邀功请赏了。陈永年临刑前的断头酒都吃了，险为刀下鬼。后经查明系误捕，也就不得不把陈永年释放了，而陈永年被吓得精神失常。

几天之后，风波平息，经多方查询，家里人才在邻近安庆的怀宁县沈店老家找到了他们兄弟俩。他两兄弟从虎口逃出跑到乡下后，在堂兄陈遐文家的蚊帐里躲了三天三夜，终于逃脱了杀身之祸。

这场劫难的风波，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使他们对封建军阀的残暴有了亲身体验，对社会的黑暗和军阀的反动统治更加疾恶如仇。事后，他们兄弟俩对祖母和母亲说：

“这个仇一定要报！我们要找父亲去！”

## ◎清苦少年父子情薄

1915年秋，他们的父亲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吹响了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进军号角。陈独秀到上海后，得悉他逃亡日本时家遭倪嗣冲部队查抄，并要斩草除根，不禁怒火中烧，于是即令延年和乔年兄弟俩到



上海求学,使他们早日自创人生。

一天,陈独秀的同乡好友潘赞化,在上海法租界吉益里 21 号陈独秀的住处,见到两个陌生的孩子,忙问陈独秀:

“这两位是谁家的公子?”

“他们都是鄙人的孩子,大的叫延年,小的叫乔年,从安庆领来上海读书。”说着,他又对延年和乔年说:

“你们快叫潘伯伯好!”

从此,他们两兄弟同潘赞化晚间同去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补习学校学法文。1917 年,五四运动方兴,陈独秀应蔡子民先生所聘,赴北京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由于陈独秀名气大,此事轰动了上海滩,当别人夸耀他们的父亲时,他们兄弟俩却不以为然地说:

“家父名为新文学院院长,实质去做旧官僚!读书虽多,而不能为天地立心,为民立命,和文盲又有什么两样?”

朋友们听了,虽然批评他们兄弟俩有点狂妄,但也佩服他们要为天地立心、为民立命的宏伟抱负和鸿鹄之志。

陈独秀去北京以后,他们两兄弟寄住上海四马路的亚东图书馆《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店堂,开始了独立生活。后来,两兄弟又一起考入震旦大学,继续学习法文。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是陈独秀的同乡好友,遵照陈独秀的嘱咐,每月给他们兄弟俩的生活费只有 10 元左右,而每次领取这 10 元钱时,延年总是等在外面,乔年进屋到柜台去拿。这 10 元钱除交学费外,所剩无几,生活十分清苦。为此,兄弟俩不得不半工半读,谋生自给。白天在外做工,晚上以地板为床,吃大饼,饮自来水,夏天蚊咬无蚊帐,冬天寒风刺骨无棉衣,一件夹衣一年四季不离身,面带饥色,身体消瘦,朋友见了十分怜悯,多有责怪陈独秀。

1919 年冬的一天夜晚,法文补习班下课时,北风大作,寒气逼人,路灯昏暗,潘赞化感到一团寒气袭来,走近一看,却是陈延年。他一身寒气笼罩,如同沙漠上的小羔羊,以手抚肩,浑身哆嗦,潘赞

化见了十分同情而关切地问道：

“延年，你没有寒衣不冷吗？”

“还可以。”延年在路旁拱手而立着说。

潘赞化邀他到家中，欲将棉衣脱给他穿。

“不需要，谢谢潘伯伯！”说完，他又消失在去四马路的黑夜之中。

兄弟俩对清贫生活并不在意，以苦为乐，也不要封建家庭的接济，决心在艰苦中磨炼自己，并且持之以恒。

一次，他们的祖母谢氏带着家人到上海查看陈家在沪产业的经营情况，好不容易找到他们兄弟俩。祖母看见他们衣衫破旧，生活如此艰苦，摸抚着他们，不禁一阵心酸落泪，当即差家人给他们兄弟俩添置衣服和物品，另租住处，并好言劝道：

“延年、乔年，你们是陈家的后代，你们在上海求学吃苦，令祖母心痛不安。家里拿钱供你们求学，是理所当然的事。苦工不用去做了，一切费用都由家里供给，你们出洋留学，家里也供应得起。”

可是，两兄弟异口同声谢绝道：

“祖母大人，你老人家的心意我们领了。不过，我们远离家门，就是要自立、自创人生，不依靠家庭，半工半读以苦为乐。古人云：‘少年人宜使苦，苦则志定’嘛！”

老祖母虽然心酸，但听了两兄弟这番自创人生的话语，从内心感到高兴。这两个孩子在外面求学确实懂事多了，不贪恋家中的钱财，长大了一定能成有用之才。于是，强忍心酸地说：

“好吧，祖母也不是老糊涂，尊重你们兄弟的志向。不过，今后遇有困难或缺少钱用，可随时给家里来信，我会及时叫人送来！”

“祖母，你真领会我们的心。我们决不辜负你老人家的希望，一定好好地自创人生！”延年、乔年听了祖母的话，更增添了自立的信心。

他们的父亲陈独秀四处奔波，无暇顾及家庭，又与延年、乔年

两兄弟长期分离，以致父子感情淡薄，无融洽之意。1919年6月，时值五四运动高潮期，陈独秀在北京亲自散发他起草的反对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时被警察局逮捕，震动全国，影响极大。陈独秀的第二位妻子高君曼在上海吓得胆颤心惊，整天发愁。一天，潘赞化问延年：

“你父亲因五四学潮被捕，朋友们正在设法营救，你知道吗？”

“已有所闻。”延年答道。

“你们两兄弟对此有何想法？有无担心害怕？”

“我们兄弟认为，既做就不怕，怕则不做。何况这次学潮含有无产阶级斗争的意义，是千古以来所未有的，在此空前复杂的环境下出现危险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志士仁人，求此机会作光荣的牺牲而不得，有什么值得恐怖的呢？”延年胸怀坦荡地说。

“如果营救无效，你们俩有什么想法呢？”

“不过中国失去了一个有学识的人罢了，当然可惜。”乔年插上说道。

言语之中，虽见父子情薄，但却表现了他们幼年初立鸿鹄之志的气概。

陈独秀不让延年、乔年在家里吃住，令他的第二位妻子高君曼心中不安。高君曼是延年、乔年的姨妈，也是继母，她视他们两兄弟为子，她认为于情于理都应让他们兄弟俩住在家里，与她自己所生的两个孩子陈子美、陈鹤年一样。当时，李达、王会悟住在陈家，张国焘来上海也住在陈家，陈望道负责编《新青年》，也住在陈家。陈独秀何以不让自己的亲骨肉住在家中？高君曼苦口婆心，多次也说服不了陈独秀，甚至为此发生口角。为此，高君曼找到同住上海渔阳里的潘赞化，她说：

“望你以老友的资格代表我恳求独秀，让延年兄弟回家，我在名义上和感情上待他们兄弟，会好于我自己所生。”她说着泣不成声。

潘赞化与陈独秀强争数次，陈独秀总不以为然，斥高君曼：

“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姑息养奸，不可！不可！少年人生，由他们自创前途可也。”

这样，延年、乔年两兄弟在去法国勤工俭学之前，也没进家门吃住，坚持一面打工，一面读书，以苦为乐，在自创人生中不断成长。

### ◎赴法苦学求真理

1919年底，一艘由上海开往法国的远洋邮轮下等舱里，有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华法教育学会资助的勤工俭学的学生，其中有一黑一白、形影不离的两个学生，他们就是陈延年和陈乔年两兄弟。他们是通过当时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的亲笔介绍信赴法勤工俭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艘远洋轮为有钱的乘客提供应有尽有豪华、奢侈的享受，但在下等舱里的这些工读学生只能靠“打通腿”和啃着干硬的面包飘洋过海。

上海到马赛这两个世界海港城市之间的远航，环绕半个地球，有15500公里的海路。这艘有着两个大烟囱的现代化蒸汽船，从上海吴淞口驶出，经东海、南海、孟加拉湾、印度洋、红海，穿过苏伊士运河，驶入地中海，在海上漂泊了将近40天。1920年2月3日，当远洋轮驶入法国最大港口马赛时，从巴黎乘火车专程来迎接的华法教育学会的代表，已候在码头栅栏后面，热情欢迎这批工读的新来者。当工读者提着微不足道的行装踏上法国的土地时，华法教育学会代表以流利的法语很快为他们办了护照等手续。

马赛是法国最大的港口城市，有着连贯里昂和巴黎的铁路。它虽是西方发达的港口城市，但也有着东方色彩的商店、餐馆以及具有浪漫色彩的普罗旺斯风格的大教堂，是东方人接触西方的第一窗口。这时满怀希望来到法国的中国年轻人，在游览这个城市时，

看见了街头无数的失业黑人、西班牙人以及阿尔及利亚人，使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及同行者所抱的希望，很快像肥皂泡破灭了，原来天堂如梦幻的西方世界，也处处有饥寒交迫的穷人！华法教育学会代表不得不对这些年轻人说，在法国勤工俭学，能找到挣钱糊口的工作算是幸运了。

陈延年兄弟俩及其他工读者，乘上火车经过里昂地铁通道，来到了心中向往的五光十色的巴黎。巴黎是法国的首都，跨塞纳河两岸，有着七八百万人口，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庄严地诞生在这里，作为历史见证的“巴黎公社社员墙”，为这座世界名城增添了光辉的色彩。巴黎又是欧洲的花都，灯红酒绿，景色旖旎，令这些东方的年轻工读者眼花缭乱。西方世界，一片豪华、奢侈，富者大腹便便，花天酒地，穷者骨瘦如柴，沿街乞讨。在远隔祖国万里的花花世界，举目无亲的陈延年兄弟俩为勤工俭学含辛茹苦，四处奔波……

最初，陈延年兄弟俩住在巴黎凯旋门附近的伯尼街 22 号，一面做工，一面学习，以他们过人的智慧和流利的法语考入巴黎大学附设的阿里雍斯学校，学习文学、地理、法国文明史等，打算学完后报考巴黎大学。正当他们刚刚适应异国穷困生活环境，学业有所长进时，控制华法教育学会的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吴稚晖以及中国驻法公使陈篆等，勾结法国反动当局肆意迫害勤工俭学学生，竟然宣布与勤工俭学学生脱离经济关系，使得陈延年和大批勤工俭学学生得不到资助，陷入了难以忍受的贫困处境，过着几乎流浪的生活。1921 年 2 月 30 日，上海《申报》这样报道在法国勤工俭学学生的困境：在法国勤工俭学的 1500 名中国工读的学生中，只有大约 300 名谋得了就业机会，其余大部分人受雇已毫无希望地等待了数月，完全陷入了困境。巴黎警察局也记载着当时中国工读学生第一桩自杀事件。一位在医院里动了急救手术的工读学生，因付不起医疗费而被医院送进了救济院，事隔不久他就自杀于救济院。一个

工读学生把死者的尸体运到了巴黎街头一家小酒店，当酒店老板打电话告知中国大使馆时，大使馆对此反应十分冷淡，置之不理，没有任何人愿意来掩埋尸体。成百的工读学生挨着饿，个个都梦想每天有碗米饭或几片面包充饥……

陈延年两兄弟就是这成百挨饿的工读学生队伍中的一员。身在异邦，远离亲人，饥寒交迫的困境，并没有动摇他们勤工俭学的意念和决心，两兄弟相依为命，相互鼓励，不学成功，决不回国。他们时而里昂，时而巴黎，四处奔波，只要能餬口，不荒废学业，什么脏累活都干，什么苦都能吃，但很难有一个安身之处。有时劳累痛苦之时，生性活泼的乔年就边敲打什么，佯把胡子一捋，嘴里边咚咚锵锵唱起伍子胥过关来。唱一段之后，他又风趣地对延年哥哥说：

“当年，伍子胥不得过关，一夜把胡子急白了。我们现在也在过关，哥哥，你可不要把胡子急白了……”

乔年的唱和笑，往往逗得不苟言笑的延年也哈哈大笑起来，劳累和痛苦，也在笑声中烟消云散了。

1921年，巴黎和马赛之间的法国另一个工业城市——里昂，附近的一家工厂翻砂车间来了两名中国工读学生做翻砂工，拼命地干活。一会儿抬砂，一会儿倒铁水，一会儿又清理工场，整天忙碌，没有一会休息时间，满脸灰砂和汗水，面容憔悴，他们就是陈延年兄弟俩，被生活所迫从巴黎来里昂勤工俭学。一天辛勤劳动，所得无几。当时的法国资本主义经济萧条冷落，工厂开工不足，失业人口剧增，时局非常险恶，在法国的外籍人要寻得工作谈何容易？即使有个临时性的工作，法国的资本家常常又以无法销售的彩色明信片之类的东西发给工人，充抵部分工资。这样，陈延年兄弟俩所得的微薄工资，又被资本家七折八扣自然难以维持起码的生活，只得过着清教徒式的生活，吃得坏，穿得坏，绝口不谈清苦。王若飞的舅舅黄齐生先生在法国看到中国名流的儿子如此吃苦耐劳，不

由得大发感慨：

“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勤工俭学过那么苦的生活，每餐拿面包蘸酱油吃，堪称勤工俭学的典范。”

他们两兄弟在上海求学时，坚持独立，自创人生，过惯了艰苦生活，磨炼了他们克服困难的意志，这使他们在异国的困境之中，仍能坚持勤工俭学，拼搏前进。

陈延年兄弟俩信仰一致，最初信仰无政府主义，对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学术思想有所研究，对李石曾、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也很崇拜，以致通过他们获得华法教育学会的资助赴法勤工俭学。到法国后，他们仍信仰无政府主义，编辑无政府主义刊物《工余》，还和法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格拉儒有过联系。兄弟俩与他们父亲陈独秀在思想上存有芥蒂，陈独秀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进行批评和斗争，令陈延年兄弟俩反感，甚至对陈独秀在中国筹组中国共产党也不赞许。1920年秋，陈公培等人到法国，华法教育学会派陈延年到马赛港码头迎接，陈公培向陈延年出示陈独秀亲笔介绍信时，陈延年笑了笑说：

“他那个人，你别理他！”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921年间，贫困的处境使中国勤工俭学学生难以忍受，心中怒火燃烧，纷纷起来进行生存斗争。由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发动了“二·二八”求学运动、6月拒款斗争和9月回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学生们高呼“为了生存和学习的权利而斗争”的口号，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在4年内，给每个勤工俭学的学生，每月按400法郎计算的资助；要求中国校方准许他们回里昂中法大学，以弥补为了生存被迫流浪所耗费的光阴，毫无顾忌投身于期待已久的学习，校方表示可以考虑。然而，9月24日开学前夕，里昂中法大学布告栏里，却贴出一张出人意料之外的布告：

“只有具有文凭需要继续深造的学生，才能在大学里学习；每

个学生在注册时要带足够的生活费,而且必须通过入学考试……”

这是中国校方玩弄的伎俩。这所大学是由吴稚晖主持的,实质是海外补习学院,是为留学生预习外国语和某种专业知识的,入学无须文凭和考试。校方这一布告,如同一盆冷水泼在中国勤工俭学学生的头上,也激起这帮热血青年的怒火,不得不在校园内举行游行示威,高呼抗议口号,但中国校方不仅拒绝勤工俭学的学生注册,而且勾结法国反动当局,派来武装警察对付手无寸铁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用水龙头、警棍驱散游行示威的学生,当场逮捕了104名示威的学生,并于当年强行把他们全部遣送回国。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残酷迫害,使陈延年兄弟俩彻底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毅然跳出了无政府主义的泥淖,同李石曾、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决裂,加入了斗争的行列。这使李、吴等十分恼火,悔不该当初资助陈独秀两个儿子来法国勤工俭学,并厉声骂道:

“这两个小崽子,比他们的老子还厉害!”

在这场斗争中,陈延年兄弟俩先后结识了共产主义者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等,得到了他们很多的支持和帮助,开始走到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来,参加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活动。

不久,花花世界的巴黎街头,出现了一个由中国工读学生开办的小书店,出售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书刊,摆有陈独秀的出版物《新青年》杂志等,还有法国共产主义者的刊物。书店生意兴隆,吸引着中国进步的工读学生和华工。这就是陈延年兄弟俩开办的以推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书刊为宗旨的中国书报社。不久,这个书店也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者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等聚会点,商讨着开展共产主义革命活动的事宜以及旅欧共产主义组织——“少年共产党”的筹建工作。

1922年6月,巴黎西部布伦森林一片绿色,林海茫茫,古树参天,青松翠柏,婀娜多姿,森林里的小广场别有洞天,阳光灿烂,百



花盛开，花香醉人。一天，一些中国工读学生满怀喜悦，在这里秘密集会，庄严宣告——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正式成立！与无政府主义决裂的陈延年兄弟俩也出席了成立大会，光荣地成为少共第一批成员。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和陈延年等被选为少共中央执行委员。赵世炎担任少共书记，陈延年担任少共宣传部长，并负责编辑少共的机关刊物《少年》月刊，还负责刻蜡版。这时，他们和赵世炎同住在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小旅馆里。这里又是少共中央的机关。

巴黎是世界名城，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有着许多好玩处，是令人向往的国际旅游胜地。有革命纪念地公社社员墙，有纪念拿破仑战功的宏伟建筑凯旋门，以及巴黎圣母院、国立现代艺术博物馆、卢浮宫、埃菲尔铁塔、意大利广场……肩负少共机关刊物《少年》编辑重任的陈延年，无心去游览和欣赏这些美丽如画的景物，躲进戈德弗鲁瓦旅馆小楼成一统，不管春夏与秋冬，昼夜不停地工作，精心编辑刊物，用细腻匀称的笔锋把成千上万字刻写在蜡纸上。然后精心印刷，虽是油印，但犹如铅字印刷一样。《少年》杂志办得有声有色，引起大批中国勤工俭学者和华籍工人的兴趣，被称为巴黎的《新青年》杂志。

陈乔年白天和王若飞等一起到附近一家生产有机玻璃的工厂做工，每天9小时，一进工厂大门就干个不停，一天下来疲惫不堪，拖着沉重的步子踏进戈德弗鲁瓦旅馆。然而，乔年晚上还得帮助哥哥延年油印《少年》杂志，常常忙到巴黎圣母院下半夜钟声连响几下才睡，睡不了一会儿，又闻巴黎圣母院晨钟响起，又匆忙赶往工厂做工。他们兄弟俩干得十分出色，深受少共领导的赞扬。

陈延年兄弟俩在勤工俭学中长进，在斗争中成长。他们同赵世炎、王若飞、萧三等和法国共产党交往甚密，扩大了视野，开阔了胸怀，并经当时的法共党员阮爱国（即胡志明）介绍，于1922年8月加入了法国共产党。消息隔洋传到中共中央，引起当时的中共中央

总书记、他们的父亲陈独秀及其他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陈独秀思忖着，他的两个儿子，在国内始终与他坐不到一条船上，感情淡薄，缺少共同语言，他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他的两个儿子信奉无政府主义，没想到，他们兄弟俩在法国两年的勤工俭学，思想剧变，抛弃了无政府主义，信仰起马克思主义来，还参加了法国共产党。想到此，陈独秀内心不由得感到几分欣慰。为发展和壮大党在旅欧人员中的力量，经中共中央研究，正式承认旅欧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和参加法共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组成了中共旅欧支部，陈延年、周恩来、赵世炎等被选为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人。不久，《少年》杂志改名为《赤党》，陈延年兄弟俩和邓小平同志一起主持《赤党》的编辑出版，戈德弗鲁瓦大街小旅馆二楼周恩来的房间，成了临时编辑部。邓小平同志还以他出色的刻写蜡纸的技艺而获得“油印博士”称号。

1923年春，旅欧支部得到中共中央赴莫斯科代表团的通知，决定派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王若飞等赴俄学习。3月18日，他们一行在周恩来伴送下离开巴黎，经比利时、柏林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这里，他们的条件比在法国要好得多，吃饭、穿衣、住房、理发、洗澡、洗衣等都由学校负责；每月发给少许零用钱。尽管吃的是黑面包，里面有干草，勉强能吃下去，甚至大便三四天不通，但陈延年常对人说：

“我一生未曾有过这样好的生活，无须为一日三餐亡命奔波，可安下心来好好学习。”

1924年，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革命统一战线已经建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揭开序幕，革命形势高涨，火热的斗争迫切需要大批党的优秀干部。是年暑假，陈延年及另外几名同志，奉中共中央之命回国，前往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的广州，接替周恩来同志担任广州区委书记，管辖两广、福建和香港的事务。

同年秋末冬初，陈乔年也奉命离开莫斯科回国到北京，担任北

京地委组织部长。当时北京地委书记是他留法、留俄时期的老同学赵世炎。那时，北方区委还未成立，整个工作由党中央委员李大钊负责。1924年底，中共北方区委正式成立，李大钊任书记，赵世炎改任北方区委宣传部长，陈乔年改任北方区委组织部长，时年22岁，是北方区委领导成员中最年轻的一个。他和赵世炎成了李大钊的得力助手。

从此，从童年起就生活、学习、工作以及留法、留俄在一起，生活道路又几乎相同的陈延年、陈乔年两兄弟，因革命工作需要，肩负革命重担，才依依不舍地分开，各赴祖国的南北方，战斗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之中，用宝贵而年轻的生命，谱写着他们各自的光荣历史……

---

## 第十三章

### 英勇果敢陈延年 宁死不屈保卫党

---

#### ◎“黄包车夫”

1924年秋，广州天高云淡，革命浪潮汹涌。文德路上，有一处正在装修的并排四幢式样划一的三层楼房，里面到处堆着残余的木料、玻璃碎片、油漆桶、刷子等杂物，这就是广东区委办公地址。在二楼一间摆有一副铺板、一张席子、一床被子、黄色皮包当枕头的房间里，只见一位中等身材、黑而粗壮、浓眉大眼炯炯有神和身着一件油漆斑斑、袖口破烂的粗哔叽学生装而又像装修工人的青年，正在聚精会神而又诙谐地和人谈话，这就是陈延年。

陈延年在广州近3年时间，就是这样勤奋工作，艰苦朴素。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不少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政军中任职，领着丰厚的薪金，生活过得蛮不错。而陈延年每月只领和一般同志同样的生活费，他穿的那件破旧的粗哔叽学生装，还是出国时廖仲恺先生发给他的；脚上穿的是从国外带回来的钉底翻毛皮鞋。同志们劝他做一套新衣服换一下，买一双新鞋，他只是点

头微笑,或者风趣地说:

“破衣、破鞋进出方便,不惹人耳目,是最好的自我保卫,谁会把我这个瘪三样子当作党的干部。”

由于工作性质关系,陈延年是不大露面的,外界人士起初认识他的人并不多,但由于他是党的领导人,党的工作搞得震天撼地,使广东的党组织从几十人发展为几千名党员,并领导百万工农群众,令人民欢欣鼓舞,令敌人胆颤心惊,因而他的名字也渐渐传开,像磁石一样,把人吸引住,并把他当作传奇人物传开,有褒有贬,有的出于仰慕敬佩,也有咒骂的。有人说,陈延年和黄包车夫特别好,经常替他们拉黄包车,关心他们的疾苦;有的说,他常不在家吃饭,总是跑到最低等的二厘饭馆,同工人一起吃饭聊天;又有的说,他为了工作和读书,常常几天几夜可以不睡觉,他的案头和床上都布满书报,每天要看一个多小时的俄文书报;又有的说他忙得不可开交,几个月不理鬓发,不刮胡须;有的说他思想不开化,周围有的女同志羡慕和追求他,而他却退避三舍;或者有人对他提婚姻问题,他总是推说工作忙……吴稚晖提起陈延年,不忘当年在法国巴黎被陈延年兄弟俩的厉声责骂,总咬牙切齿地说:

“陈延年那个熊样子,哪里算得上共产党领导人,简直是黄包车夫!”

## ◎省港大罢工的卓越领导者

1924年10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吹响号角,北伐军挺进之时,广州上空突然乌云密布,由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和佛山豪绅地主陈恭受控制的广州商团,在英帝国主义分子的指使下,发动武装叛乱,无辜枪杀革命群众,妄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一时间,枪声四起,血染羊城,形势严峻……

在这危急关头,陈延年沉着冷静,挺身而出,立即和国民党左

派领袖廖仲恺冒着生命危险，赶往韶关，果断地向孙中山建议实行武装镇压，孙中山立即下令北伐军回师广州，并组织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临时指挥机关。陈延年参加了军事委员会的工作，指挥广州的工团军和农民自卫队，联合周恩来领导的黄埔军校学生，向反动商团讨伐，在几小时内彻底平息了叛乱，给英帝国主义分子沉痛打击，极大地鼓舞了北伐军和广州人民。随之，陈延年的名字在广州和黄埔军校学生中广为传开，深受孙中山先生的赞誉。

血的教训，使陈延年和广东区委清醒地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是当务之急。为此，广东区委征得孙中山先生的同意和支持，由广东区委军事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主持，从黄埔军校抽调特别官佐徐成章和第一期毕业生周士第、赵自选等负责，建立了第一支革命武装，番号称“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任命徐成章为队长。铁甲车队为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揭开了中国革命新的一页。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以铁甲车队为基础，扩大成立了独立团。独立团在北伐中，所向披靡，使敌人闻风丧胆。

1925年初，盘踞广东东部的军阀陈炯明叛变，阴谋推翻广东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革命政府于1925年2月1日，开始了第一次东征。

东征军的主力3000人，是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黄埔军校的学生军，纪律严明，作战英勇。经过两个月的作战，东征军打垮了陈炯明的反动势力。是年6月，盘踞广州附近的另一支军阀刘震寰、杨希闵，趁东征军酣战之际，在广州阴谋叛乱，企图推翻国民革命政府，形势非常危急，广东政府被迫搬迁。陈延年和广东区委立即团结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坚决主张东征军回师讨伐。同时，他又组织铁路、邮电、电厂、水厂工人罢工，使敌人运输、电讯等全部瘫痪，加上海陆丰等地农民自卫队赶来助战，东征军同叛军交战一天半，瓦解了叛军，使广东革命政府转危为安，于7月1日改为国民政府。

1925年5月30日,英国巡捕一声枪响,上海南京路上洒下了中国人民的鲜血,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掀起了反帝斗争的高潮,北京、天津、汉口、青岛、南京、广州、香港、沈阳等地人民,纷纷罢工,响应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6月19日,香港爆发了十几万工人的大罢工,香港当局用紧急戒严和严密封锁来对付罢工,引起罢工工人更大的愤怒,纷纷离开香港回省城广州。6月23日,在陈延年和周恩来的领导下,组织广州工人、农民、学生、黄埔军校学生等十几万人,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声势浩大,气贯长虹,显示了中国人民英勇不屈的大无畏气概。当游行队伍经过珠江畔沙面英租界对面沙基东桥时,英兵突然开枪射击,英、法、葡炮舰同时开炮轰击,当场牺牲52人,重伤170多人,轻伤无数,血染珠江,酿成轰动一时的“沙基惨案”,激起广州、香港人民的更大怒火。为纪念这一反帝事件,当年沙基即改名为六·二三路,并在桥头树立“勿忘此日”的石碑以教育后人。

惨案发生后,陈延年怒火满腔,但又沉着、冷静,立即召开区委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并与廖仲恺等磋商。一面由广东革命政府向帝国主义提出严正抗议;一面与周恩来、邓仲夏、苏兆征等同志领导了省港25万人大罢工。又在“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下,组织了工人纠察队,联合黄埔军校学生,在农民自卫队的配合下,封锁东起汕头,西到北海的海岸,断绝对香港的物资供应。一时间,香港交通停顿,商业一落千丈,粮食供应恐慌,经济陷入瘫痪。这次大罢工,长达1年零4个月,到1926年10月才宣告结束,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给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同时也促进了革命力量的发展,巩固和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在领导省港大罢工中,陈延年充分显示出聪明的才干,果敢坚定,始终战斗在第一线,赢得人们的敬佩和爱戴。然而,敌人及其帝

国主义者对他却是咬牙切齿地咒骂，甚至不惜一切手段对他进行诋毁。英帝国主义侦知陈延年是我党在南方的领导人，又是省港大罢工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因陈延年脸部有细微的疙瘩，就以麻子之称，并写成传奇小说，对陈延年大肆诋毁和嘲笑。陈延年对此却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当别人将传奇小说送到他手中时，他却视之如“宝”，幽默地说：

“奇文供欣赏，感谢英大人给鄙人扬名了……”

## ◎鲁迅的“仁侄”

广州革命运动深入发展，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当时的广州中山大学就是学生运动的基地之一。陈延年深入中山大学发展党的组织，并成立政治部，还为中共中山大学总支部主办的刊物《少年先锋》撰写文章。为壮大中山大学左派势力，他推荐鲁迅继郭沫若之后，担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1927年1月，文化革命旗手鲁迅应邀从北京到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兼文学院院长。

在中山大学对面不远处，有一排普通的楼房，这就是广东区委的秘密机关。陈延年在这里召集中山大学的党员毕磊等，研究迎接鲁迅的工作。他要大家帮助鲁迅了解和熟悉这里的情况。他满怀信心地说：

“当鲁迅对时局有所了解以后，他是能够决定何去何从的，是会同共产党合作的。”

当鲁迅风尘仆仆地来到广州时，中共中山大学总支部召开大会，热烈欢迎鲁迅，使鲁迅十分感动。

1918年前后，鲁迅与陈独秀相识，并参加了《新青年》七人编委会，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战士。鲁迅曾说：

“其时惹我最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他又说，“这里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却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那时，鲁迅常去《新青年》社址北京箭杆胡同9号陈独秀家中，他曾见过陈延年。不过，那时陈延年还是个娃娃，他每次去陈独秀家中，都见陈延年在专心做着功课，鲁迅曾对陈独秀说：

“你这个公子很有出息，长大了也是一个才子。”

鲁迅到广州后，听说陈延年是广东区委书记，又是他推荐自己来中山大学任教的，高兴地对他人说：

“他还是我的老仁侄，很想见见他。”

一天，鲁迅在中山大学学生毕磊的陪同下，来到广东区委机关。当机关接待人员告知正在批阅文件的陈延年，鲁迅先生来看他时，他迅速从二楼跑下来会见了鲁迅。

陈延年见到鲁迅先生，毕恭毕敬地称鲁迅为父执，深深地一鞠躬。鲁迅见到当年还是个毛孩子的陈延年十分高兴，激动不已，连声赞道：

“后生可畏。青出于蓝胜于蓝，中国大有希望！”

“承蒙前辈夸奖。今后更望前辈多多指教和帮助，给予更多的合作！”

“我听老仁侄的，听共产党的，同敌人斗争不可屈服！”

从此，陈延年同鲁迅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 ◎父子关系微妙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在广州不幸被国民党右派暗杀，广州革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陈延年火速赶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可是到上海后，几天却找不到党中央的处所，一时傻了眼。此时，俄国驻上海领事馆已通知党中央，陈延年已到上海几天，可是他的父亲陈独秀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却不见他的踪影，大家惊恐起来，担心国民党右派在船上或上岸时谋害他，于是派人四处查访陈延年。

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滩，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陈延年，心急如焚，但又不便轻易露面。急中生智，他不得不托人到《国民日报》登了一则小小的寻人启事，即林木找马道甫。林木为陈延年在法国时的化名，马道甫是郑超麟在《向导》上写读者来信时用的化名。张伯简首先看到这则寻人启事，便按启事上的地址，去旅馆找到了陈延年，然后，张伯简又把陈延年送到旅法的同学郑超麟家。郑超麟与陈延年久别重逢，亲切握手问好，为陈延年安全担心的石头也落了地，并说：

“延年，驻俄领事馆告知中央，说你已来上海几天，大家都为你的安全担心。”

“我也十分焦急，不得已才登了个小小的广告。党中央处所又搬到哪儿去了？”

“当前形势急剧变化，国民党右派妄图捣毁党中央，为适应斗争需要，现秘密搬到闸北去了。我这就带你去见你的父亲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陈延年在郑超麟的带领下，来到闸北中央秘书处见父亲陈独秀。陈独秀见儿子陈延年安全地来到中央，没等儿子延年开口，便幽默地说：

“延年同志，大家以为你被国民党右派请去‘作客’了。”

“独秀同志，党中央迁址，也应当给我们秘密打个招呼，不能让儿子与母亲失去联系。”

“是临时决定搬迁，还没来得及告知有关同志，请延年同志原谅。”

父子二人便在天井坐下谈起工作来，就像陈独秀平日接见其他同志一样，见不到父子之间那种特殊关系的影子，普通极了。郑超麟见状，感受颇深，也就避开了。

陈延年在党内，一直称自己的父亲为“独秀同志”，并不因陈独秀是自己的父亲，又是中央总书记，而对他有什么特殊的称呼。然

而,对于他父亲的错误,他却以同志式的关系提出批评或建议。大革命期间,以陈延年为代表的党在广州的领导人赞成北伐,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上海中央对北伐不积极,陈独秀还写过文章反对北伐,广东方面没有敢于直接反对陈独秀主张的,多是唯唯诺诺,唯有陈延年敢于直接反对父亲陈独秀的主张。他说:

“独秀同志片面主观,反对北伐是错误的,缺乏对全国形势的正确分析。”

陈延年与他弟弟陈乔年在上海求学时,就与父亲陈独秀存在芥蒂,不理睬陈独秀“父道尊严”那一套,相互交往,采取平等式的关系。1917年,陈独秀应蔡子民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期间,一次陈延年从上海到北京来找父亲陈独秀,他不像其他人家儿子那样,直接进去找父亲,而是先递上名片,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要拜见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还署上自己的名字。陈独秀见了片子后,才同意儿子陈延年进去,同接见其他来访者一样,似乎没有父子那种特殊的血缘关系。这件事在北大传出后,有人同陈独秀开玩笑说:

“陈独秀先生提倡民主,都提倡到自己家里来了,身体力行。”

陈延年兄弟俩与父亲的关系非常微妙,当然也有着他们的感情世界。其实,他们兄弟俩对父亲陈独秀,内心也是很敬重和爱戴的。1926年春,陈延年从广东来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时,他听说父亲陈独秀同中央失去联系多时,连他的秘书任作民也不知总书记的下落,大家都以为陈独秀一定被国民党秘密逮捕暗杀了。陈延年听了焦急万分,立即到亚东图书馆去找陈独秀同乡好友汪孟邹,见面便问道:

“汪伯伯,近来你可见到家父?”

“延年,你父亲怎么啦?他有些日未来了。”汪孟邹不解地答道。

“他与中央失去了联系,他可能被……”说着,陈延年便泣不成声了。

汪孟邹听了，顿时也惊恐起来，但又安慰道：

“延年，你不要过分焦急。你父亲或许有什么重要事正在处理，不便与中央联系，或许老胃病又发了，怕不会出什么问题。”

“汪伯伯，但愿如此。”陈延年擦了擦眼泪，又说道：

“家父也不该这样，不论什么重要的事情，也该向秘书打声招呼，弄得大家心里不安。”

“延年，你到你姨妈那儿再去问问，或许她知道。我再设法打听打听，如有消息我会告诉你。”

时隔不久，陈延年听说父亲陈独秀得了伤寒病住进了医院，怕给中央添麻烦，所以未告知中央。这样，陈延年才放下了心。

### ④“花盆”犹在不幸被捕

1927年1月，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国民政府从广州迁都武汉，共产党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武汉和上海。对领导广东的共产党工作，在肃清反革命，建立国民政府以及推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等重大革命活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陈延年，奉中共中央的调遣，于1927年春，离开广州赴上海，担任中共浙江区委书记和上海市委书记，着力于浙江和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工作。不久，蒋介石背叛革命，突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倒在血泊之中。在一片白色恐怖下，陈延年和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及时向中央写了意见书，提出促使武汉政府迅速出师，直指南京“反击蒋介石的军事计划”，并强调指出，如果再妥协退让，整个革命将会遭到失败，与他父亲陈独秀妥协退让的错误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果不出所料，7月15日，汪精卫不顾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并提出“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发生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从此，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

民主，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

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极端恐怖下，陈延年冷静沉着，没有消极悲观和失望，而是卓有远见，充满乐观，他对周围的同志说：

“血总是要流的。这次我们缺少经验，吃了亏，但也使我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认识更清楚了，也把我们的党锻炼得更精明强干了。人们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只要我们好好总结这些经验，我们就有胜利的希望。”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滩，哪有共产党人的立足之地，然而，坚决果敢而善于斗争的陈延年与赵世炎一起，夙兴夜寐，同敌人周旋，千方百计整顿和恢复被国民党破坏的党和工会组织，积极领导上海工人和江浙的民众进行反对国民党的斗争。同时，还得与“左”、右倾错误路线作坚决的斗争，使党的组织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使刚刚转到秘密环境的党，在国民党斩尽杀绝的恐怖政策下，得以坚定而积极开展工作。1927年4月27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延年因斗争需要未出席会议，但仍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的弟弟陈乔年也被选为中央委员。这样，陈氏父子三人在同一次党代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这在中共党史上是罕见的。

1927年6月26日上午9时许，上海四川路底施高塔恒丰里104号居民住宅里，上海共产党主要领导同志正在举行秘密会议，改组江浙区委与成立江苏省委，在一致赞同声中，陈延年被选为江苏省委书记。这时，突然传来不幸的消息，有人被捕，供出许多重要机关，需赶快转移。正在发言的王若飞，一听这紧急消息，便草草结束了发言，立即宣布散会，各自转移。下午3时许，特务闯进省委机关进行搜查，留守机关的赵世炎夫人来不及把放在窗台上作为暗号的花盆拿下来，不料陈延年和组织部长郭伯和一同来省委机关探视，见用作暗号的花盆仍在窗台上，以为平安无事，便信步上楼。谁知一上楼，潜藏的特务像恶狼似地冲上来，当即抓住了留守的秘

书韩步先。陈延年和郭伯和一见形势不妙，便举起木凳和特务搏斗。由于寡不敌众，陈延年的头被打破，牙齿也被打落，鲜血淋漓，特务一哄而上捉住他，将他押往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赵世炎、郭伯和也同时被捕。

### ◎营救不成反落虎口

陈延年等被捕的不幸消息传到党中央，当时的总书记、他的父亲陈独秀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十分震惊。党的地下组织立即设法营救，并通过中国救济会与敌方办案人员接洽，愿以800元赎出陈延年，敌方办案人员见钱眼开，表示可以商量。这时，在狱中的陈延年沉着冷静，巧妙地应付敌方的审讯，说是这家主人雇的烧饭师傅，化名为陈天佑。审讯他的敌人看他那老实巴交的样子，黑黑的脸，满嘴胡茬，穿着破衣，油渍斑斑，也信以为真。

一天，上海亚东图书馆经营人汪孟邹先生，突然接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寄来的一封字迹潦草的信，他拆开一看，大吃一惊，信上写道：

“鄙人于6月26日被捕，现拘押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拘留所。我是正式工人，烧饭司务，当然不会有多大嫌疑，不日可讯明释放，现在我的衣衫裤都破烂了，天气又渐热，请先生替我买一套布衫裤送来，谢谢！”

这封信虽未署名，但汪孟邹从潦草的笔迹中认定是陈延年写的。

汪孟邹与陈独秀是同乡世交，关系密切。亚东图书馆又曾是《新青年》的发行处，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在上海求学期间，汪孟邹曾经接济过他们，兄弟俩也常去亚东图书馆帮助店里打包、送书，汪孟邹非常喜欢俩兄弟。

汪孟邹接到信后，焦急万分，再三思索，决心冒着生命危险营

救陈延年。用钱？还是找人？他突然想到同乡胡适。

胡适是陈独秀奖掖和提携起来的后辈，私人感情笃深。于是，他立即乘火车赶到南京，径直来到蒋介石总司令的总政治部找到胡适。这时的胡适已投靠蒋氏门下，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颇得蒋介石的宠信。为探明胡适的态度，汪孟邹用试探的口气说：

“胡部长，请你帮我救一个人。”

“何人？”胡适问道。

汪孟邹从衣袋里掏出陈延年的信，交给胡适看，并恳求地说：

“胡部长，此人务必请你一救！”

胡适接过信，看了又看，认不出是谁的笔迹，便问道：

“汪经理，这是什么人？你知道鄙人平生不讲假话，你必须说出此人姓名、职业，我方可营救他。”

汪孟邹既怕，又不得不说出真情：

“不瞒你说，他就是陈独秀先生长子陈延年！”

“噢，是他！”胡适听了先是一愣，后又在室内踱起步来，思索着。陈延年正是蒋介石追捕的重要共产党人之一，现既已被捕，看来九死一生了。

汪孟邹见胡适态度冷漠，心不由得嘣嘣地跳起来，是凶？是吉？

片刻，胡适转身对汪孟邹说：

“独秀之子，鄙人一定营救！”说着，把信装入皮包，便和汪孟邹匆匆走出办公室。

走到总政治部门口时，胡适停步对汪孟邹说：

“汪经理，你先回上海等候消息。”话音未落，便钻进小汽车，直奔蒋介石亲信、总政治部主任吴稚晖的家中。

吴稚晖看这潦草的信问道：

“这是谁的信？”

“吴主任，我想请你营救他。”

“你说出谁，我才好营救！”

“他……他……就是……”胡适胆颤心惊而又断断续续地说。

“谁呀？你说就是了。”吴稚晖不耐烦地说。

“他就是陈独秀长子陈延年！”

吴稚晖听“陈延年”三个字，不由得狂笑不已，大叫道：“好了！好了！老陈（指陈独秀）没有用了，小陈可怕，太可怕，胜过其父十倍。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可以太平了！”

胡适被上司弄得惊慌失措，连招呼也不打，就悄悄离去。

吴稚晖担任过国民党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监督，陈延年兄弟俩在法国反对过他，他早已视这两人为眼中钉，肉中刺。同时，陈延年代表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时，总是坚持原则，语言犀利，蒋介石感到陈延年是不好对付的敌手，早想捉拿一斩为快！现在猎物在手，岂能放掉。吴稚晖如获至宝，于是迫不及待地拿起电话直报蒋介石，蒋介石立即派车把吴稚晖接了去……

## ◎铁骨铮铮不泄密

书生气十足的汪孟邹，满怀希望地回到上海。但是，左等右盼，望眼欲穿，总是等不到胡适营救陈延年的消息。他哪里知道，蒋介石得知陈延年被捕立即电告国民党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说：

“此子之恶，胜过其父十倍，立即斩首严惩！”

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杨虎，当时还不知道这个案件，接蒋介石电令后，亲自查究审讯，下令将陈延年、赵世炎、郭伯和、韩步先提到审讯室。先是一阵严刑拷打，要他们各自招出身份，供出党的地下组织名单。陈、赵、郭被打得皮开肉绽，昏死过去，又被打手用冷水泼醒过来，但他们铁骨铮铮，誓死不泄露党的秘密，与敌人周旋斗争。唯独贪生怕死的韩步先，在敌人的老虎凳酷刑下，当场供出了陈、赵、郭三人的正式身份。这样，上海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落



入敌人虎口。穷凶极恶的杨虎，露出一脸狞笑，走到血肉模糊的陈延年面前，皮笑肉不笑地说：

“陈延年先生，你是共产党大名鼎鼎的人物，你的案情是九死一生的，这你是清楚的。不过国民政府很器重你的才干，蒋总司令特来电关照鄙人，只要你招出上海地下党全部名单，马上你可以得到自由！”

陈延年轻蔑地付之一笑，一言不发。

“陈先生，你为什么不说话？”

陈延年怒目圆睁，仍然一言不发。

“陈先生，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听你的便！要杀就杀，休想从我嘴里抠出一个字！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也是杀不尽的！”陈延年用着全身力气，坚定地反击。

“陈先生，既然如此，就不要说我杨某不客气了！”

“给我打！狠狠地打！”

叭叭一阵皮鞭，打得陈延年背脊肉绽血溅，昏死过去。打手用水把他泼醒，杨虎又吼道：

“上老虎凳看他招不招！”

酷刑老虎凳，惨不忍睹，陈延年汗水如注，心如刀绞，咬紧牙关，仍然一字不吐。

残暴的杨虎，得不到陈延年的任何口供，气急败坏，恼羞成怒地命令道：“拖出去，立即斩首！”

7月4日，当时上海3位党的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和郭伯和同时壮烈牺牲于龙华塔下。巍巍的龙华塔，滔滔的黄浦江，成了历史的见证。

不久，陈延年、赵世炎、郭伯和牺牲的噩耗在报上刊出，忠厚、善良的汪孟邹闻之如雷击顶，痛彻肺腑，懊丧不已。他多日不语，闭门谢客，烧香忏悔，求苍天饶恕，而且多日不敢见陈家的人。

---

## 第十四章

### 陈乔年智勇双全 笑洒热血献青春

---

#### ◎“人生自古谁无死”

1926年，北方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日益高涨，反日讨张（作霖）和反英讨吴（佩孚）国民示威大会，接二连三地举行，给北洋军阀盘踞的北京和北方的大本营以沉重打击，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撮合张、吴军阀，加紧对中国的进攻，又给中国人民带来新的灾难。

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无视中国主权，竟然炮击大沽口炮台，强词夺理，联合英、美等8国驻华公使，蛮横地向中国政府发出所谓的“最后通牒”。这种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无比的愤慨，北方人民更是忍无可忍，怒火满腔。3月4日，北方区委再次领导30万人参加的反日示威大会，声势浩大，群情激昂。3月18日，在天安门前又召开反对8国通牒的国民大会。

这天，初春的北京，冰雪融化，万物复苏，北京10万多群众，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前，形成巨大的反帝

洪流。人们挥舞小旗，高呼着“驳复最后通牒！”“维护中国领土完整！”“驱逐八国公使出京！”等惊天动地的口号，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屈服于外来侵略的意志和力量，吓得8国驻京公使胆颤心惊。会后，北方区委又组织两千多人的请愿团，到执政府请愿，强烈要求执政府“驳牒”、“驱使”。当请愿团到达铁狮子胡同执政府的东辕门，正推选代表进入执政府见段祺瑞时，段祺瑞军警突然封闭了胡同东西出口。刹时，罪恶的枪声四起，马刀、刺刀挥舞，对群众进行灭绝人性的血腥大屠杀，执政府门前血肉横飞，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当场打死47人、伤200余人，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惨案发生时，只见一位白面英俊的青年，雄姿勃勃，不顾生命危险，会同李大钊、赵世炎等指挥群众撤退，正当他在最前面带领群众疏散时，一个军警手持刺刀，突然向他猛刺过来，躲闪不及，胸前被刺伤，几穿心脏。顿时鲜血染红了衣襟，他手捂伤口忍着阵阵剧痛，英勇强悍，继续指挥群众撤退，直到请愿队伍散去，他才带伤回到北方区委机关。一到机关，这位年轻人就昏倒在地，同志们见他满身鲜血，脸色苍白，伤势严重，十分危险，一阵心痛，立即将他送进医院抢救。

这位临危不惧、冷静沉着的白面英俊青年，就是北方区委最年轻的领导人陈乔年。他在医院脱离危险，只住了几天，伤口还没愈合，就赶快出院投入更加紧张的战斗。同志们劝他伤口痊愈再出院，他婉言谢绝，并说：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那么多同胞惨遭杀害，流血牺牲，我躺在医院里怎能心安？”接着，他又激动地说：

“我每时每刻都觉得，他们在呼唤我们踏着他们的血迹继续前进！同时，那么多的工作在等待着我，我要立即出院加倍地工作，更坚强地战斗，这点伤算得了什么？”说着，他吟诵起文天祥的佳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 ◎正确意见被否定之后……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北京和北方地区，是北洋军阀的大本营，是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中心，风云变幻，情况复杂，斗争异常艰巨。

1925年11月，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通电反对张作霖，国民军再度控制北京地区。一天，北方区委由李大钊主持召开会议，提议联络国民军发动北京的革命群众，举行旨在夺取北京政权的“首都革命”时，有一位年轻领导人却提出相反的意见——时机还不够成熟，应该等待时机成熟再作考虑。与会者聚精会神地听取这位年轻领导人冷静地分析北方敌我力量的对比，他认为北京的革命群众运动虽有很大发展，但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国民军虽倾向革命，但力量不甚强大，而且也不太可靠；以奉系军阀为主的反革命力量虽因郭松龄倒戈受挫折，但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仍有较强的实力。然而，这位年轻领导人的意见被区委讨论的结果否定了，按李大钊、赵世炎等的提议，通过了立即发动“首都革命”的决定。这位年轻领导人虽然声明继续保留自己的意见，但对区委集体通过的决议坚决执行，行动上决无两样。11月28日，以推翻段祺瑞政权，建立国民政权为目的的“首都革命”正式发起，几十万赤手空拳的群众向段祺瑞执政府进行猛烈的冲击，然而事先与我方有约的国民军背信弃义，临阵调转枪口对准革命群众，致使“首都革命”遭到失败。失败和错误的决策教育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也证明了这位年轻的区委领导人的正确见解。这位年轻领导人就是陈乔年。他在革命斗争中显示出来的胆识、才能和远见，受到了区委领导同志的赞扬，称他是具有很高马克思主义水平的卓越的领导人。

陈乔年生性活泼开朗，平易近人，大家都乐意与他一道工作，无论斗争如何艰苦，工作如何繁忙，即使受了伤，他都充满了革命

的乐观主义精神，笑声盈盈。区委机关常有紧急任务挑灯夜战，为了解除大家夜间工作的疲劳，他不是给大家讲故事、讲笑话，就哼上几句家乡黄梅调或京剧，他常常逗得大家捧腹大笑，顿时把睡意驱走，又精神抖擞地干起来。

## ◎儿子教训老子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大革命遭受挫折，大批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之中。在这白色恐怖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4月27日至5月9日在汉口市武昌第二小学召开，有一位年轻有为的代表，被一致选为中央委员，是25位中央委员中最年轻的委员之一，与会代表向他投去敬佩的目光。这位年轻代表就是陈乔年。

当时，大会虽表示赞成斥责他父亲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但仍选陈独秀继任总书记，乔年的哥哥延年同时被选为五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氏父子三人在中央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同在一个战壕，但在路线斗争中却泾渭分明。

1927年8月7日，在武汉市鄱阳街一幢西式三层的楼房里，召开挽救党的紧急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错误，撤换了陈独秀在党中央的领导职务，提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作为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陈乔年，参加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不因陈独秀是自己的父亲而讲情面，与陈独秀所执行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决拥护党中央撤换陈独秀领导职务的正确决定。他在会上说：

“我的父亲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使大革命失败，党受挫折，而且也使我哥哥延年和李大钊、赵世炎等一批共产党人惨遭敌人的杀害，这是血的教训，切切不可忘记。对国民党反动派只有作坚决的斗争，不能存在任何的幻想。”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虽然被撤销党内领导职务,但他并没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一次,陈乔年和他爱人史静仪去看望父亲陈独秀,陈独秀十分高兴,但在言语中,父子二人就当时的时局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陈乔年对父亲陈独秀说:

“爸爸,你过去执行的路线和政策是错误的,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不能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党应有自己的武装,走苏维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革命才有希望。”

陈独秀听了儿子乔年一番“说教”,不以为然,仍坚持自己的错误看法,同时也十分恼火,满肚子不高兴,对当时在场的他的秘书黄玠然说:

“你看,儿子竟然教训起老子来,岂有此理!”

陈乔年夫妇连饭也没吃,就气愤地走了。黄玠然见他们父子如此“赌气”,也只得摇头而笑安慰陈独秀说:“总书记,何必和小子见识一般。”

## ◎病中母子相见

八·七会议后的一星期,奉中央之命,陈乔年又担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长,与当时担任省委书记的罗亦农,共同担负起领导湖北党的工作。7月15日,暗藏在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的阴谋家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这时的武汉,一片白色恐怖笼罩,四处搜捕陈乔年和罗亦农,但陈乔年置身于敌人的天罗地网之中,沉着冷静,不畏艰险,时而“破帽遮颜过闹市”,时而化装成工人、学生、知识分子,不停地奔走于大江南北,同公开和暗藏的敌人进行斗争,千方百计地保存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成为罗亦农的得力助手。

艰苦的斗争,繁重的工作,无规律的生活,过度的操劳,使陈乔

年被病魔缠身了，发高烧达摄氏 39 度，脉搏跳动缓慢，腹部出现无数玫瑰色斑疹，昏迷不醒，病情严重，急得夫人史静仪团团转，又不敢轻易找医生，只得向省委机关报告。省委机关立即秘密地将陈乔年送进汉口德国医院治疗，经诊断染上了伤寒病，幸亏及时送进医院，否则肠出血、肠穿孔，那性命就十分危险了。

陈乔年自幼离家，和哥哥延年一道在上海求学，后又远离祖国赴法勤工俭学、留苏，1924 年冬回国，又奔走革命，虽时时思念家乡和亲人，尤其思念亲生母亲高晓岚，但无暇顾及。染上伤寒病，躺在病床上，思念母亲之情油然而生，甚至彻夜不眠。于是，在病榻上写了封家书，寄到故乡。

沉浸在长子延年遇难的无比悲痛之中的晓岚，收到二儿子乔年患伤寒病的信，更是悲痛欲绝，焦急不安。伟大的母爱驱使她不得不赶往汉口去看望乔年。

高晓岚是将门之女，还是第一次出走远门，在年仅 17 岁的三儿子松年的陪伴下，迈着小脚寸步，按着陈乔年信中提供的地址，在汉口的一个居民区的一处普通民房门前，咚咚地敲响了门。不一会儿，随着开门声，走出一位脸庞白皙、文静的年轻女子，彬彬有礼而有戒心地问道：

“请问大妈，你找谁？”

“我找儿子小五子（乔年的乳名）。”

“大妈，对不起，你找错门了，这里没有小五子。”这位年轻女子欲关门，陈松年忙上前说道：

“大嫂，小五子是我二哥，是他的小名。”

“哪他的大名叫什么？”

“大嫂，他的大名……”陈松年心存戒备地把话缩了回来，忙向身后母亲探望了一下，轻声几乎贴耳对这位大嫂说：

“他叫×××！”

“什么，我不认识，你们快走！”

“大嫂，你看这信封上的地址，不是明明写的这儿门牌吗？”陈松年急得把信封递给那位大嫂看。

那位大嫂接过信封一看，展现在面前的是十分熟悉的笔迹，心里也明白了几分，忙笑脸问道：

“小弟弟，信能不能给我看看？”

陈松年拿不定主意，忙问母亲，母亲连连点头。陈松年这才将信递给那位大嫂。她展开一看信的落款竟是“儿乔年叩上”。

顿时，戒备之心为之一扫，向前一步，亲切地喊道：“婆母、小弟，快请进来。”

这位大嫂不是别人，正是乔年的夫人史静仪，是乔年志同道合的战友，他们在地下工作中和战斗中相识，相爱而结为伉俪。史静仪出身于武汉一个盐商家庭，文静而很有教养，是一警惕性极高的地下工作者。在这白色恐怖下，也难怪她这样做了。她把婆母和小弟陈松年引进室内，便把躲在家中养病的乔年叫了出来。乔年虽脱离危险，但身体十分虚弱，他见到日夜思念的母亲和小弟松年的来到，不禁热泪盈眶，像孩提时代那样，亲昵地喊道：“妈妈！”扑在母亲怀中。

高晓岚也含着热泪，望着久别的儿子乔年。母子相见，悲喜交加，泪水满面，千言万语，万语千言，母子情依依……

没想到，这竟是他们母子、兄弟的最后一次相见。

## ◎突然被捕智斗叛徒

1927年冬，上海黄浦江上空依然弥漫着血雨腥风，革命形势暂时处于低潮。为加强上海党的领导，奉中央之命，陈乔年调到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在万分险恶的环境中，他和省委书记王若飞等一起，不断变换斗争方式，巧妙地同敌人周旋，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地深入工厂、机关和学校，联络同志，鼓舞斗志，坚



定信心，日夜为革命奔走，使上海被敌人破坏的党组织得以恢复，上海革命力量重新聚集起来。

1928年春，正当上海和江苏革命运动又蓬勃兴起时，一个巨大的灾祸突然从天而降。

2月16日，江南大地春风吹拂，万物复苏。这天在上海滩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和酱园路正在秘密召开两个重要会议：一个是江苏省委召开的各区组织部长联席会议；一个是上海总工会召开的各区特派员及各产业总工会主任联席会议。正当会议进行之时，国民党特务突然包围了这两个会议的会址，荷枪实弹地冲进会场，特务杀气腾腾地吼道：“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

特务随着冲上去将陈乔年和郑复他、许白昊等11人逮捕，这是江苏省委和上海总工会继1927年6月陈延年等被捕之后，遭到的第二次大破坏。这两个会议的召开，是十分秘密的，敌人是怎么知道的呢？后来查明是叛徒唐瑞林告密造成的。

陈乔年等被捕后，当日被押在英租界新闻捕房拘留所，次日即被引渡到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拘押在天字监一号。陈乔年被捕后心中完全料到，既入虎口，势难生还，但死，要死得大义凛然，宁死不屈。他从被捕的第一天起，化名为王××。敌人开始并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与他同狱的有一个陌生者也被打得鲜血淋漓。这个陌生者呻吟不已，大骂国民党反动派特务，还不断呼叫着：“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是杀不尽的！怕死不当共产党！”

转战南北的陈乔年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以敏锐的目光注视着陌生者。而这位陌生者呻吟以后，便慢慢向陈乔年靠拢，主动与陈乔年搭腔，陈乔年警惕地观察这位陌生者的言行和表情。这位陌生者一次又一次地问陈乔年：

“你是不是安徽怀宁人？听你的口音很像。”

陌生者的言行，使陈乔年心中产生了疑问。

一天，这个陌生者又讨好地对陈乔年说：

“我是被叛徒出卖的，叛徒太可耻了！你是不是叛徒出卖而被捕的？”

陈乔年还是一言不发，以敏锐的目光看出“来者不善”。

这个陌生者一次又一次地问陈乔年：“你是不是安徽怀宁人？是不是姓陈？”

陈乔年果断地回答道：“我是中国人！”

这个陌生者被顶得哑口无言。陈乔年越来越感到事情不妙，便将情况秘密告知狱外地下党组织，请查清这个陌生者身份。

几天之后，陈乔年接到狱外地下党组织的秘密通知，这个陌生者正是叛徒唐瑞林，但他并不认识陈乔年。特务为探明陈乔年的身份，将唐瑞林佯装投进牢房。狱中的同志和陈乔年得知消息后，立即予以揭露，并向狱方提出抗议。敌人阴谋被揭露后，气急败坏，才不得不将这个可耻的叛徒撤走。这时，陈乔年的身份仍然未暴露，还有保全和生还的一线希望。

在党内提起陈乔年，都说他年轻有为，是最年轻的卓越的领导者，他的被捕引起党中央高度重视，决定设法营救他。时间就是生命，落入敌人虎口的陈乔年，随时有被杀害的危险。为此，地下党组织千方百计，计划用钱将他赎出。此时，与他同时被捕的郑复他、许白昊也在狱中研究营救计划。

### ◎周之楚勇敢身替陈乔年

陈乔年等 11 人被捕后，唯有陈乔年和周之楚的身份尚未暴露，这给营救陈乔年提供了条件。采取什么办法营救？郑复他和许白昊周密研究，决定由周之楚顶替陈乔年。但是，这要以牺牲周之楚的生命为代价。

周之楚出身商人家庭，父亲是华侨大商人，家财万贯。周之楚投身革命，英勇斗争，被捕后虽遭严刑拷打，但始终没暴露身份，立

场坚定。为营救陈乔年，万般无奈，郑复他和许白昊跟他说出了营救陈乔年的计划，要他顶替陈乔年省委组织部长的身份和职务。周之楚听后并不过分紧张。他镇静地思忖着，这就意味着用自己宝贵的生命去换取陈乔年。他想到了党的事业，想到了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

他坚定地说：“复他、白昊同志，我愿意顶替陈乔年同志，用自己的生命保全他！”

“好同志，党的好儿子！”郑复他、许白昊热烈地拥抱着周之楚，又说：“之楚同志，在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轻意暴露。此外，你还有什么意见，对组织、对家庭还有什么要交待的？因为你随时作出牺牲的准备啊！”

周之楚坚定地说：“我没有什么挂念，请党组织放心。我周之楚决不向敌人屈服，时刻准备牺牲！万一我牺牲了，请党组织设法告诉我在海外的父母和家里的人，我是为中国人民伟大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

“党和人民是会永远记住你的，好同志……”说着，郑复他、许白昊又和周之楚紧紧拥抱在一起，热泪不禁夺眶而出。

## ◎ 节外生枝乔年英勇就义

正当营救陈乔年的计划准备实施时，突然节外生枝。周之楚被捕的消息传到海外，他的父亲心急如焚。这位大商人虽然不知道儿子参加了共产党，但也深知儿子被捕事出有因。于是他火速赶回国内，四处奔走，打通关节，用重金营救周之楚。这样，敌人知道了周之楚的真实身份，陈乔年的身份便不问自明了。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杨虎闻之哈哈大笑，洋洋得意，他又可以向蒋介石邀功请赏了。

陈乔年的身份暴露，意味着敌人的罪恶子弹在等待着他，然而阴险的敌人并不立即杀害他。因为敌人知道他是江苏省委组织部

长，地下党组织及其名单全在他的心中，妄图从他的嘴里掏出地下党的名单，一网打尽。

两天后，敌人果然下毒手了。他被押到审讯室，阴险毒辣的杨虎亲自审讯他。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陈乔年！”

“不会弄错吧，你不叫王××吗？”

“那是你狗眼不识泰山！”

“陈先生，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是生是死全由你选择。”

“要杀就杀，共产党人从来不怕死！”

“蒋总司令对你很器重，年纪轻轻，特来电关照，只要你交出地下共产党组织及其名单，你马上可以自由。我杨某说话算数！”

“要头有一个，要名单没有！”

“难道你真的要去见你的哥哥不成？”

“那就送我去吧！”

“好！陈先生，送你走！但没有那么便宜！”

顿时，敌人的皮鞭像雨点似的抽打在陈乔年身上，打得血肉模糊，遍体鳞伤，昏倒在地。

“哗！”一桶水泼在陈乔年身上，陈乔年慢慢苏醒过来，艰难地蠕动着四肢。

“给我拖回去！”气急败坏的杨虎吼着。

陈乔年被拖回监房后，同狱的难友们见他受了苦刑，心痛极了，十分钦佩他面对敌人严刑拷打所表现出来的共产党人坚贞不屈、正气凛然的大无畏精神。当难友们安慰并劝他好好休息时，他淡淡地说：

“吃几记耳光，挨几鞭子，挨几火腿，泼几桶水，算个啥？”

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26岁的陈乔年，面对生死考验，十分坚定，铁骨铮铮，早已置生死于度外。身份暴露后，他从狱中转告党组

织,希望党组织不必再为营救他而费心,更不必再为他破费花钱了,他对党组织设法营救他,表示万分感谢,即使被敌人杀害,也在所不惜。在监狱最后的严峻时刻,他十分乐观,鼓励难友们同敌人作斗争,给大家讲故事。他学识渊博,故事特别多,饶有风趣,往往逗得难友们捧腹大笑,同时不放过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机会。

敌人绝望了,终于要向他下毒手了!

1928年6月6日,一群穷凶极恶的特务突然打开牢门,像恶狼似地呼叫着:“陈乔年!郑复他!许白昊快点出来!”

难友们凭经验知道敌人要下毒手杀害他们了。陈乔年、郑复他、许白昊3人被押出牢房,难友们洒泪目送,陈乔年镇静自若,含笑与难友们告别,并鼓励难友们:“要为革命保重身体,好好学习,经受考验,以便将来继续为党工作。”

难友们对他这位年轻有为的坚强战士即将被残害、壮烈牺牲表示难过和哀怜时,他却乐观地说道:“人生固有一死,血不会白流!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乔年同志,你对党、对家庭有何遗言?”难友们含泪问道。“对家庭无挂念,对党的尽力营救,表示衷心感谢!同志们再见了!”陈乔年向难友们告别道。

陈乔年等被特务押到监狱中庭,解开脚镣,五花大绑起来,他们从容不迫,不约而同地高呼:

“共产党万岁!”

“打倒蒋介石!”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刹时间,敌人冲上去,七手八脚把陈乔年、郑复他、许白昊押到龙华塔下枫林畔刑场,不久从刑场方向响起了几声罪恶的枪声,使党又失去了3位坚强的战士。

## ◎两兄弟牺牲父悲戚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听从共产国际的命令，秘密离开上海而隐藏在武汉，从虎口逃生的陈独秀，得悉亲生儿子陈延年惨遭国民党杀害，如同晴天霹雳，悲痛愤怒，痛骂蒋介石不仁，誓与他不共戴天！尽管陈延年反对他的主张，但他毕竟是自己的亲骨肉，又是共产党杰出的人才，现在死于蒋介石的刀下，又怎能不叫他心胆俱裂呢？于是，他不得不装成商人秘密上船潜往上海。一到上海，他见第二位妻子高君曼哭泣甚哀，在家中为延年设灵位，烧纸招魂，他忙问道：

“延年的尸收了没有？”

“没有。”

“怎么回事？”

“他死得很惨。组织上托人要过尸，蒋介石不给。据监狱里传出消息说，特务要他供出党的地下组织名单，他誓死不泄露党的机密，受尽了各种酷刑，最后是被分尸惨死的。”高君曼泣不成声地诉说着。

陈独秀听了，悲痛哽咽，终日沉默不语，闭门谢客。妻子怕打扰他，也不敢同他讲话，更不敢提起陈延年牺牲的事。

祸不单行。不幸的事接二连三地降临到陈独秀的头上。

陈独秀长女筱秀，在安庆家乡闻悉哥哥延年在上海被杀害，立即奔丧上海，由于过度悲伤和劳累，又暴死于上海医院。陈独秀悲哀加悲痛更是沉默不语。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被撤销党内职务，国民党还是不放过他，又悬赏3万缉拿他，他不得不在上海过隐居生活。不料，1928年6月间，又传来二儿子乔年被国民党杀害的噩耗，而且与延年一样尸首难寻。灾难接踵而至，令他痛不欲生，完全消沉了，悲痛、悲

观、失望……一齐绞在他的身上。妻子高君曼在家中，又为乔年设灵位烧纸招魂，寄托哀思。陈独秀悲痛满怀，心里默默地呼唤着：“延年啊乔年，你们两兄弟死得好惨！你们死于蒋介石之手，我与他不共戴天，这个仇迟早是要报的，你们安度亡灵吧！”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在南京监狱中，高兴得像孩童一样，托人打酒买菜。他对人说生平滴酒不喝，今天为国仇家恨，为大革命以来死难烈士要痛饮。当他斟第二杯酒时，他呜咽起来：“延年啦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酌此一杯。”

说着，他老泪纵横，痛哭流涕，别人劝他，他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 ◎子夭折遗腹女在何方

陈乔年生性活泼，充满青春活力，且又十分重感情。他与爱妻史静仪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又是相亲相爱的革命伴侣，转战南北，风风雨雨，同舟共济，相互鼓励，与敌人进行公开或地下的斗争，在白色恐怖下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1927年5月，正值大革命失败危难之际，他与史静仪结合的产物——儿子降临人间，起名为红武。夫妻俩喜从心来，给他们艰苦的地下斗争生活带来了无限的乐趣。此时，他的父亲陈独秀继任中共五届总书记，在武汉主持中央工作，喜闻乔年生一子，忙叫秘书黄玠然买了红糖、鸡蛋、老母鸡等送去，还带去他向别人借的现金和大洋，给儿媳史静仪生产之用。满月之后，陈乔年夫妇常带着小红武去看父亲陈独秀，陈独秀见了又白又胖的孙子喜笑颜开，有时还抱在怀中逗着玩，可是这个刚出世不久的孙子，见了留着山羊胡须、穿着洋装的爷爷，就哇哇地哭叫起来。儿媳史静仪见了，马上就从公公手中抱过来，陈独秀还幽默地笑着说：“你这个乳臭未干的伢子，也懂人性，还着生呢？”

1928年2月，陈乔年不幸被捕时，史静仪又有孕在身，心急如

焚，她深知乔年是国民党缉拿的共产党要犯，既身落虎口，凶多吉少，牺牲在所难免。她焦急忧愁，生了一场大病。党组织立即派人安慰史静仪，照顾她的生活，并告知她，陈乔年的身份尚未暴露，党组织正在设法营救陈乔年，要她多保重，为革命生下后代。6月6日，当陈乔年惨遭国民党杀害的噩耗传来时，大腹便便的史静仪悲痛欲绝，几乎昏厥过去。党组织问她有什么要求时，她忍着悲痛说：“党组织对乔年已尽了营救的责任，他为革命牺牲，死得其所，我没有什么要求。但唯一的要求是请党组织设法为陈乔年收尸，不能让他像延年哥哥一样没留下一块忠骨。”

当她得知国民党当局不让收尸时，她痛骂国民党当局：“惨无人道，古往今来，哪有杀人不让收尸之理？这个仇一定要报！”

陈乔年的牺牲，给史静仪沉重的精神打击，怀孕在身，情绪低落痛苦，陈乔年那可亲可爱的音容笑貌，时刻萦绕在她的眼前。她失去了亲密的战友，相亲相爱的丈夫，怎能不痛彻肺腑呢？然而，命运之神又给她带来新的灾难——她与陈乔年所生的爱子小红武，因无人照料又不幸夭折，这又给了她更为沉重的打击，心胆俱裂，伤心惨痛，但她毕竟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人，还是以坚强的意志经受了这双重的灾难的考验，终于为光荣牺牲的爱夫生下了遗腹女，为革命生下了后代，这又给她以极大的安慰。

1928年底，史静仪奉命去苏联留学，其女由党组织托人代养。行前她给陈家去了封信，信中说：“乔年在上海不幸被捕后，组织上曾设法多方营救，但无效果。乔年牺牲后，当局又不让收尸，后又托人多方寻找，仍未寻得。今奉命我去苏联留学，小红武已死，其女由党组织托人代养。望婆母多多保重。”

史静仪赴苏联留学期间，又改嫁于他人。

时至今日，已有60余年，陈乔年烈士的遗腹女，今在何方？是生？是死？解放后，陈家多方打听、寻找，仍杳无音讯。



---

## 第十五章

### 陈松年历经沧桑 普普通通一家人

---

紧依长江北岸的古城安庆，住有 30 来万城市人口，住有许许多多的普通人家。古往今来，人们在这里辛勤劳动，繁衍后代，创造着文明。在全国众多的中小城市中，它只不过是个名不出众的小古城。然而，它有一条穿市中心而过、不太长的人民路大街，却使得它显得繁华，充满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城市的气氛，热闹非凡。两旁绿树排排，高大的法国梧桐张开枝叶，相互掩映成林荫大道，清凉宜人。街心花园无处不飞花。大大小小建筑有序的商店，鳞次栉比。大街上车水马龙，人如潮涌，素有安庆“小南京路”之称。顺路向西徜徉，伴随人流，用不了多久，就到这条路的尽头。尽头一旁，苍松翠柏丛中，有一座典雅且有民族风格的四方建筑，在阳光下，显得端庄大方、明亮，游人络绎不绝。这就是 1907 年，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著名的辛亥革命烈士徐锡麟的纪念台。在台的左侧，有一幢临街的普通宿舍楼，在其二楼住有一户普通的人家，门上写着这样一副对联：

荆树开花兄弟乐 砚田无税子孙耕

这就是陈独秀三子陈松年的家。若是掀响门铃,稍许,随着开门声,便会走出一位身着中山装,手拄拐杖,头发花白,年近八旬,行走不便的中等身材的老人,热情地接待你。这位老者,正是陈松年。

### ◎褪色的像框

这是一套三间居室,是80年代初期,当地政府为照顾年老体弱的陈松年而分给他的,这才使得他从住了多年破漏不堪的平房而乔迁新居。室内摆设十分简单、陈旧。朝南窗临阳台的10来个平方米的房间,摆有一张单人木床,床上铺着半新半旧的床单,放有一床破旧的被子;床的一头有一小书架,上面放有一些业已发黄而积有灰尘的古书和一套《独秀文存》,这就是陈松年的卧室。客厅里有几张半旧的接待来访者用的沙发和一台12吋的黑白电视机。套间为照顾他生活而住在一起的小女长璞一家三口的卧室,室内也没有一件像样的现代化的组合家具之类的东西。陈松年的家与许许多多普通家庭没有什么两样,甚至还不如有的普通家庭。左邻右舍大都有了彩电、冰箱之类的现代化电器商品,而他家还是那台用了多年而天线又坏了的黑白电视机。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挂在客厅墙上的两个普通而又褪色的像框,为别的人家所没有。这两个像框是陈松年这个普通家庭的标志,对于他来说,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也是吸引四方来访者的魅力。他视为珍贵之物,“文化大革命”中,他害怕造反派造反上门而砸了,将其收藏起来,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又叫小女长璞挂在客厅墙上。凡有上门来访者,陈松年都会兴致勃勃而不厌其烦地向来访者介绍两个像框内镶嵌的珍贵之物。

一个像框内,镶嵌着两帧半身一男一女的照片。这是陈独秀及其结发妻高晓岚的照片。

陈独秀这帧照片摄于1936年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监狱，时年57岁。身着长袍，头戴毡帽，淡眉短发，尖削的下颏，一副书生相，潇洒而悠闲自得：坐在一张藤椅上，目视前方，颇有几分悠闲自在，不像囚犯，倒像一位老学究。结发妻高晓岚，面容清秀端正，两眼炯炯有神，梳着老式发髻，穿着女式西装，看上去是一位颇有教养的中年妇女。

人们进了陈松年这个普通的家，见了陈独秀及其结发妻高晓岚的半身照，无须主人介绍便知这是陈独秀后裔的家庭，心里就会暗自感叹道：普通家庭不普通。

另一个褪了色的像框，也是陈松年及其子女，或者说，也是这个普通家庭感到光荣和自豪的象征。像框内镶嵌着中央人民政府1954年元月份颁发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庭光荣纪念证”，上面写有：

查陈延年、陈乔年两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不朽，其家庭当受社会之尊崇……

落款系手写体：主席“毛泽东”，并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印。

陈松年对来访者，常常无限感慨地说：

“这是党和政府给我们家的光荣，也是延年和乔年两位哥哥用自己鲜血写成的光荣。”

陈延年比陈松年长12岁，乔年比陈松年长8岁，他们是陈独秀结发妻高晓岚所生的胞兄弟，感情深厚，亲密无间。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俩外出，跟随父亲陈独秀在上海求学时，陈松年还是个几岁娃娃。陈延年兄弟俩乘大轮船离开安庆家乡时，陈松年拉着两个哥哥的手，也吵着要同他们一道去上海找爸爸。陈延年兄弟摸抚着弟弟松年说：

“小弟，你年纪还小，待你长大了，爸爸不带你去上海，我们一定带你去上海。好弟弟，在家里要听祖母和妈妈的话，好好读书，书读好了，我们才带你去上海。好不好？”

陈松年含着泪花，连连点头，目送两个哥哥走上轮船，一声汽笛长鸣，轮船徐徐离开码头时，他还向两个哥哥挥动着小手，用尽力气大声喊道：“哥哥再见！”

当陈松年及其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两个亲哥哥被杀害的消息时，全家悲痛，尤其母亲和祖母更是悲痛欲绝，同时担心，安庆的国民党党徒、地痞、流氓再来骚扰，更担心国民党党徒对陈松年下毒手，来个斩草除根，吓得全家惊恐万状，陈松年不得不跑到乡下躲避起来。后经陈独秀养母谢氏电请国民党 33 军军长柏文蔚出面周旋说情，才平息了这场风波，但这场风波给 17 岁的陈松年留下了终生难以忘怀的印记。这时，只有这时，他才知道自己的父亲陈独秀和两个哥哥是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是缉拿和杀害的要犯。这在他心中种下了为两个哥哥报仇的种子，他甚至对母亲说：“我也要找父亲，为哥哥报仇去！”

母亲听了，心惊肉跳脸色煞白，连忙用手捂住他的嘴厉声骂道：“你这伢子疯了，胡说什么……”

松年吓得忙往母亲面前一跪，求饶道：“母亲，孩儿不好，惹你生气了，以后我不……”

母亲一把拉起松年，抱着他泣不成声，泪洒松年头……

弹指一挥间，几十年过去了。陈松年常常伫立在这两个褪了色的像框前，沉思良久，心情难以平静。几十年来，陈家发生了多少事，又经历了多少曲折和磨难：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从兴旺鼎盛到衰落和贫穷，他身历其境，几多苦难，几多惊吓，几多愤懑和辛酸……有时他甚至想到，要不是父亲参加革命，这个大家庭也许不会衰落到这等贫穷的地步，延年和乔年哥哥也许不会死于国民党的屠刀之下。然而，他又从沉思的复杂情绪中理智地感到世间万

事万物，尽管纷繁复杂，但他必定有自身的发展规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今天陈家从几度磨难中煎熬过来而成为一个贫穷的普通人家，这也是陈家历史发展的必然回归，因为陈家本来就是被富户人家瞧不起的小户人家。也好，小户人家也有自身的安逸，可以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一家欢欢乐乐享受那天伦之乐，没有大户人家那么多的忧愁和烦恼，甚至于灾难和心酸，身居普通人家倒也悠闲自乐……

### ◎他支撑着这个家

按《陈氏宗谱》和封建社会的传统，陈独秀现在的安庆家庭，当是陈独秀名正言顺的家庭，其儿孙为正统的后裔。说起陈独秀现在的家庭，首先要说的是三子陈松年。他在祖父陈昔凡亲手兴起而又破落的封建官僚大家庭以及陈独秀从事革命活动，给陈氏家庭带来的种种不幸之后，是怎样支撑这个家庭的？

1910年，正当陈独秀与小姨子高君曼同居，同去杭州寻欢作乐，8月，陈松年在安庆出生了。他一来到人世间，陈家就连遭不幸，厄运就降临于陈松年的头上。正是老子革命，儿子遭祸。

1913年，陈松年3岁时，陈独秀因参加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迫潜逃日本。可是，当局却不放过陈独秀，不仅通缉陈独秀等人，而且安庆的统领马连甲带兵查抄了陈家。此时，陈独秀养父陈昔凡刚去世，还停棺家中，急煞了陈独秀养母谢氏，陈昔凡珍藏的字画大半被马连甲的兵抢去，还声言要抓陈独秀的儿子，以斩草除根。机灵的延年、乔年急忙从后房上跳下，逃到乡下老家陈家破屋，3岁的松年却跌落在邻居家澡盆里。平日，陈家尤其是陈独秀的养母谢氏待邻里真诚厚道，乐意助人，行善积德，与邻里关系和睦亲热，没有大户人家那盛气凌人之势，陈家的孩子与邻里的孩子关系也很好，懂得事理，待邻人尊重有礼貌。所以，3岁的陈松年跌落邻

居家的澡盆里，邻居家的夫人就势如同给自己的孩子洗澡一样，给陈松年洗起澡来，才巧妙地掩护过去。事后，陈家老太谢氏特登门致谢，并酬谢大洋，以感谢邻人救了陈家后代的一条命。邻人夫妇婉然谢绝：“陈家奶奶，这大洋不能收，情我们领了。这种事谁见了都会这样做，何况你老人家平日待我们也不错，收了大洋，岂不是见外了吗？”

“好，我们陈家万分感谢你们夫妇，永远不会忘记这件大恩大德的事。”说着，谢氏拉着松年的手说：“伢子，快给救命恩人磕头！”

陈松年应声往地下一跪，磕了三个响头。邻人夫妇忙上前扶起松年，不好意思地说：

“伢子，快起来！陈家奶奶，你这叫我们怎么……”

自1913年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再也没回过安庆家门，在年幼的陈松年记忆中，亲生父亲陈独秀究竟是什么样子，连点影子也没有。

陈松年幼年读私塾。祖母谢氏请塾师在家独教陈松年，陈松年也很聪慧，读书认真，祖母谢氏每天还亲自过问陈松年读书之事，有时还得抽他背上几段书，或叫他默写生字、生词，并常常叮嘱他要像延年、乔年哥哥那样勤奋读书，为陈家光宗耀祖。陈松年的塾师名叫王乃揖，是个新派人物，在教书之余，这位塾师还常给陈松年讲些新派人物的故事，以开化陈松年的脑子。陈松年听得入神、入脑，非常有兴趣。陈松年读书很有长进，那些四书五经之类的东西，已不能满足他那读书求知新知的欲望了，于是这位新派人物的王老师，向他祖母谢氏建议，设法让松年进学校去读书，不要耽误了松年的学业前程。开明的祖母谢氏当即允诺，并让松年进了模范小学读书，接受新的教育。1929年，陈松年毕业于安庆六邑高级中学，本当报考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然而此时陈家正遭遇一连串之不幸——

他的两位长兄延年和乔年先后惨遭国民党杀害，父亲陈独秀

被撤销职务，落难于上海滩，生母高晓岚患病日趋严重，祖母谢氏因陈家连遭不幸焦愁而双目失明……陈松年是陈家安庆家庭仅存的一棵独苗苗，两门陈家全靠他传宗接代，因而家里两代人——祖母和生母，视他为心肝宝贝，时时刻刻捏在手掌心，岂能再让他出去读大学，或参加什么共产党……不仅如此，而且按封建礼教和陈氏家规，对陈松年严加管教，不让其越雷池一步，使得他成了驯服的绵羊，终日守在祖母和生母身边。即使到了80岁高龄，陈松年还时时记起，他生母高晓岚临终前的苦苦叮嘱：

“松年吾儿，母命苦一辈子。你万万不要再出去读书，更不要像你父亲和两个哥哥那样，参加什么党，给家里带来灾难和不幸。陈家又破落到这种穷困地步，唉……”高晓岚含着泪对松年又说道：

“松年，你是陈家唯一的命根子，好好做人，安安稳稳过日子，孝敬祖母，把这个家支撑着。如能这样，母死也无怨，九泉之下也瞑目了……”

母亲的遗嘱，祖母的家训，陈家的破落和人亡，使得他安分守己，“两耳不闻窗外事”，心甘情愿地做孝子贤孙，硬着头皮支撑着这破落而危难的家。生活所迫，他1929年高中毕业后，只得忍痛割爱，抛弃了上大学的心愿，先后在安庆高级中学当理化管理员和黄甲狮小学任教，靠微薄的工资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此时，陈家从一个钟鸣鼎食的大家庭破产衰落到贫穷的境地，除了他那微薄的薪水外，就别无其他收入了。可想而知，当年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陈家小少爷陈松年独立支撑着这个家是多么艰难。在国民党统治下，他这个家又是个“特犯户”，随时都会有灾难降落而来。这样，穷愁交加，他又经受了多少惊恐和苦难……

1932年，又一场灾难降临到陈松年的头上，他的父亲陈独秀在上海病榻上被国民党当局作为共产党首领抓捕关押在南京监狱里。当他从报纸上看到这一不幸消息时，吓得半呆，浑身哆嗦，连学校里的课都不上而跑回家，惊恐万状地告诉妻子窦珩光，并要妻子

先瞒着双目失明的祖母谢氏，日后再见机告诉她。陈松年全家，有两大害怕和担心：一是父亲的案子非同小可，担心蒋介石判他死刑；二是担心安庆国民党当局上门抄家并抓捕他，以斩草除根。陈松年如同热锅上的蚂蚁，焦愁万分，提心吊胆过日子。

忍耐了一段时间，陈松年见没什么动静，又托人侧面打听，说像陈独秀这个大案子，没有上面的命令，安庆当局是不敢乱动的。这样，陈松年一家人的心才稍平定了些。

是年放寒假，陈松年和妻子窦珩光带着家乡土特产，去南京监狱探视父亲，这样父子才得以相见，悲喜交加，离情依依……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迫于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形势不得不提前释放陈独秀。陈独秀无可奈何之下偕同少妻潘兰珍溯万里长江而上，飘泊四川江津避难。经父亲陈独秀多次来信催促，陈松年携带一家及其祖母，也流落江津，虽然一家人在危难中团圆，一家七八口人客居异乡，步履艰难，生活极端的窘迫。后来，生活实在难以维持下去，陈松年夫妇不得不与父亲陈独秀分居独立自主谋生，在潘赞化手下当一名事务员，后又在江津女子中学当教员，靠微薄的薪金勉强地维持自立生活，有时还得省吃俭用，挤出点钱接济父亲或给父亲请医生看病，可算得是个道地的孝子了。

陈独秀自年轻时起，为革命四处奔走，生活飘泊无定，颇少“儿女情长”，然而避难江津，尤其隐居鹤山坪后，却是“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节假日，他常要松年一家去团聚以享天伦之乐。起初，潘兰珍对陈独秀一家人团聚，也挺开心，因她从没享受过大家庭的欢乐，每逢松年一家上山看望陈独秀及她这个继母时，她都要做些可口的饭菜，大家高高兴兴地欢聚一餐。随着生活的窘困，有时甚至揭不开锅，潘兰珍也渐渐由高兴而转为犯愁，甚至下“逐客令”，当着众人的面同陈独秀吵嘴。有一次，陈松年夫妇抱着两个孩子上山看望陈独秀，适逢缸中无米，弄得潘兰珍十分尴尬，一气之下当着众人的面，把一只盛米的小缸咣当一声攪碎在正逗着两个孙女玩



的陈独秀面前，大声冲着陈独秀说：

“依同孙女儿玩得开心，依晓得缸里米都没了吗？叫阿拉做啥么子给他们吃……”

陈独秀被潘兰珍数落得两眼直翻，一句话也说不出。

通情达理的松年妻子窦珩光见状，强装着笑脸对潘兰珍说：“二奶奶，家庭过日子实在难。我们马上就下山，你不用烧饭了。”说着，窦珩光从衣袋里掏出准备买米的几个大洋，递给潘兰珍，并说：“二奶奶，这几块大洋你拿去买米，烧饭给爹爹吃！我们这就下山。”

潘兰珍见松年妻如此举动，连手都没伸，掉转身就往房里跑去。

陈独秀还能说些什么呢？沉思了片刻，不得不婉转地对松年夫妇说：

“她也难。你们来了，她不弄给你们吃，面子上又说不过去；弄给你们吃吧，‘巧妇难做无米之炊’……”陈独秀在屋内踱了几步之后，又十分窘迫地对松年夫妇说：“这样吧，日后你们尽量少来，如果有事，我叫人送信给你们，免得弄得大家不愉快。今天，你们不要生她的气。”

“父亲，我们能理解母亲的心情，她也是迫不得已的，我们下山去了，你老人家多多保重。”

陈独秀默默无言，目视着儿子松年及儿媳珩光和两个可爱的孙女走出石墙破屋……

陈独秀艰难地走完人生最后旅途，凄凉病逝于僻静山村鹤山坪，未留分文。还是他生前众多好友帮衬，陈松年才体面地把父亲安葬于江津县城鼎山脚下的康庄园地。以后又经周折，将其父陈独秀及祖母谢氏灵柩运回安庆，与生母合冢于安庆城外北郊叶家冲。此时，他已是一家5口的家长，硬撑陈家的门户。然而家贫如洗，无正当职业和经济来源，有时靠临时代课弄几个代课薪金，甚至在安庆东门外学种瓜菜数亩，靠辛勤的劳动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陈独

秀生前同乡好友房秩五先生见陈松年如此艰辛劳动，不禁无限感慨，写了一首《感事陈松年》诗：

独秀山前日影斜，几回惆怅故人家。  
西华葛帐孤儿泪，犹秀青山学种瓜。

“一唱雄鸡天下白”。1949年4月，古城安庆解放了，历经沧桑的陈松年开始了新的生活。陈松年执教多年，同时，为人厚道，教学认真，且讲究教学方法，他教起小学自然课来，就像给学生讲故事，寓知识性于故事之中，学生听着有趣。有时还带学生捕捉昆虫来制作标本和做些有趣的实验，颇受师生好评。解放后他曾任教过的学校，多次聘请他去继续任教，然而他却没有去当教师，放下了教鞭，被民政部门找去协助搞群众和优抚工作。这除了他两位兄长延年、乔年是烈士外，是否还有其他什么原因？事过几十年之后，有人问及此事时，陈松年意味深长而饶有兴味地说：

“如果当年我走进了学校当教师，我也许活不到今天了！学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历次政治运动知识分子首当其冲，成为被整对象，我又是中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的孝子贤孙，能不被整吗？哈哈……”

中国有句古话用得上陈松年，即“识时务者为俊杰”。陈松年在几十年的生活中，将此奉为信条，并默默地去行，去做，只求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工作，与世无争，与人无争。

1951年经民政部门介绍，他进了安庆市开始筹建的窑厂，当时一位厂长兼4个厂的厂长，实际上由陈松年负责筹建的具体工作，忙得不亦乐乎。他一心扑在筹建工作之中，工程进展很快，还受到民政部门的表扬，而每月只能拿到20来元的生活费。即使这样，他仍以两个烈士兄长为榜样，任劳任怨地工作。

天有不测之风云。“三反五反”打“老虎”的风暴猛烈地刮到这

个正在筹建的工厂，他——陈松年，一夜之间被打成“老虎”，成了个贪污犯。上级迅速派来了厂长和工作组，对他审查、批斗，并限期退赔赃款，否则要逮捕法办。清清白白的陈松年哪经受得住这场无情的风暴，吓得失魂落魄。工作组逼他老实交代，他无从交代，尽管他一再说明，自己没有任何贪污行为，而且在检查书中端端正正地写着毛主席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

陈松年还是未能逃脱无情的批斗，甚至逼供信，他一时想不开，曾经欲寻死自缢，差点成了悬梁鬼。这下可是罪上加罪——畏罪自杀，日子更加难熬了。他开明的妻子窦珩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一再劝说丈夫陈松年应心底无私天地宽，心放宽些，不要同工作组硬顶着，来个“退兵”保命之计，一口“招认”下了那个贪污款项。为了在限期内退赔赃款，求得宽大处理，陈松年把先辈留下的北京箭杆胡同那座当年曾是《新青年》编辑部的房子卖了。总算求得了工作组的宽大处理，同时还沾上他两个烈士哥哥的一点光，说是考虑到他是烈士的亲属，退赔了就不作其他任何处理了。然而，陈松年心里自是不服，但在那高压政策之下，他也奈何不得，只得委曲求生了。

陈松年卖了北京房子退了赔，此案该算了结了吧，然而，我们的党还是实事求是讲究事实的，后来上级有关部门来厂检查验收复查时，认为证据不充分，系逼供信，一举推翻了陈松年贪污的结论，又将退赔的款项如数退还给陈松年。陈松年压在胸中的石头总算落了地，闹了一场虚惊，卖掉了房子，“清白”二字完璧归赵，他又清清白白做起人来。

后来，厂里仍叫陈松年继续搞筹建的后期工程，但他“吃一堑长一智”，不愿再搞了，而当了一名技术管理员，与经济帐目“老死不相往来”。由于他在小学教过自然常识课，懂得一些自然知识，又能解决一些技术难题，或者弄点小改小革。他还懂点医道，尤其是

中医，人们往往又请他看点小毛病。这样天长日久，人们便自然地给他一个雅号——“博士先生”，受到人们的尊敬。

到了70年代，安庆市又筹建第二砖瓦厂，由于陈松年懂得一套砖瓦生产技术，又被调去当生产管理员，直到1980年退休。

在漫长的岁月里，陈松年的处境，比平常人家生活尤为艰难，但他胸怀坦荡，宽以待人，不过多地追求什么，知足不辱；坎坷曲折不失志，顾全大局，自尊自爱，赢得各方人士的赞许。

陈松年做梦也未曾想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曾多届当选为安庆市人民代表和人大常委会委员以及市政协常委，人民给了他无比信任，参政议政，他感到无比的光荣，他还被聘为省文史馆馆员。陈松年笑口常开，十分乐观，业余生活充满情趣，不仅养花种草，而且爱唱黄梅戏，爱哼京剧清唱。他常到市工人文化宫，与一些退休老人，自敲板鼓自唱自哼。他还参加了市老干部合唱团，常常随团下厂为工人演出。1984年在安庆纺织厂演出时，他不慎摔伤了腿，虽经及时治疗，仍留有残疾，行走外出，离不开手杖；洗澡、穿衣，十分不便。这一切，他都忍受着，默默地摸索出适合自我的生活规律和战胜腿疾的方法。比如穿裤时，他用手先把残疾的腿搬起来放在凳子上伸直，然后套进裤脚。晚年生活即使艰难，他仍是豁达乐观，笑口常开，与来访者侃侃而谈。1990年他因病住院动手术时，还在病房里放开嗓子哼唱京剧，~~打~~游哉，与病魔作斗争，医护人员和病友感叹道：“真是乐观的老头儿！”

其实，这时陈松年已经到了垂危之际，他对守候身边的子女说：“我能活到今天赚到的，算是命大，我要含笑去见你们爷爷，也要让你们看到我笑着死！”

手术后没过多久，陈松年在医院病榻上，终于含笑走完了他那艰辛的80个年头的人生之路，与世长辞了！果不其然，他含笑紧闭双眼，安详地躺在病榻上，像是在甜甜地睡觉……

## ◎她为陈家默默奉献一生

陈松年日常生活是挺有趣的。上班时是个地道的“良民”，对于分配的工作，他从不挑肥拣瘦，服服贴贴听上头的指挥，认认真真干工作。然而他下班回家，却是一个“伟丈夫”，一副大男子气派。生活清贫他并不介意，粗茶淡饭他也不管，唯能讲究小菜的做工和口味，哪怕是一碗咸菜，也要做出安庆的酸辣口味来，否则宁愿吃淡饭，也不愿动那不合口味的菜一筷子。他又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主儿，从来不动手盛饭，吃完饭碗一推了事。这些生活小事往往又难为了与他风雨同舟的老伴——窦珩光。

提起窦珩光，陈家老小都说她是个好当家的，为支撑这个家，她默默地奉献了一生。陈独秀生前，一再夸她是个好儿媳，贤惠、通情达理。

窦珩光，生于1912年3月，比陈松年小两岁。陈窦两家联姻的媒介，乃是松年的祖父陈象五，当年在苏州窦军门家当塾师，窦珩光的父亲窦子敬，就是陈象五的学生，师生情谊笃深。加之松年和珩光同学，俩人相处如兄妹，松年为人诚实、聪慧，窦子敬遂将五女珩光许配给松年。珩光进得陈家门，正是陈家连连遭不幸和破产贫穷之时，没有过一天安宁日子，“陈独秀”三个字同样给她的生活罩上阴影。她悉心侍奉祖母公婆，随夫赴南京探视狱中的公公，漂泊蜀地江津，为陈家生儿育女，一般女人吃过的苦，她都饱尝了，一般女人没有过的苦楚，她也都经历过了，但她从无怨言，只默默地为陈家奉献着自己的一切。她与松年一样，不得不接受与她年纪相仿的婆婆潘兰珍，常常是苦水自吞，顾全大局，不给丈夫添麻烦，并与他共担忧愁。在江津避难期间，她拖着两个孩子，还一度当过小学教师，以减轻松年肩上的担子，还得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挤出几个钱接济公公陈独秀，以尽孝心。

解放后，陈家也未摆脱一贫如洗的境地，生活极度困难，一家6口人，仅靠陈松年每月二三十元的工资，还得培养子女读书。经济拮据，度日如年，常常弄得揭不开锅，窦珩光不得不在街道做临时工，带着小女儿长璞去抬土方、修路、卖苦力，晚上在一盏电灯下，儿女做功课，她就糊火柴盒、拣猪毛或者织手套等，弄几个钱来补贴家用。她为培养子女节衣缩食，吃尽了苦头。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她把精细的粮食，全省给正在读书的孩子吃，而她吃的却是“瓜菜代”。懂事的长女长玮、次女长琦，不忍母亲为了她们读书如此地劳累，都提出不考大学，高中毕业就去做工或谋职业，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重点保证弟妹上学读书。但窦珩光坚持要保住陈家世代书香，她对两个女儿说：“伢子，我就勒紧裤带，节衣缩食，苦死累死，也要供你们上大学。”

两个女儿听了母亲的一席话，“哇”地一声，一齐扑倒在母亲的怀中……

丈夫陈松年为人忠厚，谨小慎微，不善交际。为了子女入学、升学以及下放上调等等，窦珩光还得四处奔波，登门求人，里里外外，都由她一人张罗着。当她和风雨同舟的陈松年，呕心沥血，把4个子女培养成人（其二女一子为大学毕业），成为国家有用之材时，她已操碎了心，蜡烛耗尽，不幸于1976年病逝。

她的小女长璞同来访者谈起她的爱母时，常常不断流出热泪，泣不成声地说：“从我记事起，我就没有看见妈妈吃过一餐好饭，总是把好吃的给姐姐、哥哥和我吃。她对爸爸的生活照顾，可以说到了体贴入微的程度，而她自己吃的是粗茶淡饭，甚至是稀饭，从来没见过她做过一件像样的新衣穿！我们长大了，而她却离开了我们，没享到我们儿女的一天福，她把一切都默默奉献给了我们陈家……”

## ◎毛泽东与陈独秀家庭

1953年2月20日晚9点多钟，一艘乘风破浪的军舰，突然在安庆江面中心停泊。这时，夜深人静，寒风凛冽，谁也不知这艘名为“洛阳”号的军舰，为何突然停泊？军舰上乘坐何人？一位身材高大、魁梧，满面红光、神采奕奕的老者，立即派随行人员上岸，到中共安庆地委找到地委书记傅大章，说是有一位中央首长要见他。傅大章听说中央首长要见他，不禁一阵高兴，倏然又紧张地忙问：

“请问这位中央首长是谁？”

“你上军舰就知道了。”来人答道。

傅大章和来人驱车来到安庆码头，乘快艇靠上“洛阳”舰。傅大章在来人的陪同下，登上“洛阳”舰甲板，走进舰舱。顿时，出现在傅大章眼前的不是别人，正是心中日夜想念的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幸福暖流顷刻涌上心间，似乎成了8亿中国人中的最幸福的人。随行人员上前向毛主席介绍说：

“主席，他就是中共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同志。”

“主席好！”傅大章未等应答，便情不自禁地问起主席好。

“大章同志，你好！”主席说着，把手伸向傅大章，傅大章紧紧握着巨人之手，激动得热泪盈眶，要不是考虑到主席的安全，他真想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招呼他坐下，并随手递给他一支烟。

这是毛主席视察南京后，乘军舰溯江而上，去武汉视察途中临时决定停泊安庆的。当军舰经过安庆，见到挺拔矗立的振风古塔时，毛主席问随行人员：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古城安庆。”随行人员答道。

毛主席一听“安庆”这两个字，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历史风云

人物——陈独秀。他不就是安庆人吗？毛主席眼前又闪出当年他和陈独秀在北大的一些往事来。那时，他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陈独秀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并主编《新青年》杂志，他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一代人的学生，又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和作者。他记得，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不久，他把自己写好的一篇短文送给陈独秀过目。陈独秀连夜看完并认真做了修改。第二天他来陈独秀处取稿件，看见文章多处被修改，心里老大不痛快，说：

“这些地方我看还是不改的好。你这么一改，文章就没多少味道了。”他指点着稿件修改处说。

“你拿走吧，不就改了几句话么？”陈独秀挥挥手说。

“你几句话一改，意思跟原来就不一样了。我看还是改回来的好。”他笑了笑对陈独秀说。

“就这么改了，不要耽误时间，快拿去排印！”陈独秀武断地说。

“如果不改回来，文理上也欠通顺……”

“你小孩懂得什么，文理通不通我不晓得么？”陈独秀光起火来，以教训人的口气说：“今后别老是纠缠这些小事，要多想大事，否则很难有什么大作为！”

他无可奈何地苦笑一下，转身便走了。

几天之后，陈独秀见刊在《每周评论》上经他修改的那篇文章，又照原样改了回来，气得把《每周评论》狠狠地往桌上一摔，转身要去找毛泽东，幸好李大钊在场，硬是把陈独秀拽了回来。

想到此，毛主席不禁笑了笑，觉得陈独秀这个人有个性，可是太固执己见了，而这固执己见，又害了他一生。

主席知识渊博，对中国古今历史了如指掌，尤其他对视察的地方历史沿革、风土人情都了解得一清二楚，有时问得地方一些负责人目瞪口呆，一时答不出来。此时，他不仅想到安庆是陈独秀的故乡，而且还想到安庆是个历史名城，是太平天国的古战场，英王陈玉成就战死在这里；辛亥革命著名烈士徐锡麟，在这里举义刺杀安



徽巡抚恩铭，震惊中外，给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安庆又是一个军事重镇要塞，是他当年指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渡口之一。

毛主席招呼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坐下后，就问起傅大章有关安庆历史沿革的情况来，当他问傅大章安徽为何简称皖时，傅大章答道：

“安庆有一与长江交汇的皖江，同时安庆又曾是安徽省政府所在地，故简称为皖。”

主席听了，笑了笑说：

“不够全面。据《通典》记载，两千多年前即公元前540年，春秋时期，安庆已是皖国的所在地。《前汉书》上，就有皖国的记载。1662年即清康熙元年，建立安徽省，从那时起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这270多年间，安庆一直是安徽的省府。我以为，这就是安徽省简称为皖的来历。大章同志，你说对吗？”

“主席，你说得对。你了解安庆历史，比我还了解得清楚，我只顾忙工作，很少去研究历史，我要向你老人家学习。”傅大章面红耳赤，又有点内疚地说。

“干革命不懂得历史怎么行？不了解中国的昨天，怎么能建设好中国的今天？作为一个地方上的负责人，不了解地方的历史沿革，怎么能做好工作呢？所以，历来我主张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学点历史，了解历史，不要鼠目寸光。”毛主席边抽烟边对傅大章说。

傅大章听了主席这谆谆教导，连连点头，从内心深处感到毛主席真是知识渊博，不愧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在主席详细询问了安庆的工作情况之后，出乎傅大章意料之外，他又问道：

“陈独秀是安庆人吧？”

“是的。他祖籍在怀宁县，生于安庆。”

“陈独秀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据说还有一个老母亲(即陈独秀养母谢氏,已于1939年病逝于四川省江津县)。陈独秀后来和一个姓潘的女工结了婚,那个女工现在不知下落(即潘兰珍,1949年11月病死于上海)。陈独秀有个儿子叫陈松年,现在安庆窑厂工作,当技师,家庭人口多,收入低,生活有些困难,据说把北京一所房子卖了。”

“这所房子,是不是当年陈独秀在北京的旧居,还是《新青年》的编辑部。”主席插话说。

“正是。”

“何必卖房子呢?陈独秀家庭生活有困难,地方上可以补助一些嘛!”主席关切地说。

“事先,我们不知道卖房子这件事,以后才听说的。不过,我们对陈独秀这个人还……”傅大章说到此,有些胆怯而犹豫起来。

主席见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说:

“陈独秀这个人,是有过功劳的。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是有贡献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的影响也许比任何人还大,我是他与李大钊等那一代的学生。后期,他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陈独秀1937年出狱后,中央派人做他的工作,争取他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希望他发表个声明承认错误,回到党内来,但他拒绝了。因此,对他这个人物要历史地具体分析。对于他的家庭,地方上还是应当给予照顾的,有困难可以帮助解决嘛!”主席停了会,又说:

“陈独秀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还是党的早期革命家和活动家,在狱中斗争英勇顽强,被蒋介石杀害,是革命的烈士。对于陈独秀这个家庭,还是要以革命烈士的家庭对待嘛!”

自1953年毛泽东视察安庆后,中共安庆市统战部每月补助陈松年家30元,在当地被传为佳话。

当安庆市委统战部第一次通知陈松年来领补助费,他连做梦也未想到毛主席及地方党政领导,对他家庭是这样的关怀,激动得

热泪盈眶，用颤抖的手签名领取30元补助费时，对着办公室里挂着的毛主席像深深地三鞠躬，办公人员争着同他握手，分享毛主席给他家的幸福。

知足常乐的陈松年，对此感激涕零。即使晚年，他也常对人说：

“当时真从内心感谢毛主席和地方上党政领导，全家人激动、幸福。这不仅是钱，而主要是政治上给了他及其全家的应有的地位。也许是这个缘故吧，自1953年毛主席视察安庆后，历经许多政治运动，尤其‘文化大革命’，未受过什么大的不公正的待遇和迫害。同时，那时物价低，30块钱很是值钱，帮助我解决了很大困难，4个儿女中，有3个上了大学，亏了这30块钱的接济。”

1990年，陈松年病逝前还对来访者多次说道：“早些年前，我的子女大了，都有了工作，经济有所好转，我也有退休金，曾多次提出这30块钱不能再要了，国家也有困难。但有关部门不仅没有接受我的要求，从1989年元月份起，每月补助费又增加了30元。说是物价上涨了，这是党和政府的一点心意，给我买点营养品补补身子，或者请个保姆照顾晚年生活，你看党和政府想得多么周到！我受之有愧，未能为国家做出什么贡献。”

毛泽东主席早已与世长辞，但他当年关心陈独秀家庭及有关部门几十年来给予陈独秀家庭的补助，至今在安庆古城仍被人们传为佳话和美谈，使人们从心灵深处感到，我们的党历来是实事求是的，尊重历史，凡是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过一些有益的事的人，党、国家、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他的家庭也是会得到社会尊重的。

## ◎困境中成长的孙辈

陈松年支撑的安庆这个普通家庭，仍不失为陈家书香门第。他的4个儿女在艰难的困境中，自幼沐浴着党的阳光，在延年、乔年

两个大伯父自创人生,为革命献身的精神激励下,勤奋好学,积极向上,各自走出了一条成才的人生之路,在各自的岗位上正在为四化建设出力,同时也为《陈氏宗谱》揭开了新的一页。他们——陈家的新一代,今又在何方,他们工作、学习、生活又怎样呢?这是鲜为人知的。

早逝的长孙女——长玮,工程师,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她,1961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生前在安徽省马鞍山钢铁设计院搞设计工作,与同校学友王德基志同道合,结为伉俪,同在设计院工作。她,因努力工作,劳累成疾,不幸于1984年患乳腺癌而早逝,时年46岁,生二女一男。每当陈松年同他人谈到长女长玮病逝时,他很悲痛惋惜地说:

“这孩子好学上进,很明事理,钻研业务,热爱生活和工作,也很爱好文学。可是,她走得太快、太早了,正是为国出力干事的时候。要是不死,她也该是高级工程师了。”陈松年又回忆说道:

“长玮出世不久,就随家漂泊江津避难,她爷爷病故江津时,她也守在一旁。她爷爷生前挺喜欢她,常常抱在胸前逗着玩。”

不善言谈的孙女——长琦。她,1941年避难时生于江津,1942年陈独秀去世时,她还是个两岁的孩子。她,四方偏圆脸,中等身材,浓眉大眼,举止文静,不善言谈。她和姐姐长玮一样,刻苦攻读,姐妹朝夕相处,亲密无间,体贴父母,放学回家,不是做功课,就是帮助母亲做家务,寒暑假同母亲一道去做小工或抬土方,赚几个钱交学费和买书籍文具。1965年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分配至云南昆明有色金属研究所工作,1976年经母亲四处奔波求人,调入安庆中国人民解放军4812工厂,现为安徽省政协常委、高级工程师。与生活道路坎坷的安庆二中一级教师罗小伦结婚,其夫为全国人大代表,安庆市政协副主席。

陈独秀孙辈中第一个共产党员、孙子——长琦,1947年生于四川江津。1975年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并留校任教,现为讲师。与

同校学友张浦东结婚，生一女。长琦是陈松年唯一的爱子，他与老伴窦珩光倍加喜欢，“望子成龙”——成为大学高材生。长琦自幼活泼，聪明发奋，小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取省重点中学安庆一中，进入中学更加勤奋读书。不料，1966年高中毕业时，十年浩劫打破了他及其学友考大学的良好愿望。于是他戴着红花，扛着背包，怀揣红宝书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面对黄土背朝天，顶着烈日修地球。然而，他脑海中仍然蕴藏着上大学的一丝丝希望，一天劳动下来，只有在油灯下伴随着书本耐心地盼望着，等待着！愿望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来了，1973年以高分冲淡了爷爷“陈独秀”三个字在政治上笼罩的阴影而考取工农兵学员，踏进合肥工业大学这所全国重点大学之一的大门。他和他的父母是多么的高兴，在那个年月，陈家的后代能获得这样的机会，是多么的难得！长琦进入大学后，勤奋学习，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当他看到校友李大钊的孙子入党时，他心中也涌起要求入党的强烈愿望——李大钊同爷爷陈独秀一道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孙子能入党，难道陈独秀的孙子就不能入党吗？于是，他鼓起勇气向学校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决心积极创造条件，接受党组织的考验。

然而，在那不可理喻的年代，中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的孙子要求入党，谈何容易！学校党组织接到陈长琦的入党申请书，表面上虽然表示热烈欢迎，并说了些热情鼓励的话，但还是感到棘手，于是不得不请示当时省委负责同志：陈独秀孙子能不能吸收加入党组织？省委负责同志明确答复道：

“党的政策历来是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面，只要符合党员条件，陈独秀的孙子也可以入党，何况陈独秀还不是敌我矛盾。”

陈长琦心中也明明知道，爷爷陈独秀的问题，必定影响他的入党。于是，他更加刻苦地学习，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主动向党组织汇报思想情况，接受党组织的考验和审查。这样，他终于于1974年光荣地加入了爷爷与李大钊等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成为陈家孙辈中

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喜讯传来，全家人高兴，尤其是父亲陈松年感到陈家在社会上的政治地位也在开始发生变化。现在，长琦还兼系党总支的工作，成为学校业务和党组织的骨干力量，肩挑着两副重担。长琦的长相很像他爷爷陈独秀，有人风趣地说：

“以后影视要找扮演陈独秀的演员，长琦是最适合不过的人了！”

不断进取的陈独秀的小孙女——长璞，生于1951年，是陈独秀安庆家庭孙辈中年龄最小的一个。然而，她却有不进取的精神，好学上进。她中等偏上身材，胖乎乎的白净脸庞，长着一双水灵灵的眼睛，高高的鼻梁上长着一颗圆圆的黑痣，就像一颗发亮的小宝石镶嵌其中，一头披肩长发，显得健美、洒脱而稳重，具有一种吸引人的朴素、自然的魅力，待人接物热情、真挚，往往未曾开口，先是朗朗一笑，给人一种纯朴亲切之感。不过，也许是历史同她开了个玩笑，使得她成为陈独秀孙辈中，唯一没有跨进过大学之门的人，她极为遗憾。

1968年，她初中毕业后，在热烈的锣鼓声中，回到安庆邻县的同城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是非颠倒的年代，小小年纪的她，还得忍受着爷爷“陈独秀”三个字给她政治上带来的默默痛苦、劳动、做事和说话，都得比其他人小心三分，干起来还得比其他人多干三分，争得好的表现，争取早日跳出农门。近3年的严寒酷暑的再教育，终于使得她换来了招工进城的喜悦——1970年进了安庆一家集体所有制小厂当挡车工，她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饭碗和荣誉，刻苦学习操作技术，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很快便成了一个熟练的挡车工，被厂里评为先进生产者。然而，她心里却埋藏着上大学的理想和心愿——她哥哥、姐姐都是重点大学的毕业生，而自己还是个“戴帽子”的初中毕业生，这怎能与陈家书香门第相称呢！于是，她默默地盼望和等待像哥哥那样的机会——成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机会终于来到了，根据她的表现和考试的成绩，几次

被车间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可是都未被推荐上。原因是人们的眼睛红了——她陈家都是知识分子,有好几个大学生,还是应让给没有大学生的工人子女上大学吧,来个一碗水端平。这样,她被排斥在工农兵学员行列之外,她气得偷偷地哭了好多次。妈妈窦珩光最懂得小女儿的心情,这个孩子好学上进,不甘落后,脾气又倔强,作为母亲当然也希望自己的爱女能上大学,这在当时既是一种政治荣誉,又可为陈家书香门第添上几分光彩。可是,哪有好事都能落在陈家的子女身上,想想别人说的也似乎有点道理,于是她安慰小女长璞道:

“你这个伢子,看起来像个男伢子,样样事好强,这么点小事就哭鼻子,也不怕别人看了笑话。”母亲摸抚着小女长璞,又说:

“妈妈理解你的心情,是个好伢子。古人说:行行出状元,你现在就好好学技术,说不定你还能成为像郝建秀那样的劳动模范哩……”母亲的一席话,说得长璞挥泪而笑。

事过若干年的今天,长璞说起这件事儿,她还觉得挺耐人寻味的。她写得一手好字,有一副好口才,同时又是文娱活跃分子,这样在厂里当上了宣传干事,后又调到一个剧团当会计,1981年调至安庆市图书馆古籍组当助理馆员。但她心仍不安,在哥哥、姐姐面前,她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妹妹,与之太不相称了,于是她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业余参加了安庆市委党校干部中专函授班学习获得了毕业证书,心里才算安了些。母亲去世后,她虽与合肥工业大学毕业的姜恒敬结婚成家,生了儿子,但她父亲生前仍同她生活在一起,精心照料年迈的父亲,使陈松年安度晚年。她还得接待四方的来访者。凡来访者,她都热情接待,实事求是地回答有关她爷爷陈独秀及其家庭的问题,尊重历史,不以个人感情而信口开河。她还常常给来信者复信,为他人提供资料,分文不收,还得贴邮资。她对待工作认真负责,钻研和熟悉古籍业务,对待读者有着火一般的心,当地报纸曾表扬她,是热心为读者服务的好青年。她平常总

是尽量“隐名”，不轻易使人看出她是陈独秀的孙女儿，她常对来访者说：

“名人后裔难当。既要处处维护名人之名，又要不以名人之名招摇过市，作为资本而获取什么……因别人的眼睛总是盯着你！”

她虽是一个步入中年的女性，但她的脾气和个性，却有点像她爷爷陈独秀那倔强劲儿。就拿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这件事来说，就是她这种倔强脾气的生动写照。要求入党是她多年的愿望，而她的哥哥长琦已为她做出了榜样，她想，不论何等的艰难险阻，我一定要实现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的愿望。为此，她多次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主动向党组织汇报思想情况，接受党组织的考验，以延年、乔年两个大伯父为榜样在日常工作中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努力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参加党的组织。尤其是她看了《开天辟地》电影后，这种愿望更为强烈，又向党组织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的努力、进取以及党组织的教育和考验，1992年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陈家孙辈中的第二个共产党员。

一代杰人之家，一个英烈之家，竟是这样的普普通通，而他的后裔，又都是在困境中成长起来的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为党、为国家、为人民辛勤地工作着……



---

## 第十六章

### 陈鹤年流离香港 妻子儿女遭厄运

---

#### ◎香港影院里的一位老人

1991年8月，繁华的香港，烈日炎炎，热流滚滚，热得人们无可奈何。

一天，一位身着T恤衫、头发稀疏、中等个儿、脸庞清瘦、年纪八旬的老者，在一位头发花白、面色白净，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50来岁的女士挽扶下，走进香港一流的星光电影院，对号入座在中间座位上，全场连他们在内也只有7位观众。

放映开始，银幕上出现四个鲜红的大字：“开天辟地”。这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反映和描写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题材影片。在这部长片放映近3个小时中，这位老者全神贯注，没靠椅背，也没讲一句话，完全沉醉于影片情节之中。

影片放完散场了，他依然坐在座位上凝视着银幕。当影院服务人员催他出场时，这位老者似乎才从沉醉中醒来，带着满口港音，无限感慨地对身旁的女士说：

“这是我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你爷爷比较公正的

形象。不过，你爷爷不太像，丑了点，脸再秀气一点，鬓角高一些就好了。”这位老者转脸对身旁女士说：“你看我的脸，很像你爷爷。”这位老者又惋惜地说：

“可惜，你奶奶一点儿不像。她长得秀气、文静、也漂亮，比那个演员好看得多。性情温和、善良，是一位慈爱的母亲。她很有文学修养，不仅懂得古诗词，还会写格律诗，讲起故事来娓娓动听，叫你听得入神、入迷。可是，你奶奶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你没能见到她……”

这位老者是谁？他就是陈独秀与第二位妻子高君曼所生的儿子陈鹤年；那身旁女士就是从北京来港探望他的长女陈祯祥。

陈鹤年流离香港已有30年没看过电影了。这次是她女儿陈祯祥从大陆来港探望他，在报纸上看到星光电影院上映《开天辟地》电影的广告，而陪他去的。女儿祯祥说：“爸，我今天陪你看电影去，好吗？”

陈鹤年诧异地说：“我与电影无缘，30多年没进过电影院的门，今天你要陪我去看电影？”

“爸，这是我在大陆刚看过的影片，写的是我爷爷的事。”

“大陆过去对你爷爷不太公正，拍的电影还能有什么好的形象，有什么可看的？”

“这部电影叫《开天辟地》，是描写爷爷和李大钊等人创建共产党的事，与过去拍的不同，你一看就知道。”

陈鹤年理解女儿的心情，同时又经不住女儿的劝说，只得同意去看这部电影。谁知电影一开始，就像一块磁铁一样，把他紧紧吸引住，随着情节发展，他思绪万千，浮想联翩。他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母亲的形象，又是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父亲没有被扭曲的艺术形象；他又想起当年颠沛流离的童年生活和坎坷、火热的青年时代……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老泪盈满眼角。女儿祯祥见老父亲动了感情，温柔地说：“爸，这么多年我没有和你生活在一起，你还是我童

年记忆中那样富有感情的爸。”

“阿祥，你爷爷、奶奶也是很注重感情的。人是有感情的高级动物嘛？”陈鹤年说着笑了，又说：“今天看到你爷爷比较真实的形象，我心里舒畅多了。阿祥，你说我能不动感情吗？”

“爸，历史总归是历史，任何人也改变不了。大陆也是尊重历史的嘛？”

“但愿如此，也该如此……”

## ◎颠沛流离迫居香港

陈鹤年，又名哲民，谱名遐和，生于1913年。为陈独秀与第二位妻子高君曼所生之子，是陈独秀4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也是迄今唯一健在的一位。

陈鹤年哇哇坠地来到人世间不久，就碰上父亲陈独秀反袁“二次革命”失败遭难之时，随父母和比他大一岁的姐姐子美，连夜乘船逃离安庆抵芜湖。父亲陈独秀一到芜湖，就被叛军逮捕，险遭枪决。自此，陈鹤年除1930年随母亲高君曼来安庆为姨妈（即高晓岚）奔丧外，再也没有回过故土安庆。

他的童年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父亲陈独秀为了革命四处奔走，他随父母辗转于上海、北京、广州等地，没有过过安定的童年生活。尤其他姐姐陈子美10来岁时，父亲与母亲感情破裂，他们姐弟随母亲独居南京破草屋，过着凄凉、贫困的生活，饱尝了童年的苦楚，给他们姐弟幼小心灵烙下了深深的印记。由于贫困生活所迫，他们姐弟二人十几岁就半工半读，进了职业学校学习求生的实用技术。姐姐子美学妇产科，他学电讯。1931年冬，他们慈祥的爱母高君曼不幸病逝；他们姐弟就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但他们并没有去上海找他们落难的父亲陈独秀，而是走着各自的自创人生的生活道路。18岁的姐姐子美，与在银行、供销社任职的张国祥结婚

时,他已学完电讯,后又到扬州上高中。在此期间,他获悉父亲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关在南京监狱,尽管他与姐姐子美对父亲陈独秀的感情存在着某些芥蒂,但他毕竟是自己亲生的父亲,于是陈鹤年去狱中探望父亲陈独秀。这是1930年他与母亲来南京定居后,第一次与父亲见面。年幼的鹤年为父亲的安全担忧,深知蒋介石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父亲的,于是他热血沸腾,头脑天真简单地对父亲说:

“父亲,你既入虎口,生命难保,十分危险,蒋介石随时都可能秘密地杀害你。因此,我准备组织人劫狱救你出去!”

“胡闹!你个小伢子懂得什么?千万别胡来!”陈独秀听了厉声斥责道。

好心的陈鹤年被父亲厉声斥责后,气得转身就走,再也没有来看陈独秀。这是他与父亲陈独秀一生最后的诀别。

陈鹤年在扬州读高中时,是个穷学生,生活清寒,但他刻苦学习,成绩很好,颇受老师的喜欢。读到高三时,陈鹤年又转到北京,高中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父亲陈独秀当年任教过的北大,在政法系读书。陈鹤年由于年幼就受父亲陈独秀的影响,同时他接触的大都是地下党的领导人,尤其他的两个哥哥延年、乔年光荣牺牲对他的影响,甚至在他的心灵深处埋藏着为两个哥哥报仇的种子,他在北大读书时,就以一颗火热的心,继承两个哥哥的遗志,加入了地下党,成了预备党员,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

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向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指使汉奸在冀东和察哈尔成立傀儡政权,国民党政府继续奉行不抵抗主义。陈鹤年同千千万万爱国青年一样,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义愤填膺,积极参加了由共产党领导的有数千学生参加的声势浩大的一二·九爱国示威游行。

这一运动迅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积极响应,形成了全国人民爱国运动的新高潮,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有情人终成眷属。在蓬勃发展的学生救亡运动中,陈鹤年认识

了民先队队员许桂馨，两人一见钟情，热恋而结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此时刚读到大学二年级的陈鹤年与许桂馨的爱情结晶——长女祯祥出世了，这给他们年轻夫妇带来了无限幸福和欢乐，但也给他们从事革命和抗日活动带来了困难。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面抗战。大批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爱国学生纷纷响应中共的号召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然而，陈鹤年夫妇由于女儿出世的拖累，未能如愿去延安，后来由地下党分配到北京西山抗日游击队，夫妇俩又全身心地投入抗战工作。陈鹤年由于学过电讯，在西山游击队负责收发报，并培养收报人员。那时，游击队的电讯设备很差，还是从国民党军队和日本人手中缴获的战利品，由于他认真负责，技术熟练，排除敌人的电波干扰，干得非常出色，受到游击队领导的表扬。妻子许桂馨则在西山做群众工作，积极宣传抗日，发动和组织妇女做军鞋、军用手套，支援抗日前线。陈鹤年夫妇在革命队伍中相亲相爱，相互鼓励，是志同道合的一对革命伴侣。那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既没有工资，更没有安定的生活环境，随着游击队四处奔波，出没于农村和山区。这一切都没有难倒他们，在艰难的斗争中锻炼成长。由于陈鹤年工作出色，党组织又派他到广西由地下党创办的抗日报纸去工作，妻子也随同去了广西。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抗日报纸，经常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干扰和破坏。1938年的一天，地下党获悉国民党特务要来捣毁抗日报社，通知工作人员立即疏散转移。陈鹤年在报社小阁楼上收发完最后的电讯时，国民党特务已荷枪实弹包围了报社，他从地下室才逃了出来。然后在地下党的帮助下，一家去了香港，先后在《光明日报》、《立报》任编辑、记者并兼收发报，是个多面手。他写得一手好文章，也许是受父亲陈独秀潜移默化的影响，他的笔锋犀利，并以“哲民”为名发表许多宣传抗日的文章。不久，他又奉命回到桂林，仍在地下党办的报纸做编辑和收发报工作，其间还当过一段时间的教师。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又起，由于他著文反对国民党而遭

到通缉，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全家又辗转到了香港。进《星岛日报》工作并正式定居香港。自此 50 多年间，陈鹤年再也没有回过大陆。

陈鹤年为人厚道，对工作一丝不苟，对技术精益求精，尤其译电技术高人一筹，所以，他在《星岛日报》一干就是几十年，又升为译电室主任，包揽了一层楼的电讯工作，直至今日 80 多岁高龄，仍在辛勤工作。他升为译电室主任后，工资也提高了，在香港与后妻生养的几个儿女也长大成人。他手中也有了点钱，但他并没有追求高消费，而是用来开办少年出版社，像他父亲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一样，把出版社的宗旨和对象定为面向青少年，先自办、出版月刊《学生文丛》，后改为《青少年》。1978 年，为呼应大陆振兴中华，建设四化，把刊物由社会科学调整为自然科学类科普读物，更名为《科学模型》，仍以青少年为主要读者对象，自写、自编、自办发行。他办刊严肃，既不哗众取宠，也不招揽刊登广告，明知在香港那样的花花世界里办这样严肃的刊物是赔本的事，而他还是矢志不渝坚持办下去，已出刊 100 多期。女儿祯祥在香港探亲时，不解地问老父亲：

“爸，你已 80 高龄了，苦了一辈子，何不享享清福。你又明知办这个刊物是赔本的事，我看不要再办了吧！”

“阿祥，当年你爷爷提倡‘科学与民主’，发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今天振兴中华，建设四化，同样需要这两样东西。办这个刊物，旨在向青少年传播科学知识，也算是我这个海外赤子对祖国尽了一点微薄之力。”陈鹤年对女儿祯祥意味深长地说。

陈鹤年这位 80 多岁的老人，青少年时代历经流离、坎坷和沧桑，独居香港 50 多年，耳闻目睹了香港由贫穷发展成举世闻名的繁华大都市，然而，他“两耳不闻窗外事”，对政治概不过问，但他是一位深深热爱祖国的老人。1949 年 12 月广州解放后，他就把 12 岁的长女祯祥和 9 岁的次女祯荣送回大陆读书，希望自己的子女在新中国接受教育，长大成才，更好地为祖国建设服务。为此，1952

年他与夫人许桂馨商定，由夫人带着他们的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在大陆定居，心里充满了阳光和希望。他万万没想到，与妻儿这一别，近40年没有能再相聚；他更没想到，妻儿在大陆几次政治运动中因“陈独秀”这三个字，给他们带来的厄运和灾难……

## ◎女成右派妻“逼”离婚

1979年10月，北京金风送爽，红叶满山，层林尽染，一片秋色。

一天，一位中年妇女兴冲冲来到北京党史展览馆。随着参观人流，她步入宽敞明亮的展览厅，在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身着西装的大幅肖像前，伫立良久。她看得是那样的入神、入迷，近看、远看，仔细地端详，揉揉眼再看。一面看，一面抄写文字说明。看着，抄着，不禁两眼润湿，心潮起伏，直到展览馆关门铃响，她才恋恋不舍地走出展览大厅。她就是陈独秀的孙女、陈鹤年的长女陈祯祥。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爷爷陈独秀的照片，怎能不使她心潮激荡呢？

1937年，陈祯祥出生时，他爷爷陈独秀还关押在南京监狱，她出生后，就随父母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失去童年的幸福和欢乐。1949年12月，广州解放后不久，热爱祖国的父母便把12岁的她和9岁的妹妹祯荣送回祖国怀抱，就读于北京的学校。她们姐妹俩和许多孩子一样，天真烂漫，甜蜜地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儿，脖颈上戴着鲜艳的红领巾，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跨进学校门，在五星红旗下茁壮成长。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正在北京读初中的陈祯祥刚满13岁，她热血沸腾，瞒着父母，也没听从师友的劝阻，毅然报名参军，要去朝鲜前线打美国鬼子。当她没有被批准时，还哭鼻子，带兵的首长拉着她的手说：

“小姑娘别哭，美国鬼子是哭不倒的。你好好学习，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待你长大了，下次一定带你去打美国鬼子！”

陈祯祥年纪虽小，但好学上进，生性倔强，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参加志愿军未能如愿，心中不甘，于是她就向团组织申请，要求加入青年团，可是，她的年龄又不够，团支部书记鼓励她说：

“你要求进步和参加团组织，我们欢迎，待你长到16岁，团组织一定接收你入团。”

陈祯祥据理力争：“刘胡兰当年入党年龄也不够，只有16岁，党组织不是破格吸收她入党吗？难道入团就不能破格吗？”

“刘胡兰是英雄。”

“英雄也是人，她入党时还没成为英雄。”

团支部书记被陈祯祥这种要求进步和要求入团的强烈愿望感动了，向学校团委作了如实反映。校团委经过认真考虑和研究，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当年底就吸收她为青年团员，为许多同龄学友所羡慕。在中学和大学读书时，她都是学生干部。

那时，首都北京每年都举行“五一”、“十一”盛大庆祝游行，那沸腾欢乐的场面是多么令陈祯祥向往，尤其还能见到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那是多么的幸福！她入团以后，获得参加庆祝“五一”、“十一”盛大游行的资格，尤其使她不能忘记的是1957年“五一”劳动节，她作为游行队伍的仪仗队队员，身着盛装，手捧鲜花，兴高采烈地站在天安门东侧的华表下，当毛主席神彩奕奕地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她挥舞着鲜花，尽情地欢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此时，她感到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她还听了彭真同志代表党中央宣读的整风决定。当时，她想自己是一个团员，要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整风运动。

不久，一场整风反右的风暴无情地席卷着神州大地，大字报铺天盖地，无数人遭殃。正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陈祯祥，怀着帮助



党整风的天真幼稚的愿望,在院领导的再三动员号召下,她动心了,鼓足全身勇气,总算“鸣放”了一炮——学校图书资料少,新老师多,教学质量不高,建议院领导采取措施,边整边改。她万万没想到,一条意见却招来了“弥天大罪”,反击她的大字报四处贴满,批判会一个接一个:

“陈祯祥给教学质量提意见是假,否定党的教育事业是真!”

“陈祯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企图在教育战线上打开向党进攻的缺口!”

“陈祯祥,你必须老实承认,你是中国最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的孙女,你父在香港,你反党是有意识的,你是天生的右派!”

“陈祯祥对党不满,对党怨恨是有阶级根源的!你爷爷陈独秀不开除出党,你父亲至少是中央的一个部长,你想上哪个学校就上哪个学校,不会来师范学院的,所以,你早就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

……

一时间,帽子满天飞,棍子一齐打,压得陈祯祥喘不过气,抬不起头,她偷偷地哭泣,冥思苦想,她连爷爷陈独秀是个什么模样都不知道,难道爷爷有问题,后代就一定会反党?难道定居香港的人都不是好人?子女也不是好人?……她怎么也想不通,辨不清。起初,她在班上党支部的促帮会上,她还为之反驳,但几次班级和系的批判会把她批驳得“体无完肤”,压下了她的“反党气焰”——沉默不语,听天由命。运动结束,她这个“天生右派”终于落网,被定为二类右派,开除团籍,劳动察看,以观后效。从此,陈祯祥心中一股热爱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青春之火几近熄灭,她为此痛哭了好多天……

陈祯祥非常热爱自己善良的母亲许桂馨。她在学校里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处理,起初还瞒着在一家职工医院当司药的母亲

许桂馨，怕母亲承受不了这种意外的政治打击。后来，当母亲从她同学的口中得知此厄运后，如同晴天霹雳，天旋地转，悔恨自己当年目光短浅，觉悟不高，千不该万不该跟陈独秀儿子结婚，害得自己的爱女成了右派。此时，她才初悟出“陈独秀”这三个字的份量及其给儿孙辈带来的政治阴影，她愁得生了一场大病。在病中，她愁肠寸断，痛心疾首，左思右想，为了使在大陆就读的几个子女不再遭受陈祯祥的厄运，摆脱陈独秀的政治牵连，含着泪水，毅然提出与在香港的陈独秀的儿子陈鹤年离婚，彻底与陈家断绝亲情。后经北京中级法院和香港代办处联系，于1958年批准双方协议离婚，规定陈鹤年每月给其子女抚养费人民币60元。

然而，“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以及“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封建传统思想和反动的血统论，在那个极左年代甚为风行，许桂馨虽然与陈独秀之子陈鹤年离婚划清界限，但照样将她家打入另册，子女们依然因陈独秀的问题牵连入不了团，政治上受人歧视。1964年在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时，她的三女儿陈祯庆因写批判陈独秀的材料少，说她与陈独秀未划清思想界限，立场不稳，为此从北京某师范学校毕业后，迟迟不分配工作，让她到植物园劳动锻炼，改造思想。为此，全家通过反复讨论并决定，由二女儿祯荣写信通知在香港的父亲陈鹤年，每月的60元抚养费也不要了，以表示彻底与陈独秀划清思想界限，以求安生。这样，许桂馨这位善良的母亲及其儿子长长地松了口气，似乎解脱了套在脖子上的精神枷锁，扫除了“陈独秀”三个字笼罩在这个家庭的政治阴云，以为从此再也不会受陈独秀问题的株连了。

## ◎“文革”中妻儿灾难深重

许桂馨一家人太天真了，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照样受陈独秀问题的株连，全家5口无一人幸免，遭受了更为深重

的政治灾难。

人们也许还记得，在“文化大革命”烈火燃烧时，《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上，以显赫的标题，发表了这样一篇举足轻重的大批判文章——《彻底批判中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在这篇大批判文章的烈火燃烧下，陈独秀在北京的儿孙们再遭厄运，一个也没有逃脱被烈火焚烧的命运。

——长女陈祯祥。所任教的中学造反派在全校群众大会上宣布她是陈独秀的孙女，勒令她检举揭发陈独秀并交出陈独秀的照片。陈祯祥从来没见过爷爷陈独秀，也没见过陈独秀的照片，她哪里交得出。于是便把她的档案抛出来，说她是右派翻天，包庇陈独秀，是陈独秀的孝子贤孙。于是对她关押、抄家、残酷批斗，实行专政，以致患上全身病症。陈祯祥把“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当作信条，所以平日教学认真，教学质量高，她所教的班级学生在考高一级学校的录取率高，曾受到校长的表扬。与她同在一所学校任教的丈夫刘邵，教学也很认真。这样，造反派把她夫妇俩和校长打成反党“三家村”，还写批判文章在报上发表，对她及其丈夫进行攻击污蔑，置于死地而后快。她的丈夫刘邵竟被迫害致死，被造反派宣布为“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还勒令她检举揭发丈夫的罪行，划清界限，争取宽大处理。陈祯祥经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而病倒，即使这样，造反派还是不放过她。

——母亲许桂馨。1952年携儿女在大陆定居，一直在一家职工医院当司药。平时工作负责，勤勤恳恳，为儿女含辛茹苦，很少言语，医院里的同事没有人说她不好的。尽管她与原夫、陈独秀之子陈鹤年离了婚，但她毕竟曾是陈独秀的儿媳妇，灾难依然降落在她的头上，被诬蔑为“特务”、“坏人”、“陈独秀的孝子贤孙”，无情地关进“专政对象学习班”，批斗、逼供信……后又被迫下放劳动，吃够了苦头。

——次女祯荣。在“文化大革命”的“红海洋”浪潮冲击下，曾一

度将名字改为“陈红”，但这“红”字并没有给她增添一点喜意，反而被扣上“为陈独秀翻案，进行阶级报复”的罪行，后又被定为“五一六”分子，关进专政的学习班，严刑拷打、审问，达半年之久。

——三女桢庆。只因买毛主席像章时随口说了一句：“6角钱贵了些！”就这么一句话，便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说是毛主席像章不是商品，只能说“请”，不能说“买”，这是对毛主席的诬蔑。又说，毛主席像章是无价之宝，“6角钱贵了些”是对毛主席的贬低，于是，陈桢庆被戴上了双料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加之她又是陈独秀的孙女，罪加一等，四处游斗。此时，她是第一次怀孕临产，吃尽了苦头，她和她的丈夫及孩子的身心都受到极大的摧残，致使她至今双手痉挛，用不上力气，拿不住东西。

——小儿桢祺。“文革”开始那年，他刚18岁，清白得如同一张白纸，但因为他是陈独秀的孙子，又有父亲陈鹤年在香港的港台关系，所以参加红卫兵不到两个月，便被剥夺了参加一切政治活动的权利。但他并不气馁，写血书，要求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68年8月，他被分到内蒙古武川县插队。他吃苦耐劳，事事干在前，又少言寡语，谨小慎微，又因他是陈独秀的孙子，连贫下中农的会议都不准他参加，视他为专政对象，贫下中农们连孩子都不让靠近他。他哭了，这是为什么？他出世时，爷爷陈独秀早已病逝了，连爷爷的照片都没见过，爷爷究竟是些什么问题，为何又牵连到他？他怎么也想不通……无奈，他发愤努力，拼命劳动，第一年就干了460个劳动日。即便如此，仍然不能改变他的处境，多次要求入团，团组织不予理睬。快满25周岁时，怕超过入团年龄，他在油灯下又写了一次入团申请书，团组织仍然不理睬，还要他死了这条心，团组织的大门是向贫下中农子弟敞开的，不是向牛鬼蛇神狗崽子开的。1974年，北京派人到内蒙古知青插队的县社招工、招考教师，尽管县社一致推荐陈桢祺，又因他是陈独秀的“贤孙”而被排斥在外，招考的人说：“这号人不适合

当教师，也不适合回北京。”

与他同去内蒙古武川县插队的 300 多名知青大部分陆续招工回北京，到 1976 年时，只有他一个人还在靠挣工分吃饭。他 3 次参加高考，成绩都不错，还是因为他是陈独秀的孙子而被拒之于高等学府大门之外

历史值得回顾。解放前，陈祯祥的父母因为是陈独秀的儿子、儿媳，被国民党当局视为共产党，多次被通缉逮捕，过着如同惊弓之鸟的生活，最后只得流落到香港。解放后，陈祯祥父母怀着对祖国的一颗赤子之心，把她及其弟妹们送回大陆读书，期望子女长大成才后为祖国建设出力。万万没想到，因为是陈独秀的孙子、孙女，在政治上受歧视、受迫害；十年浩劫中，又因为是陈独秀的“孝子贤孙”，屡遭厄运，被冠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受到种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磨难。这究竟是为哪一桩呢？陈祯祥沉思、痛苦、难过、彷徨……但是，在那极左的年代，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声，到哪儿去诉说呢？生性倔强的陈祯祥不甘心当“反革命”，于是，她瞒着母亲许桂馨接二连三地写信申诉、上诉，而这一切不仅无济于事，反而罪加一等——“翻案”！接踵而来的，又是拷打、审问、逼供……

## ◎盼来噩梦醒

在那妖风四起的日子，陈鹤年在北京的子女，如同生活在黑夜里，盼星星，盼月亮，盼望噩梦醒……

这一天终于盼来了，万恶的“四人帮”倒台了，又迎来了第二次解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解决历史问题，正本清源。1979 年，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关怀下，北京市给陈祯祥一家落实了政策，彻底平反。陈祯祥一家终于从噩梦中醒来，获得了新生，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她的母亲许桂馨年近八旬，退休在家安享幸福的晚年，与祯祥生活在一起。陈祯祥对母亲极为孝顺，生活照顾

入微。陈祯祥现在北京经济学院任教,为副教授。陈祯庆现在北京民建市委工作,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而勤奋地工作。陈祯荣现在北京针灸骨伤学院工作,为副教授。生活道路坎坷的陈祯祺已全家去香港定居,协助父亲办《科学模型》月刊,并在这个刊物上连载他自己写的有关电子计算机的科普著作,显露其才华。

1984年,陈祯祥及其弟妹们喜出望外地见到了从未见过的安庆三伯父陈松年,使失去几十年联系的陈独秀后裔,又结根攀缘起来……

1992年5月,陈祯祥自费去了爷爷陈独秀晚年生活并病逝于四川省的江津县,探寻爷爷当年的足迹。她在江津县委统战部同志的陪同下,凭吊了江津修复的爷爷陈独秀的原墓址。她又沿着当年爷爷陈独秀的足迹,登上了僻静的鹤山坪,当她走进爷爷陈独秀石墙院破屋故居时,她不禁哇地一声哭了,她简直不敢想象,当年爷爷陈独秀在这僻静、落后的山村是怎样生活的,又是怎样在这年久失修、破烂不堪的石墙院破屋度过他那晚年最后日子的。接着,她又不顾旅途的疲劳,风尘仆仆地赶到自己的故乡——安庆,参加北京党史学会在这里举行的第二届陈独秀研讨会。在会上,她含着泪水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名专家、学者,倾诉了她父母及其一家所饱尝的坎坷、流离、曲折、辛酸的生活,声泪俱下,揪人心肺,催人泪下……

在故乡安庆,她又与陈独秀在安庆的孙辈——她的弟妹们长琦、长珺、长璞相逢,悲喜交加,四姊妹热烈拥抱,热泪盈眶,叙述各自的苦楚和手足深情。四姊妹又同去凭吊了爷爷陈独秀的墓,他们伫立墓前久久沉默缅怀,泪流满面,不愿离去……

---

## 第十七章

### 陈子美命运坎坷 偷渡海外无音讯

---

十年浩劫灾难深重，一片白色恐怖。多少人被迫害致死，又有多少人被投进大狱，多少家庭被迫妻离子散，几多辛酸，几多愁苦……不甘冤死的人们，唯有活路一条——逃，只有逃，逃出境外，也许还能有一线生存的希望。即使被边防军打死，也好一死为快，总比被活活折磨死好。

一天深夜，雨雾霏霏，广州珠江口有一位50多岁、披头散发、遍体鳞伤的女子，用了她一生的积蓄和首饰，秘密请人用一只汽车轮胎，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漂江过海，偷渡香港……

这位女子就是陈独秀与第二位妻子高君曼所生的女儿陈子美。

#### ◎幼年辛酸婚姻不幸

陈子美，生于1912年，比弟弟鹤年长一岁，为陈独秀与高君曼所生之长女，也是陈独秀4个女儿中唯一的生存者。子美，乳名“螭子”（蜘蛛的一种），也作“喜子”，有时也写作“洗子”。其意是陈独秀当年与高君曼

自由相爱而出走家庭，独居杭州的结合产物，此时陈独秀又荣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可谓是“双喜临门”。故陈独秀为女儿起乳名“蝎子”，以示喜庆之预兆。

陈子美与他小一岁的弟弟陈鹤年，是童年的游伴，亲密无间，同样是颠沛流离，辛酸，失去了童年的幸福和欢乐。她10多岁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之时，陈独秀忙得不可开交，顾不上家庭，子美姐弟俩很少见到父亲。此时，他们的父母感情破裂，家庭不幸给他们年幼的心灵罩上了一层深深的阴影。后来，他们姐弟又随母亲离开上海独居南京破草屋，过着一贫如洗的凄凉生活。生活所迫；她与弟弟鹤年不得不半工半读，进了职业学校，她学妇产科，为就业学得一技之长。她聪慧过人，学习勤奋，成绩又好，很讨学校和母亲高君曼的喜欢，放学回来还得照顾生病的母亲。她快毕业之时，她的母亲高君曼贫病交加，久病无钱医治，含愤而死。自此，他们姐弟俩就各自走着自创人生的艰辛之路。弟弟鹤年去扬州读高中，准备报考大学，她在他人的同情和帮助下，进了一家医院当见习助产士，开始了独立生活。

子美长得白净漂亮，热情洒脱，逗人喜爱。少女情窦初开之时，不少“白马王子”在追求她，一个偶然的机，她与比他大10岁、在南京银行和供销社供职、家境又不错的张国祥相识，以至相爱。他们定亲和结婚时，母亲已去世，父亲又落难在上海滩，成了国民党当局通缉的共产党首领，处于危险之中。她只得求外婆、高君曼的生母六氏夫人作主，成全了她与张国祥的婚事。张国祥生于1902年，家为菜农，读书勤奋而谋了职。其实，他与子美结识前已经有妻室子女，但他一直瞒着天真无邪的子美。纸是包不住火的。1936年，当子美生第三个孩子即二女儿张树德时，家庭经济拮据，生活困难，发现张国祥似乎有外遇，在补贴情妇。这时，子美才如梦初醒，始知丈夫张国祥已有妻子儿女，自知成了张国祥的妾，如同蒙受天大耻辱，难以容忍，与张国祥大吵并要与之离婚。张国祥无奈，



只得与原妻蔡氏离婚。然而，蔡氏离婚不离家，还得给她生活费。子美顾全大局，只得忍受着，但这给他们的家庭生活笼罩上了一层阴影，常有争吵。事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南京失陷，子美、张国祥携二子三女避难重庆，子美在重庆又进一步深造妇产科。1938年8月，她的父亲陈独秀偕同少妻潘兰珍以及陈松年一家，也避难江津。江津与重庆毗邻，交通比较方便，子美曾多次要去江津看望父亲，但张国祥却死活不让她去。这是怎么回事呢？1932年，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后关押在南京监狱，此时张国祥与子美已定亲、完婚，子美带着张国祥去狱中探望父亲陈独秀，父女狱中相见悲喜交加，百感交集。当子美把自己与“白马王子”张国祥的婚事告诉父亲陈独秀，陈独秀听了十分不快，厉声斥责道：“年幼无知，后果不堪设想！”

对此，子美听不进，张国祥尴尬、恼火，父女俩在狱中争吵了起来，子美与和张国祥气得转身就走。对此，张国祥一直耿耿于怀，所以在重庆避难期间，他不许子美去江津看望岳父陈独秀。子美从小受父亲的影响，性格也倔强、刚烈，本来对父亲就存在某些芥蒂，感情淡漠，丈夫张国祥又不让去，她也就不再坚持。

1939年5月，日本飞机对陪都重庆实施战略性大轰炸，一片惨象，目不忍睹。子美一家险遭轰炸，吓得心惊肉跳，于是又匆匆逃离重庆到香港。逃离重庆时，未来得及从友人家接走两岁女儿张树范，因此而失散，后来知其音讯时已病死于重庆。

子美一家在香港小住后，又取道回上海。不久，子美与张国祥的感情彻底破裂，带着4个儿女另租房分居，无限痛苦。然而，命运之神似乎与她作对，她的长女张树仪不幸一跤摔坏了右腿，生活使得她更加难以煎熬，她对丈夫张国祥怨恨万分。抗战期间，上海滩物价一日三涨，生活水平高，开销大，除张国祥给的生活费外，子美又无其他任何经济来源，生活越来越难过。同时，子美幼年就与母亲生活在南京，习惯于南京生活，费用开支要比上海小，于是她带

着子女到南京住在下关，过着像她母亲当年带着她与弟弟独居南京那样辛酸、穷愁的生活。子美一直提出要与张国祥离婚，张国祥拖着不办，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她才与张国祥正式断绝关系。张国祥不给她及其子女的生活费，一个弱女子哪能养得起4个儿女？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子美只得忍心割爱，丢下亲生儿女，毅然离去……子美去往何处？很少有人知道。

### ◎从不向孩子提起外祖父

陈子美忧愁、无奈、含泪独身而走，在南京下关车站几度徘徊、犹豫，何去何从？经过一番思考，她乘车又悄悄回到上海，隐居下来，不与子女更不与前夫张国祥有任何联系，她对张国祥之恨可谓是刻骨铭心。她凭着一手妇产科的医术，在一家医院谋得助产士一职，过着默默孤独的生活。不久，她又结识了李焕照先生，并同他结了婚。此时，人民解放军开始大进攻，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已摇摇欲坠。上海形势十分吃紧，许多有钱人家纷纷逃往台湾和香港，子美和李照焕无力出走，只得与千千万万的上海人一样等待着解放。子美又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叫宝堃，乳名叫“宝宝”；小的叫莹堃，乳名叫“毛毛”。这给他们夫妻在战乱生活中带来极大的欢乐。此时，子美下决心做了绝育手术。

解放后，子美与李焕照仍然定居上海，成了光荣的劳动者，子美仍当产科医生。尔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陈子美只得隐其父亲陈独秀之名，除了组织上之外，其他人并不知道她是陈独秀的女儿。她深切地感到，在那个年代，“陈独秀”这三个字内在含义及其潜伏的“政治危险性”，这如同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一旦爆炸，政治厄运在所难逃。所以，她待人接物谨小慎微，除了做好工作之外，“两耳不闻窗外事”，奉行“保身哲学”。她对与前夫、后夫所生的子女从不提起他们的外祖父陈独秀，以免增加子女

的政治压力，子女也不知道外祖父就是赫赫有名的陈独秀。

50年代初期，子美与张国祥所生的有3个子女在上海读书。长子张肇山、长女张树仪先后参军离开了上海。张肇山参军后，被保送到南京航空学院学习，后被人政治陷害屈死于狱中，时年只有20几岁。20多年后才得以平反。可是，其父张国祥早已病故，其母杳无音讯。张国祥生前不让儿女与他们的母亲子美来往，一旦发现，即是一顿惩罚。子美与张国祥所生二女儿张树德在上海读书时，一次，偷偷去看了母亲子美，母女相见，抱头痛哭，泣不成声，难舍难分。后来被张国祥知道，张树德挨了一顿毒打，并要她立下保证，日后不准去看母亲。然而，有一件事却也奇怪，张国祥对子女也从不提起他们的外祖父陈独秀。二女儿张树德1953年初中毕业时，填履历表中的社会关系一栏，不知如何填写，而又必须忠诚老实，这时张国祥才不得不告诉她，外祖父是陈独秀。天真的女儿听了“呀”地一声惊叫，好一会儿又不解地问父亲：“是不是历史书上讲的那个陈独秀？”

张国祥看看女儿，一言未发，只是点了点头。

张树德为了证实陈独秀是否真的是自己的外祖父，又偷着去问母亲子美：“妈，爸说，陈独秀是我的外祖父，是不是？”

子美不仅没有回答女儿，反而厉声地斥责：“你外祖父早死了，你问他干什么？今后少问！”

已是高中学生的张树德，从母亲斥责声中似乎也得到了证实，从此再未问过母亲。直到1956年，张树德考取山东大学，向母亲告别时，子美才给她看了外祖父陈独秀的照片，同时还给她看了四舅鹤年一家的合影照片。这时，她才知道还有一个舅舅在香港。子美还兴致勃勃地指着照片上的陈祯祥，对女儿张树德说：“她与你年纪差不多。据说，现在北京读大学。”

不久，子美和李焕照全家迁居广州。次年即1957年暑假，张树德从上海特地去广州看望母亲，李焕照先生也十分高兴。万万没有

想到,两三年后,在风云变幻的极左年代,张树德同母亲陈子美失去了联系,直至今日,她也不知母亲在天涯何方?

### ◎陈子美今在何方?

“文化大革命”中,陈子美偷渡香港,又飘落何方?后来她去了加拿大,居住在华人区。先在华人开的医院里当产科医生,手中积蓄了些钱后,私人开办了产科医院。她的医道高明,很受华人的欢迎。

人们不禁要问,陈子美死于“文革”,不仅见于《陈独秀传》等史料,连她现在定居在广州的丈夫李焕照,也听说子美死于“文革”,因李先生当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投入大牢。那么,又是怎么知道她被人用汽车轮胎偷渡香港,后又去了加拿大定居的呢?这还得从陈祯祥 1991 年到香港探望父亲陈鹤年说起。

1991 年,陈祯祥在香港探亲期间,一天到父亲一位邻居的阿姨家中去玩,这位阿姨见她的长相、走路的姿势、说话的神态,使她想起了在加拿大认识的一位产科医生,并对陈祯祥说:“阿祥,你的长相很像我在加拿大认识的一位产科医生。”

“是吗,她叫什么名字?阿姨。”

“她姓陈,名字叫子美,年纪近 60 岁。”

“啊!”陈祯祥听到“陈子美”三个字,不禁惊讶地叫了起来,又反问道:“阿姨,她叫陈子美?”

“是的,阿祥,你认识她?”

“我姑妈也叫陈子美。”

“哪有这么巧。”

“阿姨,她是什么地方人?”

“据说,她祖籍是安徽人。”

“她是什么时候到加拿大定居的?”

“听她说,是大陆‘文化大革命’中,她在广州被打成反革命,还有什么牛鬼蛇神,被批斗游街,身上打了许多伤。她丈夫又被抓去坐牢,实在没法过下去了,就把身上剩下的钱和首饰给了渔民,然后用汽车轮胎,冒着生命危险,正好那天夜里又下雨雾,就偷渡到香港……”

“阿姨,你说的这位产科医生,就是我姑妈,她也是产科医生。我们都以为她死了,要不是你说,我们还不知道她还活着。太谢谢阿姨了!”

“不用谢,我也不知道她就是你爸阿姐,要知道早告诉陈先生了。这真是无巧不成书了。”

“阿姨,你可知道我姑妈现在加拿大什么地方?”

“阿祥,我已回香港多年了,听说,她后来到什么地方开产科医院了,现在可不清楚她在什么地方……”

后来,陈祯祥通过各种渠道,各方打听,仍未获得有关她姑妈陈子美的音讯。陈子美如果健在的话,也有80多岁了。可是,至今任何亲人,包括她在大陆的儿子以及健在的丈夫李焕照先生,都不知她是生还是死,迄今仍是一个谜。

但也有人分析,陈子美如果健在的话,听到祖国大陆如此大的变化,一定会设法与子女联系的,否则,为何20多年过去,未见她一个字呢?

---

## 后 记

风风雨雨十多年，几易其稿，终于把《破屋春秋——陈独秀一家人》一书写了出来。

事情起始于1981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东风劲吹神州大地，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拂去历史尘埃，许多人和事，恢复了“庐山真面目”。应一家报纸之约，写一篇有关陈独秀家庭及其子孙今昔的专访。这样，我虽然在陈独秀故乡安庆工作、生活20多年，几经打听，才第一次迈进陈独秀之子陈松年先生的家门。那时，陈松年先生已届古稀之年，是安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住在安庆西门任家坡两间极其普通的老式破旧房屋里，室内摆设简陋，唯一吸引我的是挂在墙上的陈独秀与结发妻高晓岚的两帧发了黄的照片和中央人民政府1954年元月颁发的陈独秀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两烈士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在采访中，陈松年先生侃侃而谈他们陈家及其后裔，在陈独秀奔走革命以及逝世后的几十年间所饱受的人间沧桑和充满了悲欢离合的心酸。然而，春风已经吹进这个普通的家庭，开始受到社会的尊崇。

此后，我同陈松年先生一家交了朋友，闲暇之时常与陈松年先生聊天侃山，久而久之，耳濡目染，越来越感到这普通家庭不普通，陈独秀与其一家人，充满了悲欢离合。陈独秀也是一个有血有肉、重感情的人。同时

也感到，陈独秀与一家人的悲欢离合，从某个侧面也折射出他那曲折坎坷的一生。随着改革开放、民主进程的加快，尤其中共《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后，陈松年先生及其家庭政治环境越来越宽松，又获得新住房一套。同时外地研究陈独秀的专家学者来信来访日益增多，大都是了解其家庭及后裔的情况。这样，我就悄悄萌发了写作本书的念头。

写作本书尽管受了一点挫折，但初衷不仅未改，反而横下一条心，来个破斧沉舟干到底。为此，1992年10~11月，在安庆市针织总厂及其厂长黄文才的资助下，作者逆江而上，到陈独秀晚年生活、归宿之地——四川省江津县考察、采访，寻觅故人的踪迹，从而获得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感情世界也有了质的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在江津考察、采访时，得到江津县政协及县政协主席宋正棋、文史办公室王增辉、侯铁生、廖掀等先生的热情接待和支持。尤其70多岁的侯铁生先生不顾高龄，陪同我采访、考察了陈独秀故居鹤山坪石墙破屋、白沙和陈独秀原墓址等。从江津考察返回后，即动大手术修改，重新谋篇布局。以陈独秀祖籍陈家破屋和江津石墙破屋为主线，详尽地写了陈独秀的家世、家业兴衰、先辈及其与一家人的悲欢离合等。笔下的人和事，揪人心肺，催人泪下，特别是写陈独秀穷困潦倒的晚年及其避难江津的一家人的艰辛、少妻潘兰珍对陈独秀的真挚爱情时，作者几乎是流着泪写的，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得到许多单位和朋友的热情支持、帮助、鼓励和指导，除上面说到的外，主要还有：江苏省第一监狱、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安徽省第二

监狱、安庆市政协文史办、安庆市档案局、安庆市图书馆、安庆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以及陈独秀孙子陈长琦、孙女陈祯祥、陈长琦、陈长璞，还有丁海椒、周文华、陈荣升、王文杰、罗昌一、袁春荪、曹润华、许振轩、刘欣、崔贤明、蒋放、操群、陈政敏、周恒昌、詹叔媛、徐吉祥等。同时，也参考了有关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作者并非历史学者，由于水平有限和学识浅陋，以及资料之限等客观条件，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学者和读者不吝教正。

作者

1993年8月于古城安庆